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大管家——联合国秘书长们



编者的话

联合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从成立到今，已有 52 年的历史。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它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有曲折，有错误，也有成绩，而今它已渐趋成熟，对世界和平与人类的进步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世人的瞩目。它的成长主要是世界各国努力的结果，但也是与联合国历任行政首长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

《世界大管家——联合国秘书长们》一书，介绍了第一任到现任的七位秘书长。他们的出身、经历、特点和他们在联合国任内的主要活动与业绩等在书中都有阐述。他们虽来自不同的国度，有着各不相同的经历，但大都能努力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世界经济与发展，为保障妇女与儿童的权利等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编撰过程中，作者参阅了大量中外文材料。因此本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但由于编著者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世界大管家——联合国秘书长们

敢作敢为、驰骋风云的联合国大厦奠基人

特里格夫·哈尔文丹·赖伊

人们对挪威特里格夫·哈尔文丹·赖伊的名字较为陌生。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联合国诞生之日起走马上任的首任秘书长。曾经驰骋于国际政治大舞台达七年。他是一个充满矛盾型的人物，他不仅担任联合国的最高行政首长，而且面对国际局势，尤其是在大国意见对立时，他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与观点。被指责为“亲苏”，“亲美”，而最终遭到苏联的反对和仇视，又遭到美国的反对，落得第二届任期未届满便辞职的结果。不管怎么说，毕竟特里格夫·赖伊的名字是最早载入联合国史册的。他有功也有过，是那个时代所产生的一位“特殊”的历史人物。

著名的政治家与外交家

特里格夫·赖伊是挪威著名的政治家与外交家，在西方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也颇有影响。他于1896年7月16日出生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一个木匠家庭。在他年幼时，父亲便离开了人世，从此一家人生活无着落，年小的赖伊，不得不自己谋生。起初他在奥斯陆工党总部当工差，以后一直半工半读维持自己的学业。由于他勤奋好学，1914年考上了奥斯陆的克里斯蒂尼亚大学，攻读法律，课余时间他仍是一名工党总部的工差。1919年在克里斯蒂尼亚大学获得法律学位后，从事劳工律师职业。

赖伊在小学读书时，受到一位社会改良主义教师的影响，很早便参加政治活动，15岁加入工会联盟青年团，高中时便当选为奥斯陆近郊阿喀尔工党地方支部主席。大学毕业后，还曾兼任工党总部秘书。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初，挪威处于经济萧条、工潮起伏时期，赖伊被任命为工党联合会法律顾问，从事调解劳资纠纷工作，在工人中享有一定声望，成为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工党在农民党的支持下，组成了联合政府，赖伊出任司法部长。不久，他当选为议员，3年后调任商务部长。1940年挪威被德军占领后，他即随政府流亡伦敦，1941年被任命为挪威流亡政府的外交大臣，一直到二战结束。在任外交大臣期间，他参加了许多错综复杂的外交谈判和会议，这些谈判与会议所涉及到的问题几乎都与挪威的利益有直接关系。

1946年2月1日，赖伊当选为联合国第一任秘书长，任期5年。1950年11月1日，他又受命继任3年（未经正式重选）。后由于在朝鲜战争问题上采取积极支持美国提出的干涉朝鲜内政的各项建议，并倡议组织所谓的联合国军武装卷入朝鲜战争等行动而遭到苏联的强烈不满与坚决反对，加之又遭到来自美国方面的批评，被迫于1952年11月10日辞职。

离开联合国后又重返挪威政界，1963年至1968年曾先后担任工业大臣、商业和航运大臣、驻外特使及奥斯陆省长等职。赖伊于1968年12月30日去世。他生前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夫人约迪斯，有子女三人。赖伊在1952年辞去联合国秘书长职务后，撰写了一本长达400多页的自传《为了和平——在联合国七年》，是献给夫人约迪斯的。该书于1954年出版。赖伊在自传中写道，自1920年起，他和家人通常约上朋友拉根瓦德夫妇一家到挪威高山上的一座木屋一起过圣诞节，但自从1940年德国侵占他的国家后，他们不得不中断一起外出度假的计划。“在那些年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与法西斯作战，解放挪威”。

出任联合国第一任秘书长

赖伊曾说，对我来说，所有一切的开始不是在旧金山，也不是在伦敦，而是在 1945 年圣诞节发生在挪威高山上的那座木屋里。

二战结束后的 1945 年 4 月 25 日，50 个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创建联合国的国际组织会议。赖伊作为挪威政府代表团团长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以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案为基础进行讨论，并起草了联合国宪章。6 月 26 日，50 个国家的代表举行了长达 8 小时的签字仪式，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当晚，旧金山会议宣告闭幕。此后波兰补签了该宪章，从而成为第 51 个创始会员国。不久，中、法、苏、英、美和其他多数签字国批准宪章后，一部划时代的历史文献《联合国宪章》诞生了。1945 年 10 月 24 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联合国宣告成立，这一天被定为联合国日。1946 年 1 月 10 日~2 月 14 日，举世瞩目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届联合国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伦敦举行，这也是联合国的成立大会。从那时起联合国正式开始了它为全人类服务的历史使命。赖伊作为战后挪威新政府的外交大臣奉命率团前往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联合国的第一任主席和第一任秘书长就要在那次大会上产生了。

在 1945 年 12 月圣诞节前夕，赖伊和他的夫人约迪斯决定携子女赛斯尔、格利和梅特，约上老朋友拉根瓦德夫妇一家再一次聚集在挪威高山上的那座木屋共度传统的圣诞节。过去的 20 年间，他们不知在一起共同度过了多少个欢乐的圣诞节。但随着 1940 年德军侵占他们的国家后，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在那些战争年代里，全家人被迫流离失所，他们当中有的留在挪威，有的滞留在瑞典，还有的逃亡去了英格兰。战争结束了，挪威重又恢复了自由。赖伊的全家又团圆了。他们决定要像过去一样和亲人、朋友在一起好好的聚一聚，以享受一下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将要来临的圣诞节。因为，这是德国法西斯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开始过的第一个祥和、自由的传统节日，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分离、灾难、忧虑和痛苦统统都结束了。他们以往住的那座木屋全部是用圆木搭建而成的。它座落在挪威中部哈林达尔和纽密达尔之间海拔 3200 英尺的高山上。即使由最近的火车站通往那座木屋至少也有 15 英里的路程。他们驾车沿着熟悉的蜿蜒的山路向山上驶去，车开到半山腰的一个农场时便不能再往上开了，他们只得下车扛上滑雪橇和背包沿着陡峭的山坡攀登 3 英里方到达目的地——那座多年未光顾的木屋。赖伊沉浸在与家人、朋友团聚的喜乐和节日的气氛中。

圣诞节那天早上，他们起得很早，在早餐前外出作了一次小小的滑雪旅行。晶莹的白雪覆盖着开阔的山坡，那些紫杉树和短小的白桦树都披上了银装，丛山还从没有这样美丽迷人过。他们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的风光。当他们回到那座木屋坐在餐桌前共进早餐时，忽然，克努特·阿梅林——一位过去一直照看木屋的年轻农夫滑雪来到他们的住处。大家感到非常疑惑，不知什么原因使他在圣诞节的一大早赶到这里？赖伊心想，或许是带给拉根瓦德什么消息，或许是在奥斯陆的政府给我带来了什么口信？那位年轻的农夫递交给赖伊一封挪威外交部从奥斯陆发来的电报。赖伊在拆开电报前，他在猜测电报的内容，不知道这封电报对他将预示着什么。当时赖伊是怀着一种惊奇与忐忑不安的心情读这封电报的。电报是美国驻联合国预备委员会的首席代表艾德莱·E·史蒂文森发给挪威大使埃里克·科尔班的，然后派人送到在山上度假的赖伊的手中。电报的基本内容是：“外交部长赖伊是否愿意参加联合国第一任主席的竞选？联合国大会将在下一年 1 月 10 日召开。假如赖伊

先生愿意的话，美国代表准备向大会推举他。”电报的最后一句写着“尽快做出答复”。显然，这封电报预示着他的政治生涯将会有一个新的转折。赖伊把电报阅览了一遍之后，又当着家人的面将电报大声地读了数遍。在此之前，早在8月间，他在奥斯陆就已经收到过美国大使馆寄来的一份机密文件。文件是美国驻联合国的首任代表、国务卿爱德华·R·斯特蒂纽斯写的。内容是询问赖伊是否考虑过竞选联大主席的问题。对这件事他并未看得很重，但他认为没有理由拒绝美国代表团两次提出要其作为联合国首任主席人选的建议，是否同意，须立即作出决定。赖伊经过再三考虑后，作了答复。他立即起草了一份电文，表示愿意接受美方的建议。他把这封电报交给克努特，由他下山给挪威外交部发封回电。在返回奥斯陆的头几天里，赖伊把这一情况立即向政府内阁作了汇报。内阁授权他可对美国的提议作出最后决定。

1946年1月初，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赖伊在率团出席了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社会民主党会议之后，于1月8日抵达伦敦。早先在联大筹备阶段赖伊的印象是美、苏、英均同意提名他为联大主席的候选人。但此刻他却听说，英国在最开始时赞成荷兰外交大臣伊尔科·范·克莱芬斯，继尔又支持比利时外交大臣波尔一亨利·斯巴克。1月9日上午，美国代表团的一位使者又告诉赖伊，根据多数意见，美国人认为斯巴克的当选几乎已成定局，所以美国不打算再对拉美国国家施加影响来支持赖伊。赖伊对美国在提名他为候选人的问题上态度动摇不定感到不满，因而决心退出竞争。1月10日上午，苏联驻伦敦大使费奥多·T·古塞夫当选为大会会议主席。之后，他私下对赖伊说，他的代表团已从美国人那儿得知赖伊退出的消息，然而苏联和它的东欧伙伴打算提名他为联大主席候选人。他还毫不隐讳地说莫斯科不欢迎斯巴克先生，因为苏联把他视为“西欧集团”的倡导者。赖伊向古塞夫建议，假如让联大筹委会主席哥伦比亚人埃德华多·朱利塔·安吉尔博继续主持联大会议的话，也许会避免矛盾与冲突。古塞夫回答说，他的代表团已同美国代表团就赖伊退出一事进行了协商。协商的结果是美国人重又同意支持赖伊为联大主席候选人。接着古塞夫又说，苏联将在大会上推荐赖伊，美国人会投他的赞成票。

按联合国大会会议的议程安排，首先是选举联大主席。在选举前的那一刻，苏联代表团副团长葛罗米柯走上讲台发言，表明了苏联的态度，他说，“挪威在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的战争中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它是德国入侵的受害者之一。挪威人民在战争中显示了他们无愧是为民主而战的优秀战士。我相信没有人怀疑挪威外交大臣特里格夫·赖伊先生是一位有才能和有经验的政治家。权衡最近提到的关于主席候选人问题……，我们认为特里格夫·赖伊是非常合适的人选。”他的提议得到波兰、乌克兰、丹麦等国外长的支持。但美国及其盟国又坚持要比利时外交大臣斯巴克出任此职。最后美国方面的意见以28票对23票获得通过。就这样赖伊竞选联大主席的事化为泡影。大会的第二项议程是选举联合国秘书长。秘书长的职责是：担任联合国的行政首长；在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及托管理事会的一切会议中，以秘书长资格行使职务；执行各个机构所托付的其他职务；向大会提交关于联合国工作的年度报告和必要的补充报告，以及根据宪章第99条，秘书长得将他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何事件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这对任何一位担任首任秘书长的人来说都是一项艰苦而又艰巨的工作，而它的选举工作也是复杂而艰难的，选举程序先是由安理会进行推荐，

而后通过大会选举和任命。当时提出了不少候选人，有英国的安东尼·艾登和美国的陆军上将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等。据说，艾森豪威尔是最早的也是最有希望的秘书长人选。但因为联合国筹备委员会决定把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所以，应艾森豪威尔本人的要求，美国代表团发表声明表示他不再竞选秘书长一职。在大会召开期间，与会代表普遍认为，为了防止五大国垄断，为确保秘书长的公正与忠于宪章，该职应由常任理事国之外的人员担任。于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一些中小国家都提名挪威的外交大臣特里格夫·赖伊出任秘书长，苏、美、中、法、英五个常任理事国也都表示赞同。最后经安理会推荐，2月1日大会以46票对3票通过了对赖伊的任命。于是赖伊成为战后成立的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为宗旨的有代表性的最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第一任秘书长。从那时起，他也成为北欧国家于战后第一个步上国际政治大舞台的人。赖伊的出任得到了联合国各成员国的信任，这不仅对他本人来说，而且对他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与骄傲。命运之神把赖伊推上了“世界权力”的顶峰，但摆在他面前的却是一条充满坎坷的艰辛的道路。赖伊对此深有体会。他说，从事联合国秘书长的工作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一项工作，他所肩负的责任也是世界上最艰巨的。任何一位担任秘书长的人都会深有感受，假如他是在尽心尽责地工作，他认为，秘书长是联合国的公仆，不是专为某一个国家服务的，应认真地解决国际上发生的每一个重大的事件，而不应回避它们。秘书长有责任对重大的国际问题作出公正判断而不怕为此遭受风险。作为联合国首任秘书长，赖伊认为自己应在这个从未有人涉足的职位上勇敢地进行探索，辛勤工作，克尽职守。

支持阿犹分治巴勒斯坦

众所周知，阿、以争端由来已久。巴勒斯坦位于亚洲西部，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通枢纽，是连接东、西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民族纠葛不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帝国主义的插手和强国间的争斗，阿、以争端随之加剧。几十年来，中东地区一直是世界上最动荡不安的地区。联合国创建初期，巴勒斯坦问题即成为赖伊出任联合国秘书长之后不久接连遇到的一系列最棘手、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就赖伊本人来说，他忠于职守，遵守宪章的各项条款，本着和平的愿望去解决和处理世界上出现的一切国际争端。也许是他的自信，也许是他思维天平的倾斜，或许是他对问题的判断有误，使他在处理巴勒斯坦问题上当时与联合国，与英、美大国的做法保持了“一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以色列国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现状，以及持续半个世纪积怨甚深的阿以矛盾至今仍难以彻底化解，这一切后果的产生应追溯到赖伊就任秘书长的那一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取得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公开奉行“扶犹抑阿”政策，犹太复国主义者借机煽动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迁居巴勒斯坦，引起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疑虑和不满，导致了阿、以民族之间不断发生流血冲突。二次大战后，美国力图取代英国在中东的地位，利用犹太人强烈的复国主义情绪，以安置犹太难民为契机，展开了一场打入英国控制的巴勒斯坦地区，以争夺巴勒斯坦的斗争。

1946年8月初，犹太建国协会执行机构在巴黎开会，通过了要“在巴勒斯坦适当地区建立有活力的犹太国”计划。同年10月4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公开支持这一计划。他指出，犹太难民“不应等到巴勒斯坦问题

解决之后才移入”，而应“立即开始”。英国对杜鲁门这种拆台的做法十分恼火。11月，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表示，“英国一心一意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如果解决不了，英国将卸下委任统治这副担子……，把整个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由它作出决定。”1947年2月4日，在伦敦举行的、由英国单独出面调处阿、犹关系的圆桌会议宣告破裂。此时英国已无力调解阿、犹之间的尖锐民族矛盾，无力控制巴勒斯坦局势，被迫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同年4月2日，英国驻联合国代表亚历山大·卡多根正式通知秘书长赖伊，要求秘书长把巴勒斯坦问题列入联合国议程，并要求事先召开联大特别会议，成立一个对巴勒斯坦问题进行实地调查的特别委员会，之后由特别委员会向9月召开的联大会议提出报告以供讨论。4月28日~5月15日，联大召开了专门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第一次特别会议。特别会议还根据地区原则，排除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组成了由大会授予全权，有11个国家的代表参加的特别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前往纽约、耶路撒冷、贝鲁特和日内瓦，以调查与巴勒斯坦问题有关的一切争论。对此，赖伊专门委派了秘书长助理维克多·霍作他的全权代表及指定安理会事务局局长、墨西哥人阿方索·加西亚·罗布尔斯担任首席秘书参加特别委员会的工作。赖伊确信该委员会秘书处是无可指责的办事处，它不仅从事调查工作，而且还从事政治方面的工作。调查期间，特别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阿、犹双方意见，还去巴勒斯坦和欧洲的犹太难民营调查访问。同年9月，该委员会向赖伊及联大提出报告，一致建议结束委任统治。

1947年11月，联大第二届会议就巴勒斯坦问题展开辩论。会议不顾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在美、苏等国投票赞成的情况下，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在处理巴勒斯坦问题上，赖伊表示了明确的立场，对阿、犹分治持完全赞同的态度。并积极敦促联大通过特别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分治巴勒斯坦的多数方案（特别委员会在9月向联大提出报告时，对巴独立后的治理方式提出两个方案：其中一个是由加拿大等七国提出的多数方案，即建议把巴勒斯坦分为犹太和阿拉伯两个独立国）。但分治决议通过后，遭到了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一致反对。阿拉伯最高委员会的代表致信赖伊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永远不会允许或屈服任何大国对巴勒斯坦强行分治的企图。”阿拉伯联盟宣布不承认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阿盟七国总理及外长在开罗举行的会议上也宣布：“阿拉伯人决心为反对联合国分裂巴勒斯坦的决议而战。”……分治决议终于触发了酝酿已久的阿犹全面冲突，由最初的武装冲突迅速发展为一场战争。面对这种局面，英国索性撒手不管，执行联大决议的有关机构也束手无策。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布成立，仅数分钟之后，美国就宣布了对它的承认。在美国的支持下，以色列不断扩张侵略，先后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及周边阿拉伯国家进行过五次大规模战争，即“五次中东战争”。从此使整个中东地区陷入了持久的战争与动乱之中。这是分治协议所带来的后果。

1948年5月15日，以色列国成立的第二天，爆发了震惊世界的“第一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为了把它们反对任何肢解、隔离或分裂巴勒斯坦的誓言变为行动，将军队开进了由分治决议划归阿拉伯的巴勒斯坦土地，反对建立以色列国。埃及、外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军队相继进入巴勒斯坦，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也门也参加了军事行动。随即爆发了以色列同埃及、伊拉克等国的战争。赖伊对阿拉伯国家采取的这次联合军事行动大加指责。

他说，随着英国提前结束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阿拉伯国家就对巴勒斯坦发动了侵略战争。这是无视联合国的存在，是对联合国的挑衅。赖伊谴责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采取的行动，他说这是自二次大战结束后世界看到的首次武装侵略行为，也是宪章通过以来由数国首次公开在它们领土之外参与的武装入侵行动。为此，他强调联合国决不允许这种侵略行径得逞，同时不允许它对和平解决的方案、集体安全和富有意义的国际法产生任何不利影响。宪章第 99 条款规定，秘书长得将其所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任何事件，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根据这项条款，赖伊断言阿拉伯国家的行动属于宪章第 39 条中所提的对和平的威胁，并声称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的侵入已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他认为有责任采取应付的对策。在战事爆发后，他立即让联合国立法局致信安理会主席，提请安理会对阿拉伯国家武装入侵巴勒斯坦事件予以注意。他并亲自写信给安理会各常任理事国代表，强烈谴责阿拉伯国家的“侵略行径”。他在信中强调，联合国最首要的目标之一，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宪章第 24 条款规定，为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起见，各会员国将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授予安理会。他说，安理会在 5 月 15 日当天召开的会议已表明，如果安理会不采取果断立场支持联合国及宪章的权威的话，联合国就不会立即采取迅速有效的行动。他在信中还说，现在对立行动已开始。别的势力将卷入这场威胁中东和平的战争的可能性和危险性日益加剧。赖伊认为，假如在此次事件上纵容埃及的话，那么，过去那些依靠安理会来帮助解决它们争端的国家很可能也会变得无视安理会，这样就会有更多、更大的危险出现。而安理会在战事爆发后未能有效地采取行动，势必给联合国的声誉带来最严重的损害。因此，赖伊呼吁安理会在阿拉伯国家“入侵”的问题上采取迅速有效的行动。战争爆发的当天晚上，他在富雷斯特·希尔斯的家中与几位关系密切的顾问一起开会，决定委派杰克逊司令官和科迪埃尔先生一同前往斗争前线，以帮助调解双方之间的冲突。

在赖伊的积极敦促下，5 月 29 日，安理会通过了英国代表卡多根提出的停火四周的建议，并由联合国巴勒斯坦调解专员伯纳多特实行监督。后经过伯纳多特的斡旋，阿以双方终于同意停火四周。停火期间，以色列违背停火决议，充分利用这段时间补充其所缺乏的各种武器，加紧部队集训。在停火到期的 7 月 9 日那天，战争重新爆发。战火爆发的第四天，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杰塞普向安理会提出一份决议草案，要求阿以在三天内实现永久停火；耶路撒冷城在 24 小时内无条件停火并实行非军事化；责成调解专员监督停火。该项草案在安理会以 7 票对 1 票获得通过。当月 19 日，阿以双方接受了第二次停火。调解专员伯纳多特在两次停火期间就解决阿以问题曾两次提出建议，内容是对阿拉伯国家和犹太国家的领土划分重新进行调整。但两次建议均因以色列的强烈反对而未果。9 月 17 日，伯纳多特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控制区内被人暗杀。据说伯纳多特被杀害的主要原因是他提出了一些有利于阿方的建议，并被认为偏袒巴勒斯坦人。据卡斯登撰写的一书中揭示，这位联合国专员惨遭杀害乃赖伊和于 1948 年首任驻联合国常任代表、以色列外长阿巴·伊凡秘密合谋的结果。卡斯登说，伊凡当时与赖伊的关系极为密切。

伯纳多特被害后，赖伊任命联合国秘书处的美国人拉尔夫·J·本奇为代理调解专员。他的这项任命在安理会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获得批准。在赖伊的眼中，本奇的工作做的非常出色。下面一段话是他对本奇所做的调解工作的

叙述。他说，本奇在阿、犹冲突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努力做停火的工作，在他的敦促下，安理会在 11 月 15 日，再次通过了一项呼吁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以长期停战协定来取代临时停火的方案。与此同时，联大也通过了一项对阿拉伯难民提供物质援助的计划。赖伊说，此项计划由他负责的行政部门带头去执行。鉴于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都不同意伯纳多特生前曾提出的永久解决的建议，联大因此同意建立一个调解委员会以帮助交战双方达成一项解决方案。经过本奇大量做调解工作，埃及终于在 1 月份电告本奇先生，它准备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同以色列政府进行谈判。随后，本奇很快把阿以双方召集在希腊的罗德岛连续进行 42 天的停火谈判。1949 年 2 月 24 日，以色列和埃及在本奇的主持与组织下签署了停战协定，紧接着其他的阿拉伯邻国如黎巴嫩、约旦和叙利亚也先后同以色列缔结了停战协定。伊拉克拒绝与以色列谈判，但表示接受停战协定。赖伊对本奇的工作做了高度评价：“很明显，如果没有本奇做的工作与奉献，在那一时期就不会有停战。我们都为他而感到骄傲。”“诺贝尔委员会——一个由挪威议会任命的机构授予本奇先生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奖也使我感到自豪。”赖伊说，正如本奇先生所说的那样，这意味着赞颂联合国和它的秘书处为解决国际争端所发挥的应有作用。

赖伊退职后曾说，“世界绝大多数人民期望中东国家能建立起真正的和平、相互理解和相互合作。”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国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签订的停战协定，仅有暂时性质，不构成政治上的相互承认，也不是和约。所以这场战争产生的恶果是长期的。以色列国家建立后的几十年中，中东战火连绵不断。阿以冲突使近百万巴勒斯坦人颠沛流离，无家可归，处境十分悲惨。为恢复家园和人民的基本权利，巴勒斯坦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去世前，曾作出努力，使中东形势发生了转机。1993 年，巴解组织（法塔赫）和以色列在挪威丛林中密谈 8 个月，终于各自做出让步，并宣布互相承认。同年 9 月 13 日，正式签署了加沙——杰里科自治原则宣言。这是阿以冲突 45 年来的重大转折，是中东和谈的历史性突破。尽管巴以之间还有许多棘手的问题远没有解决，但巴以协议毕竟加快了漫长曲折的中东和平进程。如今，世界人民都希望赖伊在 40 多年前说的话能尽早地变为现实。

为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斡旋活动

赖伊作为西方的一位政治家，他很早就提出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他曾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进入联合国之前经受了艰难的考验。在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他对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心与重视，积极支持中国为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所进行的斗争，并在其中进行调解斡旋。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主席庄严地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这声音成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也成为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在此之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建国前夕就已通过决议，否认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出席第四届联合国大会的资格。所以，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理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不断变换手法，节外生枝，阻挠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致使国民党集团非法占据中国代表席位长达 22 年之久。中国政府在这期间一直在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进行着长期不懈的斗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不久，即 1949 年 11 月 15 日，当时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四届联大主席罗慕洛（菲律宾人），声明“驱蒋纳我”的立场。他在电文中声明，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政府”已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它已没有任何资格代表中国人民。否认所谓“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合法地位。周恩来外长还正式向赖伊提出，要求联合国立即取消“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以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愿望。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立即得到苏联代表团的支持。11 月 23 日，苏联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发表声明，支持中国政府致联合国秘书长和四届联大主席电文中的坚定立场。1950 年新年到来前夕，赖伊像往年一样，正忙着给联合国各会员国的政府和人民寄发新年祝词。此刻，他并不知道苏联副外长、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雅科夫·A·马立克先生正在安理会的会议上发言，他对国民党集团是否代表中国继续留在安理会的代表权问题阐述个人意见。马立克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以蒋廷黻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不再代表任何人，应立即退出安理会。他的发言立即得到与会一些代表的支持。赖伊指出，这是自联合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由一位重要人物对安理会某个常任理事国代表权问题提出的异议。

1950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外长第二次致电赖伊秘书长和四届联大主席罗慕洛，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国民党集团的代表继续留在联合国安理会是非法的，要求联合国将非法的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安理会开除出去。

1 月 10 日，安理会举行会议。厄瓜多尔、印度、南斯拉夫取代了加拿大、阿根廷和乌克兰当选为新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苏联代表马立克先生在会上提出一项支持周恩来外长 1 月 8 日电文的提案。要求安理会开除国民党集团的代表蒋廷黻，说他不能代表中国。他认为，蒋廷黻作为安理会会议主席，并参加安理会一切活动不合法。马立克还受权声明，假如安理会对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不采取有效措施的话，苏联代表团在国民党集团的代表未被安理会开除之前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

1 月 12 日，安理会再次举行会议。为了对苏联提案进行公正的讨论，安理会决定由古巴代表卡洛斯·S·布兰科担任本次会议主席来主持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辩论会。“国民党集团的代表”蒋廷黻被迫退出会议主席地位。

1 月 13 日，安理会就苏联提案进行表决。只有苏联、印度、南斯拉夫 3 票赞成，美国、古巴、厄瓜多尔、埃及、法国和国民党集团 6 票反对，英国和挪威弃权。结果苏联提案未获通过。苏联代表在那次会上宣布，在“国民党代表”被赶走之前，他的代表团将不参加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工作，苏联政府也将不承认在“国民党代表”参加下安理会作出的任何决议是合法的。于是，苏联代表毅然退出了安理会议事厅，以示抗议国民党非法占据中国席位。苏联代表的退出以及后来停止了参与联合国一切机构的活动，致使联合国工作陷于异常困难的境地。赖伊对苏联代表抵制安理会，拒不出席会议提出了批评，认为苏联违反了规则。同时对此深感忧虑。他在书中这样写道，“1 月 13 日，对联合国来说是黑暗的一天。苏联代表退出安理会，使在场的 10 位代表脸上的悲观表情显而易见。然而，如何才能摸清苏联的真正意图和动机？这次他们打算要走多远呢？上一次在 1949 年，当南斯拉夫当选为安理会

非常任理事国而取代了乌克兰时，遭到了苏联的强烈反对。但当时苏联代表安德列·雅·维辛斯基先生采取的威胁做法较为隐蔽，而现在的威胁已经用行动体现出来。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苏联和其他一些支持苏联立场并与中国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相继退出了有国民党代表非法占据着中国席位的不少于 21 个联合国的机构，使不久前苏联代表马立克退出安理会议事厅的情景再现。人们无法知道这是否意味着他们永久地离开了联合国呢？”赖伊认为，苏联退出安理会和停止在联合国机构的一切活动，使联合国机构陷于瘫痪状态。为了联合国的利益，必需有所行动，以打开僵局，尽快地使联合国各机构正常地运转起来。他担心如果不把苏联拉回来，联合国将面临分裂的危险。赖伊说，已有迹象表明，自 1949 年 12 月以来，在莫斯科，中国政府和苏联之间的一系列重要谈判正在进行。他担心，克里姆林宫忽然采取的此次行动是分裂联合国，另组一个新的“人民民主”的国际组织的第一步。他分析，苏联、中国以及其他由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所拥有的人口加起来约为 8 亿人。根据这一点，一个非常强大的组织有可能建立起来，强大得足以同联合国进行强有力的竞争。要是这样的话，全世界很快就能看到两大“联合国集团”公开地相互进行竞争。而且这种态势可能会导致许多阿拉伯国家、亚洲国家，甚至其他一些地区的国家退出联合国，因为这些国家并不在乎同哪一方集团结盟。

不论怎么说，赖伊已看到了当时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已是大势所趋。苏联的行动无疑是对新中国的有力支持，引起了世界各国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极大关注。当时安理会内形势对新中国颇为有利，承认新中国的有苏联、英国、挪威、印度和南斯拉夫五国，法国和埃及等国也并不坚持反对新中国代表进入安理会。美国代表格罗斯认为这是个程序问题，明确表示要对苏联提案投反对票，但对此不能行使否决权。赖伊说，暂且不论共产党集团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承认哪一个政府代表中国的问题上意见不同，就其邻国来说，大部分非共产党国家已经承认了北京——新中国，还有其他一些联合国会员国包括英国、南斯拉夫、瑞典、丹麦、新西兰、以色列和荷兰等国也承认北京。赖伊对新中国也持支持的态度。他认为加入联合国的应是中国而不是蒋介石集团。现在蒋介石已被赶出中国大陆，仅控制着 Formosa（福摩萨）——台湾省（16 世纪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对台湾省的称呼，后来某些外国人沿用此名），既然是这样，他又怎么能充当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言人呢？另外，影响赖伊对该问题作出判断的还有其历史原因，那就是全世界在过去已经看到苏联——一个共产党国家在革命成功之后被西方孤立起来。他始终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他认为，西方应该在 20 年代寻求各种途径同俄国进行接触与交往。假如那时西方施行了这样一种政策，就完全可以影响苏联的发展进程。那么现在世界是否正在以同样的方式把它同拥有 47500 万人口、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切断联系呢？面对这样严峻的局势，在一开始赖伊并不知道作为秘书长到底该做些什么。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他打算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先同常任理事国进行协商。随后，他与负责行政和财政事务的秘书长助理拜伦·普赖斯一道前往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迪安·G·艾奇逊以及他的一些高级顾问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中，赖伊对联合国的形势深表忧虑。他说，“早些时候，在柏林实行封锁期间，那些困难是难以想像的，但是现在我们却面临着联合国内部的危机。”赖伊反复询问国务卿艾奇逊，美国是否会在将来承认共产党中国呢？艾奇逊回答：“不会承认。”他攻击北京政权

是临时的政府，说几乎不知道它在做些什么，认为它所做的一切在国际上未产生过什么影响。他反对“中国共产党政府占据联合国的席位”，并指出赖伊提议的由联合国大会特别委员会来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为时过早。赖伊与艾奇逊的会晤未取得进展。但这并没有使赖伊灰心。他决定下一步通过与安理会的各位代表进行坦诚的交谈，做好安理会内部的工作，也许会使情况有所改变。其理由是，目前已有五国驻安理会代表已承认了北京政权，它们是苏联、挪威、南斯拉夫、英国和印度。假如另外两个安理会代表法国和埃及也投票承认北京政权的话，那就会在安理会内形成多数，这样一来美国不得不对新中国加以承认。回到纽约后，赖伊立即和他的顾问再次协商讨论关于秘书处和秘书长对缓和目前的局势应该做些什么。同时，他委托秘书处法律部的伊万·克诺先生和 A.T. 费勒先生为他准备一份从法律观点考虑联合国内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备忘录。

1950年3月8日，赖伊提出一项关于“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法律方面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谈到，“中国问题在联合国历史上是独特的，这并非因为牵涉到一个政府的革命变革，而是因为第一次有两个敌对的政府并存着。”“当前争执的问题应该是，究竟这两个政府中的哪一个在事实上据有使用国家资源及指导人民以履行其会员国义务的地位。从本质上讲，这意味着新政府是否在国家的领土上行使有效的权力，以及人口的大多数是否服从这种权力……。”赖伊积极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基本准则是，他不管共产党中国与蒋介石集团孰是孰非，而认为革命后所建立起来的共产党政府在事实上统治了绝大部分的中国国土和人民，从客观上讲，这个政府当然代表中国，应该加入联合国。他的这种主张招致美国的批评，认为他越权。“备忘录”认为，把取得一个国家在联合国组织中代表权问题和对一个政府的承认问题联结在一起，从法律观点来看是错误的。赖伊在“备忘录”中提出了一项重要原则，这就是应把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同任何一国政府是否承认新中国问题区别开来。为了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赖伊建议召开由各成员国政府首脑或外长出席的安理会特别会议来讨论和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他自己并根据这份“备忘录”，继续同安理会的所有代表讨论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他第一个进行谈话的是年纪最大、资历最深的英国常驻代表亚力山大·卡多根先生。卡多根曾参与了创建联合国的所有筹备工作。当赖伊问及卡多根他的政府是否就这个问题向法国施加一些影响时，卡多根说他不能肯定。但他劝告赖伊不要召开安理会特别会议。他建议，“最理想的是在安理会内寻求解决的方案。”卡多根还表示，一旦安理会大多数支持北京新政权的话，他也希望“国民党代表”蒋廷黻退出安理会。在这之后，赖伊又分别同法国、印度、古巴、埃及、厄瓜多尔、南斯拉夫、挪威等国大使一一进行了私下交谈。他们每人都表示接受赖伊提出的“备忘录”，同时对赖伊在事态恶化之前来解决这场纷争所做出的努力持赞同态度。特别是法国大使让·肖维尔对赖伊深表理解，他说他非常赞成这份“备忘录”，并表示马上与法国外交部联系。赖伊对当前能达成一项解决问题的协议的可能性充满信心，因为他同许多代表进行了谈话，实际上这些代表都同意毛泽东政府在事实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理应拥有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同年3月10日，赖伊又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一篇《什么政府应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问题》的声明，他在声明中明确提出有必要迅速地达成一项《关于什么政府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的决定》。这一声明表明了赖伊要尽快解决

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决心。为了尽早地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以及使苏联代表重返联合国，赖伊从4月20日至5月下旬带着“和平使命”先后访问了华盛顿、伦敦、巴黎和莫斯科等大国首都，宣传他的“联合国二十年和平规划”，调解大国之间的矛盾，以及对“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调停斡旋活动。出访期间，赖伊在与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会谈中阐述了他的观点，“联合国应当被看作是东西方开会的场所。既然是这样，中国代表权问题就应该在承认其现实的基础上加以解决。”“虽然对联合国来说做出这项决定是艰难的，但实际上它不会损失任何东西。中国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领导已丧失了信心。”他指出，“即使中国共产党仍被排斥在联合国外，但假如国民党的代表蒋廷黻被驱逐出安理会的话，苏联的所有代表就有可能重新回到联合国。”赖伊在访问莫斯科期间，于5月18日与中国政府的官方代表、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了会谈。据他出访后的报告讲，由他提出的关于举行安理会特别会议以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建议在巴黎和伦敦受到热情的欢迎。法国一再表示它已准备支持中国在联合国取得合法席位，并同意赖伊提出的在安理会内部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建议。6月6日，赖伊向59个会员国发出公函，指出国际形势的严重性，并强调“在中国代表权问题未获解决之前，要取得重大的改进是不可能的”。他再次向会员国呼吁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在赖伊进行斡旋活动期间，苏联表示将在不久回到联合国。8月1日，苏联代表马立克在退出安理会长达6个半月后终于重返安理会，并担任安理会8月份主席。当时苏联代表曾以主席身份裁定“国民党代表”不能代表中国参加安理会会议，但这项裁定未获通过。

在赖伊出访归来后不久，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国际形势出现急骤变化，致使国际关系复杂化。随之，赖伊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斡旋活动中断。这使本来有可能也有希望解决的中国代表权问题无限期地拖延下来。那么中断赖伊对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斡旋活动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当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他认为它属国际争端而不是内战，身为秘书长有责任处理这个问题。可以说，朝鲜战争的爆发转移了他的视线。但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旗帜，跨过鸭绿江，入朝与朝鲜人民并肩战斗抗击美国侵略者。但驻汉城的“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却在同年11月间向安理会报告说，中国军队向驻南朝鲜的“联合国军”发起了进攻。总而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参战“反对联合国”。由于双方持续的交战，使赖伊对北京政府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不再感兴趣，并从此终止其斡旋活动。而此后中国政府与人民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坚持不懈的斗争，直到1971年，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关于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大会并通过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并立即把蒋介石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驱逐出去。这一切宣告了美国20多年来操纵联合国推行强权政治，顽固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敌视、孤立和封锁中国政策的彻底破产。

提出联合国“二十年和平规划”

赖伊曾说，联合国是一个把世界集结在一起的组织。它就像一座跨越大峡谷的桥梁，为调解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发挥着作用。作为首任秘书长，赖伊认为自己有责任使联合国真正团结成一个整体。他认为宪章赋予秘书长的政治责任是维护与促进世界和平，而不是把这种职权当作个人所拥有的权力，不是为某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利益，而是为了联合国的整体利益。为此，他视自己为独立于各国之外的“外交官”。赖伊是一个不畏艰险、个性鲜明、有独立见解的人。过去无论在挪威工党内，还是在反纳粹的战争中，他为了自己的信念顽强地战斗。二战结束后不久，美、苏即从战时合作走向对立。1947年，冷战全面展开以后，美国加紧与西方国家酝酿成立大西洋安全体系。在美国推动下，英、法、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五国于1948年3月17日缔结了《布鲁塞尔条约》，旨在加强西欧国家的防务合作，并作为建立跨大西洋安全体系的第一步。同年7月起，美、加与《布鲁塞尔条约》缔约国就建立“北大西洋区域安全组织”在华盛顿举行谈判。1949年4月4日，美、英、法、加等12国正式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这与苏联等共产党国家形成两条战线。再有，自1949年底开始，苏、美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尖锐对立。苏联代表退出安理会严重地影响了联合国机构的正常运转。面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以及出现的种种不安宁因素。赖伊深感不安，同时深感责任重大。他认为自己不能对此等闲视之，作为秘书长不能仅仅只是在大国之间扮演“老好人”的角色，而应积极想办法调解美苏之间的矛盾，尽早结束“冷战”的局面。他的十点“联合国二十年和平规划”备忘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据赖伊本人讲，这份“备忘录”是建立在斯大林和杜鲁门早些时候发表的声明基础之上的。两份声明的基本内容都强调了根据各国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探讨大国间和平共处的可能性。

1950年3月21日，赖伊在华盛顿就“二十年和平规划”备忘录的内容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政治奇迹。但按照它的步骤去做会缓解大国间的矛盾与冲突，使之团结起来”。他在发言结束时说：“我们所需要的，以及世界所需要的是通过联合国的努力赢得世界和平的‘二十年和平规划’。我相信世界各国大多数人民同我一样有这种愿望，希望联合国会员国毫不拖延地实施‘联合国和平规划’，以重新达成共识。”他的这一讲话收到热烈反响，也很快被得到肯定。美国副总统艾尔本·W·巴克利当即表示支持赖伊。几天之后，联合国的一些代表像菲律宾的罗慕洛、巴西的奥斯瓦尔多·阿兰哈、澳大利亚的赫伯特·伊瓦特以及埃及的马哈穆德等纷纷发表声明给予支持。美国的一些主要报刊，以及加拿大、法国、英国、印度、以色列和拉美国家、北欧国家的报刊也都登载文章给予肯定。出人意料的是莫斯科电台和《真理报》的评论也未持反对态度。一时间，大量信件来自世界各地使赖伊相信公众舆论是站在他一边。这更增加了他的信心，并使他很快就完成了“联合国二十年和平规划”备忘录的起草工作。

3月24日，赖伊在纽约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有记者问到，“为什么会提出‘二十年和平规划’？”赖伊当时表示他很高兴能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来回答记者的提问。他解释道：“因为我想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世界和平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它需要时间。假如它能够在5年内，10年内甚至20年内解决的话，我们将会感到欣慰。但我认为自1945年以来，分歧每年都在增加。所以说，我们对和平问题真正解决的可能性不能过于乐观。”记者招待会之后，赖伊做好了访问四大国首都华盛顿、伦敦、巴黎和莫斯科的准备。

届时他将向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艾德礼、法国总理比德奥尔特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呈上起草的“二十年和平规划”备忘录。赖伊在这份备忘录的开头写到，作为秘书长我坚定的信念是试图采取一项新的和巨大的努力来结束这场所谓的“冷战”，使世界重新走上持久和平的道路。他确信这种努力对联合国中的中小会员国来说能产生影响并得到他们的支持。他们会在调解大国间的分歧上以及在共同的政治、经济合作发展方面做出许多贡献。他还确信他提出的“二十年和平规划”备忘录一旦实施会有助于这些矛盾与问题的尽快解决。

赖伊在他的“二十年和平规划”备忘录中提出的十点建议，其内容涉及面较广而且具体。从联合国的组织建设与发展、如何尽快接纳更多的会员国，到控制核军备竞赛，以及帮助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提高其生活水平等等。“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点，根据宪章第 28 条中安理会应定期举行会议的内容，赖伊建议安理会应定期召开由各国首脑、外长和其他政府要员参加的会议。为各国间的谈判、调解国际间冲突还可进一步共同运用联合国其他一些机构。他认为一些定期召开的会议应每半年举行一次。这些会议主要用于对联合国内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与全面考察，特别是那些使大国间产生意见分歧的问题。他认为，举行这些会议的目的主要是对重大的国际问题进行协商，其中一些会议需要以私下讨论的形式举行，所做的这些努力是为了在各国间达成共识，但不能期望这些会议每一次都能有成效，都能做出重大的决策。

赖伊在第二点中建议建立一个控制原子能的国际体系，使该体系在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防止它用于战争方面发挥有效的作用。他认为，我们不能期望对控制原子能这个最难以解决的问题采取快速和简单的解决方法。唯一的办法是找出重开谈判的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由安理会通知秘书长，由其召开一次科学家研讨会。经过科学界权威人士讨论后，可对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提出新的意见。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可根据这些新建议进行研究解决。或者也可以制定一项临时的协定，即使它不能完全提供安全保证，至少可以缓解一下目前这种无限制的核武器竞赛的局面。

赖伊在第三点强调，在寻求解决控制军备竞赛问题上应采取一项新措施。不仅在核武器领域方面，而且要在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常规武器领域进行控制。他认为能够达成的任何一项控制军备的协议都有助于缓解“冷战”的紧张态势和调解国际间冲突。对这个问题应及早进行谈判，不能等到其他重大的政治问题解决之后再考虑这个问题。

赖伊在第五点中谈到如何扩大联合国组织，接纳新会员国的问题。他建议应正确地遵循和实施联合国有关文件，尽可能快地做好接纳新会员国的工作。

第六和第七点的基本内容是联合国有责任辅助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国家发展经济。赖伊建议制定一项正确和有效的计划，利用私有的、政府的及政府间可利用的一切资源对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和促进大规模的资本投资给以具体的技术性指导。他强调，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应在平等而不是施舍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互利的规划，并由会员国共同协作执行。这项规划应作为未来 20 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一项持久的发展规划。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实施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提高不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就业率以及促进它们

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他认为，在维护世界其他地区的自由与和平的同时给予技术性的指导是非常重要的。“在建立持久和平的过程中发展经济和国际贸易无疑是很重要的因素。”赖伊的这项建议得到杜鲁门总统的大力支持。

在第九条中，赖伊强调联合国的作用是通过和平手段而不是武力手段促进独立的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进行发展，以此实现整个世界的平等。他说，自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亚非人民实施联合国制定的规划必将会生活在一个和平环境里。旧的关系将会被一种新的平等、友爱的关系所替代”。

1950年4月20日，赖伊正式踏上了履行其和平义务的旅途，开始了他对美、英、法、苏四国首都的访问。他奔波于四国首脑之间，积极宣传他的“联合国二十年和平规划”。此行历时一个多月，其行程约15000英里。他的自传中有一段话表达了他本人对此次出访的心情。他说，我对四国之行程充满信心，因为我感到世界各地的人民都和我在一起，他们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的。我的十点“和平规划”备忘录出台后，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数千封人民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表示支持我的这一行动，并希望我获得成功。对于我来说，我是履行和平使命的，不代表任何特殊的政府和国家，而是作为联合国秘书长作这次旅行的。我的使命不是去谈判，而仅仅是一次考察，是寻求在近几年内能否找到结束“冷战”的基础。我想借此机会同四国首脑交换看法，不仅同他们谈目前的局势、中国代表权问题，还要谈有关联合国建设的长期规划问题，我起草“和平规划”备忘录的目的，是要通过实施这一规划来实现世界持久的和平。赖伊的出访受到了四国的欢迎和热情接待。访问期间，他分别同四强首脑及有关政府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总的来说，他的“二十年和平规划”备忘录受到杜鲁门总统、艾德礼首相、比德奥尔特总理和斯大林的认同和肯定。在同他们的会谈中，赖伊强调了支持联合国的必要性，并敦促大国应把联合国视为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一切重大国际问题的一大场所。他的话得到了四国领导人的赞同。在同斯大林会晤时，他向斯大林建议在未来的某些时候美苏应举行首脑会晤，对此斯大林欣然接受了。但斯大林强调这样的会谈必须以外交形式认真地进行准备，会谈之前应具备签定一些协议的条件。在涉及到控制原子能的问题上，斯大林对“备忘录”中的第二点提出批评。他说这点未能有效地采取措施制止原子弹。

结束了对四国首都的访问之后，赖伊于5月18日离开莫斯科按原路线返回联合国总部。在途经巴黎和伦敦两大城市时，他又在那里和法国、英国两国外长进行会晤。法国外长舒曼已认真阅览过提前送至他手中的“备忘录”。总之，舒曼同意赖伊为尽早实现和平而提出的这份“备忘录”。尽管当时法国政府还没有正式接触到这份“备忘录”，但他和比德奥尔特总理在私下已就该“备忘录”，进行过较详尽的讨论。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身患重病，但仍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赖伊。贝文表示英国政府基本上同意赖伊提出的这份“备忘录”。赞成他在第一点中提到的关于安理会应定期举行会议的建议。但对第二点，贝文提出不同看法。他告诉赖伊，英国政府不赞成科学界召开大会来讨论原子能问题。如这样做会引起混乱。一旦召集科学家开会，他们发表的声明只会给老百姓带来惊吓，只会再一次有利于俄国人。他强调原子能、控制核武器和大量毁灭性武器问题是一个政治性问题，必须由各国政府来决定。贝文先生还对“备忘录”中的第九条提出反对意见，并指

责联合国对殖民地问题不该加以干涉。他说英国对联合国处理殖民地问题以及在这一问题上对英国产生的误解一向感到不满。他声称，英国比任何其他国家给独立的人民带来的自由都多。但在联合国内它得到的不是信任，而是令人不愉快的批评与攻击。对殖民地问题，他建议，假如将所有有关殖民地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留给管理它们的国家去做的话，这是一个较好的办法。在返回华盛顿时，赖伊再次受到杜鲁门总统的接见。他抓住机会再次做调解与缓和美苏关系的工作，他向杜鲁门叙述了他与斯大林谈话的内容，其中包括向斯大林提出的建议，美苏应在适当的时候举行双方首脑会晤，就存在的一些分歧进行协商，求得共识。杜鲁门对此持赞同态度。关于杜鲁门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当赖伊提及在莫斯科时他曾告诉斯大林杜鲁门总统喜欢斯大林时，杜鲁门插话说，“你说的对，我喜欢斯大林，我相信他也喜欢我。”

赖伊对此次出访感受颇深。他在自传中是这样写的：“我所到之处受到了公众的关心与欢迎。许多信件、电报、鲜花纷纷送到我在伦敦、巴黎、日内瓦下榻的宾馆。直至我回到成功湖（美国纽约近郊一村庄，1952年以前联合国秘书处所在地）之后，信件仍源源不断寄来。这些来信大部分是自发写来的，是那些普通男人和女人们发自内心而写的。面对这些荣誉，我深感荣幸。我认为有必要发表一封公开感谢信以表达我对他们的谢意。”而苏联外长安德列·雅·维辛斯基对赖伊的“备忘录”进行了抨击，他说，“据说，赖伊是携带‘备忘录’从莫斯科返回的，但情况不是这样。他是带着‘备忘录’去莫斯科的。因为在此之前，它已获得美国国务院的支持，而后得到伦敦外交部的批准，继而又得到法国外长舒曼的确认。换句话说，该‘备忘录’是一群反对和平的阴谋者通过批准的，最后才拿给我们看的。”不过，他强调，该“备忘录”必须根据他提议的修改意见重做修改。他还宣称，苏联“准备在这项修改工作中给以协作”，并同意“秘书长在备忘录中提出的设想，即有可能通过联合国采取措施以结束所谓的‘冷战’和促进和平事业。”赖伊说，尽管他们对我进行个人攻击，但我很满意同四大强国领导人进行的会谈及所取得的成果。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关于要修改“备忘录”的提议在联大遭到了惨败，只有5票赞成。联大根据50多个会员国投赞成票通过了我提出的和平规划备忘录的决议。

赖伊后来在自传中写到，他在任期间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欣慰与无悔：大国间的谈判已恢复；6年之后各国外长将再次聚会，尽管安理会还没有做出定期举行会议的决定，但他相信这迟早会有结果的；在联合国内，大会已呼吁就原子能问题进行私下会晤，他相信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很快会就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进行协商研究；自1950年以来，联合国发展科技协作的规划已取得巨大的进展，……。赖伊说，我们面前还有许多问题与危险，但假如世界将继续沿着和平的道路走下去的话，我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实现维持长久和平的美好前景。假如爱好和平的世界能充分地利用联合国集体安全的力量、和平解决问题的方式、以及在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先进经验，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性将会更进一步减少。

无论赖伊的四国之行收效如何，不管人们怎样看待他提出的“和平规划”备忘录，不管是赞扬他还是反对他，他毕竟在为调解大国间的矛盾，联结各国间的友谊，以实现世界长久的和平而不停地奔忙，因此，他被人们誉为为和平而工作的“和平使者”。

支持美国武装干涉朝鲜

朝鲜半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直为帝国主义列强所瞩目。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历时三年零一个月。这场战争是当时美苏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和冷战对峙的结果，也是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一次全面对抗。它是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一场具有相当规模、时间较长的国际性战争。美国从一开始就插手朝鲜内政，在1945年朝鲜摆脱日本侵占之后，它即和苏联等战时盟国联手“协助”解决朝鲜独立问题。

1945年12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议上作出由美、苏、中、英四国对朝鲜实行5年托管再过渡到独立的决议，规定托管期间由美苏双方驻军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以协助组成临时朝鲜政府以及负责草拟托管计划。1946年3月，美苏联合委员会在汉城开始工作。但随着冷战加剧和朝鲜南北双方关系的不断恶化，联合委员会已无法开展工作，到1947年下半年处于瘫痪状态。于是，美国于同年8月提出一项由四国举行会议以讨论尽快履行莫斯科决议的建议，遭到苏联拒绝后，随即美国把朝鲜独立的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大会，该问题被列为联合国成立初期讨论的重大议题之一，也成为赖伊就任秘书长期间最棘手的问题之一。9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正式向第二届联大提出讨论“朝鲜独立问题”，并不顾苏联等国反对，操纵大会插手朝鲜内政，在苏联等六国拒绝参加表决的情况下大会通过了第一个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决议规定设立一个由澳大利亚等九国代表组成的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该委员会不仅有权在朝鲜境内进行监督、观察和协商，并有权对全朝鲜国民议会的选举进行监督，进而由国民议会建立朝鲜全国政府。

赖伊在处理朝鲜问题上自始至终站在美国一边，积极支持美国提出的干涉朝鲜内政的各项建议，倡议组织所谓的联合国军，以武装力量卷入朝鲜战争，并打着联合国的招牌集体干涉朝鲜事务。赖伊对联大通过的第一个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双手赞同，他称新成立的“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完全是一个国际性组织”。为此，他还专门委派秘书长助理维克托·希一柴·胡(Victor Chi—tsaiHoo)作他的私人代表，并委任能力很强的荷兰人皮特勒斯·J·施米特担任首席秘书同朝鲜临时委员会一道前往朝鲜工作。他们奉命在那儿随时向赖伊通报有关朝鲜局势的发展情况。但事实上在1948年1月，以印度代表梅农为首的朝鲜临时委员会一行人员到达汉城后，发现朝鲜各方并不欢迎联大作出的决议。北朝鲜当局拒绝与临时委员会进行接触，而且不让联合国在其控制的北方搞监督选举。根据赖伊私人代表维克托在报告中的叙述，北朝鲜广播电台激烈地抨击朝鲜临时委员会，说该委员会的成员是美帝国主义的雇佣，他们想把朝鲜变为美国的殖民地。甚至声称不允许临时委员会，还有维克托和施米特进入北朝鲜。而南方李承晚等亲美政治派别只关心通过选举夺权。后来，“小型联大”(注)*

仍通过决议授权朝鲜临时委员会在“所能进入的尽可能大的朝鲜地区”(即南朝鲜地区)单独进行选举，并不顾加拿大等国代表的反对，任意变更联大的决议，将本应在全朝鲜进行的所谓“自由选举”随意改为只在南部单独举行。后临时委员会还置各方反对意见于不顾，竟在1948年6月30日宣布承认此次的选举结果。同年8月15日，大韩民国在汉城宣布正式成立。由此导致朝鲜走上了分裂的道路。然而赖伊却无视这一切，反而对朝鲜临时委员会的工作给以充分肯定，说该委员会在当地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并确定在南朝鲜进行自由选举具有充分的自由气氛。他还称经过“自由选举产生的南

朝鲜李承晚政府为朝鲜的唯一合法政府，为此可进一步证实朝鲜临时委员会是本着促进全朝鲜和平统一的原则进行这项工作的”。而事实上，南朝鲜在5月10日进行的选举是在充满恐怖、恫吓和贿赂的气氛中进行的。

1950年6月24日午夜前（朝鲜当地时间25日清晨），赖伊接到了负责联合国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约翰·D·希克森从华盛顿打来的紧急电话，他告诉赖伊北朝鲜在25日清晨向南朝鲜突然发起进攻，引发了朝鲜战争。对朝鲜爆发的这场战争，美苏当时所持看法截然不同。而赖伊同美国的态度不谋而合。当他听到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后，还未搞清楚事实真相，就把责任完全推到北朝鲜身上。他指责北朝鲜挑起战事，严重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关于禁止军事入侵的条款，也违背了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并谴责北朝鲜是侵略者。他还担心北朝鲜挑起战端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

*（注）1947年联合国召开第二届大会期间，在西方大国的主张与支持下根据宪章第22条通过一项关于设立大会临时委员会的决议。该委员会由各会员国派一名代表参加，作为协助大会实现其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职能的辅助机构。其任务是就和平与安全问题进行调查与研究，并向大会提出报告。这就是所谓的“小型联大”。但由于有苏联集团的坚决反对与抵制，并拒绝承认“小型联大”的合法性，它仅仅在朝鲜南部搞了一次所谓“大选”外，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形同虚设。赖伊在电话中主动向希克森保证他准备立即召开安理会会议，同时要求美国政府对安理会与驻汉城的联合国朝鲜委员会随时取得联系提供保证（1948年12月12日，在美国操纵下，第三届联大不顾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代表的激烈反对，通过了由美国等三国提出的“关于承认大韩民国政府及设立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的决议。决议决定设立联合国朝鲜委员会以代替朝鲜临时委员会，其任务是促进朝鲜统一和监督占领军的撤退。但实际上，该委员会一直未能对缓和朝鲜的紧张局势做过任何有效的工作。

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下午，赖伊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这次会议也是应美国的请求而召开的。赖伊应本月主席之邀首先作了发言。他以强调的口吻对与会代表说，昨天午夜他获悉朝鲜爆发战争，遂立即给联合国朝鲜委员会拍了电报，要求它尽快写一份关于朝鲜战事的报告。第二天一早他就收到了该委员会从汉城发回的报告，并将它作为安理会文件进行了传阅。他说，自1947年以来，朝鲜问题一直为联合国所关注。成立的合法政府（指南朝鲜）已有效地控制了朝鲜的那一地区，并对其拥有管辖权。所以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才得以在绝大部分朝鲜人居住的那一地区进行监督和协商。联合国大会已命令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对那一地区的局势发展密切注视并进行汇报，因为任何局势的发展都会导致朝鲜陷入军事冲突。“根据我收到的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的报告，同来自朝鲜其他来源的报道一样，清楚地说明是北朝鲜首先采取军事行动。”但事实上，当时安理会缺乏足够的材料，仅凭美国驻韩国大使穆乔的一份电报以及朝鲜委员会的汇报，很难断定究竟是哪一方挑起战端。赖伊也只根据仅有的二三份材料就断定是北朝鲜侵略。他认为，目前形势严峻，对国际和平构成了威胁。他指出安理会是一个具有法定资格处理“北朝鲜入侵”问题的机构，并且安理会有恢复和平的义务。他呼吁安理会要履行其“明确的职责”，以对付“侵略者”的挑战，并主张以联合国名义采取措施寻求在朝鲜半岛重建和平。

美国代表继而在会上提出一项要求谴责北朝鲜所谓“侵略”的决议草案。

当时南斯拉夫代表认为缺乏准确可靠的消息，因此安理会对此难以履行其职责，同时建议邀请北朝鲜代表列席会议。但安理会未采纳，最后以 9 票赞成、1 票（南斯拉夫）弃权、1 票（苏联）缺席通过了美国提出的决议案。该决议毫无道理地宣布北朝鲜武装进攻是对和平的破坏，要求它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提出北朝鲜军队应立即回到三八线。6 月 27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美国武装干涉北朝鲜，命令它的空军和海军进行掩护，并支持南朝鲜政府的军队。杜鲁门还呼吁联合国会员国协助执行联合国 6 月 25 日作出的决议。在杜鲁门声明发表的当天，安理会又在美国操纵下，通过了第二项由美国提出的较 25 日决议更露骨地干涉朝鲜事务的所谓“紧急制裁案”，建议联合国会员国向南朝鲜提供必要的援助，“以击退侵入南朝鲜的武力进攻，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这项决议以 7 票赞成、1 票（南斯拉夫）反对和苏联缺席与埃及、印度未参加投票而勉强通过。7 月 7 日，安理会第三次通过了一项由英、法提出、实际有美国幕后操纵的决议。这项决议同样是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的。该项决议允许把以美国为主的外国干涉军称为“联合国军”，授权美国任命这支军队的指挥官以及可使用联合国旗帜，并给这支军队的司令部授以“联合国全权”。第二天，杜鲁门总统任命了美国驻远东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为“联合国军”总司令。一星期后，美国陆军参谋长将一面联合国旗授予麦克阿瑟将军，这面联合国旗是赖伊在此之前亲手转交给美国大使瓦伦·奥斯汀的。过去联合国在调解巴勒斯坦问题时曾使用过这面旗。

赖伊在美国出兵干涉朝鲜问题上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与美国的做法遥相呼应。他倡议，为了保证提供最有效的军事力量，必须在安理会的部署下，由美国领导的统一司令部组建一支由多国部队组成的过硬的外国干涉军。并建议这支部队以联合国的名义，身穿佩有联合国标志的军服，服役 2 至 3 年。他认为派遣大批外国干涉军进入朝鲜，集体干涉朝鲜事务，对联合国来说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赖伊鼓吹集体安全防务是为支持美国出兵武装干涉朝鲜开绿灯。他并对美国所谓“协助”联合国处理朝鲜战争问题表示赞赏。他希望联合国对“侵略行径”所作出的反应被看作是国际性的，认为其他会员国应当承担一部分援助任务，而这些国家提供的援助应被看作是有力的协作。为了配合“联合国军”进驻朝鲜，赖伊认为有必要就朝鲜战势同麦克阿瑟将军保持紧密联系，为此他特地委派了南非的艾尔弗雷德·卡津上校作为联合国、统一司令部和南朝鲜的三方代表前往朝鲜工作。卡津上校曾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高级官员，二战期间曾在同盟国情报部门工作，与麦克阿瑟将军关系密切，也很善于处理朝鲜难民问题，所以，他是赖伊派往朝鲜工作的理想人选。在安理会出兵武装干涉朝鲜的协议出笼后第四天（7 月 11 日），赖伊又分别给南、北朝鲜发去了内容相同的电报。他在电报中强烈地敦促交战双方接受国际红十字会提供的医疗服务，并要求他们严格遵守日内瓦大会关于战争期间的法律原则以作为避免发生事变的最好手段。但北朝鲜在 1953 年夏停战协定签署之前一直拒绝国际红十字会进入它控制的地区。在赖伊发出倡议之后，共有 41 个会员国做出响应，其中大部分国家提出了具体援助方案。在联合国中，有 15 个会员国反对出兵朝鲜。它们是：澳大利亚、英国、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法国、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和南非。对此，赖伊重申安理会的行动完全是正当合理的。应他的要求，联合国立法局还准备了一份安理会对朝鲜采取行动的法案。

律方面的备忘录。备忘录就朝鲜战争是否为内政这一论点做了说明。它指出，朝鲜问题多年来已成为国际上和联合国关注的问题。此外，宪章的有关条款曾明确地提出禁止联合国干预在本质上属于任何一国的内政，但这项条款并没有限制联合国采取措施。……不管它原来是否属于国际争端或国内争端，联合国完全有权处理任何威胁国际和平的行为。赖伊在任秘书长期间，支持美国操纵安理会，使联合国在朝鲜问题、特别是在朝鲜战争期间的所做所为，违反了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损害了联合国的声誉，玷污了联合国早期的历史。对朝鲜冲突的不断升级，联合国不仅未能以公正的调停和斡旋活动推动双方进行平等的对话，反而一味地制造事端，火上浇油。最初，“小型联大”随意更改联大决议，把在全朝鲜境内进行的选举改为只在南部举行。而后联合国又宣布该选举有效，竟把李承晚政府封为“朝鲜唯一的合法政府”。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授权美国出兵朝鲜，并不是以有关各方及全体朝鲜人民的同意为前提的，完全不属于维持和平行动的范畴。

从任期延长到被迫辞职

赖伊并不认为自己在朝鲜战争中的立场是错误的。但他的立场与做法使苏联感到愤慨，并遭到苏联的强烈反对。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反对安理会通过的美国出兵武装干涉朝鲜的协议，他认为朝鲜战争纯属内战，并强调朝鲜人像美国内战期间的南方与北方一样，同样有权利解决其国家内部的统一问题。他在1950年7月4日宣称，安理会在朝鲜战争中采取的行动是不合法的，事实上美国人才是真正的入侵者。安理会6月27日通过的决议并不是以7票通过的，实际上只有6票，第7票是“国民党集团代表”蒋廷黻投的票。他是非法占据了中国在安理会的席位。此外，美国提出的“紧急制裁案”是安理会在当时苏联缺席和中国未参加的情况下通过的。所以说，该项决议极不合法，因为它造成了武装干涉朝鲜内政的事实。葛罗米柯认为，假如安理会尊重和平事业的话，它就应当在采取这种令人反感的决议之前，尽量在朝鲜交战双方之间进行调解。他批评安理会和联合国秘书长没有做任何调解工作，并指责赖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奴颜婢膝地推动美国政府和安理会其他一些会员国去严重地违反宪章的有关条款。苏联作家列夫·奥沙丁在他撰写的《特里格夫·赖伊的伟大与衰败》一书中严厉地批评了赖伊，他说赖伊的使命虽然是保卫和平，但他在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关于朝鲜问题的不合理的决议时，却扮演了美国侵略者帮凶的角色。苏联《真理报》刊登的一篇题为《世界人民反对侵略者》的文章抨击他说，“揭下赖伊的面具，他是美国武装干涉朝鲜的一个直接和积极的帮凶。”后来赖伊在自传中对苏联人抨击感到极为不满，说“在莫斯科眼里，我成了‘美国侵略朝鲜的煽动者’……奴性十足地支持杜鲁门总统和国务卿艾奇逊来破坏联合国的声誉”。他说，苏联人如此恶意攻击他，有损于他过去一直享有的“东西方的桥梁”的声望。

1951年2月1日是赖伊任秘书长五年的任期即将届满的日子。在讨论是否继续延长他任期的问题上美苏针锋相对，各持己见。该问题在1949年10月开始提到联合国议事日程上。最开始苏联方面表示将在1950年召开的五届联大上支持赖伊延长其任期，尽管他积极支持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后来由于他在朝鲜战争期间支持美国武装干涉朝鲜，随即苏联不再赞成延长他的秘书长任期。但美、英、法三国都明确表示支持赖伊延长任期。1950年10月9日，安理会召开秘密会议，提出讨论新一届秘书长的问题。南斯拉夫代表贝布勒在会上提议对延长赖伊的任期问题请与会代表交换看法。苏联代

表马立克立即提出反对意见。他说，关于任命秘书长的条件是第一届联大在1946年1月24日通过的。作为秘书长完成其五年任期义不容辞，但对他在任期内的任何变化须由安理会和联大共同作出决定。宪章第97条规定，大会对秘书长任命应与安理会取得一致意见，然而大会单方面决定是违反宪章的。接着他公开声明，“基于上述考虑，我不同意关于延长第一任秘书长任期的意见……，我的代表团也不能接受对赖伊先生任期延长的提议。”这显示了当时苏联反对延长赖伊秘书长任期的强硬态度。1950年10月间安理会专是为是否延长赖伊的任期问题多次开会。10月11日再次开会，曾任安理会主席的英国代表格拉德温·杰布建议安理会五大国就这一问题召开会议，对此马立克根本未加理睬。但马立克重申苏联代表团不同意延长赖伊的秘书长职务，随后他提名波兰外长兹格蒙特·莫杰莱夫斯基为秘书长候选人，安理会以4票反对，1票赞成，6票弃权否决。接着南斯拉夫提议对赖伊秘书长进行重新任命，结果以9票赞成、1票否决（苏联使用否决权）、1票弃权通过。马立克为了阻止赖伊的任职延期，他不惜任何代价，不在乎任何人选，想尽各种办法欲找出一个新的秘书长人选，在以后的会议上，苏联又提出了几位候选人：法国的查维尔先生、印度的贝尼格尔·拉奥，还有黎巴嫩的查尔斯·马立克。前两位自动退出，表示不参加竞选。在马立克的坚持下安理会又对查尔斯·马立克进行了投票，仅以4票赞成、7票弃权被否决。在苏联提名未成功的情况下，马立克又提议延期讨论秘书长的任命问题，他的建议以7票对3票遭到否决。最后他向安理会威胁说，假如硬要任命赖伊的话，苏联将不买他的账，同时也不承认他是联合国秘书长。

根据赖伊自传，在五届联大未召开之前，他曾几次表示任期届满后就辞职不干了，并把他的打算写信告诉给家人。但美、英、法三国代表极力劝他打消这种念头，都希望他继续担任秘书长。1950年10月24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应邀出席联合国纪念日庆祝活动。之后，赖伊在他的寓所举行午餐会，杜鲁门会见了参加午宴的代表们、政府随行人员和其他一些客人。午餐会结束后，杜鲁门和赖伊作了短暂的交谈，他对赖伊说：“你一定要干下去。”还告诉他在同一天的早些时候就此事已经向奥斯汀大使做了交待。随后，艾奇逊在离开赖伊的寓所之前对他重申了杜鲁门的话，并告诉赖伊奥斯汀已得到通知在必要时将代表美国行使否决权，以确保对他的秘书长重新任命。

苏联不再支持赖伊继续担任秘书长，促使赖伊改变了过去的想法。他认为，假如我辞职不干了，这既不是我的选择，也不是联合国各会员国的选择。我不希望被人们看作是失败者。或被看作是由于苏联惩罚我在朝鲜问题上的做法而被迫离开秘书长的职位的。因此，他在1950年秋开始谋求连选连任，但由于苏联使用否决权而失败。最终五届联大以46票对5票通过了延长他三年的任期。但自此之后苏联和四个东欧国家不承认他的秘书长职务。例如，每年联大开会时，各国代表都需向秘书长提出全权证书，而苏联及东欧国家不向联合国提交全权证书。自1951年2月起，他本人未曾收到过这五个国家提交给联合国机构的任何证书、建议和信函，所有一切信函统统寄到联合国秘书处。不仅如此，它们还不断使用否决权，以迫使他辞职。据赖伊本人讲，将近3年当中，他都是默默地面对这种局面。这期间由于美国做后盾支持他，才使他度过重重难关。赖伊在延任之后，据说在麦卡锡进行清洗期间，他允许联邦调查局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人员中横行霸道（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中有

美国公民)，并造成一些人被迫自杀的后果，从而败坏了自己的名声。他的第二个任期一直是在朝鲜战争的“阴影”笼罩之下度过的。所以他感到已无法再继续担任秘书长的职务了，他不仅失去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同时也失去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的支持。经过数月考虑之后，他终于决定辞去联合国秘书长的职务。赖伊在他三年任职延期未的情况下，于 1952 年 11 月 10 日上午在联大会议上宣读了他的辞呈。他说：“假如仅仅是苏联及其支持者对我本人继续进行大量攻击的话，我非常希望坚持到任期届满，因为我长时间以来已习惯了苏联对待‘我’的这种态度。”但问题是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他要面对类似苏联那样的攻击。他声称，“我现在退出是希望我的辞职能有助于联合国挽救和平及更好地为全人类的进步与自由事业服务。”赖伊宣布辞职引来了两种不同的反应，据赖伊本人讲，在他宣布辞职的第二天，许多代表其中包括他在外交界的一些好友力劝他重新考虑这一问题。像英国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他是第一个反对赖伊作出这项决定的人。他说，假如赖伊在这个关键时期辞职，这的确是件遗憾的事。他希望赖伊能重新考虑他的辞职决定。此后还有巴西外长乔·尼夫斯达·方图拉、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扎弗鲁拉·汗先生及希腊大使基罗都像艾登一样表示了他们的态度。此外，还有近 30 个国家的首席代表都在私下里做他的工作，劝他对辞职问题重新加以考虑。但这一次赖伊主意已定，他没有采取像前一次那样的做法。不论是劝说、挽留，还是攻击，他都不会改变辞职的决定，他不会再继续干下去了。不过，他向他们做了解释，他希望在 11 月底之前最迟在圣诞节前辞去职务。但他表示在联大没有任命新的秘书长之前他不会离开联合国。然而赖伊辞职使苏联感到振奋，莫斯科广播电台说，赖伊的辞职显示了他的名誉扫地，因他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支持美国入侵朝鲜在全世界引起了公愤。

赖伊正式宣布辞职后，随即而来的工作是酝酿讨论新的秘书长人选。要选出一位继承人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冷战时期，当时的世界被划分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和西方阵营两大阵营。秘书长必须是两大阵营均可接受的人物。1952 年的圣诞节过去了，迎来了 1953 年的新年。3 月 11 日这天，安理会终于开会讨论新的秘书长人选问题。经过多次协商，五大国一致同意瑞典外交部副部长达格·哈马舍尔德为秘书长候选人。紧接着在 4 月 7 日，联大通过对哈马舍尔德的任命。从那天起他就成为赖伊的接班人。即将退职的赖伊、新任秘书长、联大主席与其他许多代表在那次大会上相继发言。此次赖伊的发言是他作为秘书长在联大作的最后一次发言。他说：“代表们都知道我不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我认为联合国不是通过简单与快速的方式去实现和平与进步的，而是由各会员国政府在数十年中以其智慧、忠诚和不断遵循规章来实现的。”“纵观历史，我认为不但在今天而且在将来世界和平对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所以联合国组织对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更是必不可少的。”5 月 1 日，赖伊向秘书处的全体工作人员告别。这是新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专为赖伊安排的一个欢送仪式。秘书处的同仁们都深有感触地说，联合国的第一个七年是最艰难的七年。赖伊回答说，“的确是这样。我不在意过去的七年对我来说是多么的艰难，我知道这七年对你们来说同样不轻松。所以，在我离开之前，我要做一件长时间以来一直想做的事，那就是将过去所有的烦恼、令人失望的事、令人头痛的事统统抛在一边。我要带走那些美好的回忆……，我希望你们也不要忘记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些最好的合

作。”就这样，赖伊离开了他任职长达七年零二个月的秘书长职位，返回他阔别多年的故土——挪威。回国后，他继续在政府内任职，并在业余时间专心撰写他的自传：《在联合国的七年》，以了却他的心愿，以便让后人了解一些有关联合国创建早期的历史与故事。

有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有一部历史。赖伊也有他自己的一部历史，是他亲手“写的”历史。他在任期间，处理过许许多多的国际问题与争端，他有功也有过。今天人们对他的功与过评说不一。不过，他毕竟是那一历史时期所造就的一位“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

（王利平）

孜孜以求、以身殉职的第二任秘书长

达戈·哈马舍尔德

达戈·哈马舍尔德在 1953~1961 年期间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他以其坚韧的毅力、公正的态度为世界和平孜孜不倦地工作着，直至生命最后一息。他从曾任瑞典首相的父亲那里继承了政治家的才能。在任期间，他为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而到处奔波，并拒绝向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屈服。他的卓越领导使联合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组织。1961 年，他在非洲执行和平使命时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他生前曾说：“联合国不是为了带领我们进入天堂，而是拯救我们，使我们不会掉入地狱。”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在他的身后留下了一个金灿灿的光环：诺贝尔和平奖。

卓尔不群的青年时代

1905 年 7 月 29 日，达戈·哈马舍尔德降生在瑞典中南部约乔坪市的一个贵族家庭。

哈马舍尔德家族始于 17 世纪。这一姓氏在瑞典文中是“铁锤防御盾”之意，为 1610 年瑞典国王查理九世赐给该家族始祖卡尔古斯塔夫的，作为忠勇的象征。当时卡尔·古斯塔夫在皇家军队中服役，授大尉军衔。为国家和国家效劳，勤奋工作，忠于王室——这就是哈马舍尔德家族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后来，该家族成员逐渐脱离了军队，成为著名的政治家、律师、作家等。达戈的祖父罗伦佐·哈马舍尔德就是当时瑞典一位著名作家。

达戈的母亲阿格涅约·阿里姆克维斯特亦出身名门，其祖先个家庭以自由主义、笃信宗教、热爱文学而著名。达戈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对哲学和诗歌的热爱。

然而，对达戈的未来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乃是他的父亲亚里马尔·哈马舍尔德。亚里马尔从年青时就在瑞典政府中担任许多要职——省长、内阁司法部长、教育部长、上诉法院成员、驻丹麦大使和特使。他擅长法律。达戈降生时，他已是瑞典国内一位知名的国际法专家了。他相貌英俊，身材修长，于 1890 年娶了富有魅力、黑头发的阿里姆克维斯特。他们婚后育有四子，即鲍、艾克、斯滕和达戈。

达戈是这个家庭中最小的儿子，比他的长兄鲍小 14 岁。达戈出生时，他父亲正在同丹麦和挪威进行长时间的外交谈判，儿子的洗礼只好一再延期。待父亲归来时，亲朋好友已欢聚一堂，为达戈洗礼。一位好友为此给新生儿送了一个花瓶，上面刻着“赠给长期无名的人”。

小达戈的童年是在孤独中度过的。没有什么孩子和他一起玩，甚至仅比他长五岁的哥哥斯滕也和他玩不到一块。母亲成了他唯一的寄托和陪伴者。因此她不得不对小达戈给予其他孩子未曾要求过的特殊关照。她像自己家族的先人一样，在音乐、诗歌、历史、政治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并尽力把这些知识灌输给她的四个孩子，特别是对小达戈，因为她觉得他的求知欲远比其他三个兄长强。

小达戈上学后，被公认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因此很快便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由于总和大人在一起，他显得比同龄的孩子成熟得多。又由于他不大合群且不卷入男孩子之间的帮派之争，他自然而然成了学校里的“和平缔造者”。他经常在发生争吵和打斗时过去劝阻。这是令达戈永远难忘的经历。

小达戈曾立志当一名教师，并得到母亲的赞许。但有两件事使他改变了

志向。其一是 1914 年 2 月，他父亲亚里马尔就任瑞典首相，其二是五个月后，一名塞尔维亚青年刺杀奥匈帝国皇储，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交战双方屡次袭击瑞典商船，造成人员及财产重大损失。那年，小达戈才 10 岁，他对此十分愤怒，对当首相的父亲迟迟不采取报复行动表示不满。一天，他终于忍不住问父亲，“当瑞典的船只被击沉时，我们不采取报复行动，世人会不会把瑞典视为软弱可欺？”父亲沉吟片刻，对他说：“战争会导致成千上万人丧生，因此政府不能轻易宣战。瑞典船只被击沉是个悲剧，但这是战时的偶发事件，并非交战双方蓄意所为。我身为瑞典首相有义务确保瑞典和平，使因船被击沉而造成的几百人的死亡不致扩大为因参战导致的成千上万人的死亡。”他停了停，然后严肃地总结说，“真正的答案是，瑞典和其他国家应携手努力消除战争，因为战争一旦打起来，无论中立国还是参战国都不能幸免，正如眼前这场战争所展示的那样。”

其后几星期里达戈一直在反复回味父亲的话，并断定这些话是明智的。从这时起，小达戈就放弃了当一名教师的理想，立志成为父亲那样的政治家。

随着小达戈一天天长大，他与父亲的关系日趋亲密。在达戈心目中，父亲严然是一位英雄。达戈喜欢和父亲就时事问题进行辩论。然而，达戈对时局充满浪漫和幻想的见解使他常与老成持重的父亲意见相左。

在中学里，达戈仍然表现出色。他博览群书，且过目不忘。这种惊人的记忆力使他无需在考试前刻意准备。父亲常在别人面前夸奖他：“瞧，要是我有达戈的大脑，我本会爬得更高。”

1923 年，达戈 18 岁时进入乌普萨拉大学攻读文学士学位。这是瑞典最古老、最著名的高等学府，达戈的父亲曾毕业于此并留法律系任教。第一学期结束时，达戈的期末考试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这除了归功于他惊人的记忆力之外，更要归功于他的勤奋和铁一般的自制力。他远离五彩缤纷的大学社交活动，不喜欢跳舞和泡妞儿。当他的同龄人沉溺于这些活动时，他却日日夜夜、通宵达旦地学习。立志出入头地的达戈，决心不让任何无谓的事情影响自己的学业。

达戈入校两年后便获得学士学位。其后三年，他按照父亲的建议继续攻读经济学，于 1928 年获经济学哲学硕士学位，1930 年再拿下法学学士学位。他是乌普萨拉大学第一个获得最高分数的毕业生。他的面前，有一条通向辉煌彼岸的金光大道。

飞黄腾达的仕途

1930 年，达戈随同父母来到斯德哥尔摩。从此，开始了他的功名前程。

最初，达戈担任皇家失业问题委员会秘书。工作十分辛苦，但他还继续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学成后受聘为该校助教。他的博士论文及其出色的工作表现很快引起了财政部官员的注意。1936 年，31 岁的达戈被任命为财政部副大臣。此时他在政治上逐渐转向社会党。

达戈深知要赢得信任，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他不知疲倦地埋头苦干，有时通宵达旦。处理的复杂财政业务，制订的新方案，他总是按期完成，并提出准确的论证和可靠的实施方法。财政大臣维格费尔斯说：“哈马舍尔德对事情本质进行解释的才能永远是令人满意的。”

年轻有为的达戈成为新闻界和出版界追逐的对象，他经常被要求发表对时局的看法或为出版商写书。达戈遵从父亲的建议，对此采取了回避态度。起初，新闻界对他的冷漠颇有怨言，但后来，他们转而尊敬这位兢兢业业、

不爱出风头的副大臣。

1941年，年仅36岁的达戈被任命为瑞典国家银行股东会议主席，是最年轻的董事长，这表明达戈不仅赢得了信任，而且建立了威信。

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德意志法西斯肆虐欧洲大陆之时。达戈受上司委托，同挪威流亡政府官员谈判瑞典向该政府提供财政援助事项。一次，为了同在伦敦的挪威领导人签署协议，他与几位挪威流亡政府代表一起乘一架没有标志的英国运输机飞往伦敦。当飞机飞至北海上空时遭到德国飞机的拦截。为摆脱德机的阻拦和追踪，他们的座机不断爬升、摇摆和倾斜。当机上所有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时，达戈却叼着雪茄专心致志地阅读一本16世纪法兰西诗歌集，仿佛这一切与他无关。一位挪威人见此情景，忍不住对他说：“你的神经一定是钢铁制成的，哈马舍尔德先生。我都忘了自己姓什么了。”达戈诙谐地回答说：“没有什么东西比法国诗歌和雪茄更能安定神经了。你想抽一支吗？”

达戈最终安然抵达目的地，并出色地完成了使命。为表彰达戈对挪威解放事业的贡献，他被授予圣奥拉夫大十字勋章，这是挪威人给予为数不多的几位有杰出贡献人士的最高荣誉。

1945年，达戈·哈马舍尔德被任命为瑞典政府的经济顾问。他被委托同其他国家，特别是同美国进行一系列关于签订经济合作协定的谈判。从此，哈马舍尔德同美国工业界和金融界开始有了业务接触，这对他以后的政治生涯颇有好处。

1949年，达戈就任瑞典外交部秘书长。这时他的周围已经有了一套忠于他的工作班子。两年后，哈马舍尔德成为外交部常务副大臣，是外交部的实际领导者。

登上世界“权力顶峰”

1952年11月，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宣布辞职。这位挪威人被苏联指责为美国的“傀儡”，而美国人却抨击他对“共产主义”太软弱。他在冷战对立双方之间走钢丝越来越难了。而朝鲜停战谈判走入死胡同，他也无能为力。因此，他除了主动提出辞职，已无路可走。

但接替赖伊的人选却迟迟不能产生。苏联、英国、法国主张选举一位专心致力于行政事务、对国际事务采取低姿态的秘书长。而美国则主张秘书长应扮演“更强有力”的角色，“帮助解决”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由于各大国意见相左，秘书长的选举工作陷入僵局。1953年3月安理会再次举行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代表虽几次开会，但都毫无结果。为了打破僵局，法国代表推出哈马舍尔德作为候选人。他出生于中立的瑞典，因此被看作是合适的人选。

哈马舍尔德曾于1951年和1952年两次率领瑞典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他在联大的这两次露面给人印象并不深刻。不知为什么，他在新的国际交际场合显得忧心忡忡，举止失措。对联合国中多数代表团成员来说，他的名字是完全陌生的。当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第一次听到哈马舍尔德的提名时，感到十分困惑。他的手下人竟也无人知晓，于是纷纷跑去问瑞典代表：“哈马舍尔德这家伙是谁？”当一位美国外交官终于记起曾在瑞典——美国贸易谈判中与之打过交道时，他对杜勒斯说：“如果现在能找到他，我们应该把他抢走。”

哈马舍尔德被提名为秘书长候选人，连他自己也始料不及。有人向他透

露风声并要他发表感想，哈马舍尔德以一笑置之。由于当时正值“愚人节”前夕，他把这一消息视为“国际玩笑”，并为有人如此逗弄他感到气恼。他认为，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在发布如此重要的消息之前，不可能不先征求他的意见。然而尽管传闻不断，他却一直没有收到联合国总部、甚至瑞典驻联合国使团的任何正式函电。原来，安理会代表们认为如果在正式投票和发布消息之前就让哈马舍尔德知道对他的提名，则哈马舍尔德很可能推辞不于。因此他们决定对哈马舍尔德的提名进行投票后立即发布消息，这样哈马舍尔德将处于很难拒绝提名的境地。

4月1日，哈马舍尔德收到安理会主席、巴基斯坦大使波克哈里的正式信件。信中称：“考虑到秘书长这一职位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目前这个时候，安理会成员国热切希望您能接受这一任命，如果联合国大会能如我们期待的那样批准的话。”

哈马舍尔德此刻的心情十分复杂。他知道他之所以获得提名，乃是各列强相互妥协的结果。许多深孚众望的政治家都因与冷战中某一方的瓜葛而被排除在外。而他的中立国背景，他的默默无闻以及他那温良谦恭的性格恰恰帮了他的忙。联合国秘书长工作是世界上最困难的工作，需要高超的走钢丝技巧。他必须放弃对自己出生国的效忠，只忠于世界各民族的共同理想和利益，而不论个人好恶如何。自己能挑得起这副重担吗？哈马舍尔德对此心中无数，便去见自己91岁高龄的父亲亚里马尔。亚里马尔了解自己的儿子，甚至胜于达戈本人了解自己。他毫不犹豫地说：“你当然应该接受提名。你的全部生命就是追求这个目标。”

1953年4月7日，联合国大会正式批准安理会对达戈·哈马舍尔德的举荐。两天后，哈马舍尔德带着喜悦的心情飞往纽约联合国总部就任那崇高的职位。他在对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说：“我，达戈·哈马舍尔德，兹庄严宣誓，将以全部忠诚、判断力和良知履行联合国秘书长职责，使我个人品行符合联合国利益，不寻求和接受任何政府和其他组织对我履行职责的指示。……我们的工作是和解与现实的建设。”他引用一个瑞典诗句作为结束语：“人们最伟大的祈祷是祈求和平而非胜利。”

他上任伊始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结识联合国的4000多名工作人员，他花了两周时间，从38层直到地下3层，走进每间办公室，同每一个工作人员打招呼，包括自己的副手、各部主任以及看门人、擦窗工等。1958年，他第二次当选后，又一次重复了这个程序。

他对新闻界的态度也与前任迥然不同。赖伊当政时，喜欢直言不讳地对政局发表看法，而新闻界也习惯于每天接收戏剧性的声明。哈马舍尔德则对新闻界这种喜欢制造轰动效应的作法十分反感。他认为记者的局限性使得他们往往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对解决复杂的国际争端尤其不利。他在上任之初即表示不会仅仅为了使新闻界满意而发表声明。

哈马舍尔德一上任，就把加强联合国秘书长的作用和扩大他的职权范围作为行动目标，以期使秘书长和他领导的秘书处全体工作人员能够独立行动。赖伊当政时，纵容美国麦卡锡分子肆无忌惮地对联合国的美籍雇员进行非法调查和甄别，严重影响了联合国工作人员的情绪和工作效率。哈马舍尔德认为这种调查和甄别是对联合国独立性的侵害。联合国只有成为一个不偏不倚的、客观的、不屈从于某些国家压力的国际组织才能取得成功。联合国雇员按理只能对联合国及其宪章效忠。他把美国联邦调查局对联合国的骚扰

称之为“完全不能容忍的”，并宣布驱逐在联合国的该局人员。与此同时，由于意识到此举可能会得罪作为联合国主要捐助国的美国政府，哈马舍尔德为秘书处制订了一套程序，以对雇员的免职进行管理，从而使联合国雇员的聘用标准受秘书长控制。由于该制度能使任何有“共产党嫌疑”的联合国美籍雇员受到秘书处调查并视情况将其解雇，因而美国政府也感到满意。

哈马舍尔德上任后的第二项行动是扩大联合国调节国际争端的活动范围，包括联合国维持和平的行动，以及领导机构——安理会和联大直接授权秘书长调节冲突的各种使命，增加秘书长的调停职能。他希望秘书长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使联合国秘书长成为国际行动的首倡者。

致力于缓和中东紧张局势

哈马舍尔德于 1955 年来北京与中国政府商谈释放朝鲜战争期间在中国东北被俘的美国空军人员和谍报人员问题。在这一问题解决之后，另一个世界热点——中东地区又被推到国际舞台的中心。虽然联合国于 1949 年安排了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但远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阿、以冲突的根源。几十万逃离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难民栖身于临时搭就的难民营里，困苦不堪。阿、以边境地区流血冲突不断，很可能发展成为一场全面战争。英法两国因担心其生命线——苏伊士运河的安全，便威胁将以武力干涉阿、以之间可能的战争。美国人态度暧昧。苏联则表示西方的任何军事干涉都将被视为对苏联自身的威胁。

哈马舍尔德对日益紧张的中东局势深感不安。1956 年 1 月，他飞往埃及和以色列，同两国领导人讨论缓和局势和避免战争的途径。埃以双方都指责对方首先挑衅。哈马舍尔德确信，在联大和安理会正式讨论中东局势只能加剧双方的猜疑和敌意，因为局势之复杂远非公开的争论所能解决。此外，东西方在此问题上的严重对立使人们难以指望他们共同支持采取具体行动，只有“悄悄外交”才能奏效。通过在幕后谈判中扮演中间人角色，才能实现联合国讲坛上相互指责所无法实现的目标。

哈马舍尔德私下向有关各方提议举行秘密谈判。这导致美国于 3 月 20 日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安理会责成秘书长研究实施阿以停火条款的途径，并作出安排，以缓和紧张局势。该议案得到安理会批准。

哈马舍尔德对这项委托表示欢迎，但同时也暗示即使没有接到安理会指示，他也会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行动。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他想要重申秘书长有权在世界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的地方采取独立行动。

4 月 6 日，哈马舍尔德飞往贝鲁特。这是他中东使命的大本营。其后几个月，他旋风式地访问了埃及、以色列、叙利亚、约旦四国，同各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在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家中，哈马舍尔德饮着茶，和主人连续辩论数小时。言谈生硬的本—古里安尽管最初充满敌意，但后来也转而敬慕这位思维敏捷、颇有修养的秘书长。在开罗，哈马舍尔德同埃及总统纳赛尔——阿拉伯世界的代言人亦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这些会谈的目的在于从阿以双方领导人那里获得不容置疑的避免边境冲突的保证。使哈马舍尔德的使命复杂化的是新闻界的好奇心。不管他走到哪儿，都有数十位记者紧紧跟随，没完没了地询问会谈进展情况，回避他们并非易事。任何断章取义的引述都会破坏业已取得的进展。哈马舍尔德通过其新闻官，对这些问题一概答称：“事情正在进行”，“局势尚可”。这种暧昧态度虽然令新闻界不满并使秘书长本人受到批评，但却防止了谈判进程被过早曝光从而导致失败。对

哈马舍尔德来说，和平使命的成功远比他在新闻界的受欢迎程度重要得多。

最终，哈马舍尔德从埃以双方得到了遵守停火条款的保证。紧接着是令人惊讶的变化：埃以双方的宣传调门明显降低了，边境流血事件也大大减少了。纳赛尔和本—古里安态度变软，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哈马舍尔德的个人影响，是他使对立双方相信其中立性、客观性和真诚致力于和平的精神，从而使后者作出了无条件遵守停火的保证。

当哈马舍尔德从中东返回纽约时，他情不自禁地感到此行收获比预计的还要多。中东局势暂时稳定了下来，并为全面解决该地区问题提供了一个心理上的契机。他的努力在安理会和新闻界获得一致赞扬。

在其后几周里，尽管埃以双方仍不时指责对方违反停火条款，但两国边境地区的冲突维持在最低限度。局势一度充满希望，以至有人在安理会提出一项议案，就全面解决阿以争端设定谈判框架。然而到7月份，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彻底改变了中东的政治版图。

尽力解决苏伊士运河危机

在地中海和红海之间，有一条绵延一百英里的狭长地带。自《圣经》时代起，它就成为两个世界之间的门户，多少世纪以来，它是世界上最繁忙也是最最重要的贸易通道。早年往返于亚非之间的商队，在此穿过苏伊士地峡炎热的沙漠，给生活在两大洲的人民带来对方的财宝和文化。

富有远见的人们早就梦想在苏伊士运河地区挖一条“沟”，以在东西方之间建立一条水道。工程师们曾预言这一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到1859年，在法国领事斐迪南·莱塞浦斯的倡导下组建的一个私人公司，开始筹划挖这样一条“沟”。此后，数十万埃及民工，历经十年艰辛，用他们的双手，把原来连接亚非两洲的这一地峡刨成了一条人工运河。为此埃及付出了1680万英镑的工程费用，占总投资的79%。近12万民工在强制的劳役中丧生。这条并不起眼的“沟”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它长173公里，沟通了地中海和红海，使欧亚两洲之间的距离比绕道非洲好望角要缩短6000~12000公里，成了东西方海上交通的咽喉要道，在战略上和经济上都具有巨大的意义。

1888年签署的《君士坦丁堡公约》规定，苏伊士运河无论在平时或战时都保证向各国开放。它由几个国家组成的理事会管理，其中英法两国占有大部分股份（英国政府占44%，法国投资者占50%），苏伊士运河对大英帝国尤其利益攸关。为了控制这条海上生命线，英国在运河地区维持着强大的陆海军力量。在永流不息的运河上，人们看到的大都是耀武扬威的西方船只，其中四分之三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在北约国家的船只中，英帝国又占了三分之一。作为埃及领土上的运河，其股份的96%却掌握在外国人手中。1955年运河收入达1亿美元。可埃及所得只有300万美元。这条运河不仅没有给埃及人民带来多少好处，反而成了埃及人民近百年来受剥削和压迫的历史见证。收回运河是埃及人民强烈的民族要求。为此，埃及人民不断进行斗争。

1948~1949年的阿以战争打破了苏伊士运河保持60多年的平静。当时，埃及扣留了开往以色列的船只和货物。这导致联合国安理会对埃及提出抗议。但埃及未予理会。这也成为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重要争端之一。

1956年4月，当哈马舍尔德为防止爆发一场新的阿以战争而访问中东时，埃及同美国就美向埃及提供财政援助，以支持埃及建造阿斯旺水坝的谈判也正在进行。美方表示愿意在埃及政府建造这座水坝的一期工程中提供

7200 万美元赠款，世界银行也将借给埃及 2 亿美元。但是，必须以美国对埃及进行财政监督和停止埃及与苏联的军火交易为前提。埃及人拒绝了这些要求，美国和世界银行也随之取消了对埃及的援助和贷款计划。

埃及人对此十分气愤。在美国宣布拒绝提供援助后一星期，即 1956 年 7 月 26 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在亚历山大的群众大会上宣布将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公司的全部财产、资产和债务移交给埃及；管理公司的一切机构全部解散，运河航运将由埃及成立机构管理。运河收入将用于建造阿斯旺水坝工程。埃及政府这一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果断措施得到了埃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影响极大，连在美国严密控制下的巴拿马也作出了反应，发出了要恢复巴拿马运河主权的呼声。

但是埃及这一正义要求遭到英、法两国的疯狂反对。它们表示将立即派遣军队和飞机迫使纳赛尔收回成命。而美国为了将英法这两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排挤出运河地区，便问英法两国施外交压力，使之不诉诸武力。最终，英法的态度软了下来，运河仍控制在埃及人手中。

哈马舍尔德意识到，这一危机的出现使他促成的停火协议几乎成了一纸空文。以色列认为埃及的行动构成了对它的直接威胁，因为“如果埃及的行动受到鼓励的话，它将会进而向犹太国发动全面进攻”。

10 月 5 日，安理会开始审议苏伊士运河争端。有关各方在公开会议上争论不休。与此同时，哈马舍尔德也在同埃及、英国和法国的外长们举行幕后谈判，试图调解各方争执。他向这些外长们指出：“鉴于世界的利益和各国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我的职责是帮助你们达成一项既符合贵国利益又与国际社会的要求相吻合的协议。”他希望为真诚的谈判和妥协奠定基础，并强调应时刻牢记国际社会的利益。

哈马舍尔德把三国外长请到 38 层楼自己的办公室内喝了几次咖啡，完全以聊天的方式进行谈判。当时大家已对妥协抱绝望态度，在举行了 6 次这样的会谈以后，三国外长在咖啡桌旁达成了有关苏伊士运河运营的总的原则协议，规定各国船只可自由通过运河、尊重埃及主权、运河经营同各国政治不发生关系以及通行税的收取方式和用途等，以此为依据起草的决议案获得安理会一致通过。

哈马舍尔德对业已取得的进展十分满意，并建议再举行一系列私下会谈。在埃及和英法同意后，哈马舍尔德开始着手安排在日内瓦谈判。

但在 10 月 29 日，一项令人震惊的新闻简报出现在联合国的电传机上，使谈判突然中断：以色列军队越过埃以边境，入侵埃及西奈半岛并正在向纵深挺进。

西奈半岛是位于苏伊士运河和埃以边境之间的一块埃及领土，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显然，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已迫不及待要对埃及采取行动，以掌握主动权。训练有素的以色列机械化部队将埃及军队分割包围。种种迹象表明，这不是一次单纯的报复行动，而是全面战争。

哈马舍尔德对事态的发展深感震惊。他对几个月来的中东和平努力的失败虽感到遗憾，但更担心的是事态会失控从而使敌对行动扩大化。他认为现在不是痛苦反省的时候，需要的是清醒的头脑和坚决的行动。

当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洛奇打电话给哈马舍尔德要求次日上午召开安理会会议时，哈马舍尔德正在制定停火方案。两人经磋商后，决定由美国提出一项停火决议，以迫使以色列停止进攻。

在经过一个不眠之夜后，哈马舍尔德于次日上午召开了安理会会议。会议对美国的决议案讨论了一整天。在最终表决时，法国和英国代表令人惊讶地使用了否决权。哈马舍尔德对此的吃惊程度不亚于上次获悉以色列入侵西奈之时。那一刻，他望着会议室墙壁上悬挂的象征人类追求和平的壁画，感到一种冷酷的嘲讽。

第二天上午，在经过又一个不眠之夜后，哈马舍尔德再次召开安理会会议。这时来自中东的消息向人们澄清了昨天英法否决停火决议的原因。当以色列军队正在西奈半岛肃清残余的埃及军队时，英法两国的飞机开始轰炸埃及机场，作为随后派遣空降部队控制苏伊士运河的前奏。

为应付不断恶化的危机，安理会通过一项动议，要求召开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至第二天黄昏时，76个国家的代表聚集一堂，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美国的提案，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停火，并禁止向中东输送军队和武器。同时还呼吁恢复苏伊士运河的自由通航，并指示联合国秘书长在其权限内采取一切措施，使决议条款得以落实。

哈马舍尔德深感责任重大。他推断，除非他能承诺有效地保证英法以三国的利益，否则它们是不会理会停火呼吁的。

他的推断是对的。英法两国表示，只有派遣联合国部队以使运河地区中立化，并使导致目前局势的事件不致重演，它们才尊重联合国决议。然而得到苏联支持的阿拉伯国家主张联合国的职责只应限于使该地区恢复到以色列入侵前的状态。

哈马舍尔德仔细琢磨着当前的困境。最大的问题在于，即使联合国大会同意英法关于派遣一支联合国部队的要求，这支部队从哪来？难道能凭空变出一支军队来吗？

随着危机的升级，英法两国加剧了对埃及的轰炸。11月4日早晨，精疲力竭的联大代表们通过一项决议，指示秘书长制定有关联合国紧急部队的计划，并在48小时内向联大汇报。在走出联大会议厅时，哈马舍尔德用嘶哑的嗓音对其助手说：“走，咱们一起去变一支部队来吧！”

这正是他受命要做的事。起初，他对一夜之间能否变出这样一支军队表示怀疑。它需要很多国家的合作，而这些国家往往在最简单的问题上都难以合作，能指望它们同意派兵去动乱频仍的中东执行一项前途未卜的冒险使命吗？

尽管心存疑虑，哈马舍尔德还是全身心地执行联大的决议。在此后两天里，他和助手们为此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他们向一些国家的代表试探派兵的可能性。北欧国家和其他几个小国都暂时同意了。加拿大则表示愿提供一个全副武装的战斗营。哥伦比亚代表亦十分乐意请求本国政府派兵，并可望得到肯定答复。不久，哈马舍尔德据此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他草拟的维和行动蓝图。蓝图中呼吁成立由少数军官组成的联合国司令部监督各国派遣的小分队。然而，为了使维和行动不受冷战政治的影响，应将大国排除在维和部队之外。这一蓝图以57票赞成0票反对，19票弃权获得通过。这样，没经过多少讨论，联合国大会就不事声张地采取步骤，以创建世界历史上第一支国际维和部队。

接着，哈马舍尔德开始采取计划中的第二个步骤：通过电话紧急召集参加维和行动的各国驻华盛顿使馆武官。经过连续数小时的会谈，大家商定了本次行动的具体细节。由美国负责空运，但它将不派军队参加行动。

连日来不分昼夜地工作使哈马舍尔德精疲力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心情越来越轻松，因为他的辛勤工作换来了可喜的成果。被请求帮助的各国都十分合作，加拿大、哥伦比亚、丹麦、巴基斯坦和芬兰已同意派兵。在挪威方面，由于该国法律禁止向国外派兵，议会召开特别会议通过了一项紧急法案，给予内阁必要的权力作出决定。哈马舍尔德颇为得意地对一位助手说：“人们常批评联合国总是令其成员国失望，而更多的情况是世界各国令联合国失望，这次则大不一样。”

到11月6日，埃及和以色列双方也已先后表示遵守联合国停火决议。只有英法两国仍拒绝停火。它们的军队正在向苏伊士运河区挺进。哈马舍尔德加紧完成了关于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最后报告并将其副本递交给英法两国代表。然后点燃他那味道怪异的小雪茄，在室内来回踱着步子，焦急地等待着回音。

英法的答复终于来了。哈马舍尔德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他告诉记者有重要声明要发表。然后，在短暂而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之后，他用疲惫但却稳重的声音宣布：鉴于联合国紧急部队已成立，英法两国已命令其武装部队停火。它们是在埃以两国政府无条件接受停火得到确认之前就同意这样做的。”我可以证实埃以两国政府已接受停火”，哈马舍尔德补充说。

记者们听罢立刻蜂拥般向自己的打字机和电话机跑去。几分钟后，关于停火的新闻简报就通过电波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

11月15日，哈马舍尔德登上了飞往中东的飞机，去亲自领导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当他抵达埃及时，首批联合国小分队已经到达。因为来不及制作正式的徽记，他们便在胳膊上带着蓝色袖章。

在阿布·苏维尔机场，身着便装的哈马舍尔德检阅了联合国部队。他对官兵们说：“你们正在一个历史性时刻执行历史性使命。”随即离开机场，同联合国部队的军官以及埃及官员举行会谈。要做的事情很多，如清理苏伊士运河沉船，在航道沿岸部署军队以及外国军队有秩序地撤离埃及等。他还制订了联合国司令部应奉行的政策。

哈马舍尔德还对以色列进行了闪电式的访问，以加速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军。在耶路撒冷这座依1949年停火协议而一分为二的城市，哈马舍尔德访问了阿拉伯控制的“旧城”和被以色列入定为首都的“新城”。时值正午，烈日炎炎，整座城市被热得发烫的空气笼罩着。哈马舍尔德漫步在耶路撒冷古老的石头建筑之间。他记得，8年前，就是在这里，另一位名叫博纳多特的瑞典人为和平事业献出了生命。不知不觉，他和助手走进了一条样子很怪的狭窄小巷。当哈马舍尔德及其助手们把其余随行人员甩开约40码时，突然听到“砰”的一声枪响，哈马舍尔德急忙转身，一颗子弹从他耳边飞过，打到身后的墙上。

“是子弹！”他的助手惊恐地说。“我们正被人瞄准。”

“不错。”哈马舍尔德很快回答说。“记住，我们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如果这事传出去，将会引发另一场阿以危机。”

他们迅速返回随行人群当中，哈马舍尔德微笑着，用平稳的语调说：“先生们，离开这里吧，风太大了。”其实，一丝风都没有，在热空气中，人们被烤得汗流浃背，大家以为秘书长疯了，都转身盯着他。他们看到秘书长冲大家做着鬼脸，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便跟着他上了汽车。

在其后的几周里，停火条款逐步得到遵守。哈马舍尔德亲自监督着整个

维和行动。每天都有关于维和部队活动的各种报告传送到他在联合国总部的办公室里，使他在此次行动的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

到 1957 年 3 月为止，即以以色列入侵西奈半岛五个月之后，哈马舍尔德宣布所有外国军队都已撤出了埃及领土，联合国大会的命令得到不折不扣的遵守。他向安理会通报说，联合国紧急部队已全面部署在埃以停火线上。至此，尽管阿以冲突的根源依然存在，迫在眉睫的危机已经过去。战争停止了。在联合国援助下，苏伊士运河在清理了战争造成的阻塞之后，于 4 月 10 日重新对国际航运开放。

从派遣军事观察团到派遣维和部队，这是联合国的一次创新，是维和行动历史上的一次跃进。

哈马舍尔德说，紧急部队用于维持和平是成功的。在建立维和部队时，他曾经提出了如下原则：

第一，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临时办法，并不妨碍有关当事国之权利、要求或立场；

第二，维和行动只有征得有关各方的一致同意才能实施；

第三，维和部队只有在自卫时方可使用武力。

人们把这三点概括为中立的原则，得到同意的原则和自卫的原则，并称之为哈马舍尔德三原则。这些原则，对联合国后来的维和行动都具有指导意义。

预防外交

苏伊士危机解决后，哈马舍尔德的国际声望大为提高。1957 年 9 月 26 日，联合国大会一致选举他连任联合国秘书长。联大主席称哈马舍尔德为“我们最出色的国际公仆”。对于自己重新当选，哈马舍尔德且喜且忧，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就反映了他当时的复杂心情：“如果不是出于责任感，没有任何人明明知道担任联合国秘书长职务意味着什么还会接受这个职务。然而任何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又都不会没有感激之情，这是一个既艰苦而又光荣、既令人兴奋而又让人沮丧的工作。”

哈马舍尔德的第二个任期从 1958 年 4 月 10 日开始。不久，黎巴嫩危机爆发了。

自苏伊士运河危机发生以来，英法势力被迫退出中东地区，美、苏两国争相填补“真空”，中东的战略格局发生转变。1957 年 1 月，美国提出了实行“军事援助和合作计划”的艾森豪威尔主义，美副总统和总统特使相继到中东活动，6 月美正式宣布参加巴格达条约军事委员会和“反颠覆委员会”。苏联则在指责艾森豪威尔主义加剧了中东紧张局势的同时，积极发展同埃及、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的关系。黎巴嫩危机就是在这种冷战的阴影下发生的。

1958 年 1 月底，纳赛尔宣布埃及和叙利亚将合并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此举在阿拉伯国家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约旦和伊拉克两个王国立刻做出了反应，决定组成一个联邦。在黎巴嫩，原有的宗教矛盾再次尖锐起来，亲纳赛尔的穆斯林和亲西方的基督教派就与谁结盟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除此之外，身为总统的基督教派领导人夏蒙谋求通过修改宪法连任总统职务，亦遭到穆斯林派的强烈反对，黎巴嫩政府做出不参加任何联盟的决定后受到了埃及电台的抨击，国内的反政府派组织了示威游行，最后发展成暴力活动。先是特里波利市的美国信息服务图书馆被烧毁，接着贝鲁特、西顿等城市，以及黎巴嫩的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地区也相继发生暴力活动。

1958年5月22日，黎巴嫩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阿联干涉黎巴嫩内政”问题。安理会经过几天激烈的辩论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哈马舍尔德看过后极不满意，指出这个草案只提到派观察组赴黎巴嫩调查，却没有授权秘书长提供必要的观察员和做出行政安排。当为哈马舍尔德所认可的决议草案拿到会上时，已是晚上。哈马舍尔德立刻投入紧张的工作，安排挪威、厄瓜多尔、印度三国派员组成观察组，到次日凌晨安理会通过决议时，哈马舍尔德立刻就宣布必要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协助观察组工作的军事观察员，有的第二天就可到位。

哈马舍尔德从一开始就强调，赴黎巴嫩观察组不充当警察。黎巴嫩驻联合国代表曾要求哈马舍尔德派两千人赴黎巴嫩“保卫观察员”，为哈马舍尔德所拒绝。哈马舍尔德认为派兵赴黎巴嫩会彻底改变联合国行动的性质，更何况还有巨额费用问题。

埃及支持安理会派观察组的决定。对于纳赛尔的意图，哈马舍尔德与西方国家有不同的看法。由于埃及的宣传攻势和对黎巴嫩的活动，西方认为纳赛尔是中东动乱的主要根源。哈马舍尔德则认为这种分析过于简单化。他感到埃及的所作所为，至少一部分原因是纳赛尔怀疑其他阿拉伯国家阴谋在西方的帮助下推翻他。因此，哈马舍尔德认为只要说服纳赛尔相信他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埃及就会停止其挑衅行为。当然，最紧迫的还是避免局势恶化。哈马舍尔德一方面要求埃及外长法乌齐停止电台的宣传攻势，另一方面抓紧落实军事观察员的人选。6月19日哈马舍尔德亲赴贝鲁特主持联合国赴黎巴嫩观察组首次会议。此时的贝鲁特仍然枪声阵阵。哈马舍尔德在4辆装甲轿车的护送下到宾馆后，立刻同观察组成员开会，接着赶往总统官邸礼节性拜访夏蒙总统。这一天，哈马舍尔德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两点三十分，连晚饭都没顾得上吃，只以几个芒果和一瓶威士忌充饥。

6月20日，哈马舍尔德会晤黎巴嫩总理，两人一致认为必须全力防止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发生冲突。接着又赴安曼和耶路撒冷，安抚约以两国领导人。

6月22日，哈马舍尔德飞抵开罗，先与外长法乌齐会谈，随后与纳赛尔会谈了四个半小时。哈马舍尔德坦率地告诉纳赛尔，他肯定黎巴嫩反对派得到了外部的军事援助，只要观察组找到证据，联合国就会宣布阿联为侵略者，从而带来一系列后果，包括向埃及领土派驻紧急部队，甚至不排除美英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因此，他劝纳赛尔改弦更张，停止军事渗入和鼓动黎巴嫩叛乱分子的电台宣传。纳赛尔承认了军事渗入的事实并解释了原因。他完全同意哈马舍尔德的意见，让黎巴嫩成为东西方之间中立的交汇点，保证停止军事渗入和武器运送。次日，法乌齐重申了纳赛尔的承诺，并告知已下令停止通过叙黎边界进行的军事援助。同时，法乌齐也表示担心纳的这一决定泄漏出去会在埃、叙两国和黎巴嫩反对派领袖中引起不良反响。这就是说，哈马舍尔德必须在不让纳赛尔丢面子的前提下做夏蒙的工作。6月24日，哈马舍尔德飞返贝鲁特，中午应邀与黎巴嫩总理共进午餐。在主人问及访问开罗的结果时，哈马舍尔德婉转地说，他现在“对联合国的行动充满信心”。主人听后十分高兴，吩咐上了一块大蛋糕，上面写着“联合国，救救黎巴嫩”。哈马舍尔德当着记者的面大声说：“阁下，我不能接受这句话，因为拯救黎巴嫩的应是黎巴嫩自己。”

当天下午，哈马舍尔德在同夏蒙总统的会见中告诉后者，他虽然不能泄

漏同纳赛尔会谈的内容，但他感到对联合国阻止军事渗入和武器输送的努力更有信心了。

与此同时，观察组向哈马舍尔德报告，黎巴嫩军司令吉哈布将军和反对派领袖琼卜拉特都不希望动武，如果能够说服夏蒙放弃连任的打算，吉哈布可任临时总统。此外，反对派已基本上同意让联合国观察员进入自己控制的地区。现在的关键是夏蒙的态度了。

6月26日，哈马舍尔德返回纽约后，致函美英两国外长，指出阿联的军事渗入似已停止，希望不要因为黎巴嫩政府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或因美英大张旗鼓地向夏蒙政府提供军援而葬送这一形势。哈马舍尔德还指出，只要夏蒙不放弃连任打算，黎巴嫩就不可能实现和解。哈马舍尔德表示相信，如果黎巴嫩政府公开要求西方援助，那不仅对夏蒙政权没有好处，而且还会削弱中东地区其他亲西方政府的地位，并因此而削弱西方在中东的影响。

7月初，夏蒙宣布9月23日任期一到就离职，从而为解决黎巴嫩危机铺平了道路，然而黎巴嫩政府对阿联军事渗入的指责仍未停止。7月7日，哈马舍尔德在与杜勒斯共进午餐时，杜勒斯告知伊拉克、土耳其、伊朗、以色列等国强烈要求美国介入黎巴嫩。哈马舍尔德表示，他认为纳赛尔确实不希望黎巴嫩加入阿联，但他受到叙利亚和黎巴嫩反对派的压力，因此有必要为其提供一个从黎巴嫩脱身的理由。哈马舍尔德建议延长联合国赴黎巴嫩观察组任期，并将其职权范围扩大为维护黎巴嫩的独立和完整。杜勒斯表示可以考虑，并向哈马舍尔德透露，美中央情报局已证实纳赛尔确已下令不再给黎巴嫩反对派以援助。哈马舍尔德的努力成功在即。

就在这时，伊拉克发生了政变。哈马舍尔德立刻意识到黎巴嫩会借机要求西方提供军事援助。果然不出哈马舍尔德所料，政变的翌日早晨，美驻联合国代表通知哈马舍尔德，美应黎巴嫩政府之邀将按联合国宪章第51条派兵赴黎巴嫩。两天后，英国应约旦国王之邀派兵赴约。局势骤然紧张起来，直到美国搞清伊拉克革命并非苏联、阿联所策划，并派特使赴伊拉克和埃及安抚，局势才缓和下来。哈马舍尔德得以继续努力争取扩大联合国赴黎巴嫩观察组。他认为，联合国在黎巴嫩的存在有助于缓和局势，并为美军撤出创造条件。然而安理会上争论激烈，无法形成决议。在这种情况下，哈马舍尔德表示，如果有必要，即使得不到大会或安理会的指示，秘书长也应采取行动弥补联合国宪章和传统外交所提供的维护和平机制的不足。他宣布他有义务采取实际步骤，防止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在得到安理会的默许后哈马舍尔德立刻行动起来。与此同时，7月30日，美承认伊拉克新政府。7月31日，吉哈布将军当选为黎巴嫩总统。危机逐渐平息下来。

8月份，联大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美英从黎巴嫩、约旦撤军问题，最后一致通过了10个阿拉伯国家提出的“睦邻决议”。决议“要求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严格按照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行事”，“责成秘书长立即做出实际安排以便在目前情况下在黎巴嫩和约旦问题上，充分帮助维护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从而便于外国军队早日撤出这两个国家”。哈马舍尔德对会议结果感到欣慰和高兴，称通过决议的8月21日为“联合国为当前国际政治与当前外交做出宝贵贡献的一天”。联大特别会议一结束，哈马舍尔德便赶赴中东，落实联大决议，先后访问了黎、约、埃、以、伊拉克等国家。在安曼，哈马舍尔德与约旦国王侯赛因、首相里法伊探讨了在安曼设立联合国“代表处”的设想。哈马舍尔德的意图是以

此向约旦和英国提供一种保证，创造有利于英军撤出的气氛，并进而促进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睦邻关系。在贝鲁特，哈马舍尔德与吉哈布和夏蒙商讨了增加联合国观察员的措施。在巴格达，新政府向哈马舍尔德保证愿与约旦保持正常关系。在开罗，阿联领导人表示不反对在英军撤出后恢复特里波利港对约旦的石油供应，并同意讨论恢复约旦航空公司班机飞开罗事宜。9月，黎巴嫩局势大大改善。反对派缓和了自己的敌视态度，关闭了地下电台。双方政治组织开始收缴各自追随者的武器。吉哈布就任总统。10月1日，英国宣布将于10月20日开始撤军。10月8日，美国宣布月底前完成撤军。11月16日，黎巴嫩政府正式要求从安理会议程上取消黎巴嫩议题，黎巴嫩危机宣告解决。

解决黎巴嫩危机是联合国预防外交的一次实践。哈马舍尔德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初步提出了预防外交的宗旨、方法和原则。哈马舍尔德指出，预防外交“从一开始就是以预防为目的”，以填补真空的方式“避免各方中的任何一方采取行动”。安理会决定派观察组赴黎巴嫩后，哈马舍尔德就曾指出，这次联合国行动是一次典型的预防外交事例，其主要目的就是不让中东受冷战的影响。因此，哈马舍尔德除组织实施外，还亲赴冲突双方各国积极斡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服双方克制自己，配合联合国观察组完成使命。伊拉克发生革命后，哈马舍尔德又向有关方面陈说利害，争取外国军队撤出。哈马舍尔德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始终把握一条原则，这就是联合国的行动以不冒犯任何权力集团为基础，“以便为确保避免任何一方采取行动提供广泛的可能”。

与大国的冲突

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个个手握否决大权，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既要尽量保持公正，又不能不想方设法求得它们的支持，或至少是不反对。尽管如此，当危机直接或间接涉及到某个或某几个大国的利益时，还是难免与它们发生冲突。

老挝的危机就是一个例子。老挝危机可以说是美国一手制造的。1954年7月日内瓦协议签定后，法国殖民军被迫撤出老挝，美国乘虚而入，以政治、经济、军事援助培植亲美势力。早在1954年，梭发那·富马亲王就曾尝试民族和解，因美国和泰国阻挠而失败，直到1957年11月才同以他的同父异母兄弟苏发努冯亲王为首的“巴特寮”爱国战线达成了万象协议，随即组成了民族联合政府。在1958年的局部选举中，“巴特寮”成绩突出，引起美、泰担忧，美寻找借口停止了对老的援助，迫使富马首相辞职。新的右翼政府于1959年9月要求联合国派紧急部队赴老挝制止“北越的侵略”。哈马舍尔德所设想的解决方案是，派遣一名秘书长代表进行调查，然后向秘书长报告，再由秘书长向安理会或大会报告，这样秘书长就能根据情况在美苏两大国之间居中调停，发挥缓冲作用，避免它们在安理会发生正面决裂。此外，哈马舍尔德还想赋予这个秘书长代表协助整个印支地区的联合国成员国政府处理地区问题的权力。哈马舍尔德的这个设想得到了缅甸、柬埔寨、老挝和泰国外长的原则赞同，但在美国那里却碰了钉子。这次老挝发生危机，哈马舍尔德不仅支持北越和中国提出的关于恢复由日内瓦会议建立的国际监督委员会的要求，而且还批评了美国在老挝的秘密活动。美国自然不愿让哈马舍尔德插手。当哈马舍尔德任命的调查小组首席秘书布里肯斯塔夫不愿屈从美国的压力时，美国驻老挝的一些机构便散布谣言，诋毁布里肯斯塔夫的工作，企

图把他赶走。哈马舍尔德对此大为光火，向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洛奇递交了一份反驳书，一一驳斥对布里肯斯塔夫的责难。哈马舍尔德几次努力说服老挝国王和各派实现民族和解与国家中立，均因美国从中作梗而遭失败，直到1961年肯尼迪上台改变政策后，老挝才实现了停火。

如果说美国在老挝危机中彬彬有理地冷落了哈马舍尔德的话，那么法国在比塞大危机中对哈马舍尔德就是大不敬了。1961年7月，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迫于国内的紧张形势要求与法国谈判法军撤出比塞大基地及其南部边境问题，为戴高乐所拒绝。突军和平民包围并封锁了比塞大的法国海军基地，交火后法军一举占领了比塞大城。安理会应突尼斯的要求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一项“暂行”决议，呼吁“立即停火并把一切武装部队撤回原阵地”。为落实这一决议，哈马舍尔德主动提出访问突尼斯。启程前，哈马舍尔德约见了法驻联合国副代表，向其解释了访突的目的，并表示如法政府愿意，他可在返回途中在巴黎停留。法国副代表向外长德姆维尔请示，得到的回答是“没有话要对哈马舍尔德说”，哈马舍尔德误以为法政府不反对他访突，这才离开纽约。与布尔吉巴会谈后，哈马舍尔德感到事态严重，必须立刻向安理会报告。他的助手斯皮奈利认为，如果马上提出报告，法国势必指责这是突尼斯的一面之词，劝哈马舍尔德等一等再说。哈马舍尔德接受了他的劝告，但还是决定给法国外长发电，询问法对冲突双方直接接触的态度。哈马舍尔德还通知法国领事，他将访问比塞大，并请其通知比塞大的法军指挥官。然而当哈马舍尔德一行到达比塞大郊外时，车被法国伞兵截住。虽然哈马舍尔德亮明自己的身份，并表示强烈抗议，但法国伞兵坚持要搜查，直到后来来了一名军官，才放他们通行。法国外长的回电直到次日夜晚才送到哈马舍尔德的手中，这本身就表明法国对哈马舍尔德介入比塞大事件不满，9年以后戴高乐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证实了这一点。电报对哈马舍尔德关于澄清法国立场的要求和访法建议置之不理，对安理会的停火决议也表现出轻蔑的态度，宣称只有法军达到全部目的才会停火。更让哈马舍尔德恼火的是，法国外长还表示，哈马舍尔德给他的电报“表明的是突尼斯政府的观点”。哈马舍尔德不再怀疑，当天上午法国伞兵对他本人的不恭是故意的。此次突尼斯之行哈马舍尔德无功而返。在随后举行的安理会会议上，先后有三项决议草案因美、英的反对而遭否决，法国干脆就拒绝参加会议。无奈，哈马舍尔德只能劝说布尔吉巴尽量避免事态扩大，并要求美国压法国撤军。

有人说，哈马舍尔德在比塞大危机中支持突尼斯的要求，是因为他在处理刚果危机中始终得到了突尼斯政府的理解和帮助。然而在哈马舍尔德看来，这不仅仅是个投桃报李的问题。他认为，一个新生的小国在与大国发生争执时有权期待联合国秘书长采取公正的态度。只有秘书长秉公行事，小国才会保持对联合国及其秘书处的信心。事实上，6年以后，布尔吉巴告诉斯皮奈利，哈马舍尔德的那次访问在关键时刻鼓舞了突尼斯人民的士气，突尼斯人民永志不忘。

毕竟，哈马舍尔德与西方大国的冲突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程度上都是有限的。相比之下，同苏联的冲突更为频繁，更为公开，更为激烈。在1960年的第十五届联大会议上甚至出现了戏剧性场面。这次会议可谓热闹非凡，参加会议的有23位政府首脑和57位外交部长。由于此前刚刚开过关于刚果问题的特别联大，联合国在刚果的行动自然成了一个重要的话题。一些亚非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批评了联合国在刚果的行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

夫则把矛头直接指向哈马舍尔德，指出“令人遗憾的是殖民主义者一直在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在刚果进行着肮脏的勾当……”，“大会应保证不让秘书长滥用自己的地位，而要他严格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和安理会的决定行使自己的职责。”赫鲁晓夫最后建议废除秘书长职位，提出联合国由代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中立不结盟国家集团的三名官员领导，这就是著名的“三驾马车”方案。几天以后，赫鲁晓夫在另一次发言中指责哈马舍尔德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代理人，表示“如果他自己没有勇气提出辞职，我们就将根据形势得出不可避免的结论。一个违背了基本的公正原则的人是不能留在秘书长这样一个重要职位上的”。坐在主席台上的哈马舍尔德虽然外表平静，但心中却怒火燃烧。他向坐在旁边的大会主席博兰德请求允许他立刻发言。博兰德感到了他的愤怒，劝他准备准备下午再发言。哈马舍尔德接受了劝告，先口授了一个发言稿，然后交给几位助手征求意见。这天下午，联大会议厅内异常安静，哈马舍尔德按准备好的发言稿为自己做了辩护。他在发言中说：“我曾经说过，只要有那么一天，我担任秘书长不再有利于，或被认为不再有利于联合国组织，我就不会再担任这个职务。今天上午的发言似乎表明苏联觉得不可能再与现任秘书长一起工作，这似乎可以成为我应该辞职的有力原因。然而苏联代表还表示，如果现任秘书长辞职，他们不愿选举一个新的秘书长，而是要坚持一种我根据广泛的经验确信使有效地行使职责无法实现的安排。如果我辞职，就等于在这个困难和危险的关头将联合国组织丢弃不管。我无权这样做，因为我对所有看重联合国的成员国负有责任，这是一种压倒其他一切考虑的责任。”

“需要联合国保护的并不是苏联或任何大国，而是其他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联合国首先是它们的组织。我对它们运用和指导这个组织的智慧深信不疑。为了所有这些其他国家的利益，只要它们需要我，我就将在我的任期内作为这个组织的公仆留在我的岗位上。”

“苏联代表谈到了勇气问题。辞职是再容易不过的，留任才不那么容易。向一个大国的愿望低头容易，与其抗争则是另一回事。大会成员国都知道，我以前曾多次在许多问题上是这样做了。如果把联合国当做当今世界上最佳保护的国家需要，我还将继续这样做。”

哈马舍尔德发言一小时后，还没离开主席台，就收到了苏联代表团的邀请信，邀请他出席次日的招待会。由于信封上的日期在他发言之前，他便让手下向苏联代表团询问邀请是否仍然有效，得到的回答是：是否参加由秘书长决定。哈马舍尔德应邀前往，受到赫鲁晓夫的热情款待。赫鲁晓夫似乎有意表明，政治与私人关系是两回事。

关于哈马舍尔德与赫鲁晓夫冲突的原因，有过许多猜测。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哈马舍尔德领导的联合国刚果行动与苏联的政策相悖，但也不排除个性的原因。1959年3月，哈马舍尔德曾赴黑海的索契拜会赫鲁晓夫。正式会谈结束时，哈马舍尔德说，如果他采取令苏联不快的立场，他相信赫鲁晓夫不会误解他的动机。赫鲁晓夫微笑着答道：“请不要做任何迫使我们不得不批评你的事。”在当天晚上的宴会上，哈马舍尔德谈到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格医生》。赫鲁晓夫不高兴地问为什么要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一个被俄罗斯人民所摒弃的作家。哈马舍尔德解释说，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是以文学价值为标准的。在场的米高扬问哈马舍尔德，他是否赞同书中主人公的反社会行为。哈马舍尔德回答，说《罪与罚》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并不意

味着赞同杀害老寡妇的行为。为了缓和谈话的气氛，哈马舍尔德提议为“现在记录在案的正直的罪人”干杯。赫鲁晓夫和米高扬问哈马舍尔德，“正直的罪人”是不是指“悔过的罪人”，得到否定的答复后，两人拒绝举杯。接着，宾主又谈起了苏联作家与移民作家的优劣，这时哈马舍尔德提议为“活着的苏联艺术”干杯。赫鲁晓夫又问这是什么意思，哈马舍尔德回答说，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解释。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这才举起了酒杯。当时陪同哈马舍尔德访苏的多勃雷宁大使评论说，那天晚上的谈话说明，赫鲁晓夫和哈马舍尔德是同样固执的人。

献身和平

在哈马舍尔德生命的最后一年多时间里，他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解决刚果危机之中。1960年7月12日，刚果共和国总统和总理联名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请求联合国给予紧急军事援助，保护刚果免遭外来侵略。

组织联合国部队刚果危机的爆发并没有使哈马舍尔德感到十分意外。他曾于1960年1月到过刚果，当时的刚果正在酝酿摆脱比利时殖民统治，实现国家独立。哈马舍尔德在考察中感到，刚果独立的时机还不成熟，因此于当年5月安排副秘书长本奇以参加独立仪式为名向新政府提供帮助。6月30日刚果共和国宣布成立，卡萨武布和卢蒙巴分别担任总统和总理。按照比利时与刚果签定的友好合作条约，刚果独立后，比利时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将继续留在刚果，治安由刚果保安军负责维持。保安军有2.5万人，军官均为比利时人。7月5日，驻首都利奥波德维尔的保安军因新政府未能立刻更换外籍军官和提高士兵待遇而举行兵变，驱逐外籍军官。卢蒙巴赶赴一兵营劝阻，答应每人提升一级，但未能平息军人的不满情绪，兵变很快向其他城市扩展。7月8日，路路阿堡（今卡南加）和加丹加首府伊丽莎白维尔也发生了兵变，并首次杀死了几名欧洲人。7月10日，比利时空降部队不顾秘书长代表的反对开进上述两座城市保护白人。哈马舍尔德正在日内瓦参加经社理事会会议。当他在会上做了发言之后立刻赶回纽约时，危机又有了新的发展：加丹加省省长冲伯宣布脱离刚果独立，与此同时刚军与比军交火，比居民大量外逃，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几乎陷于瘫痪。7月13日晚8时30分，哈马舍尔德召集安理会开会，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比利时从刚果撤军，并授权秘书长采取必要步骤，向刚果政府提供一切必要的军事和技术援助，直到刚果保安部队能够完全承担起职责为止。会议结束时已是凌晨3时25分。哈马舍尔德立即返回办公室安排落实安理会决议，比利时驻刚果的代表在同秘书长代表的谈判中提出，只有联合国部队接替比军维持治安，比军才会撤出。哈马舍尔德首先征求非洲国家的意见，特别要求加纳、几内亚、马里、突尼斯等法语非洲国家马上提供军队，并要在刚果的秘书长代表本奇向刚果政府询问是否可以接受。与此同时，他要求英、美、苏三国提供运输飞机，立刻空运部队到位。哈马舍尔德还决定任命早已奉令待命的联合国巴勒斯坦停火监督组织参谋长霍恩将军为联合国军指挥官。到6时30分哈马舍尔德与助手走出办公室吃早餐时，联合国刚果行动已经运转起来。11时，应召前来同哈马舍尔德商量使用英国在尼日利亚的空军基地问题的英国代表比利吃惊地发现，通宵工作的哈马舍尔德竟然没有丝毫倦意，而且还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与泰国外长讨论联合国在东南亚的工作。

由于秘书长高效率的工作，首批突尼斯的部队15日晚就由美国飞机空运至刚果首都利奥波德维尔。紧接着，加纳、摩洛哥、埃塞俄比亚的军队也陆

续赶到。

分兵加丹加哈马舍尔德认为，既然确定刚果独立的基本法是包括冲伯在内的所有刚果领导人一致同意的，而且联合国是把刚果作为单一的实体接纳为成员国的，联合国就不能支持加丹加省的独立。比军开进加丹加并解除当地刚果军队的武装是助长冲伯集团闹分裂的关键因素，但由于比利时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在加丹加有重大经济利益，比利时不愿撤军。7月26日，哈马舍尔德指示本奇和霍恩做好分兵加丹加的准备，27日亲赴布鲁塞尔说服比政府迅速从加丹加撤军。次日又飞抵利奥波德维尔，向刚果领导人解释联合国的行动方针。卢蒙巴要求联合国部队帮助他用武力制止加丹加的分裂，为哈马舍尔德所拒绝。哈马舍尔德坚持通过谈判解决加丹加问题。7月31日，比国王致电哈马舍尔德，以冲伯坚决反对和比舆论不同意为由，拒绝了哈马舍尔德提出的宣布撤军的要求。哈马舍尔德认为情况紧急，刻不容缓。于8月2日宣布派本奇赴加丹加谈判比撤军问题，拟让首批联合国部队于8月6日开进伊丽莎白维尔，然后比军立即开始撤出。哈马舍尔德的本意是造成一个既成事实，但声明发表后比不表态，冲伯则扬言“加丹加政府决心全力抵抗卢蒙巴政府，抵制联合国部队到加丹加”。8月4日，本奇飞抵伊丽莎白维尔后向哈马舍尔德报告，加丹加抵触情绪太大，哈马舍尔德不得不收回成命，赶回纽约求助于安理会。哈马舍尔德首先电告联合国军指挥部做好随时开进加丹加的准备，然后努力争取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促使比利时和加丹加改变态度。哈马舍尔德在安理会上指出，能否尽快、甚至立即解决刚果问题关系到战争与和平的大问题。他请安理会明确表示其关于刚果问题的决议完全而且尤其适用于加丹加，并请安理会要求所有成员国给予积极配合。安理会经过激烈辩论于8月9日凌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比政府立即按秘书长确定的方式从加丹加撤军。得到了安理会的尚方宝剑，哈马舍尔德立刻与比外交大臣、刚果总理和冲伯联系，要求他们积极配合实施安理会决议，并决定亲自带着文职和军事顾问以及两个连的瑞典军队赴加丹加。为避免引起刚果中央政府的误解，哈马舍尔德在飞行途中起草了一个备忘录，向冲伯和卢蒙巴说明，联合国直接同加丹加地方政府打交道仅仅是为了商讨联合国军进驻事宜。一旦比军撤走，政治、体制问题将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谈判解决，联合国不会干涉。联合国既不帮助中央政府逼地方政府就范，也无权禁止中央政府采取任何行动处理加丹加问题。8月12日，当哈马舍尔德乘坐的飞机接近伊丽莎白维尔时，塔台告诉飞行员只允许秘书长的飞机着陆，后面4架运载瑞典军队的飞机不能降落。飞机到达机场上空时，哈马舍尔德通过无线电告诉冲伯，5分钟之内收不到允许全部飞机降落的指令，5架飞机将全都返回利奥波德维尔。飞机终于着陆了，哈马舍尔德直到看着后面运输机上的瑞典士兵平安地走下飞机，才离开机场。

联合国军队开进加丹加的组织实施工作对哈马舍尔德的毅力和才能都是巨大的考验，他所表现出的卓越的组织才能和把握时机的能力以及临危不乱的勇气都为世人所称道。然而他拒绝以武力解决加丹加问题的立场，他与冲伯直接会谈的做法，引起了卢蒙巴的不满，卢蒙巴宣布，刚果政府对秘书长已失去信任。

制止内战联合国部队开进加丹加后，哈马舍尔德松了一口气，认为联合国行动的军事阶段可以很快结束，民政援助计划可以开始付诸实施。不料就在这时总统卡萨武布与总理卢蒙巴之间的不和发展成公开的冲突。9月5日，

卡萨武布和卢蒙巴分别通过广播电台宣布解除对方的职务。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参谋长蒙博托上校将全家送到联合国军指挥官的住宅，各个派别的政治领袖也纷纷要求联合国部队予以保护。利奥波德维尔形势混乱，谣言四起。9月14日，蒙博托在广播电台宣布取消总统、总理和议会的权力直至年底，让“技术人员”治理国家。同时，蒙博托还宣布驱除苏联东欧国家驻刚果的外交官。

虽然秘书长代表千方百计居间调解，但卢蒙巴与卡萨武布之间的矛盾却有增无已。这时的刚果已没有任何有效的政府。蒙博托的军政府，虽然联合国拒绝承认，但却得到了西方国家明里暗里的支持。10月，联合国发生了刚果席位之争。此时哈马舍尔德正在做卢蒙巴和卡萨武布的工作，说服他们和解，因此主张不把刚果的席位授予任何一方。然而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却竭力为卡萨武布拉票，美驻外使馆也频频向驻在国政府施加压力。卡萨武布还亲自来联合国游说，并以刚果总统名义在联大发言。结果联大表决，让卡萨武布的代表占据了刚果的席位。哈马舍尔德对美国颇为不满，但却无可奈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虽然哈马舍尔德曾紧急致函卡萨武布，要求他约束蒙博托，不要逮捕政治领袖，甚至警告说，如果有人企图闯入卢蒙巴的住宅，联合国卫兵将使用武力制止，但卢蒙巴还是在逃离住宅后被蒙博托的国民军逮捕。原政府副总理基赞加则在东方省的斯坦利维尔另树旗帜逮捕了反卢蒙巴的议员，与利奥波德维尔分庭抗礼。此时，苏联指责联合国刚果行动中心是逮捕卢蒙巴的同谋；卡萨武布则正式抗议联合国干涉刚果内部事务，保护卢蒙巴的同谋；比利时政府也批评秘书长代表曲解联合国决议，偏袒一方。哈马舍尔德左右不是人。从刚果危机一开始，哈马舍尔德就始终坚持不偏不倚的原则，可到头来却遭到冲突各方的指责，此时心里自然觉得委屈。他在致阿联外长法乌齐的信中写到：自刚果危机爆发以来，“我们一直处于争吵之中，先是同卢蒙巴，接着是同俄国人、比利时人、蒙博托……”，“各国代表团很少有人理解我的难处……”西方，特别是比利时的态度更是让哈马舍尔德伤心。他在致荷兰外交大臣的信中表示：“我不会抱怨他们对待联合国和我本人的态度，更恶劣的态度我都习惯了。可是如果说我看到这样的态度来自我认为同我自己非常接近的人而一点都不伤心，那就太不坦率了……”

哈马舍尔德的处境越来越孤立。有些非洲国家扬言撤走自己的部队，转而支持基赞加。法语非洲国家主张撮合卡萨武布与冲伯，而西方国家则公开支持蒙博托。尽管如此，哈马舍尔德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他认为，联合国的行动不能停止，如果联合国部队撤出刚果，后果只能是内战，部族冲突，政治解体和经济崩溃。为此他在12月7日召开的安理会会议上竭尽全力争取对联合国行动的支持。然而这次安理会和大会未能就刚果问题做出任何决议，只是在最后决定给刚果行动以必须的财政拨款。

1960年的岁末，哈马舍尔德的心情难以平静，刚刚结束的联大会议令他失望，但他不愿屈服。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我的工作有点像与雪崩搏斗。你知道搏斗的规则，那就是扔掉滑雪板，不要挣扎，漂浮在雪面上，等待救援者。令人宽慰的是，雪崩终究会停下来，然后只要你还浮在雪面上，你就可以重新开始像聪明人一样行事。”

翌年1月17日，卢蒙巴被转移到分裂的加丹加省。哈马舍尔德得知后再三与卡萨武布和冲伯交涉，要求保证卢蒙巴的人身安全，停止非人虐待，依

法律处理。他还要求美国不要继续支持卡萨武布和蒙博托，以此显示西方的中立。2月份传来了卢蒙巴被杀害的消息。后来联合国调查委员会认为，其实卢蒙巴早在1月17日夜一到加丹加就遇害了。安理会震惊了，经过激烈辩论终于在2月21日按哈马舍尔德的意思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联合国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内战，必要时可使用武力。决议还要求采取措施使比利时及其他不属于联合国指挥的外国军人、准军事人员和政治顾问以及雇佣军立即撤出刚果，呼吁成员国采取措施制止此类人员去刚果，要求刚果议会在必要的保护下举行会议。决议扩大了联合国使用武力的权限，但却没有像过去那样提及秘书长，既未肯定他过去的业绩，也未明确他今后在执行决议中的作用。虽然哈马舍尔德知道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苏联的否决，但仍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屈从大国压力的表现。

刚果的局势更是不容乐观。一方面联合国部队的实力因有的派兵国撤走或扬言撤走自己的人员而受到削弱，另一方面卡萨武布强烈反对2月21日的安理会决议，认为这是“侵犯主权”，冲伯宣称这是联合国向加丹加宣战。刚果全境骚扰联合国人员的事件越来越多。此时的哈马舍尔德手中唯有一支笔。一封封信从纽约发往世界各地，请求，劝说，利诱……哈马舍尔德针对不同情况使用不同的写法，竭尽全力争取使各国政府为落实安理会的新方针而出力。对于刚果的内部斗争，哈马舍尔德也只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谈判做各方的工作，劝他们约束自己，避免发生内战。经过近一个月的谈判，哈马舍尔德派出的使者终于说服卡萨武布接受了2月21日安理会决议。同比利时的交涉也初见成效。4月下旬组成的比利时新政府不像前届政府那么热衷于支持加丹加分裂，表示愿意配合执行安理会决议，从加丹加撤出比利时的政治顾问和军事人员。只有冲伯倚仗英、美、比、法等国财团的支持，不肯合作。

四五月间，两百名刚果政治领导人开会讨论刚果政治问题，会上卡萨武布与冲伯发生尖锐矛盾，中央政府逮捕了冲伯，后来以冲伯派代表参加议会会议为条件将其释放。然而冲伯返回加丹加后并未履行诺言，反而派人到西欧、罗得西亚、南非等地秘密招募雇佣军。哈马舍尔德决定对加丹加的外国雇佣军和顾问采取更严厉的态度。7月7日，联合国部队逮捕并驱除了冲伯的一个重要政治顾问。刚果议会终于复会。联合国除为与会代表提供安全保卫以外，还协助做了组织安排、交通运输等工作。议会一致批准了由阿杜拉组织的联合政府。9月初，经秘书长代表一再做工作，基赞加终于同意离开自己的根据地，到首都就任为他留出的副总理职务。持续了近一年之久的政府危机终于结束了。哈马舍尔德十分高兴，立刻指示在刚果的联合国官员与阿杜拉商讨训练刚果国民军、逐步从联合国接管维持治安工作以及培养当地公共管理人员等问题。

魂断恩多拉刚果新政府对联合国的态度是友好的，但哈马舍尔德知道，加丹加问题不解决，新政府的日子就不会好过。果然到了8月中旬，阿杜拉通过联合国代表转告哈马舍尔德，他的政府已在加丹加问题上发生争执，再不采取措施就有垮台的危险。他要求联合国提供援助。亚非国家驻联合国的代表也为此而施加压力，有的甚至公开对秘书长本人提出了批评。在此情况下，哈马舍尔德一方面要求比利时政府协助将联合国名单上的比利时军官全部撤出，另一方面建议刚果政府发布法令，驱逐加丹加的外国军官和雇佣军，并要求联合国帮助中央政府执行这一法令。哈马舍尔德还指示驻加丹加的联

联合国部队加强力量，以防万一。经哈马舍尔德同意，联合国部队于 8 月 28 日凌晨 5 点开始兜捕加丹加的欧洲军官和雇佣军。到当天下午，已有 81 名外国军官被抓获，但由于西方国家驻伊丽莎白维尔领事馆的庇护，还是有不少名单上的人漏网，更为严重的是有些顽固分子转入地下，阴谋抵抗。形势依然严峻，甚至连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安全都受到了威胁。在刚果的秘书长代表提出了一个行动计划，主要内容是说服有关国家政府制止自己的领事馆支持冲伯；要求冲伯停止煽动性广播和恐怖破坏活动；责令外国军官限期 24 小时离境，否则联合国部队将再次采取兜捕行动。如果上述行动仍不奏效，就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包括接管广播电台、逮捕捣乱分子和煽动暴力者，对冲伯的警察宪兵部队采取防范措施。哈马舍尔德感到事关重大，于是在纽约征求了美、英、比、加、瑞典、阿联、突尼斯和尼日利亚等国代表的意见，得到了这些国家的原则赞同，这才回电表示同意上述计划，但他特别强调一定要先尽力说服冲伯谈判，非到不采取更严厉的措施阿杜拉政府就会倒台、甚至发生内战之时，不要轻易行动。考虑到在现场的官员可能因环境恶劣、情况紧急而采取后果特别严重的行动，哈马舍尔德还一再告诫手下，采取行动要事先报告。然而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为了调解阿杜拉的中央政府与冲伯之间的冲突，哈马舍尔德于 9 月 12 日下午离开纽约前往刚果。当哈马舍尔德乘坐的飞机还在大西洋上空飞行时，联合国刚果行动中心的负责人下达了采取行动的命令。然而这次行动并不像前一次行动那么顺利。联合国部队在占领邮局、广播电台等目标时遇到了加丹加宪兵的武装抵抗，冲伯此时也不知去向。哈马舍尔德一到刚果就意识到加丹加的局势非常严重。虽然他对部下不经报告就采取这么重大的行动极为不满，但他并未过多地追究部下的责任，相反还主动向安理会和新闻界承担了自己的责任。此时此刻，哈马舍尔德最关切的的就是停火。当晚，刚果行动中心为哈马舍尔德举行接风晚宴，刚果政府主要领导人都应邀参加。但哈马舍尔德为加丹加的形势焦虑不安，实在无心应酬。宴会一结束，哈马舍尔德立刻与助手一起返回刚果行动中心指挥部，了解加丹加的最新情况，并向安理会报告。9 月 13 日采取行动之前，联合国驻加丹加部队的指挥官拉雅断言，最多两个小时便可制服任何武装抵抗。但到了第二天，战斗仍未停止，联合国部队的伤亡不断增加。9 月 15 日哈马舍尔德决定推迟返回纽约，留下来寻找停火的办法。哈马舍尔德感到实现停火的关键在于找到冲伯，于是连夜起草了致冲伯的信，阐明了联合国的立场，并表示希望立即停火，然后冲伯与中央政府举行谈判。9 月 16 日，坏消息接连不断。联合国部队在加丹加全境的驻地都遭到了袭击，连在空中飞行的运输机都未能幸免。是日，秘书长驻伊丽莎白维尔的代表奥布里恩终于通过英国领事与冲伯联系上了。哈马舍尔德除了让奥布里恩将他于 15 日夜写的信转交给冲伯外，又加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以双方立即停火为条件亲自前往罗得西亚的恩多拉与冲伯会见，“以便共同寻找和平解决目前冲突的方式，从而为在刚果的框架内解决加丹加问题开辟道路”。次日，冲伯回信表示同意赴恩多拉会谈，但对停火附加了联合国部队不得离开营地、停止一切调动、停止地面空中支援等条件。哈马舍尔德立即复信表示遗憾，指出停火只能是无条件的。尽管如此，哈马舍尔德感到事关重大，刻不容缓，因此未等得到进一步答复就决定前往恩多拉。临行前，经研究决定，飞行的目的地保密，飞机在飞行中实行无线电静默，以防不测。哈马舍尔德计划仅在恩多拉过一夜，因此只带了一个手提箱。

手提箱里除日常用品外，还有几本书：有袖珍版联合国宪章，英文版的圣经《新约》和《诗篇》，德语诗人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和《献给俄尔甫斯的十四行诗》，法国小说家季奥诺的《诺亚》，德国犹太哲学家布贝尔的著作《我和你》的英文版本，一张纽约地图，还有当天上午刚收到的信函和一本便笺簿。1961年9月12日他离开纽约之前，曾写信告诉布贝尔，已有出版商答应出版《我和你》的瑞典文译本，而且他已向出版商保证两个月内拿出译稿。显然，哈马舍尔德是想在旅途当中忙里偷闲，继续翻译这部著作。哈马舍尔德对文学的爱好一直保持到他的生命的终结。阅读和翻译文学作品既是他在紧张工作之余的一种调剂，也是他在心绪不佳时的一种解脱。当初他不得不接受自己最得力的助手科迪尔的辞职时，就是以阅读法国作家格拉克的《一个面朝森林的阳台》和翻译布贝尔的作品来摆脱烦恼的。

哈马舍尔德及其随行人员乘坐的飞机于当地时间下午4时51分起飞，夜晚11时35分通知恩多拉塔台将于零时20分抵达，零时10分报告已看到机场灯光，正在下降，接着便突然音信全无。

在纽约留守的副秘书长本奇和其他工作人员整整一夜没有得到哈马舍尔德的消息，都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不幸，不由得焦虑起来。18日上午10时，接到负责搜寻的美国空军上校马特里克的报告：从空中发现飞机残骸，无一幸存者。

联合国震惊了，全世界震惊了……9月19日，联大年会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中召开，虽然哈马舍尔德在过去的一年里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指责，但当大家坐到联合国会议大厅里，看到主席台上那空着的秘书长座位时，却不由得触景生情，无比悲伤。哈马舍尔德的言谈举止，喜怒哀乐，像电影镜头一帧帧在与会者的脑海中闪过……哈马舍尔德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离开人世的呢？是大功即将告成的喜悦，还是功败垂成的遗憾？人们无从知道。但他未竟的事业是一定会有人继承的。9月20日，冲伯在向哈马舍尔德的柩枢献上花圈后与秘书长的代表达成了停火协议，这正是哈马舍尔德前往恩多拉的首要目的。10月23日，挪威议会授予哈马舍尔德诺贝尔和平奖。11月3日，缅甸常驻联合国代表吴丹被推选为联合国代理秘书长，他正是哈马舍尔德生前与人谈到过的两个候选人之一。1963年1月，加丹加的分裂运动终止。次年6月联合国军撤出刚果，7月冲伯接替阿杜拉担任中央政府总理。冲伯在任内也为其他派别的分裂活动所困扰，一年多以后被蒙博托将军推翻，流亡西班牙。1971年10月，刚果民主共和国改名为扎伊尔共和国。1997年5月，统治扎伊尔32年的蒙博托总统在反政府武装兵临城下之际，被迫交出大权。扎伊尔又改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

（朱凌云、徐力源）

宽容大度、坚持中立的第三任秘书长

吴 丹

吴丹是缅甸著名外交家、作家和翻译家，也是虔诚的佛教徒。他本喜欢做一个自由的著书立说的文人，而不愿参与争权夺利的政治。但他成长在缅甸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开展的时期，历史又偏偏使他与政治结缘。他即使参与政治，也常常保持中立，从不参与帮派斗争，不失自己做人的风格。正是由于这样，他是个处处受人欢迎的人物，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后来成为世界知名人物。1954年吴丹任吴努总理秘书，后任缅甸常驻联合国代表。这时他在国际大舞台上还是寂寂无名的一员。1961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遇难，在冷战时期的特殊环境中，在东西方阵营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吴丹于1961年11月被任命为联合国代理秘书长，从此他被推上世界政治中心的大舞台，成为国际政治舞台骤然升起的新星，开始了他光辉但又奔波操劳的一生。吴丹任联合国秘书长的10年（1962~1971），正是危机频仍的年代，他以谦逊、宽容的态度，爱好和平的政治智慧，不畏艰险的奉献精神，多次成功地调解了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和冲突，受到人们的称赞。

少年：早熟的家长

在班达诺的一望无际的田野上，吴氏农庄最为显眼，庭院里种着芒果树、石榴树、棕榈树和一棵巨大的酸荚树，树木掩映着两层木结构的小楼。1909年1月22日，吴丹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较殷实的农民家庭。父亲吴波尼有百亩牧场，十亩菜园，还有三幢这样的小楼房。家畜有15头小公牛、6头母牛、10头水牛。作为佛教徒他们从不屠宰这些牲畜，只是吃鱼以及别人送来的肉。吴丹的爷爷积蓄了堆积如山的粮食，姥爷的家庭手工业也很兴旺，他的芦苇席和竹席产品在缅甸、印度很走俏。

吴丹的父亲是这里唯一懂得英语的人。吴丹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6岁时，吴丹便上小学，两年半后升入中学。12岁时吴丹已如饥似渴地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及一些英国大文豪的作品。15岁便在《缅甸男孩》杂志上用英文发表文章，少年时期的吴丹就对文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的外号叫“月亮脸”，即很明朗宁静的意思，也常保持一种平静安详的气质。

在吴丹14岁的时候，他敬爱的父亲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了，这给吴丹的母亲以很大精神打击，作为家中长子，家庭的重任已落到吴丹的头上，他成了早熟的家长。吴波尼死后，他的生意合伙人——吴丹的叔叔和另一位叫吴索钦的人都相继辞世。吴丹一家希望与吴索钦的遗孀分享约25万美元的遗产，但吴索钦的遗孀因亲人辞世而病倒在床，财产之事交由她的侄子代理。她的侄子是个无赖，吴丹无奈只得请了律师帮妈妈打点财务，并向法庭起诉，吴丹一家理由充足，但在对方的“穿梭外交”活动后，仰光高级法院受理此案。据说对方向法官贿赂了一辆英制小轿车，这场官司不言自明，结果吴丹一家输了。

吴丹的妈妈不得不变卖家中的贵重物品偿还起诉费，以至无法交起孩子们上学的高昂学费。对于吴丹是否继续上学，当妈的犹豫不决，但吴丹还是决定上大学，他只上了两年大学，拿了专科文凭，然后便回家挣钱养家了。他深深地怀念着父亲。父亲的死使他失去了两年的学业，也使他放弃了成为一个旅行家的梦想。

他在家乡谋到了一个中学教师的职业，当教师的决定是吴丹人生的一次

重大举措。三尺讲台使他无限感慨，当教师的荣誉感胜过赚钱的欲望。但就整个缅甸社会环境来说，很多缅甸历史上的领袖人物都是国家中学的教师。这使吴丹结识了不少推动缅甸历史前进的俊杰。他已从丧父的悲痛中解脱出来，而能平静地对待父亲的死和自己的人生旅途了。他已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佛教信仰，佛教给了他丰富的精神内涵。

仰光是缅甸文明的荟萃之地，吴丹在仰光增长了见识，亲眼目睹了英国殖民者对缅甸的殖民统治，吴丹在大学期间以“蒂拉瓦”为笔名，撰文抨击时弊。这时大弟吴坎已去了仰光，二弟吴当和三弟吴丁貌正值青年，吴丹供养他们大学四年的学费。吴丹同时还参加缅甸独立运动，后被驱逐出班达诺。这时吴丹与缅甸独立运动领袖之一、缅甸独立后第一任总理吴努同时爱上了在班达诺学校委员会工作的富裕米商的女儿密耶。吴努为此写了很多诗歌送给心上人，而吴丹则为中学生写了一本《城市和他们的故事》一书，歌颂古代罗马的文明。

当大弟吴坎结婚后，家庭又有了从前的温馨，吴丹的负担也减轻不少。但他自己的婚姻却一直与母亲的期望背道而驰，他爱上了比自己年龄大的杜登丁。杜登丁是律师吴钦的独生女，在曼德勒省长大，她的父亲去世时，她已成年，便与母亲回班达诺与姥姥同住。高中毕业后，她想继续学巴利文研究佛教。1934年11月吴丹终于与杜登丁结为连理。新婚这天，新郎新娘双双穿着艳丽的缅甸传统服装，腰围金黄色的沙笼，吴丹还穿了一件白色真丝排扣衬衫，英俊潇洒，煞是好看。

青年：加入民族独立运动的洪流

吴丹的青年时期，正值缅甸独立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时期。吴丹在仰光大学上学期间便结识了像吴努、昂山这样的学生领袖，青年领袖们在进行认真的学习。1937年吴丹加入吴努组织的“红龙书社”，成为首批加入左派读书俱乐部的成员。他同这些进步青年一起翻译出版了大量左派进步书籍。“红龙社”成员日见增多，《红龙杂志》的发行量也不断扩大，他们从列宁文集内选出部分文章登载在《红龙杂志》上，同时还翻译出版了英国工党约翰·斯特雷奇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卡尔·马克思、尼采、印度左派思想家M·N·罗依等人的著作。

在1936年2月，仰光大学当局开除学生会主席吴努和《孔雀之声》的主编昂山，大学生立即发起抗议运动，几乎全部缅甸籍的学生都参加了罢课，成立“全缅学生联合会”，该会与“我缅人协会”，建立了密切联系，1937年以后，这些进步青年知识分子都参加了“我缅人协会”，并在协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协会主席德钦礼貌的领导下，协会作出了斗争、动员、革命三步骤的计划。当时吴丹还在班达诺，他支持协会领导人民进行斗争的决策，但反对通过暴力方式的革命。1938年爆发了缅甸人民称之为“1300年运动”（1938年是缅历1300年）的全国性的反英运动，仁安石油工人罢工，商人、市民、僧侣等广大阶层，都卷入反帝斗争中来。这时的吴丹由于第一个儿子貌波出生又夭折而陷入痛苦中，好心的朋友为安慰他们夫妇，给他抱来了与貌波年龄相当的一个婴儿慰其创伤，吴丹收为养子。不久，他们又有了自己的女儿埃埃和儿子貌丁貌。

1941年日军入侵缅甸，32岁的吴丹亲眼目睹了日本军国主义对缅甸实行的法西斯统治。由于家中有幼小的孩子，吴丹冷眼观察时局，不曾轻举妄动。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中，吴丹的头脑非常清醒，他从不相信日本会给缅甸带来

自由，他的情绪相当消沉。作为班达诺人民的领导人、班达诺城市管理委员会成员，吴丹当然要与日本人打交道。

1942年5月，昂山和吴努希望吴丹出任缅甸的教育重组委员会秘书长，目的是为改革缅甸的教育体制。那时，公共交通已被破坏，不管是船票还是火车票，人们必须排队等一天多才能从日本人那里买到，如果谁想从队列中出去一小会儿，那他就再也站不到队列中了。吴丹幸运地租了一条私人船，他告别了妻子、母亲和三个幼小的孩子，他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到他们，带着对家乡和亲人的眷恋，他匆匆启程赴仰光。

仰光秩序混乱，被英国毁坏的地方还没有修复。吴丹住在大弟吴坎家，他整日为他们的安全担忧，过着极其紧张压抑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月后他便写出了“缅甸的新教育政策”的报告。同年8月1日，在日本授意下，新的缅甸执行政府成立，“准独立委员会”起草章程草案。吴丹呈上的报告被搁置了，因为新政府并没有什么实权。在日本导演下，1943年8月缅甸从形式上获得了独立，日本通过与巴莫政府签订的《日缅合作条约》、《秘密军事条约》牢牢掌握着一切大权，变缅甸为它的殖民地。

1942年6月在交完教育报告之后，吴丹便返回班达诺。当时日本控制着缅甸的舆论，所有的家庭都得收听他们的广播。吴丹与班达诺的四个好友组织起来收听外台。每天晚上9点他们都集中到吴钦貌的家中，厅里大声放着日本的录像，他们则躲到楼上小声听着外台，知道了不少缅甸政局的动向。怕连累妻子，吴丹叮嘱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因为起初吴丹被日本人怀疑是与英国有联系的人，以吴丹的地位和身份，他常与日本人交往，慢慢使日本人相信他是“可靠的”人，日本人也就不怀疑他看左派书籍。于是吴丹从书房里搬出所有相关书籍，如饥似渴地读起来。日本人也从他那儿借书，他为此感到十分高兴。

1944年，吴丹加入到抗日运动中来。他成为班达诺政府委员会主席，秘密为抵抗运动运送粮食，抗日斗争还没发展成为武装斗争，吴丹就被日本人怀疑了。吴丹不顾敌人的怀疑，继续为抵抗组织供给粮食。紧接着日本又敕令学校学日语，吴丹对此虽没提异议，但他表示不能胜任教师工作。于是，吴丹处境岌岌可危，日本探子警告他，驻班达诺陆军中尉暗示要下紧急逮捕令。吴丹与他的四位好友赶忙毁了短波电台。但这时日本已成强弩之末，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日本就要投降了。1945年3月27日缅甸“国民军”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5月1日，“国民军”解放仰光，两天后英军作为盟军又进入缅甸。英国企图恢复在缅甸的殖民统治，因此，缅甸人民又展开了同英国殖民者争取独立的斗争。

步入政坛：通向联合国的路

1947年6月9日，吴丹一家由家乡班达诺迁居仰光。吴丹是想通过《大西洋》月刊办一个全国性的杂志。他认为缅甸独立后，他就可以自由地写作和编辑。他倾尽私囊并从友人那里筹集了资金。他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吴努，吴努兴趣不大，他想让吴丹为筹备新缅甸政府工作。但他哪能晓得吴丹从孩提时代就梦想着创办自己的杂志。

缅甸的独立运动正在有秩序地进行着，1947年7月19日上午，一起谋杀事件发生，领导缅甸独立运动的领袖昂山将军遇害。

昂山在缅甸人民中享有很高威望，昂山之死激起缅甸人民的极大悲痛。当日赫伯特·兰斯总督授命吴努主持新的行政委员会。一周以后，吴努委任

吴丹主持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新闻工作。吴丹从未想过要参加政党和投身政治，他还做着当一个旅行家的梦，但在独立前夕的动荡环境中，这个梦想实在难圆。况且国家正当用人之际，像吴丹这样有经验的作家，又能说流利英语的缅甸人实在鲜有。吴丹从此便走上了政坛，而办杂志的愿望却被昂山之死埋没了。

成为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新闻主任后，他很少有时间照顾孩子们的教育，1948年1月4日，他作为国家计划顾问从英国回国，正值缅甸宣告独立日，这一天使他感到非常自豪。

同年6月，吴丹任情报局副局长，他非常高兴能重操旧业。他喜欢激发所有的工作热情，他说：“在每个管理领域，公共关系的因素是人的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你不得不琢磨遇到的每一个人以及他的需要。”之后吴丹又出任广播局局长，对他的工作他总是兢兢业业，从不马虎。他的工作之一就是监督《新时代的缅甸》这一刊物，他为该刊选调编辑并与他们密切相处。但吴丹不能没有自己的新闻媒介。官方定期出版《缅甸公报周刊》，几年后他又创办了每周广播节目。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加政府工作以外的社会组织和活动。1951年他创办了“民主思想的延伸社团”，之后他又加入了缅甸语历史委员会、缅甸语的翻译团体，且他已成为缅甸世界事务理事会的主要成员。

1952年他被吴努任命为缅甸电影局主席，审理宽银幕影片和选拔当地水准较高的作家、演员和导演，推动缅甸电影事业的发展。此时吴丹的工作任务之一是审批美国和苏联的宣传品。40年代晚期美国的一些喜剧片把苏联的共产主义描绘成饿殍遍野，苏联的作品则把美国扮演成丑恶的资本主义的战争贩子。吴丹认为双方的谩骂形式都太简单了。但为了让缅甸人听到外部世界的声音和信息，他仍批准这些影片在缅放映。

吴丹总是保持着他的“迷人的风度和友善谦逊的态度”，即使是在最初的公职人员训练时期，他已有这样不同常人的素质。仰光的秘书大楼是一座很有名的大厦，英国人为缅甸训练文职人员，最初受训的人身边都备有一个摇铃，以备学员有问题时用。吴丹很少使用摇铃，他总是走到门口，很有礼貌地提出他的需要。

作为机关服务人员，吴丹总是鼓励同事提出建议，行动要有自己的风格。在吴丹成为政府高级要员之后，他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谨慎处事的作风使他周旋于日益增加的帮派斗争中，就像日后他在联合国的工作差不多。在仰光的十年从政经验为他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智慧，他学会了在繁琐的事务中抓问题的关键，他从不涉足于具体事务，他对某些事务感兴趣，但从不太深地涉入，他认识到一个问题的两面性并掌握着它的全部细节。1953年吴丹任总理办公室秘书，负责国家各种项目的计划。他开始学习处理有关石油开发、工矿、机场扩建等各种国家计划建设的工程，与吴努总理和其他内阁成员一起每天早上7点进行讨论。1955年吴丹又兼任经济和社会局秘书。

作为吴努的秘书，吴丹要为吴努写发言稿，陪同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并根据吴努的意旨办事。吴丹忠实于吴努，但私下里在某些问题上也与吴努争论，并且还常常取胜。吴努对吴丹也十分信任，他常让吴丹帮助处理一些私事。由于吴丹夜以继日地工作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他与家人的接触少了，对孩子的教育也难以顾及得到。他的养子苏昆逃学后，爱上了一个少女离家出走，这使吴丹大为震怒，遂与其养子断绝父子关系。但吴丹夫人杜登丁私

下里悄悄向两个年轻人接济点钱财，不让吴丹知道。

由于经常随吴努出访，吴丹在 50 年代中期时已结识了不少各国领袖，如毛泽东、周恩来、赫鲁晓夫等。1957 年，吴努派吴丹为缅甸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吴丹一家离开仰光来到纽约，他的任务之一就是在联合国解释缅甸的外交政策，并周旋于外交家中，做一些外交事务。1964 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授予吴丹法学荣誉博士。在联合国吴丹听到了一百多个政府的声音，而一些政府的决策他并不欣赏。他觉得人民是无辜的，受到谴责的应该是那些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所谓的声明”。他毫无怨言地做着一些艰苦的幕后工作，赢得联合国里同行的称赞。另外，吴丹也担任一些国际组织的主席，经常碰到要在一些敏感问题上表决的难题，吴丹总是像许多亚非代表一样，尽量避免在投票前过早表达具体意见。

走马上任：代理秘书长

1961 年 9 月 18 日清晨，天空布满乌云，吴丹正想起身离开自己的办公室，突然从广播里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在前往刚果开会的途中飞机失事，遇难身亡。吴丹怎么也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他呆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就在几天前，他还收到哈马舍尔德发自巴黎的、给缅甸总理吴努的信，表达他对缅甸的一项行动计划的看法。惊闻这一噩耗，吴丹马上意识到这关系着联合国的重大调整，关系着刚果行动的未来。原定第十六届联合国大会要在 9 月 19 日举行，哈马舍尔德的死不仅给第十六届联合国大会蒙上了悲哀，而且能否如期举行也是个问题。况且“三驾马车”管理联合国的方案恐怕又要复活了。

哈马舍尔德遇难的当天，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了一个声明，表明他坚决支持秘书长在刚果的行动，同时也支持联合国只有一个秘书长，巧妙地避开了“三驾马车”问题。尼赫鲁的声明在当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同一天美国肯尼迪总统也通过广播、电视发表声明，强烈支持联合国实行一个秘书长的机制。

9 月 19 日联合国大会如期举行，中心议题集中在推选哈马舍尔德的接班人。与吴丹一起，还有三位资深外交家被提名为候选人：突尼斯大使西蒙，爱尔兰大使、前联大会议主席弗里德里克·H·博兰德，芬兰大使拉尔夫。这三位是哈马舍尔德的心腹，其基本立场代表了美国。吴丹的名字被排在提名候选人的最前面。令所有人惊奇，也令吴丹十分惊讶的是，美国方面第二天透露一点信息：吴丹将当选哈马舍尔德的接班人。美国代表赫勒尔德·特里布恩告诉吴丹，说他“被一些国家认为是一个有思想的候选人，乐于支持亚洲、非洲和其他中小国家的利益”。同年 9 月 3 日英国《观察家》评论吴丹是一个“典型的、稳重的、文明的官员，一个有魅力的人，一个有敏锐判断力的人和一个能使不结盟具体而形象化的人”。

9 月 19 日，在联大会议开始前，苏联派代表到吴丹的办公室，向他解释了苏联政府的立场，并阐明他们坚持的“三驾马车”的方案，说如果吴丹被某个政府提名，而不是有三个候选人被提名，苏联将不愿看到这个结局。吴丹向苏联代表表示，缅甸政府不赞同这个议案。他本人无意于秘书长的职位，他对此根本不感兴趣。

一天晚上，有几个国家的代表团聚在一起讨论秘书长候选人形势，认为安理会将促进候选人尽快产生，但苏联坚决坚持“三驾马车”方案，而绝大多数代表又反对这个议案，看来尽快召开安理会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联

大会议应推选出一名代理执行秘书长职务的人选。于是，经讨论形成一项草案，准备提交大会讨论。

吴丹把事态的发展电告缅甸政府，很快得到吴努总理的指示。指示称他将很高兴看到吴丹当选联合国秘书长，但是任职必须是长期的、稳定的。第二天，吴丹回电吴努总理，表示他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后来吴丹把缅甸政府不愿让他担任临时秘书长的意向，向各国代表私下里作了说明。

由于吴丹的明确表态，9月25日，爱尔兰、挪威、阿根廷常驻联合国代表提交一项修订草案，提议由联合国大会主席、突尼斯人蒙吉·斯利姆做临时执行人。于是，吴丹与他们一起找斯利姆商讨，希望他接受这项议案。斯利姆表示如果这项提案被2/3的多数国家所接受，他将辞去联合国大会主席一职接受这个决定。吴丹做为这项提案的召集人，还要在表决中投票，所以他马上向缅甸政府发了电报。

9月27日，吴丹收到了缅甸政府的电报，通知他加纳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建议由不结盟运动的领导人南斯拉夫的铁托总统、埃及的纳赛尔、印尼的苏加诺和印度的尼赫鲁决定，从不结盟国家挑选出一名秘书长候选人，同其他三名副手——由美国、苏联和中立国家中挑选出来的秘书长代表组成秘书长班子。同时恩克鲁玛总统还表示，他同意从缅甸推举出来的候选人领导秘书长班子。尼赫鲁马上对恩克鲁玛的建议作了表态，同意该建议并希望它能得到普遍的认同。因此吴努总理也同意恩克鲁玛的提议，并赞同缅甸成为下一届联合国秘书长人选的推举国。加纳总统的建议在阿克拉（加纳首都）公开发表，9月28日，美国新闻给予了广泛报道。

9月29日，事态在进一步发展，而且极为有趣，一名以色列代表告诉吴丹，如果吴作为候选人，以色列将给予全力支持，就在同一天，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一位代表也表示，他的国家将支持吴丹，因为他的国家很赞赏吴丹作为亚非常务理事会主席的三年中突出的工作表现，而且吴丹还积极参与亚非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事务。但吴丹表示他已经表明要支持斯利姆当选。

尽管吴丹全力支持斯利姆，但斯利姆未能获得大多数代表的支持。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认为斯利姆太偏向西方国家，法国也反对他当选，因为法国人不同意他对比塞大（突尼斯港口城市，是法国的殖民地，在那里法国人和突尼斯人曾发生冲突）冲突事件的处理。

同时，葛罗米柯又提出了一项新的议案，即同时任命分别代表东方、西方、亚洲和非洲的四人，组成秘书长班子。而且代表亚洲和非洲的代表必须是不结盟国家的，其中一人要统管这个班子。吴丹表示这个议案可能会引起拉丁美洲国家的不满，他说：“难道拉丁美洲是美国的盟友？”

新的议案虽然模棱两可，但看得出来苏联的立场明显软化了。非常重要是葛罗米柯没有在联大会议开幕前再提“三驾马车”方案。但新议案明显地不被美国、英国、法国和许多其他西欧国家所接受。

10月2日，一些国家的代表开始起草一项折衷方案，同时征求美国和苏联的意见。该方案是到1963年4月联合国秘书长换届选举前，先指定一名临时的代理秘书长。一部分国家经过讨论在有关安理会通过、任命，有关需要高级顾问的问题方面达成共识，但在有关高级顾问的人数以及他们与临时秘书长的关系方面没有达成协议。

美国和西方赞成有5个顾问，代表不同地区和非意识形态集团：北美、

苏联东欧、西欧、非洲和拉丁美洲。这样的组合是基于假设临时秘书长人选是从亚洲国家中选出。苏联及其盟友坚持有4个代表，即代表美国、苏联、非洲和拉丁美洲，同样地，也是基于临时秘书长人选是从亚洲国家中选出。

10月4日晚，加纳外交部长艾科·艾杰告诉吴丹，加纳政府推举他为秘书长人选，同时葛罗米柯和美国大使史蒂文森都同意他的这个观点。

这时，亚非代表希望作出一个紧急决议的压力增强了。10月5~6日代表们没有休息，亚非代表和一些拉丁美洲代表举行非正式会议。之后几个阿拉伯代表告诉吴丹，尽管吴丹和以色列的关系很密切，他们仍将支持他，而且一些拉丁美洲的代表也表示了同样的意向。

与此同时，美国和苏联都在为各自不同的新秘书长该有几个高级顾问的主张紧张地工作。10月9日，苏联终于同意美国的提议：高级顾问成员有5名。但两个超级大国又在地区代表问题上争执起来，美国希望有西欧代表，苏联希望有东欧代表。美苏之间在秘书长与顾问之间的协商问题上也有分歧，苏联希望“强制协商”，美国则表示反对。而且苏联想进一步发表声明，由安理会来任命、指定顾问，更确切点说，就是由苏联来任命。美国反对苏联的做法，认为顾问也没必要指定。

10月11日，保加利亚外交部长佐里恩先生立场软化，他不再坚持要任命顾问，并且同意吴丹提出的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对地区代表问题达成协议。但苏联仍坚持如果西欧出代表，那么东欧也必须有代表，这时，印度大使又提出如果西欧和东欧都有代表的话，那么亚洲也得有一个代表。

10月14日，史蒂文森在电视采访中说：“吴丹被苏联接受也被美国接受。”

鉴于刚果形势严重恶化，美国认为“任命一个临时秘书长的问题已迫在眉睫”。但到10月18日，美苏就顾问名额仍未达成协议，美国坚持有5名顾问，苏联坚持要么4名，要么7名。19日晚，吴丹会晤美苏代表，说明若这种无结果的谈判会拖延几星期，不如“要么确定下来，要么抛弃它”。这个提议稍稍有点效果。20日下午，美国作了很大的让步，史蒂文森带来的消息是美国建议召开安理会无条件地任命吴丹或者任命顾问。

美国大使刚刚离去，苏联方面的消息也传递过来，苏联同意任命吴丹，因为整个亚非国家都支持吴丹。

10月23日，吴丹收到缅甸政府的指示：“对于东西方集团的任何议案都表示积极的支持”。当吴丹把这个意见转达给史蒂文森时，他表现得很懊恼。同一天，吴丹通知亚非代表，他倾向于苏联的4人或7人顾问，而反对美国及西方的5人顾问提案。

26日，吴丹发表声明，如果局面僵持不下，他将综合不同的反应作出自己的安排。大部分亚非代表认为这可能打破僵局，因为再无任何候选人能被东西方同时接受。美、英、法、苏的代表都劝阻吴丹不要冲动行事，认为这样要引发新的危机。28日，史蒂文森对吴丹说，他将在30日发布一项声明，美国愿意吴丹不附带任何条件地当选。

29日，吴丹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说：“作为秘书长必须公平，没有偏见，但是不必中立。从道德上来说，秘书长不能保持中立或被动消极的地位。”他还举例说明公平就像法官一样，“谁犯了罪必须给予惩罚。”

美苏僵持的局面慢慢被打破了，11月1日，美苏共同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可以看出，已把顾问问题留给吴丹去处理。法国也附议，翌日佐里恩也

发表一项声明附议，为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召开铺平了道路。吴丹可以自由处理顾问名单和其职能的问题。

11月3日上午安理会召开会议推荐吴丹为代理秘书长。苏联投票赞成吴丹当选。吴丹对于苏联的支持非常高兴。

1961年11月3日下午联合国大会上秘密投票表决，委任缅甸常驻联合国代表吴丹为代理秘书长，任期到1963年4月10日，即哈马舍尔德任期期满为止。同日，大会批准了安理会的推荐，亚洲人担任联合国秘书长，这还是第一次。

上台伊始，吴丹首先要组建一个秘书长班子，其次是搞好与苏联、法国等大国的关系，为今后的工作辅路。

他说：“我要求成立个有几个人组成的秘书长班子，根据联合国宪章，在重要问题上作为我的顾问和行使秘书长委托人的职能。”“扩编的这个班子，我将全力保证它的高效率、竞争性、完整性以及有广阔的地区性。”不久他组成了一个九人顾问班子，分别代表不同的地区，对自己所代表的地区负责，并在秘书处担任职务。

为搞好与大国的关系，1962年夏天，吴丹访问了伦敦、巴黎、莫斯科和华盛顿。

在风景怡人的黑海雅尔塔赫鲁晓夫的乡村别墅里，吴丹受到赫鲁晓夫的接见。赫鲁晓夫在他的花园门口等待吴丹的轿车，两个小孙子在他周围嬉戏。当吴丹与赫鲁晓夫握手后，他抱起年龄较小的伊万，通过绿色如茵的草坪，走向花园别墅。这里别有一番田园牧歌式的情调。赫鲁晓夫穿着一身起皱的、闪亮的便服，他那矮胖结实的农民形象与举止，反倒引起了吴丹对童年的记忆：那个遥远的缅甸班达诺，生他养他的故土，星期天早上父亲总是带着吴丹和他的二哥到他的农场去。该农场离城有3英里，农场主一早便赶着牛车进城等候，小吴丹的心早已飞到水田。到那里他们可以同农民的孩子一起玩耍，摘果子，揪野花，玩得可尽兴啦。而今面对雅尔塔的景象，吴丹感到像回到家里一样亲切。他没有任何兴趣谈生意啦，他多么想换回童年时的伙伴坐在这里。这时，吴丹最关注的就是刚果问题和联合国的财政危机问题。在他与赫鲁晓夫进行严肃的谈话，问到苏联是否能为联合国的财政危机有所贡献时，赫鲁晓夫看了看吴丹，迅速回答到：“不要担心，美国人会付钱的。他们把联合国推到刚果问题上去。刚果正按着美国的意愿在成事。最后美国人会付钱的。”

吴丹访问苏联和法国后，取得了法国和苏联两国领导人的支持。两国的报刊对联合国在刚果和其他地方的所作所为的攻击显著地减少了。两年后的夏天，吴丹又对莫斯科、巴黎、伦敦等地做了访问。后来，吴丹又在古巴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受到苏联领导人的赞赏。所有这些都使1962年11月30日吴丹正式当选秘书长获得了保证。这样，联合国渡过了一次秘书长的危机。

宽容：吴丹的思想宝库

吴丹长相憨厚，圆形脸，宽额头，厚嘴唇。吴丹的妻子杜登丁贤慧可爱，她不会说英语，因为她的信仰佛教的父母称英语是“异教的语言”。她极少出席联合国的正式聚会，甚至一些秘书的妻子们都抱怨从来无缘碰见她。但吴丹夫妇偶而也宴请宾客，并且每年一次，在缅甸的节日期间举行一次大型午餐会，届时设置一个辉煌的佛院神龛，在一个大帐篷里摆放着各色彩灯、

缅甸食品，还有音乐烘托着这个特殊场景。

宴会之后，吴丹夫妇总是手拉手与宾客寒暄，握手道别，握手时间总是很长，表明他们的热情好客。

每天早晨，吴丹六点半起来便做晨祷，早餐后便读报。工作完一回到家中便换上缅甸服装，晚餐后又阅读，有时也看看摔跤、拳击的电视节目。读书成为他的一大嗜好，有时家人不得不哄骗他出门散步。

吴丹固定的体育运动便是散步和游泳了，他不会跳舞。他有一副健康的体魄。在担任代理秘书长的头两年，有一位秘书形容这种工作简直忙得不可想像，在这种情况下吴丹只病过一次，得了流感且几天就好了。

作为文学家、教育家、翻译家的吴丹，一生才华横溢，付诸桑梓的书籍也有不少，更不用说他丰富的思想涉猎范围有多广。

吴丹的前半生都是在佛教盛行的缅甸度过的，佛教文化对他的世界观和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长期佛教文化的教育使他养成宽大为怀的秉性。他不但磨练自己宽容的精神，而且培养慈爱、善良的品德，特别是谨慎、谦让、同情和保持心灵的平静，他经常专心致志的思考和反省，以此来把握自己的感情。因此，他是一个感情比较平稳的人，不容易激动，也不容易失落。可以看出，在他秘书长任内，佛教对他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和行为也有影响。在60年代的冷战环境中，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处于尖锐对立的时代，吴丹致力于国际关系的缓和，并为国际关系的缓和消除障碍，是不容易的。

吴丹认为作为一个佛教徒要做到化敌为友。因为佛教认为人来到世界上就是受苦，因此佛教徒有义务帮助别人减轻这种痛苦，不仅这样想，而且也要设身处地这样去做。他要施爱众生，同情别人，理解别人，同时也使自己因帮助别人而快乐。一个心情愉快的人会感染周围的气氛，而其他的人也愿意与他合作、相处，同情不但能分担别人的痛苦和挫折，而且能丰富人们的精神内涵，佛教徒要为不幸的人们祈祷，自动地为整个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

除了宗教信仰和实践外，吴丹自己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和理解也对他的行为有一定的影响。吴丹有意识地把自己看作人类种族的一分子，因此也很重视他的同僚。这种种族意识促使他形成一种综合的人类概念，这也就是他为世界组织进行特殊奉献的一种潜在的目的。

几乎在所有流传久远的世界宗教中都发展了“人的综合性”的思想。生活的伦理道德培育了这种思想。西方伦理学家和思想家，如艾伯特·施韦策和皮埃尔·泰尔哈德·查尔丁等人的哲学思想都对吴丹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

吴丹吸收了施韦策的《文明的哲学》一书中的思想，欣赏施韦策的“生活可敬”的理论。吴丹认为人必须有生活链条的意识，对生活应有崇高的价值和目的，不应在自私或者没有思想的行为中虚度时光。对于基督教徒、杰出的生物学家和学识渊博的思想家皮埃尔的学说，吴丹也很欣赏，他认为皮埃尔虽没有引用“生活可敬”的话，但他的思想与施韦策却同出一辙，他呼唤人与宗教应有新的伦理联系。

吴丹认为区别东方和西方文明的模式几乎是无意义的，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冲突，不是由于不同文明的不同观念，不是由于他们的传统和历史，而是由于他们本身的不文明的因素造成的。吴丹认为文明不应该只指一种优秀的思想或精神，而是指一种健康的优秀素质。一个国家的文明取决于整体人民

的素质。但同一国家的文明在不同人身上的表现程度都不一样。一个国家的优秀的文化与另一个国家的优秀文化相差无几，但不文明的表现差异就相当大。吴丹认为这个原则对任何国家的人都适用。

基于这个认识，吴丹在到联合国工作前就有很宽阔的胸怀，很宽容的气度，而宽容的原则正是联合国宪章的基础，没有这种宽容精神，人们就不可能相互理解。联合国宪章这样写道：“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集中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接受原则，确立方法，以保证非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而联合国秘书长的责任之一，不但要自己实行宽恕原则，而且要把这一原则扩大到整个国际关系中去。因此吴丹认为秘书长的职责就是在国际关系中的人与人之间、政府与政府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架设一座桥梁。所以在他 10 年的秘书长任期内，他值得自豪的一点就是致力于国际关系的缓和，并为国际关系的缓和消除障碍。

秘书长是联合国的行政首长，吴丹认为他是服务于国际事务的首长，在执行职责时不受国别、意识形态、个人好恶的影响。吴丹在就任联合国秘书长后，他最关心的就是殖民主义问题。对这个问题，他在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就有研究。1961 年 9 月，不结盟国家首次大会在贝尔格莱德召开，有 28 个国家代表出席这次会议。中国和苏联被排除在外，西方国家也被排除在外，美国特别不高兴古巴关塔那摩基地被最后宣言中提及。会议还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应尽快解决，表达了强烈反对殖民主义的愿望。参加这次大会以及吴丹本人同不结盟国家领导人的私交，毫无疑问地影响了吴丹的政治思想。吴丹一开始就树立了联合国应该是第三世界国家占优势的国际组织的概念，因为他来自于一个被压迫的殖民地国家，他的祖国缅甸于 1948 年才刚刚独立，在联合国最初的 51 个成员国中还没有她的名字，独立后 3 个月她才加入联合国。而今吴丹作为第一个非欧裔人登上联合国秘书长的宝座，他既有一种自豪感，也感到身上的担子沉甸甸的。吴丹认为，联合国过去几乎是欧洲国家的“俱乐部”，现在他对联合国不但要建立有别于几位前任的价值观，还要直接总结反殖民主义的经验。

尽管吴丹非常有涵养，非常宽容大度，但对损伤其民族自尊心的事却不能不动容，且刻骨铭心。缅甸在独立以前的代理总督，国家的最高长官，竟然不能加入由欧洲人把持的仰光有名气的三个俱乐部，理由就是他是缅甸人，这件事强烈刺激吴丹接触殖民地问题。在当选联合国秘书长后，他更是全身心投入国际和国内殖民地问题的讨论，殖民地问题成了吴丹在任时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在联合国的童年时代，大国主宰了联合国的命运，美国掌握着联大的 2/3 国家。在联合国不到 60 个成员国中，有 40 多个国家就经常在重要问题上支持美国的立场。1952 年吴丹是第七届联合国大会的缅甸代表团成员，亲眼目睹了这个现实。1955 年后，美国不再总是能够掌握联大的 2/3 多数国家，自 1960 年以后就更是这样，新的不参加任何集团的国家或不结盟国家在联合国中已占有一定地位，吴丹认为秘书长的作用也就相对重要些，特别是在代表中小国家的利益时，其作用就更明显、更重要了，因为这些中小国家把联合国当作捍卫其主权和利益的一个场所。

完善联合国的机构和工作

吴丹上台后，为对付各种突发性危机，必须首先解决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经费问题，同时，联合国的机构和工作也有待完善。

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这一年，联合国向中东派出了维持和平部队。为此，联合国每年需要支出费用1900万美元。1957年，大约有包括苏联及阿拉伯国家在内的30多个国家拒绝交纳分摊给他们的款项，理由是那些对苏伊士冲突有责任的政府应支付这笔费用。到1959年底，联合国全部赤字达到2900万美元。1960年，刚果问题发生，联合国又派出一支维持和平部队，仅1961年一年，这支部队就耗费1亿多美元。苏联因在刚果问题上与秘书长发生争执，又拒绝交纳它所应分担的费用。到1962年底，联合国财政赤字已高达1亿多美元，联合国出现了财政危机。

1961年11月3日吴丹上任，12月5日起便着手解决财政危机问题。他与各国代表就各种可能的结果进行磋商。这种磋商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同时他又关注刚果局势、古巴导弹危机、安哥拉与葡萄牙和非洲国家的摩擦。在这种严重的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吴丹决心就特别经费问题征求联大的同意。12月20日，在联大会议上，在有11个以上的国家，主要是苏联、东欧国家、还有法国和比利时反对的情况下，联大通过了一项发行2亿美元联合国债券的决议。债券利率2%，分25年还本付息，每年偿付40万。该债券由联合国会员国承担，联合国特别机构和秘书长如果决定的话，债券也可发给非盈利的私人组织。

吴丹为推销这些债券而困扰。1962年初，肯尼迪总统给美国国会发出一个特别信息，希望美国购买1亿美元债券，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国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同意总统提议。于是，其他国家的立法机关也开始讨论，英国保证到1963年购买1200万美元债券，最后债券购买达1.547亿美元。先后有64个联合国成员国和非成员国购买了债券，到1962年末，联合国似乎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但财政危机的状况仍然持续到1964年。

在发行债券的同时，联合国大会还在解决经济危机中运用了政治的手段。它请国际法院提供咨询性意见：联合国在中东和刚果的军事行动费用能否作为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本组织的经费”，并由全体会员国负责分担。苏联和法国坚持维和经费是特别经费，不属于宪章第十七条。1962年7月20日，咨询意见发表，国际法院以9票对5票作出了肯定性的答复，即宪章对于成员国规定的义务，包括按照缴纳经常费用的同样方式缴纳这个组织的特别费用。

尽管联合国成员国对国际法院的决定各持己见，观点难以统一，但这一决定在联合国史上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捍卫了联大的权力：可设置机构维护和平与安全。其次，它进一步声明联合国所有机构的费用都在联大的财政权力管辖范围之内，包括维和行动。中东和刚果维和军队的费用包括在宪章第十七条中。而且根据宪章第十九条，咨询意见打开了运用惩罚手段的大门，可以剥夺欠交会费的成员国在联大的投票权。

在美国和苏联对抗的背景下，1964年初除债券外，联合国仍有1.34亿美元的债务，财政危机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但吴丹基于过去三年的经验，基于对某些国家慷慨行为的信任，他认为这个问题不会拖得很久。

除致力于解决联合国的财政危机外，吴丹在任职秘书长的10年中，为适应联合国经济和社会活动日益扩大的需要，对完善联合国的机构、推动和促进联合国的成长做了大量的工作。

1965年成立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1949年设立的“技术援助扩大方案”和1958年设立的，向较大规模的发展项目提供投资前援助的“特别基金”

合并，总部设在纽约，并在 108 个国家内设有外地办事处。其经费和前组织一样，是由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和前有关机构成员国每年自愿捐款提供。开发计划署是世界上最大的多边技术援助机构。它被指定为联合国促进发展活动的中心协调组织。

1967 年 1 月 1 日成立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目的在于促进和加速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协调联合国系统的工业发展活动。从三个基本方面来促进工业发展：涉及直接援助的现场业务活动；调查研究、讨论会、专家小组会、座谈会和培训方案等形式的支援活动；以及它设法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和商业界、学术团体和其他机构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的促进活动。

工发组织下设特别工业服务方案、投资促进方案、工业情报服务处等，提供短期和紧急援助，为发展中国家特定工业项目提供投资资本，免费回答各发展中国家的询问。有关工业发展的政府和半官方机构的官员和技术人员，以及各种工业企业都可以利用这个服务处。关于工业设备的供应、价格、质量、交货与付款的条件，以及说明书的拟定、报价与投标的评估，都可以征求意见。工发组织得到全世界科学、技术和专业机构的合作，这些机构为一个关于各种工业问题的情报库自愿提供协助，工发组织设法通过这种合作大大增加它自己有限的资源，并开辟使技术的知识从发达世界流向发展中世界的交流渠道。

1965 年设立的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训研所），是联合国内的一个独立机构，总部设在纽约。其目的是提高“联合国实现该组织的主要目标，特别是维持和平与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效能”。

1969 年，吴丹首次提出建立一所联合国大学。他建议设立“一所确实具有国际性质，并致力于（联合国）宪章中和平与进步目标的联合国大学”，以促进政治与文化方面的国际了解为其主要职能。后来，联合国大会授权一个国际专家小组研究这一问题。大会在审议了专家小组的报告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的意见之后，于 1972 年 12 月（吴丹卸任联合国秘书长一年以后）决定成立目前形式的联合国大学，通过研究、高级培训和传播知识来促进“紧迫的全球性人类生存、发展和福利问题”的解决。

长期以来，联合国一直关心旅游事业在促进国际了解、和平和繁荣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1966 年联合国大会将 1967 年定为“国际旅游年”，用以促进世界各地人民之间的了解，促进国际合作和加强对丰富多彩的各个不同文明的认识。旅游年的活动主要由国际官方旅行组织联合会（官旅组织）进行。1969 年 5 月在保加利亚索非亚举行的政府间旅游会议建议设立一个政府间旅游组织以促进和发展旅游事业。11 月，官旅组织决定修改章程，以便使该组织具有政府间组织的性质。联合国大会于同年 12 月提出应该缔结一项协定，在联合国未来的世界旅游组织（旅游组织）之间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并认为旅游组织在同联合国系统内现有机构合作下将在世界旅游事业中起决定性的中心作用。

1962 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设立了住房、造房和规划委员会来加强对住房工作的领导。1965 年又建立了住房、造房和规划中心，以便把环境规划同工业和经济各部门的规划结合起来，并制订出一个综合性的联合国方案。1969 年，大会要求秘书长就会员国在住房、造房和规划方面面临的问题和优

先次序，特别是就造房筹资的趋势和低收入家庭住房、农村住房、社区设施和环境改善的需要情况提出一份报告。1970年发表了这份报告。报告中提出了要求采取国际行动的一些建议，其中包括要求制订一项在国家发展的范围内发展人类住区的战略。

1967年，吴丹设立联合国人口活动信托基金，后定名为联合国人口基金，以便为联合国成员国对在人口工作方面寻求援助的国家提供帮助。该基金主要由各国政府自愿捐款提供资金，1972年被置于联合国大会的权力之下，而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理事会作为它的理事机构。人口活动基金在各国政府、联合国各机构、区域性集团和非政府组织密切配合下，力求做到最有效地制订人口活动方案和最有效地利用资金。1970年，即人口活动基金展开业务的头一年，它得到24个国家1540万美元的认捐款项，其中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13个低收入国家的认捐。

吴丹还关注老年和青年问题。1969年，联合国大会决定审议老年人问题，吴丹在一份预备性报告中强调指出，应将老年人的问题和需要列入国家全面经济和社会规划来考虑。1971年，吴丹应大会要求提供一份关于老年的综合方案，为国家政策和国际行动提出指导方针。

1970年7月9~17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了世界青年大会，这是联合国第一次组织的国际青年集会，全世界约650名青年参加大会。目的是引起青年注意联合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给青年提供机会发表他们对和平与进步问题的意见，并请青年人指出他们愿以何种方式支持联合国。在此之前，秘书长应经社理事会的要求编写了一份可行性报告，建议大会建立一项称为联合国志愿人员的新方案。

秘书长报告中所列举的联合国志愿人员的目标是：给青年提供建设性机会，使他们在实施国家发展计划和执行国际合作方案中发挥才干和技能；提供新的人力来源，作为对发展项目的补充投入；通过青年的交流，增进国际了解，从而有助于建立一个具有多种文化经验的专门人员的国际网；增加全世界公众对发展工作的同情，从而引起各援助国增加捐款，并形成由发展中国家青年参加的对发展工作的更广泛的公共管理。

1970年，联合国大会决定自1971年1月1日起正式成立国际志愿服务团，其成员集体与个人均称为联合国志愿人员，由秘书长任命一名协调专员。为响应大会的要求，联合国志愿人员决定向最不发达国家派送志愿人员，并增加在整个发展中地区征募的比率。

在刚果问题上的调停活动

哈马舍尔德死后，联合国在刚果的行动计划暂时搁浅，吴丹上台后，就马上着手处理刚果问题。1961年11月24日，吴丹上任不久，安理会又通过一项决议，授权吴丹用武力驱逐雇佣军，要求对通过边界的人员和物资进行控制，以防止外国军事人员和物资进入刚果。但由于加丹加领导人的反对，该决议并未实现。几天以后，13名意大利士兵被刚果士兵杀害，引起轩然大波，吴丹马上着手处理这一事件，惩罚凶手，设立调查委员会。

吴丹处事稳健，主张秘书长应采取主动，充分发挥政治、外交作用。吴丹曾计划对加丹加施加经济压力，但未成功。1962年8月，吴丹提出一项刚果“民族和解计划”。该计划规定了联邦政府制度，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所有的军事力量、宪兵队都纳入统一的国家结构之中；重新确立中央政府对宗教、政治和各省组织的权力；宣布大赦。该项方案的重点是要防止加丹加

拖延和解的危险。

安理会讨论了联合国报告。该报告提出了结束加丹加分裂状态的三个阶段的计划建议。第一阶段规定，在草拟联邦政府制度的新草案的时期，由加丹加的冲伯集团和利奥波德维尔阿杜拉政府平均分配全部税收和矿山开采税，加丹加的军队应于两三个月以内并入利奥波德维尔的军队。如果第一阶段计划失败，就在第二阶段实施贸易制裁。第三阶段是授权联合国部队“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制止加丹加人的分裂活动”。

冲伯表面上接受了这一计划，但并没有为实现该计划采取实质性措施。为此，吴丹要求各会员国对加丹加施加经济压力，特别是停止铜和钴的进口，因为加丹加盛产铀、钴、铜，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与此同时，有人猛烈批评和指责吴丹在刚果采取的军事行动。1962年9月13日，吴丹作为肯尼迪总统的贵宾，参加了总统的午宴。宴会后他在接见厅等待副国务卿乔治·贝尔先生及夫人的接见。被接见的人排成一行，吴丹站在受接见的队列中。一会儿，有个人很紧张地走了进来，与主人和吴丹握手过后，便面向吴丹说道：“不要再派联合国部队去刚果。”吴丹未及答话，他已经径直离开屋子，走了出去。乔治先生说，这人是刚才才加进受接见名单的一个俄亥俄州的代表。

这件事情并不离奇，反对联合国军队继续在刚果驻扎的声音已不绝于耳。美国反对者的主要代表是参议员托马斯·多德，美国国会有影响的议员。英国的议会，也反对联合国针对加丹加的“强行武力政策”。

在这种形势下，加丹加军队连续六天向联合国部队阵地开火，又挑起了一场战斗。12月28日，联合国部队排除了宪兵队在加丹加省首府附近设置的路障，确促使全省交通畅通；联合国部队还控制了整个加丹加省，而加丹加的宪兵队作为一支战斗部队也崩溃了。1963年1月14日，冲伯表示结束加丹加的分离行动。

1963年2月4日，吴丹提交给安理会的报告中指出：“安理会早期通过的决议中提出的许多基本任务现已大体完成。加丹加的分离已经结束；外国专家和军事人员也已撤出加丹加；法律和秩序基本恢复；事实上已控制了全国的联邦政府已建立起来。”因此，吴丹要求精减联合国部队。1964年6月30日，联合国部队撤出刚果，联合国在刚果的维护和平行动宣告结束。

《联合国的历程》一书（李铁城编著）称，“刚果行动是当时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维持和平行动。维持和平部队的规模是联合国其他维持和平部队的3倍；死伤人数是其他维持和平行动的2倍。此外，四年中联合国还组织了当时一次最大的援助方案，联合国从47个国家募集运输、交通、农业、教育、财政、公共行政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专家1200余人前往刚果服务；军事和经济援助的费用总计达4亿美元”。

为消除古巴导弹危机作出努力

古巴导弹危机也叫加勒比海危机。这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一手导演的一场冲突。

1959年1月，长期统治古巴的巴蒂斯塔王朝被推翻，成立了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领导的革命政权，对内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

在美国的后院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古巴，为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作出革命的榜样，这是美国无法容忍的。美国将其视为眼中钉，立即采取各种措施，

对古巴新政府施压，迫使古巴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而苏联正高兴看到古巴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加勒比海危机，实际上已变成了美苏两个大国争霸世界的一次交锋。同年 10 月 21 日，美国对古巴实行禁运。古巴当时指责美国在计划对这个岛屿进行武装攻击。与此同时，古巴和苏联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进一步密切了与苏联的关系。这就更加刺激了美国，双方关系日趋紧张。

1960 年 2 月，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阿·米高扬对古巴进行了 10 天的访问，盛赞古巴革命的成就。古巴和苏联之间还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此时，美国总统责成中央情报局建立招募和训练古巴侨民的中心，加紧训练准备入侵古巴的雇佣军。7 月 18 日，古巴向安理会控诉美国对古巴一再施行威胁、压制和侵略。12 月 31 日，古巴要求安理会立即开会审议美国对古巴进行直接军事侵略的企图。1961 年，美国同古巴断绝了外交关系。于是古美关系问题就被列入了联合国的议程。

为了重新把古巴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1961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已拟好雇佣军在古巴登陆的作战计划，4 月 17 日，美国雇佣军在古巴猪湾地区和吉隆滩地区登陆，爆发了美古战争。对于美国的备战活动，古巴早有察觉并采取了充分的应急措施，随时准备抗击可能的入侵。经过三天激战，到 20 日凌晨，古巴军队已消灭登陆的几批雇佣军，只有一小部分被美国海军接走。猪湾战役以古巴胜利而告终。

美古战争的结局，对拉丁美洲、西半球乃至世界的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拉美人民中的反美情绪不断高涨。同时也使美苏全球争霸的斗争出现了新局面。由于苏联的警告，才使美国不敢贸然扩大并停止了对古巴的入侵。苏联利用美国退缩的机会，以援助古巴反对美国威胁为名，将大量的武器装备运进古巴，并派出军事顾问团训练古巴军队。

古巴是一个小岛国，国内经济十分落后，军队装备都是从别国买来的。为了对付美国的威胁，自 1962 年 7 月起，苏联开始秘密向古巴运送导弹。赫鲁晓夫认为，“这样一来，使得美国的侵略力量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局面。苏联设置导弹的意图不是对美国作战，而是阻止美国侵犯古巴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战争，另一意图是给菲德尔·卡斯特罗所创立的新的进步制度一个继续推行下去的机会。”其实苏联的真实目的是企图在西半球建立自己的军事据点，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同美国抗衡。美国对此当然十分恼火。

8 月底，美国 U - 2 侦察机在古巴上空发现，苏联正在古巴安置地对地导弹。经过反复核查证明：哈瓦那西面的圣克里斯托附近已建成导弹基地。10 月 16 日，美国武装封锁古巴，并于 22 日宣布对古巴实行隔离和严密监视。

面对美国的封锁，苏联一面加快向古巴运送导弹和伊尔 - 28 轰炸机的速度，一面采取必要的措施保卫自己的军事设施。美国也从 10 月 24 日起，先后出动 183 艘军舰封锁古巴海面，战略轰炸机满载着核武器不断在古巴上空盘旋，核潜艇也奉命进入作战状态，摆出了要打核大战的架势。美国还宣称若苏联潜艇无视美国“升上水面”的信号，将用深水炸弹炸毁。美苏相互进行核讹诈，在加勒比海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紧张局势。

10 月 23 ~ 25 日，安理会讨论了加勒比的危急局势。美苏先后提出了各自的决议草案，又互相否决了对方的草案。于是，来自亚、非集团的 45 个国家开会，促使安理会中两个“不结盟”国家加纳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向安理会提出一项决议草案。该草案要求吴丹出面调停，同争执双方进行磋商。

吴丹按照该草案精神在美、苏、古巴三方中调解。他向肯尼迪总统和赫鲁晓夫主席发出两封信，要求双方不要使局势恶化，建议停止向古巴运输军火三个星期，同时暂停封锁，举行直接谈判。他写信给卡斯特罗，希望他停止任何使局势恶化的措施。赫鲁晓夫同意吴丹的建议，并提议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肯尼迪认为危机是古巴秘密引进进攻性武器造成的，撤走这些武器危机就能化解，并表示愿意和平解决。

美苏的表态，使安理会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将取决于双方讨论的结果，于是，安理会静观局势的发展。吴丹又向美苏首脑发出信函，建议赫鲁晓夫命令已驶往古巴的任何苏联船只，在有限的时间内停在拦截区以外。同时，他也建议肯尼迪总统指示美国在加勒比海的船只，尽一切可能避免和苏联船只发生直接对抗。吴丹的建议被美苏双方接受。此后吴丹继续分别与美、苏、古代表进行私下磋商，以促使其进行谈判。

10月26~28日，美苏两国首脑互换信件。26日，赫鲁晓夫在给肯尼迪的私人信件中说：“我的建议是，苏联决不再向古巴运送武器，已经在古巴的那些武器，则加以撤除或销毁；我们则以解除封锁和同意不入侵古巴作为交换。”苏联的立场是：苏联可以从古巴撤回导弹，条件是必须公开声明，保证不侵犯古巴，并且答应要它的盟国也不侵犯古巴。对于苏联的提议，美国都给予了保证。肯尼迪总统认为它是对和平的重大贡献。他还说，联合国代理秘书长的努力大大地推进了他们的工作。

28日，赫鲁晓夫证实了“苏联政府业已下令拆除所谓进攻性武器，并把它们装箱运回苏联”。接着，苏联派副外长库茨涅佐夫到纽约，以同美国和联合国的代表们商谈一个比较正式的解决办法，确定撤出导弹并为在古巴进行就地检查做好准备工作。

但是，美国要求的、苏联同意的监督问题，尚待解决，因为赫鲁晓夫给检查开绿灯时并未征求卡斯特罗的意见。吴丹指出：“既然安理会把这一问题留给我解决，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试图探索联合国在古巴‘出场’的可能性。”

卡斯特罗对美苏达成的协议持反对态度，他拒绝联合国视察古巴领土，并提出了维护古巴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五点要求。为此，吴丹前往哈瓦那与卡斯特罗进行了两天的会谈。吴丹阐明了联合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和自己的使命，指出联合国要求冲突各方，都必须抱和解的精神。吴丹告诉卡斯特罗，赫鲁晓夫已指示停止建筑导弹基地，并撤除这些基地，把导弹运回苏联。联合国将准备在这一过程中执行监督任务，希望古巴能同意。但是，卡斯特罗态度强硬，反对联合国人员以任何理由留在古巴，卡斯特罗指出，美国坚持视察纯粹是侮辱古巴，“联合国为什么只重视美国的保证，而同时又同样重视苏联公开作出的关于撤除战略武器并将其运回的保证？”

卡斯特罗的坚决回击，使吴丹去古巴的使命落空。此后苏联领导人与卡斯特罗又进行了20多天的磋商，仍未能使卡斯特罗放弃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的严正立场。后来美国竟公然侵犯古巴领空，继续对古巴实行间谍性的侦察监视。

11月8~11日，苏联从古巴撤走42枚导弹并接受美国军舰靠船检查；21日，苏联同意在30天内从古巴全部撤走伊尔—28轰炸机，美国宣布取消对古巴的海上封锁。古巴导弹危机遂告结束。

古巴导弹危机对联合国的挑战是严峻的。吴丹在这场危机中发挥了“有

益”的作用，他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协商和讨论成功地发挥了调停的作用，这一点也得到了美苏的“含蓄”承认。

敦促阿以停火

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从历史上看，这场冲突涉及犹太人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这两个民族对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的同一肥沃地带提出的各不相让的要求。以色列曾在 1948~1949 年、1956 年和 1967 年三次为扩大犹太国而战。每次都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每次都加深了与阿拉伯邻国之间的矛盾，中东依然濒于战争的边缘。

1956 年爆发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即第二次中东战争后，联合国在埃、以边界地区部署的维和部队，有三四千名战士留下来继续执行任务。从军事上来讲，这虽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力量，但它占领着以色列领土前沿的一个狭长地带，可以阻止埃及的军事行动。但是，在中东其他地区，特别是在约、以前线和叙、以前线，紧张局势继续存在。以色列对第二次中东战争的结果很不满意，宣称以色列“解放被占领的故土”的任务尚未无成。所以，它一直在等待新的时机的到来。

自 1967 年 4 月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急剧扩大。以色列强行耕种叙、以边境上非军事区内阿拉伯人的土地，叙利亚边防部队鸣枪警告。以色列还袭击叙利亚戈兰高地，并出动飞机侵犯叙利亚领空，击落叙利亚飞机。叙、以空军交战，埃及支援叙利亚空军，对付以色列的侵略。阿、以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

5 月，阿、以之间关系进入白热化，15~16 日，埃及和叙利亚相继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埃及高级军事会议作出决定，要吴丹撤走联合国部队，并派密使把埃及参谋长穆罕默德·法齐的私人信件送给维和部队的司令官：“我谨想告诉您，我已命令所有埃及部队作好准备，如果以色列胆敢侵犯任何阿拉伯国家，就对它采取行动。我方部队根据接到的命令已在我们的东部边境西奈集结。为保证紧急部队士兵的安全，我请您命令这些士兵撤离边境上的工事，集结到加沙地带他们的兵营中去。”

这无疑是一封宣战书。司令官里基赫不敢迟疑，立即将此信全文电告在纽约的吴丹。吴丹马上召来自己的助手拉尔夫·本奇，同时约见阿联驻联合国代表穆罕默德·科尼。本奇对中东问题非常了解，三个月前他视察过维和部队营地，也会晤过埃及领导人。本奇认为这是在放试探气球，是不能接受的。他说：“应该这样回答埃及，我们不接受任何类似的权宜之计。要么让联合国部队按规定继续执行它的使命，要么让联合国部队全部撤出埃及。没有折中的余地。既然纳赛尔不希望我们的部队撤出，那他一定会让步的。”

吴丹接受了这个主意。他如此这般对科尼表达了联合国的见解。他强调联合国部队的作用在于确保这个地区的和平，以埃边境因此保持平静达 10 年之久。埃及的要求不管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是难以接受的。埃及军官无权向联合国部队的司令官发号施令。维和部队要么保持现状，要么让驻守在这个地区的维和部队完全撤走。科尼立即把这些话转告给本国政府。

但纳赛尔是位从不退却的“堂堂男子汉”。18 日由埃及外交部长穆罕默德·里亚德给吴丹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吴丹：

阿联政府谨向您告知，它已决定结束联合国紧急部队驻扎在阿联领土上和加沙地带的状况。请你采取必要的措施，在最短时间内撤出这些部队。

值此机会向您深表谢意和崇高的感情。

外交部长穆罕默德·里亚德

此时吴丹已意识到维和部队有解体的危险。这支部队由巴西、丹麦、印度、瑞典、挪威、南斯拉夫七国士兵组成。吴丹把这些国家的代表请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征询意见。一开始，南斯拉夫和印度的代表就说，“如果阿联要求联合国部队撤走，即使联合国秘书处没有作出正式决定，我们也将命令自己的士兵离开。”吴丹马上意识到讨论不会有结果了。因为南斯拉夫、印度、埃及这三国联盟长期以来一直统治着不结盟国家集团，这个联盟中的两个成员国是从来不会和第三个发生冲突的。

于是吴丹不得不把应埃及的要求作出的决定通知安理会成员。以色列代表吉迪恩·拉斐尔要求吴丹至少让驻扎在沙姆沙伊赫的联合国部队留驻在原地不动，这样也许能阻止埃及人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海峡，但吴丹拒绝了。因此拉斐尔气愤地向政府建议：“让联合国部队垮台吧，它现在代表不了任何东西，而且今后也没有人能使它死灰复燃了。”

吴丹本可援引联合国宪章第 99 条，将该事件提交安理会，但他知道，出于美、苏在这个问题上站在相互对立的立场上，安理会不可能采取行动。而且，违背埃及政府的意愿让紧急部队继续留在埃及，即使是可能的，也会创造一个危险的先例，它将使可能的驻在国不敢接受今后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于是，吴丹只好命令撤出维和部队。这样一来，中东局势顿时紧张。对于吴丹的决定，以色列持批评态度，从这时起，以色列对吴丹的批评便增多了。19 日，以色列下达局部动员令。中东战争一触即发。

6 月 5 日，以色列空军先发制人，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等国发动闪电袭击，挑起了第三次中东战争。当天，开罗、亚历山大、塞得港等埃及主要空军基地的飞机几乎丧失殆尽；叙利亚和约旦的空军也受重创。此后以色列军在 6 天之内占领了约旦河西岸、那路撒冷城东区、加沙地带、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共侵占 6.5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翌日，安理会召开会议，审议了中东局势，并通过美、苏提出的要求阿、以双方“立即实现停火”的决议案。7 月，安理会再次开会，又通过了一个“限期停火”的决议。决议要求埃、叙、约等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在当天格林威治时间 20 时停止一切军事行动。6 月 7~9 日，埃及、叙利亚、约旦接受安理会决议，宣布停火。以色列至 10 日占领戈兰高地后也宣布停火，第三次中东战争遂告结束。

中东停火不久，安理会授权秘书长吴丹在埃、以停火线两侧部署联合国观察员，以监督停火。7 月 16 日，由瑞典、芬兰、缅甸和法国组成的观察组的首批成员分别到达运河两岸，开始执行任务。

为“公正持久”地解决中东问题，安理会于 1967 年 11 月 22 日通过了由英国提出的决议案，即著名的 242 号决议。决议提出在中东建立“公正及持久和平”的两项原则：“以色列军队撤离其于最近冲突中所占领的领土”；“终止一切关于交战的主张或交战状态，尊重并承认该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以及各国在安全和得到承认的边界内不受武力威胁或武力行动影响的和平生活的权利”。决议还请秘书长指定特派代表一人前往中东与有关各国建立并保持接触，以期贯彻落实决议精神。

242 号决议成为联合国与国际社会推动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依据和基础。但由于阿以双方各执其词，长期以来决议精神难以落实。根据 242 号决

议精神，吴丹任命瑞典驻苏大使贡纳尔·雅林为调停人前往中东与阿、以双方磋商。当时整个停火线上，尤其在苏伊士运河两岸，战事仍然不断发生。雅林提出一项计划：要求以色列撤军；结束双方敌对状态；以色列船只在运河和亚喀巴湾自由通航等。埃及拒绝接受这个计划。1968年10月，埃及外长里亚德同意制订一个计划，按照阿、以双方同意的步骤分阶段逐步执行决议，但以色列拒绝放弃它所占领的土地。阿以双方意见有根本分歧，雅林调停使命归于失败。

1970年6月25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提出了一个“政治解决”中东问题的新方案，即“罗杰斯计划”。主张埃、以两国实行至少“三个月的有限期停火”，在这期间双方各派代表同联合国特使雅林会谈，讨论用什么办法执行242号决议的问题。但美国、埃及、以色列、叙利亚、伊拉克和巴解组织等相关国家和组织因意见难于统一，“罗杰斯计划”也告失败。

无论是雅林使命，还是“罗杰斯计划”，都是吴丹为中东和平付出的努力。这些行动虽然失败了，但吴丹问心无愧地尽了应尽的责任。

推动印巴战争停火

第一次印、巴战争在联合国干预下实现了停火，并划定了停火线。但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致使印、巴之间关系一直紧张。1965年8月，克什米尔印占区穆斯林为反对印度统治和宗教迫害，进行武装反抗，印度政府派军警镇压，破坏了印、巴之间的停火线。25日，印度军队入侵巴基斯坦控制的地区，导致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

9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安理会两次开会，呼吁双方立即停火。7日，吴丹及其一行带着安理会的决议，离开纽约前往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和印度新德里。在肯尼迪国际机场，他发表了简短的声明，说“我将尽全力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且把我的建议报告安理会。”到达卡拉奇后，他继续驱车前往拉瓦尔品第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机场周围是全副武装的哨兵，并装备有防空袭武器。

阿尤布·汗身体高大，很有威严，风度优雅，给人印象深刻。他指责印度入侵停火线挑起事端。吴丹解释说他此行的目的是为贯彻安理会的决议而来，“我的使命只是促成双方迅速、有效的停火，如果不这样，克什米尔问题将比越南问题更加影响世界的和平。我已经考虑让北京和莫斯科在这一问题上扮演积极的角色。”但阿尤布坚持认为，安理会应该关心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使这一问题的解决僵持不下。双方讨论未达成一致意见，阿尤布请吴丹共进午餐。

随后阿里·布托外长陪同吴丹参观了被毁坏的城市塔克西拉，这里原有世界上最古老的佛教学院。看到一度香火鼎盛的神灵牌位在战火中成为废墟，吴丹说话时的声音都颤抖了。

11日，吴丹一行飞往新德里。在新德里他会见了印度总统拉达克里希南。此人学识很高，是印度哲学家，教育家，通晓印度传统哲学，对西方哲学及中国孔孟老庄学说也有研究，出版的宗教哲学著作有近20部，曾荣获不少国内外名誉博士学位。吴丹感到与他在一起谈话受益非浅。他甚至愿意与他天天呆在一起。

在与印度总统、总理进行了交流以后，吴丹起草了一份建议，于12月同时发给印、巴双方，建议双方于9月14日以前无条件停火，并在8月5日以前撤出各自的武装力量。

这份建议从交付之日起，就以失败收场，它像此后一系列联合国做出的决议一样，都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在调解失败后，吴丹返回纽约。双方久战不决的僵持局面，使印度国内局势已有动荡迹象，旁遮普邦的边民发起了向政府抗议示威。美苏两大国都认为印巴两败俱伤或久战不决不利于他们的战略利益；美压巴基斯坦停火，并许诺恢复对巴提供军援，苏联也积极活动压印停火。

20日，安理会根据吴丹的建议通过决议，要求双方于9月22日停火，把所有军事人员撤回到8月5日以前的阵地；停火和撤军实现后，印、巴两国首脑坐下来谈判，以求政治解决印巴冲突。

9月22日，双方宣布停火。

为稳定停火后的局势，吴丹把联合国驻印度、巴基斯坦军事观察小组的军事观察员从45人增加到102人，要求他们继续沿克什米尔停火线执行任务。此外，吴丹又建立了一个由90名观察员组成的联合国驻印、巴观察团，在克什米尔以外印巴边界沿线监督停火。

1966年1月4~10日，印巴双方接受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邀请在苏联塔什干举行两国首脑和平会议，共同签置了《塔什干宣言》。双方一致同意恢复正常与和平的关系；把各自军队撤到1965年8月5日以前的边界线；释放战俘；恢复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结束敌对宣传；处理难民和非法移民等问题。在联合国帮助下，计划进行得很顺利。鉴于这种情况，吴丹把克什米尔的军事观察员减少到50人。到2月17日印、巴双方实现撤军后，联合国印、巴观察团撤离，宣告解散。

第二次印、巴战争是一场地区性局部战争，这场战争的发生与结束均有大国控制和影响的影子。美不愿印巴互相削弱，或逼巴过甚，使巴更加靠近中国；英国害怕印度大打影响其在印、巴的既得利益，加速英联邦的瓦解。战争也进一步表明了印度决心实现通过武力以削弱巴基斯坦的战略目标，这次印、巴战争使两国之间的仇恨加深，为6年后第三次印巴战争埋下了伏笔。从国际上看，战后形成的苏印、美巴抗衡格局有所松动。此次战争对印度尔后加速军备和整军的步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71年3月，东巴基斯坦发生内乱，导致了孟加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7年，印、巴分治以前，孟加拉是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印、巴分治后，孟加拉被分为东西两部分，西孟加拉属印度，东孟加拉归巴基斯坦，成为东巴基斯坦。60年代后期，拉赫曼领导的人民联盟不断进行争取东巴自治的斗争。1971年3月26日，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宣布独立，巴基斯坦当局进行军事镇压。

由于冲突使东巴数百万难民流入印度，加剧了印度次大陆的紧张局势，造成了印、巴关系的紧张。联合国密切注视这场冲突是否危及世界和平。一些人建议吴丹动用联合国宪章第99条，行使秘书长的权力，将该问题提交安理会讨论。但吴丹认为需要静观事态发展，以免造成干涉巴基斯坦内部事务的借口。5月，吴丹允准了一项国际援助印度难民的计划，并任命印度萨诸丁·阿格哈·卡恩王子监督执行。

11月21日，印度借口东巴的民族和难民问题危及印度，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大规模入侵东巴，并封锁巴基斯坦沿海。12月3日，巴基斯坦军队从西巴进行反击，印度乘机把战争扩大到西巴，对巴基斯坦发动了全面战争，导致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

12月7日，联合国大会讨论了印、巴武装冲突问题，大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要求印、巴双方停火和撤军的决议。但战斗并未停止，12月16日，印军侵占东巴首府达卡。17日，两国政府宣布的停火开始生效，战争结束。

12月21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双方严格遵守停火，双方武装力量都撤回到克什米尔原停火线的阵地。决议还要求秘书长任命一名特别代表帮助解决人道主义方面的问题。这一天诞生了孟加拉人民共和国（东巴基斯坦），也是这一天，瓦尔德海姆接替了吴丹的使命担任联合国秘书长。

第三次印、巴战争是印、巴战争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局部战争。印度通过这次战争，重划了南亚地区的版图。战争的结局极大地削弱了巴基斯坦的地区性战略地位，使东巴成为孟加拉国，而印度从此奠定了印度洋地区性军事强国的地位。

永远的遗憾

吴丹在亚洲问题方面的努力收效甚微，他感到非常遗憾。但是，用一名哲人的话说，他已经尽力了。

在亚洲，越南是苦难最为深重的国家之一。百余年间，战乱频仍，一片锦绣河山被蹂躏得满目疮痍。1964年8月5日，美国马多克斯号驱逐舰入侵越南领海，制造了“北部湾事件”，从此越南战争旷日持久，直到1975年才宣告结束。美国在越南战场上不仅投入了数十万的地面部队，还投入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强大的空中力量，对越南丛林进行狂轰滥炸。

越南战争初起时，吴丹就非常关注，他曾在巴黎公开表示反对战争。他说：“用军队并不能解决问题。1954年他们没能解决这个问题，10年以后我也看不出任何他们能够取胜的迹象。我认为东南亚问题不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只有政治和外交手段能解决这个问题。”

自此，吴丹便逐渐卷入越战这个问题中来，他私下里与一些国家领导人交换意见，交流思想，如美国阿德莱·史蒂文森大使就很同意吴丹的看法，但很明显他对华盛顿政策的影响很小。吴丹还就此亲自同苏共中央主席赫鲁晓夫、法国总统戴高乐、美国总统约翰逊交换意见。农民出身的赫鲁晓夫说话总是很坦率，他说：越南在苏联的几千里以外，苏联无能为力，但他欣赏吴丹的个人努力。

戴高乐将军也强烈谴责美国对越南的军事行动，但对其结果却未作明确表态。他强调这要越南自己作出决定。

约翰逊总统深切关注“共产主义入侵东南亚”的问题。但他不愿与吴丹谈论越战问题，而是很愿意与他谈一些个人生活的话题。他们俩人有一些惊人的相似的经历：约翰逊比吴丹大五个月，但同一年上大学，同一年毕业，同一时间当了教师，而且同一天即1934年11月17日结了婚。

吴丹认为约翰逊总统是一个很温和、很随便的人，当你的话题不接触国际事务时，他与人谈话也很投机。他喜欢吴丹，每次到纽约，他总要给吴丹打个电话。在办完公事后，便到联合国大厦看望他。值勤保卫人员会很快安排接待他的到访，不一会儿他就到了第38层的联合国办公地点。这样非正式和亲切地接待一个国家领导人，对吴丹来说尚属首例。约翰逊把越南看得很重，想得很远，这是冷战时期独特的环境造成的。他曾对吴丹说，如果越南被共产主义占领，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夏威夷了！

1964年夏天，吴丹访问了开罗、巴黎、伦敦、仰光、莫斯科、纽约，并在

约翰逊总统的邀请下访问了华盛顿。在白宫外的南草坪上，美国马里莱军乐队演奏着优美动人的乐曲，总统在玫瑰园和总统的圆形办公室里作了讲话。约 200 位宾客出席了总统的午宴。

午宴后吴丹在与一些官员交谈中便很自然地扯到越南战争，吴丹指出如果美国派密使同北越私下会谈，不要让任何政治力量参加，将是非常有益的一件事。吴丹愿做牵线搭桥人，因为 1954 年在河内的一次午餐会上他认识了胡志明和其他越南领导人。对于他的建议人们的反应不一。

回到纽约，吴丹想法同河内联系。吴丹通过苏联的渠道与河内沟通。

1966 年 2 月，正值越南战争逐步升级的时候，吴丹为促成谈判的开始，提出了某些初步的设想，他认为这些步骤应包括：停止轰炸北越，降低在南越的军事活动水平以及所有方面愿意与实际交战者进行商谈。1967 年 3 月 14 日，秘书长向有关各方送交了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建议就地休战，以备进行预备性会谈，为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作准备。1970 年 5 月，吴丹再次谈到联合国无力在结束冲突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因为几个有关方面不是本组织的会员国，也因为许多会员国，包括一些安全理事会的常任国在内，不愿意本组织介入此事。他要求召开一次由日内瓦协定所有签字国参加的国际会议。这些倡议均未产生所期望的效果。

1971 年 9 月，吴丹在他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最后一次年度报告的导言中指出，本组织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没有越南南北两方面参加，使联合国斡旋制止冲突以失败告终。他回顾他曾几次进行斡旋，但为促进和平解决所作的努力收效甚微，他为此深表遗憾。他认为，战争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是形势发展中令人不安的一个因素。

吴丹卸任并不使他感到沮丧，他反倒感到“自由解放”了，他马上打电话通知妻子和女儿，让他们把这一特别的消息告诉朋友。同时，他也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祝愿他的继承人更有作为。

吴丹于 1974 年 11 月 25 日因患癌症逝世。他一生著作颇丰，写作和翻译的书有《城市的故事》、《国际联盟》、《向新教育前进》、《吴丹回忆录》等。

（方华）

广交博历、殚精竭虑的第四任秘书长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著名外交家，联合国第四任秘书长，曾任奥地利外长、总统。

瓦尔德海姆自 1972 年至 1982 年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之职，他重视“个人外交”的作用，在任期间曾与当时 158 个成员国中大多数国家的元首及政府首脑会晤，并与相当一部分人建立了密切的个人联系。他视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为联合国的首要使命，为履行秘书长之职殚精竭虑，费尽心力，并以高效率的工作方式为维护和平，维持大小国之间的平衡，促进南北对话，保持人们对联合国的信任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早年生活——在自己的国土上流浪 1918 年冬，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匈帝国与意大利签署了停战协议，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在奥地利境内宣告结束。失败后的绝望情绪笼罩着这个昔日无比辉煌的中欧帝国，处在恶劣条件下的奥地利国民人人自危，一时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在位于第聂伯河畔的下奥州小镇圣安德烈·沃顿，小学教师瓦尔特·瓦尔德海姆刚刚从意大利前线死里逃生，却又不得不开始为他的新生儿的身体担心。他的儿子库尔特·约瑟夫出生在这年的 12 月 21 日，时间恰好是在圣诞节之前四天。他太瘦小了，全家人都发愁他能不能活下来。

库尔特在国家前途暗淡的气氛中度过了童年。他家的祖先是捷克人，原姓瓦兹拉维克，“瓦尔德海姆”一姓是父亲后来为了便于立足而根据德语改的。祖父是铁匠，早年经营一家为邮递马车安装马蹄铁的小企业，后来由于邮车越来越少，家里赖以维持生计的支柱不复存在了。父亲是祖父 11 个子女中的一个，他决定靠自己的力量摆脱贫困。后来，他通过努力做了教师。母亲约瑟芬是圣安德烈·沃顿镇镇长的女儿，外祖父在当时尚属富裕农民，但他在战争中患上了心脏病而无法再事农桑，于是只得卖掉地产以供生活之需。

由于收入有限，瓦尔德海姆家的生活十分清贫。库尔特是长子，下有一弟一妹。父亲对三个孩子的教育极为重视，为了使孩子们受到最好的教育，他乐于付出一切代价。库尔特上了离家很远的克洛斯特新堡文科中学，他每天五点钟就要起床，乘上 45 分钟的火车去学校，在车上吃一个黄油面包当做早餐。每天，在上学路上，他都要对着一家糕点店的橱窗站好久，默默地注视着里面的甜食。这情景有一次被父亲的一个朋友看到了，于是他得以美美地饱餐了一顿。后来，他回忆说：“我那时简直是一直在挨饿，同样，许多奥地利人也很少真正吃饱过。”艰苦的早年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令他受益终生。

20 年代中期以后，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开始登上政治舞台。1931 年，12 岁的库尔特第一次听说有一个叫国家社会主义的组织。这股势力很快由德国蔓延到奥地利，他们宣传奥地利应与德国合并成一个国家，并在奥地利政治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那时，有许多奥地利人希望与德国合并，但库尔特的父亲坚定地拥护国家独立，成为纳粹的坚决反对者。在父亲的影响下，库尔特 15 岁的时候便对政治产生了浓厚兴趣，小小年纪就树立了将来做一名外交官的志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把自己未来的学习方向确定为语言和法律。

1936 年奥地利重新开始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同年，库尔特高中毕业，

他爱好骑马，于是就志愿加入了奥地利龙骑兵部队服役，一年以后退役。退役后，他进入被誉为外交官摇篮的维也纳外交学院学习，同时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

就在他刚刚成年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1938年3月12日德国军队开进奥地利，奥地利被希特勒德国吞并。纳粹展开了对反对者的大肆搜捕，库尔特的父亲被捕入狱，一家人的生活再度陷入困境。库尔特只得靠课余为人教授希腊语和拉丁语来补贴家用。193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在维也纳外交学院两年的学习，并参加了候补官员考试。

同年，库尔特被征入纳粹德军。他被分配到驻上奥州一个师团的第45侦察分队，这支装备精良的机械化部队由骑兵连、自行车连和摩托车连组成，行军时常常要领先步兵部队四十公里，负责探测敌军方位，有时甚至要把敌军火力引向自己。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没有人知道自己能否看到明天早上的太阳，开小差者不计其数。

1941年春就在德军进攻苏联之前不久，这支部队开赴东部前线。在1941年冬天的一次战役中，库尔特被榴弹碎片击中了脚部。由于部队被敌军围困了好多天，他的伤口感染了。后来，给他做手术的医生说：“小伙子，再耽误一天你的脚就保不住了。”他只得被遣返回家。

父亲已获得了自由，但仍不时受到秘密警察的传唤与审讯。为了避免再受打扰，瓦尔德海姆举家迁往维也纳边上的巴登。几个月后，库尔特的伤好了，但他被医生鉴定为不宜再上前线。他便提出了休假学习的申请，申请出乎意料地被批准了，于是他于1942年重进维也纳大学继续未竟学业，师从在世界上享有很高声誉的国际法学家阿尔弗雷德·菲尔德劳斯·德劳斯贝尔格教授。他的博士论文被教授定为《康斯坦丁·弗兰茨的帝国思想分析》，康斯坦丁·弗兰茨是德国俾斯麦时期的外交家和政治学家，为了撰写论文，库尔特成了维也纳大学图书馆的常客，他阅读了弗兰茨的大量著作，终于出色地完成了论文。教授给他发来了贺电：“论文通过了，祝贺你！”1944年他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

学业有成的同时，甜蜜的爱情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1944年8月，他与伊丽莎白·里切尔（爱称茜茜）结合，这是这段时期令他感到最幸福的事情了。伊丽莎白的祖上有许多人担任过奥匈帝国官员，其父也曾在一战中任军官，帝国崩溃后一直在私营经济领域做事。两人于一年前相识于维也纳大学，伊丽莎白也在那里学习法律。库尔特和茜茜这对新婚夫妇决定去做蜜月旅行，不料，火车还未驶出维也纳就响起了防空警报，铁路停运了，于是他们就在拥挤的防空洞中度过了新婚之夜。1945年，长女丽泽洛特出世，库尔特默默地为她祈祷，但愿新生的一代不再经受战争的摧残。

学习假期满之后，库尔特再次被召归队，战争结束前他驻扎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德军在意大利投降时，他费尽周折逃脱了被俘的命运，重归故土与妻子团聚。处在战争尾声的奥地利，满目疮痍，食品紧缺。库尔特一家三口决定回巴登与父母亲一起生活。这真是一次难忘的旅行：他们乘上了一列人与货物、家禽和小动物混杂的闷罐子车，茜茜得了流感躺在稻草上，库尔特靠在苹果箱上，丽泽洛特不停地啼哭，他们成了在自己的国土上流浪的难民。当他们最终到达巴登时，与父母重逢的喜悦很快又被寒冬即临而房坏窗破的现状冲淡了。然而可怕的战争毕竟结束了，眼前出现了未来的曙光。

走上仕途——与奥地利祖国一道向前

由于在外交学院的知识积累，瓦尔德海姆毫不费力地通过了外交部的人员考试。1945年11月他接到外交部通知，他被录取了。这是一个他梦寐以求而且自信能够胜任的理想职位，因为他拥有一名成功的外交官所需要的一切条件：法学博士学位，外交学院的毕业证书和多门外国语知识。于是，这位已经做了父亲的26岁年轻人踌躇满志地踏进了外交部的大门，并由此步入了政坛。

在做了几个月的下属工作之后，瓦尔德海姆被提拔为外交部长卡尔·格鲁伯的秘书。第一次被派往国外是在1948年，他去奥地利驻巴黎大使馆做了一秘，这对他来说是一次很好的职业学习机会。在资金紧张，人员短缺的情况下，使馆每个人都要承担一系列的繁重工作。身为一秘的瓦尔德海姆常常要在大使不在时行使代办的职权，这也进一步丰富了他的职业经验。1951年，他奉召返回维也纳之后不久，年纪轻轻的他就被任命为外交部人事部门领导，这项工作责任重大，吃力不讨好，但却是外交部的一个要职。

此时的奥地利，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马歇尔计划正在发挥效应，经济开始复苏，人们对未来重又充满了信心。只是，奥地利仍在同盟国占领之下，同英法美苏四国之间关于签定条约的谈判已进行数年而无结果。

1953年，同盟国外交部长会议在柏林召开，奥地利代表第一次以平等伙伴的身份参加会议，东西方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缓和。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仍坚持要在德国问题解决之后，再考虑奥地利问题。1954年，联邦德国在西欧联盟规定的条件下加入了北约，即西方军事联盟，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改变，莫洛托夫认为继续拖延奥地利问题已无必要。新上台的赫鲁晓夫更进一步加速了问题的解决。奥地利与同盟国之间就签定条约的前提达成了一致：在条约签定和同盟国军队撤离后，奥地利应当像瑞士那样保持永久中立。中立政策意味着一方面不参加任何军事联盟，另一方面不允许任何外国军队进入本国境内。瓦尔德海姆参加了起草奥地利永久中立国家条约的谈判工作。

终于，1955年5月15日，奥地利迎来了伟大的历史时刻，外交部长哈洛德·菲格代表奥地利与同盟国签署了《重建独立和民主的奥地利国家条约》，条约于1955年7月27日生效。同年10月25日，最后一名同盟国士兵撤离了奥地利被占领区，这标志着奥地利最终脱离了同盟国的控制走向独立。不久，国民议会通过了永久中立立法，宣布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不允许在其领土上设立外国军事基地。条约的签定和中立政策的确立揭开了奥地利历史上新的一页，国内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都获得了可靠的保证。

随着奥地利向新的历史时期迈进，瓦尔德海姆在仕途上也迎来了令他欣喜的重大转折。1955年7月，他被任命为奥地利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几个月后，奥地利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国。12月，瓦尔德海姆率领奥地利代表团在各成员国代表的掌声之中入坐联合国全体会议大厅，这一情景令他感动不已，永久难忘。1956年至1960年，他出任驻加拿大大使，同时负有提高奥地利代表团在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中地位的使命。1960年到1964年间，他重返维也纳，先任奥地利外交部西方政治司司长，后改任政务室主任。1964年，他再次回到纽约，担任奥地利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直至1968年。

80年代，外交官的作用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二战后出现的新情况向他们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他们不但要有政治才能，而且必须对海底和太空的

和平利用等诸多发展迅速的技术问题有所涉猎。同时，发展迅速的传媒业对世界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又要求他们拥有超越职业领域的广泛经验，公开亮相和处理实务的娴熟技巧。瓦尔德海姆的博学和灵活使他在担任奥地利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期间被选为联合国和平利用太空委员会主席，后来还当选为设在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委员会主席。在工作之余，他阅读了大量的专业书籍和资料，以便对有关问题做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

1968年1月初的一天，身为联合国和平利用太空委员会主席的瓦尔德海姆正在宴请委员会的成员之时，人民党主席、奥地利总理约瑟夫·克劳斯给他打来了电话。总理向他提供了外交部长的职位，经过短暂的考虑，他接受了这一职位。他当时认为，自己肯定是到达仕途的顶点了，殊不知这仅仅是一个中间站。

外长生涯——走出南蒂罗尔问题的死胡同

1968年1月19日，瓦尔德海姆宣誓就任外交部长。几个月后，他就不得不面对一次严峻的考验了。

1968年8月，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政府推行“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政策，这一政策招致了苏联领导人和东欧集团部分领导人的反对，于是，华沙条约集团的军队进驻了捷克斯洛伐克。由于捷克斯洛伐克是奥地利的北方邻国，因而这一军事行动在奥地利引起了极大反响，公众舆论倒向了杜布切克政府一边，反对苏联的介入，中立政策与“思想自由”之间的矛盾一时无法调和。奥地利政府只得谨慎从事，在公众舆论压力和遵守中立政策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在艰难的处境下，瓦尔德海姆的努力有效地维持了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当苏联飞机侵犯奥地利领空时，瓦尔德海姆提出抗议，苏联驻维也纳大使不得不表示了歉意。

在瓦尔德海姆担任外交部长期间，最迫在眉睫的任务是解决困扰意、奥两国多年，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南蒂罗尔问题。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拥有25万居民的南蒂罗尔被协约国判给了意大利。奥地利提出的归还南蒂罗尔的请求在1945年遭到了同盟国的反对。1960年，当时的奥地利外长克赖斯基将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联合国大会作出决议，决定通过谈判作出令双方满意的解决。这一决议的通过使得南蒂罗尔问题国际化了。瓦尔德海姆任外长后，决定进行新的尝试，将这一问题从死胡同中拉出来。经过认真细致的谈判，他与意大利外长阿尔多·莫罗共同起草了一份协议，协议中承认了南蒂罗尔自治并规划了具体的操作日程。尽管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瓦尔德海姆取得的成果是不可否认的，他不仅保证了南蒂罗尔地区德语居民的生存状况，更促进了意、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此外，任外长期间，瓦尔德海姆在宣扬奥地利的中立立场上也功不可没，他通过灵活运用外交手腕，使苏联对奥地利与联邦德国在政治和经济上走得太近的疑虑一扫而光，并促成了由苏联创议的欧洲安全会议在维也纳召开，还陪同总统弗兰茨·约纳斯访问了莫斯科。

1970年4月的国民议会大选之后，人民党失去了多数地位，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未获绝对多数的社民党主席布鲁诺·克赖斯基在与人民党联合失败后，组成了社民党少数政府并出任总理。克赖斯基政府向瓦尔德海姆提供了两个十分诱人的职位：驻伦敦或莫斯科大使，并表示，如果他愿意，可以重返纽约干他的老本行。联合国的政治舞台对瓦尔德海姆太有吸引力了，他也相信自己具有干好这一工作的能力。他认为，像奥地利这样的小国只有积

极参与国际事务，而不是将其活动仅限于双边关系的范围之内，方能在世界组织中赢得更好的机会。于是，他重返纽约，再次出任奥地利驻联合国常任代表。

在接受了纽约的外交使命之后，一段时间里他仍对国内政治有所涉猎。1971年是奥地利的总统选举之年。这年秋天，瓦尔德海姆被人民党推举为总统候选人，参加角逐。作出参加选举的决定对他来说并不轻松，因为竞争对手是他任外长时经常陪同出访的现任总统弗兰兹·约纳斯，他对约纳斯评价甚高。瓦尔德海姆不属于任何政党，因而立场超然，为奥地利国民所敬仰。但此次他却战绩不佳，败在了作为社民党候选人的约纳斯手上。即便在失败的情况下，瓦尔德海姆仍不忘赞美对手，这是他的一大美德。约纳斯为人的正直与诚恳令他心服口服，多年以后他还一直深深怀念这位总统。

竞选之争——一桩与生日俱来的好运

当瓦尔德海姆1971年由维也纳回到纽约时，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在任将近十年了。由于健康不佳，他决定不再竞选连任。于是，一批世界知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跃跃欲试，要做这个缅甸籍秘书长的接班人。

联合国宪章规定的选举程序十分复杂。为了维持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平衡，联合国秘书长将由联合国大会选出，每个成员国只能投一票，真正的决定权其实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即英国、法国、美国、苏联和中国手中，这五个国家所拥有的一票否决权将在选举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候选人当选须通过两轮投票，他必须至少获得九个安理会成员国的赞同票，以及全部五个常任理事国的赞同票（或者至少是弃权票）。由此看来，联合国大会的那一道投票程序其实只是一个热热闹闹的形式。

通常在选举前几个月，在纽约以及有关国家的首都就已展开紧锣密鼓的竞选活动。候选人只有获得了本国以及本人所在地方政治集团的支持，才会有取胜的可能。此外，赢得安理会成员国的好感也是获胜的一个前提。理想的候选人除了个人性格方面令人信服之外，重要的一点是应该能够被所有的大国同样接受。这种情况下，来自小国及中立国家的外交家无疑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联合国秘书长的职位是外交家们政治生涯中的最高目标，对于瓦尔德海姆来说也不例外。竞选开始时，他感觉自己像是“一匹黑马”，并没有多大的取胜机会。后来才知道，竞选伊始他就拥有了一定优势，那就是：由于参加国内的总统选举，他有六个月的时间不在纽约，因而没有施展竞选阴谋和采取不正当行为的嫌疑，给公众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当参加秋季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们到达纽约时，瓦尔德海姆已经成了众所瞩目的目标。他开始暗自了解各国的态度，结果发现，选举形势十分复杂，究竟鹿死谁手尚难以预料。西方国家对瓦尔德海姆比较支持，苏联的态度对他也比较有利，只有中国表示了与此相反的意见，认为此前已有赖伊和哈马舍尔德两位欧洲人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因而此次不宜再选欧洲人。

1971年11月，选举终于开始了。候选人共有五名，两轮投票过后，只有瓦尔德海姆和芬兰驻联合国代表马克斯·雅克布森有望获得最后的胜利。此时的情况是，苏联坚决反对雅克布森，而瓦尔德海姆要想完成心愿，就必须赢得中国的支持。

奥地利政府这时成了瓦尔德海姆强有力的后盾。奥地利驻中国大使汉斯·塔尔贝尔格小心翼翼地中国政府表示了奥地利希望瓦尔德海姆当选及

渴求中国支持的愿望，他得体的举止和谨慎的言语给周恩来总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政府的态度转变使得选举形势转而有利于瓦尔德海姆，并最终给他带来了好运。

1971年12月21日，恰恰是在瓦尔德海姆生日的那一天，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5个成员国举行投票选举，在11票赞成、1票反对、3票弃权的情况下，举荐他为联合国秘书长。当这一切发生时，故事的主人公却远离现场，在纽约中心公园悠闲地散步。他一回到奥地利代表团驻地，就从一个喜气洋洋的年轻同事那里得知安理会刚刚作出了决定。

几个小时以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二层一间布置简洁、没有任何装饰的小小办公室里，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安理会主席兼塞拉利昂驻联合国代表卡拉马拉用几句话宣布了安理会的推荐，又用几句话向瓦尔德海姆表示祝贺。也许是巧合吧，十年后当瓦尔德海姆离任时，接受他的退职报告的恰恰也是一位非洲人——乌干达驻联合国代表奥图诺。

12月22日，安理会推荐的第二天，联合国大会举行特别会议，选举瓦尔德海姆为联合国历史上的第四任秘书长。随后，瓦尔德海姆作了就职演讲，在这第一次讲话中，他表现出对联合国工作的满腔热忱和对联合国未来的满怀信心，并表示，他将竭尽所能履行职责。

1972年1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瓦尔德海姆第一次带着新的使命，步入了纽约那幢容纳了联合国政治和组织心脏的摩天大楼的第三十八层，走廊尽头的房间正在静静等待着他，他将在这里开始完全崭新的工作，度过以后长达十年的联合国秘书长生涯。

上任之初——重实践不重理论

联合国对于瓦尔德海姆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他已经在这里工作多年，知道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那道鸿沟有多深多阔，也知道笼罩在联合国头上的那道光环经过过去25年的运转已渐渐褪去了迷人的色彩，更知道这个国际组织正被思想的狂热、民族主义的对抗、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辩论以及经济和社会问题层层包围，它常常显得疲惫乏力、徒劳无功。在接管联合国工作的时候，瓦尔德海姆的头脑是清醒的。

乔治·布什那时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团长，他有一次开玩笑说，应当就瓦尔德海姆的当选向他表示同情，而不是什么祝贺。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能够表现布什的幽默：1973年的圣诞节，瓦尔德海姆在堆放圣诞礼物的桌子上发现了一个写有自己名字的黄色小箱子，箱子里面是一个袖珍工具箱，装有各式各样干家务用的小工具。最令他吃惊的还是布什附在礼物中的祝福语：“圣诞并新年快乐——我希望，这些工具能够对你解决世界问题有所帮助。”瓦尔德海姆生来不擅长家务活儿，这些工具此后果然在这方面帮了他不少忙。至于解决世界问题，则要靠他自己的不懈努力了。

在上任的最初日子里，瓦尔德海姆一直在想，如何才能通过自己的个人行为最大程度地为解决世界问题作出贡献呢？他认为至关重要的应是在履行秘书长职权时，尽可能地与各国维持良好的工作关系。另外，他确信，政治问题不是借助于政治学理论，而是要通过对话和不倦的寻求利益平衡点方能解决。由此出发，他认为，有必要对联合国大会乃至安理会的工作方法作些改动，其中首要的一点就是要简化联合国日程安排，但他的这些改革设想却不幸碰了壁。

1972年慕尼黑举办奥运会期间，以色列运动员被谋杀，瓦尔德海姆针对

国际恐怖活动的蔓延，提议采取对付措施，但在众多阿拉伯国家的反对下，反恐怖问题虽年复一年地列在联合国大会的日程上，却不见有任何实际行动。直到1977年，在联邦德国的提议下，联合国才就客机被劫持的相应防控措施作出了决议。1983年，韩国部长在缅甸被谋杀，这才促使联合国批准了一些国际反恐怖行动的具体措施。

在公众眼里，联合国秘书长面对的是一些没完没了、令人头疼的具体工作。事实上，他的工作领域远不止于此，还包括经济、社会政策、文化和人道主义援助等诸多领域的问题。秘书长下属有近1.4万名工作人员，他们来自世界上的159个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教育背景，这就要求秘书长在处理联合国事务时，不单要有政治坚定性，还要有外交灵活性、丰富的国际知识和不俗的管理才能。瓦尔德海姆曾在奥地利外交部担任过人事部门领导和外交部长，因而在这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为了加强联合国与各国的联系，他认为使联合国秘书处不断吸收新鲜血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于是，他通过小心谨慎的说服工作，完成了人员的新陈代谢。

1972年瓦尔德海姆当选时，正值联合国陷于财政危机之中不能自拔。为了保证联合国的支付能力，使之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把首要目标确定为消除联合国所欠的6500万美元的债务。通过与各国周旋并严格控制和管理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他成功地缓解了联合国的债务危机。

瓦尔德海姆当选时，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朝着联合国这一世界政治舞台迈进的关键时刻。1971年末，联合国驱逐了台湾的代表，终于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瓦尔德海姆在此前评论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越来越令人不可思议了：一个仅控制了1600万人口、位于中国大陆边缘的岛上政府，竟试图代表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十亿中国人讲话。关于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问题的争论已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更令人不能满意的是，有人就此问题将不现实的阴影投注在联合国工作之上。”瓦尔德海姆对中国向联合国迈进时表现出的谨慎务实的态度很有好感，他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尽力给中国以帮助。当中国政府进入联合国时，他同意台湾代表全部从联合国撤出，联合国出版物从此不再提及台湾。

1972年8月，他来到炎热的北京，这是他第一次访问中国。中国人的热情好客充分证明了中国对联合国这一国际组织的极大兴趣。瓦尔德海姆称，中国的周恩来总理是他在任十年间所遇到的世界政治人物中印象最深的一个。在他眼中，周恩来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即使在文化革命的狂热气氛中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坚守着真理毫不动摇。

此后，瓦尔德海姆在任期间，还曾经于1977年和1979年两次访华。

瓦尔德海姆与许多中国政府驻联合国代表有着很好的私人交往。他在加拿大任职时，黄华是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当黄华得知瓦尔德海姆夫人患有背痛病时，曾经非常周到地就治疗和用药提出了建议，向他们推荐了针刺疗法。还从北京带来一包中药送给瓦尔德海姆夫妇。

“闪电行动”——一件最为得意之作

1973年10月开始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对于瓦尔德海姆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自1947年以来，他的每一个前任都深深感受到，肩膀上阿以冲突这付担子无比沉重。但真正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还是在埃及总统萨达特出人意料地对苏伊士运河发动进攻之后。当苏联准备派出军队增援埃及时，人们不禁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在家门口了。可怕的世界战争之所以没有成为

现实，其中联合国的功劳不可埋没，它在 48 小时内以闪电速度向前线派出了一支维和部队，这也是令瓦尔德海姆最为得意的一件事情。

当瓦尔德海姆接任秘书长时，中东地区就已成为一个没有一丝和平希望的战争危机策源地。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大大小小的冲突已经成为家常便饭。美国对以色列毫无保留的支持，苏联对埃及和叙利亚的大规模援助，所有这些使得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地区发生直接冲突成为可能。

1973 年初，战争的阴云再次在中东地区层层密布。1 月份，阿拉伯国家共同防御委员会在开罗召开会议，会议指派埃及在对以战争中担任主要角色，确定了战争预算，并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讨论中东形势问题。这无疑是阿拉伯世界试图在联合国控制下走谈判之路来收回被以色列占领土地的最后一次努力。但最终在 6 月召开的安理会会议未能实现他们的愿望。安理会要求以色列退出所占土地，与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签订和平条约，由于美国的否决，这项决议没有通过。

埃及外长向瓦尔德海姆表示，假如联合国安理会再也没有能力作出任何建设性决议的话，埃及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只能采取别的措施。瓦尔德海姆感到，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便迅速通告了以色列和美国，但这两国均不相信埃及会“策划一场新的战争”。随着局势的日益紧张，瓦尔德海姆于 1973 年 8 月作了一次中东之行。他试图通过与有关政府首脑进行对话来缓和紧张气氛，为重新开始谈判创造机会，但结果却不如人意。

1973 年 10 月 6 日，在埃及总统萨达特的指令下，埃及军队沿以色列军队驻守的苏伊士运河展开了大举进攻，此次进攻事先经过了几个月的准备，时间恰恰选在犹太人最盛大的节日——赎罪日。空袭警报传来的时候，以色列的城市街道上空无一人，教堂里却人山人海，前线的以色列士兵正在休假，对埃及的进攻毫无准备，因而遭到重创，不得不撤离苏伊士运河驻地。几乎与此同时，叙利亚军队在戈兰前线燃起了对以色列进攻的战火。第四次中东战争由此爆发了。

战争爆发的消息迅速传到了纽约联合国总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请求瓦尔德海姆劝说叙利亚和埃及保持冷静，特别是当时与美国没有建交的叙利亚。到纽约来参加 1973 年联合国大会的各国政府首脑也一致请求安理会采取措施，敦促战争各方实现停火。但这又谈何容易。埃及认为，以色列有义务退回到 1967 年“六日之战”以前的停火线上，并归还所占领的土地。以色列则要求埃及回到苏伊士运河西岸。两个超级大国也心有所属，美国支持以色列，苏联支持埃及，战争升级为超级大国之间对抗的危险性不容忽视。

瓦尔德海姆对安理会陈述了他的忧虑，请求安理会采取行动。为使自己的呼吁进一步受到重视，他还分别致函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美国总统尼克松：“我坚信，自己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有义务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为阻止战争升级作出努力，并促使冲突各方最终公平、持久地解决问题。在完成这两个目标的过程中，您的政府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这两封信就如同水滴撞在了烫石头上，未能发挥应有的效用。

战争局势出现了变化。以色列人一旦从运河驻地被占领后的震惊状态下摆脱出来，便全力发起了反攻。美国通过空中桥梁为以色列运来了各种军事装备，在美国帮助下，以色列军队重整旗鼓，越过了苏伊士运河，试图将向西奈进发的两万名埃及士兵切断并歼灭。战争的风向迅速转向了有利于以色列的一边，埃及有很大一部分军队陷入了困境。外交活动的契机又出现了。

10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338号决议，要求交战各方在12小时之内实现全面停火，在停火后立即开始全面执行安理会242号决议，并开始谈判。

现代战争有它自己的特点。在没有哪一方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实现停战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在12个小时之内，埃以双方又一次交火。规定的实现停火期限过去了，武器却依然没有归于沉默。10月23日，安理会通过339号决议，再次要求双方立即停火，并敦促双方军队回到停火生效时的战线。决议还要求秘书长采取措施，立即派遣联合国观察员监督双方部队实现停火。10月24日夜，美国军队进入了战备状态。10月25日，安理会再度通过340号决议，决定建立一支由常任理事国以外的会员国派

出人员组成联合国紧急部队，派往中东监督停火。

莫斯科和华盛顿的穷兵黩武致使整个世界陷入恐慌。经过几百个小时的外交斡旋，这场国际危机终于得到了缓和，美苏之间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得以避免。但交战双方的敌对状态仍在继续，埃及第三军团无粮少水，面临被以色列歼灭的危险。

在紧急情况下，瓦尔德海姆决定将在塞浦路斯驻扎的联合国部队派往埃以前线。10月26日晚，他向安理会报告说，这支由奥地利人、芬兰人和瑞典人组成的联合国部队已经到达埃及，并将于第二天早上在前线驻扎。这支部队从接受命令到完成转移，只用了不到30个小时的时间，这就是那次令瓦尔德海姆无比得意的“闪电行动”。

紧张的外交努力终于有了结果。10月27日，埃及接受以色列建议，同意进行直接军事对话。对话在联合国的引导下展开，双方将就停火的具体条件进行协商。联合国还将与红十字会一道，处理关于埃及第三军团的事宜。此时的联合国面临着重大挑战，不但要派驻维和部队，还要引导双方进行军事对话和展开救援行动，所有这些需要强大的组织和经济投入。

10月27日，瓦尔德海姆提请安理会建立一支紧急部队，并就部队的任务、规模作了详细说明。11月2日，安理会作出决定，由瓦尔德海姆说服加纳、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巴拿马、秘鲁、波兰、加拿大七国，派遣部队前往中东，联合国紧急特别部队宣告成立。这是继1967年的“六日之战”前联合国紧急部队撤离后，联合国又一次将其蓝盔部队派驻战争前线。11月15日，紧急部队接管了以色列在运河边上的检查站。

瓦尔德海姆坚持将联合国军队置于秘书长领导和安理会控制之下，以便使之拥有绝对的行动和通讯自由，相对于交战各方部队保持独立。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联合国部队一直监督着阿以双方的裁减军备和缩减军队的工作，还与红十字会一道参与了交换战俘和遣返难民等人道主义行动。

1973年12月21日，日内瓦和平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是由苏联和美国提议、在联合国的领导下进行的，由瓦尔德海姆负责召集并出任会议主席。尽管在召集会议过程中困难重重，但瓦尔德海姆坚信，由两个超级大国参加的中东会议比任何谈判都能提供更好的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会议决定建立军事工作小组，具体讨论埃以部队脱离接触的问题。经过积极工作，埃以双方于1974年1月18日签署了第一个脱离接触协议，规定在双方之间建立缓冲区，由第二支联合国紧急部队驻扎，并要求以军从西奈半岛部分撤离。1975年9月4日，双方第二个脱离接触协议签定，该协议规定建立一个由紧急部队控制的较大的缓冲区。以军完成了撤离西奈半岛的第二步。

叙利亚前线战事的谈判进展较慢，直到1974年5月才达成停火协议。以

色列和叙利亚同意，在双方军队之间的缓冲地带驻扎一支联合国观察部队，以监督双方军队撤离。这支军队由奥地利人、加拿大人、秘鲁人和波兰人组成，于1974年6月初进驻戈兰高地。随着它的到达，前线的一切战事都停止了。瓦尔德海姆亲临这里，他高兴地看到，自己的奥地利同乡正坚守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前沿阵地上。

1977年初，中东地区的政治气氛发生了重大变化。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卡特称，他将努力拉开中东和平的序幕。同时有迹象表明，阿拉伯世界开始以比较现实的眼光来看待与以色列的冲突问题。在这种气氛下，瓦尔德海姆又作了一次中东之行。此行的印象是，阿拉伯一方虽开始希望通过谈判实现和平，但以色列在全部撤军和与巴解组织对话问题上的态度仍有待改变。

以后的一些年中，在美国总统卡特的积极努力下，埃以之间签定了戴维营协定。1979年3月，埃以和约签定，和约宣布结束埃以两国之间历时30年之久的战争状态。这无疑是这两个民族在通往和解之路上的重要进步。联合国及联合国派出的两支维和部队对结束中东战争、稳定这一地区的局势显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黎巴嫩危机——一场非同寻常的挑战

中东地区一触即发的不稳定局势早已成了联合国的负担，但在瓦尔德海姆任期的十年内，这种形势表现得尤为突出。先是1973年的十月之战，紧接着又是日趋紧张的黎巴嫩局势。

黎巴嫩危机是瓦尔德海姆在任期间遇到的最大的、最非同寻常的挑战之一。黎巴嫩是一个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人们和平共处的国家，但自1975年以来，却成了上演战争悲剧的舞台，黎巴嫩的两个邻国也陷入了这场悲剧之中无法自拔。

1978年3月，巴勒斯坦游击队袭击了以色列，有38名以色列公民不幸丧生。以色列军队于14日夜大举入侵黎巴嫩，占领了黎巴嫩5300平方公里的土地。

3月19日，联合国安理会在425号决议中，要求以色列尊重黎巴嫩在国际公认的边界内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并要求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巴嫩。同时，安理会还决定组织一支联合国临时部队，由奥地利、荷兰、伊朗、法国、加拿大等国组成，负责重建这一地区的和平。这支部队不仅要与对立双方打交道，还要对付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以及武装民兵组织之间的冲突。这支部队的任务是，保证以色列军队撤离、帮助黎巴嫩政府重树威信、防止战事再生。

在黎巴嫩危机期间，瓦尔德海姆一直与交战国的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保持着个人联系。1978年4月，联合国维和部队到达黎巴嫩后，瓦尔德海姆来到了战争前线，与黎巴嫩总统萨基斯、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进行了会谈。

从中东回来后，瓦尔德海姆派副秘书长罗贝托·圭尔主持交战各方的谈判。6月13日，在联合国的压力下，以色列军队撤离了黎巴嫩南部。

在秘书长任期的最后一年，瓦尔德海姆还准备为维持黎巴嫩和平再作一些工作。1981年4月，黎巴嫩再次出现暴力狂潮。以色列人开始对位于东黎巴嫩的叙利亚地对空导弹和南黎巴嫩地区的巴勒斯坦营地发动空袭。瓦尔德海姆受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委托，负责劝说巴解组织同意停火。这项工作是通过两个不同渠道展开的。在纽约，他们做巴解组织驻联合国观察

员的工作，在黎巴嫩，联合国维和部队司令官开始与阿拉法特会谈。不久以后就有了结果。阿拉法特表示接受停火建议，两天后，以色列人也同意停火。

但黎巴嫩的和平如同过眼云烟，转瞬即逝。1982年6月，以色列再次入侵黎巴嫩，战争开始刚几个小时，以军就占领了联合国维和部队控制的区域。随后以色列军队又进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并引发了一连串的悲剧事件，不过，这已是瓦尔德海姆卸任之后的事了。

塞浦路斯——“一匹不肯饮水的马”

自从1964年联合国第一次向塞浦路斯派驻维和部队以来，它就对这里负有了特别责任。居住在塞浦路斯岛上的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之间的冲突无休无止，只有联合国才有能力为他们架起和解的桥梁。

1960年独立的塞浦路斯共和国成立。根据塞浦路斯独立前分别同英、希、土签订的协定，塞浦路斯的独立由这三国保证。建国后不久，这座错综复杂的共和国大厦就开始坍塌了。1963年末和1964年初，国内的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之间爆发了战争，并牵涉到希腊和土耳其政府。战争结果是，土耳其族人离开了中央政府，建立了自己的民族组织。联合国安理会作出决定，组建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并赋予它以下使命：阻止战火复燃，为维护法律和秩序作出贡献。

两族人在联合国秘书长和其他有关方面的推动下，进行的第一轮对话开始于1968年，1971年会谈破裂，到1972年瓦尔德海姆接替秘书长职位时，会谈又重新开始。瓦尔德海姆派副秘书长，阿根廷外交家罗贝托·圭尔前往塞浦路斯。圭尔回来汇报说，情况虽有一些进展，但土耳其族人要求地方自治，希腊族人则担心国家分裂，这两者之间的鸿沟还是无法逾越。这期间，由于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的政策明显变得强硬。塞浦路斯的局势又趋于尖锐化了。随着希腊国内发生军事政变，希腊政权由军人政府把持，希土两族人的矛盾更加尖锐。

1972年1月，当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从捷克斯洛伐克引进武器之后，岛上的局势愈发紧张。联合国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与磋商，在3月决定，将总统的武器送进仓库保管。瓦尔德海姆本人还在6月来到塞浦路斯，与两族的领导人进行了交谈，劝说他们停止冲突，直接对话，还去视察了维和部队的驻地。

1973年，岛上的局势进一步恶化。8月，瓦尔德海姆借中东之行之便再次前往塞浦路斯，与总统马卡里奥斯就岛上局势进行了详细交谈，但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在以后的几个月，希腊族人中的不安定因素仍在增长，甚至有传言说他们要发动政变。1974年7月，马卡里奥斯指责希腊军事政权企图阴谋颠覆塞浦路斯政府，并妄想谋杀他本人。7月15日，一批主张与希腊合并的军官发动了反政府军事政变，马卡里奥斯政府被推翻了，桑普森出任塞浦路斯总统。瓦尔德海姆向安理会发出了警报，并呼吁希腊和土耳其两国保持冷静。马卡里奥斯逃离了塞浦路斯，于7月18日到达纽约，到联合国总部拜会了瓦尔德海姆，向他描述了出逃的情形。

在希腊军政权控制塞浦路斯政府后，7月20日凌晨，土耳其政府以保护塞浦路斯土族人为名，派军队兵分海、空两路，向塞浦路斯北岸发起了大规模的登陆行动，并占领了基里尼亚周围地区。土耳其的入侵打乱了安理会的部署。瓦尔德海姆呼吁交战双方立即停火，从岛上居民的利益出发，与联合国维和部队进行合作。果然，7月22日双方停火了，但监控停火状况仍是一

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雅典军政府被推翻后，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紧张状态有所缓和。那段时间里，联合国无意之中成了塞浦路斯这个“孤儿”的监护人。安理会要求英国、希腊和土耳其这三个保护国，在塞浦路斯帮助重建和平，组织符合宪法的政府。三国代表在日内瓦集会时，瓦尔德海姆来到这里，以便与三国外长建立个人联系。8月14日，土耳其军队继续向塞浦路斯进攻，日内瓦会议破产了。

1975年2月，情况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鉴于长期谈判都没有任何结果，土耳其族人在塞岛北部宣布成立“塞浦路斯土族邦”，组成了自己的政府、立法机关和相应的法律机构，塞浦路斯岛上一时形成了南北对峙、各自为政的局面。安理会委托瓦尔德海姆敦促两族人重新开始谈判。

1975年5月至1977年5月，在瓦尔德海姆主持下，希族与土族代表举行了6轮谈判，联合国大会几乎每年都审议塞浦路斯问题并通过决议，安理会也常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同时瓦尔德海姆本人还多次提出建议和解决方案。他与塞浦路斯事件的最后一次联系是，提交给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双方领导人一份关于谈判状况的报告，并就制定新宪法和建立宪法机构提出了一些建议，但这些建议就像以前所作的那些工作一样收效甚微。

十年的时间里，瓦尔德海姆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努力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寻求一条出路，但结果却令人失望。他不得不承认，到他离任的时候，塞浦路斯的状况与他开始工作时并没有什么两样。他只能这样为自己解释：“当对立双方根本不准备和解时，联合国秘书长的权力不会比理智的声音影响更大。联合国是唯一有能力将对立双方拉向谈判桌的机构，但是，人们可以把马牵引到水边，却无法强迫它去喝水。”

尽管如此，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工作也不能算完全失败。维和部队多年来始终把两族之间的冲突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在恢复秩序、保障生产、重建贸易方面功劳不小。当然他们没能阻止战争的发生，但如果没有他们，这个小岛将会长时间地动荡下去，这种岛内冲突还有可能导致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

非洲问题——任期内始终面临的难题

联合国成立以来，有一百多个国家获得了独立，它们加入了联合国，改变了这个国际组织内部的结构组成和力量对比。瓦尔德海姆在任期间，没有一天不在面临着南北冲突以及非洲问题的挑战。非洲问题成了联合国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1945年只有4个独立的非洲国家，到1970年已经上升到42个。在瓦尔德海姆任期内，又有9个非洲国家加入了联合国，其中包括原为葡萄牙殖民地、1980年获得独立的津巴布韦。80年代，欧洲国家对非洲的殖民统治已经成为过去。只有在非洲大陆的南端遗留下来了两个大问题：纳米比亚的独立和南非的种族隔离问题。

1974年7月，葡萄牙通过了新宪法，对葡属非洲殖民地的地位作了修改。应新总统斯皮诺拉将军的邀请，瓦尔德海姆前来里斯本访问。他趁此机会与葡萄牙领导人就起草将其殖民地移交给非洲独立运动的行动计划问题进行了探讨。葡萄牙人表现出了非常合作的态度，他们采纳了瓦尔德海姆的建议，就行动计划达成了一致，承认了所有殖民地的独立和自决权。1974年9月7日，葡萄牙与莫桑比克解放组织的代表签署了协议，规定第二年的6月份将自主权交还莫桑比克。莫桑比克新当选总统对瓦尔德海姆在签署协议方面所

作的工作以及他在里斯本为莫桑比克争取到的利益表示十分感谢，瓦尔德海姆则把这一成就归结为葡萄牙人的合作态度。

在非洲其他的葡属殖民地，特别是安哥拉，情况就非常难办了。那里形成了三个不同的解放运动组织，它们是：得到大多数非洲国家、非洲统一组织和苏联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扎伊尔、刚果支持下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得到南非及西方支持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当葡萄牙军队开始撤军的时候，这三个组织之间的关系恶化了，葡萄牙政府不知道该把权力移交给谁。1975年1月，葡萄牙与这三个组织签定协议，承认他们是安哥拉人民的合法代表，在保持国家不分裂的情况下组成过渡政府并举行选举，葡萄牙军队将在一年之内撤离。但不久以后，三个解放组织之间便爆发了内战。1975年8月，葡萄牙人告诉瓦尔德海姆，不久前的协议已经失去效用了，他们建议，由联合国接过对安哥拉的控制权。瓦尔德海姆仔细阅读了有关宪法条款后得出结论，没有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的许可，联合国不能行使这种权力，而鉴于以前联合国卷入刚果危机后的教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是不会同意再去作这样的冒险的。随后，美国、南非、苏联、古巴纷纷卷入安哥拉冲突之中，安哥拉战乱国际化了。最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组织在古巴军队帮助和苏联支持下接管了政府。

南非的状况仍然没有什么改观，这里仍是强大、富裕、顽固的白人少数派的统治堡垒。瓦尔德海姆当选秘书长时，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已对此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由于西方大国不准备直接采取更强手段，因而对南非当权者没有产生丝毫影响，种族隔离状况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痼疾。联合国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唯一可行的办法便是：向比勒陀利亚施加压力，进行持久的说服教育工作，同时继续争取西方国家对消除种族隔离行动的支持。

年复一年，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措施的强度越来越大。1973年初，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压制和惩处种族隔离犯罪的国际公约，公约于1976年生效。1974年，联合国又采取了一项颇有争议的措施，在公证委员会的帮助下将南非排除在联合国大会之外，而将得到非洲统一组织认可的南非解放运动接纳为联合国观察员。1976年，联合国大会更通过一个行动计划，进一步将南非政府排除在联合国之外。1977年，安理会召集了一次反种族隔离世界大会，决定对南非实行强制性武器禁运，规定所有国家立即停止向南非提供任何武器和一切有关物资。1981年，在瓦尔德海姆的任期接近尾声时，联合国大会又将这一年定为制裁南非国际行动年。所有这些行动和措施虽然没有在反对种族隔离之战中产生任何实际效用，但联合国日积月累的不懈努力已使得国际社会将注意力逐渐转到了这一问题上。

瓦尔德海姆本人与南非政府的交往较少。有一段时间，瓦尔德海姆与纳米比亚问题的联系十分密切。尽管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撤销了南非的席位，但纳米比亚仍被南非占领。1972年3月，瓦尔德海姆访问了南非。南非总理约翰·福斯特表示：“如果联合国秘书长是为探讨黑人自治的问题而来，那么他能够找到谈话伙伴，因为这符合我们的政策。但如果他来当南非统一组织中激进分子的传声筒，那么这无疑是在浪费时间。”南非政府的这种态度明显预示着，会谈将不会有结果。

瓦尔德海姆此行还去了纳米比亚。他来到与安哥拉接壤的纳米比亚北部，会见了该国最大部族的代表。那里与南非军队的冲突不断，气氛十分紧张。

张，双方对未来形势的发展都持不肯定态度。另外，瓦尔德海姆还不顾自身安危，秘密来到了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下榻一家不知名的小旅馆，在飞机场的一间候机室里与 20 多个部族的代表进行了会谈。他们中有不少人是从边远地区专程赶来拜会联合国秘书长的，其态度之诚恳令瓦尔德海姆深深感动。

在与南非总理福斯特和外长穆勒再度会谈后，瓦尔德海姆回到纽约，他向安理会建议，指派一名特别代表前往纳米比亚。安理会授权他指定人选。在一个个的人选均遭南非拒绝之后，南非最终接受了前瑞士驻维也纳大使阿尔弗雷德·埃舍尔，同意由他作为联合国特别代表前往纳米比亚。

但埃舍尔此行的结果却令人失望。他得出的纳米比亚人希望国家独立的结论未被南非接受，而他自己却由于对非洲问题缺乏了解，竟鬼使神差地同意了南非的设想，在纳米比亚开始行使自主权之前先实行地区自治，这实际上与南非政府实行的种族家园政策别无二致。埃舍尔的这一作法显然走向了联合国初衷的反面，意味着联合国支持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事情到了这一步，联合国内部反响极大。瓦尔德海姆事先就知道，埃舍尔并不是一个适合的代表，故而从联合国秘书处为他指派了一名聪明能干的特别顾问，但仍未能阻止这种结果的产生。

由于用人不当，瓦尔德海姆与安理会之间产生了点不愉快。他于是又亲自出马，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与非洲代表的会谈中去了。他还说服对埃舍尔的失败耿耿于怀的安理会，继续与南非会谈。以后的几个月中，日内瓦和纽约的谈判桌上争吵不断，但却毫无进展，失望的非洲统一组织指责联合国是一只“没牙的叭喇狗”，要求立即停止与南非的谈判。以后的几年情况仍没有好转。1977 年底，南非政府甚至又创建了三个种族家园。

瓦尔德海姆和联合国仍在苦苦寻求纳米比亚独立之路。安理会 1976 年 1 月 30 日通过的 385 号决议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决议要求南非允许纳米比亚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自由选举，从纳米比亚撤军，将控制权交给纳米比亚人民的独立政府。1977 年初卡特上台不久，局势明显好转了。安理会的五个西方成员国加拿大、法国、联邦德国、英国和美国组成了联络小组，以便与南非和联合国共同探讨，如何在 385 号决议基础上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

联络小组的工作为进行之中的谈判注入了新的活力。1978 年 4 月 10 日，联络小组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建议，指出纳米比亚独立的关键在于，将纳米比亚作为一个政治整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由选举。安理会接受了这一建议。

8 月，在五国联络小组方案的基础上，瓦尔德海姆向安理会提出了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计划，主要内容包括：派遣以秘书长特别代表为首的“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去纳米比亚监控选举，撤走驻在纳米比亚的南非军队，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统治。9 月 29 日，安理会通过 435 号决议，批准了瓦尔德海姆的这项计划。纳米比亚的自由大选似乎指日可待了。

希望过后便是失望。南非政府又提出一个又一个的理由，为纳米比亚独立设置了重重障碍。瓦尔德海姆又派代表团来到比勒陀利亚。在与南非高层官员进行了长时间会晤之后，代表团得出结论，问题的主要障碍来自于南非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状况。在瓦尔德海姆的组织下，由南非和其他所有有关组织参加的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南非人对联合国颇有微词，他们借口说，只

要联合国的工作存在不公正之处，纳米比亚独立的日期就永远无法确定。瓦尔德海姆只好失望地离开了日内瓦。

此后，435号决议成了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基础。为促进这一决议的执行，联合国大会要求会员国断绝与南非的一切关系，建议安理会对南非实施全面性强制措施。但由于南非拒不执行联合国决议，纳米比亚问题依然不见曙光。到瓦尔德海姆离任时，南非仍然是非洲大陆的主要危机所在。但瓦尔德海姆坚信，种族隔离政治有朝一日终将灭亡。

联合国的行动有力地支持了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使南非政府陷入了倍受国际社会谴责的困境之中。到80年代中期以后，南非问题逐渐有了突破。瓦尔德海姆在此问题上费尽心血，四处奔走，还是给国际社会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非洲问题上令他聊以自慰的是，通过积极工作，他将津巴布韦引上了独立之路。

历险德黑兰——一次对勇气和外交技巧的考验

1979年最后一天的夜里，瓦尔德海姆带领一个由身边工作人员组成的小型代表团从纽约出发了。

两个月前的11月4日，伊朗首都德黑兰的革命学生冲入美国驻伊朗大使馆，逮捕了使馆工作人员和职员共计54人，并将这些人当作人质扣押在使馆里。国际法上规定，外交人员的豁免权和外交使馆的治外法权是不容侵犯的，因而，这次行动是对国际法的一次公然违背。

当时的伊朗，正处在伊斯兰革命的狂热气氛之中，前国王巴列维已经逃离伊朗，政权由宗教领袖阿叶特拉·霍梅尼把持。巴列维已身患重病，正在开罗、美国和巴拿马轮流避难。多年来他一直是美国忠实的盟友，现在美国决定以忠实回报忠实，因而既不准备将这位被罢黜的君王引渡给伊朗革命政府，又不同意将他的银行存款归还伊朗，而以上两条正是伊朗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标。鉴于美国的这种态度，此次学生冲击美国大使馆和绑架外交人员事件便是伊朗旨在迫使美国答应自己要求的一次强制性措施。

美国向安理会提出要求，确保伊朗释放人质并交还美国使馆。安理会开会重申，所有国家都有义务尊重外交人员的权益不受侵犯，要求伊朗立即释放人质。11月29日，美国向国际法院对伊朗提起诉讼。12月15日，国际法院通过一项决定，命令伊朗立即释放人质，并向美国交还使馆房屋。

但是，美国、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法院的一切促使伊朗释放人质的努力都于事无补。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人质的生命也日益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瓦尔德海姆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亲往德黑兰，探寻伊朗真正的权力中心，以期就人质问题与伊朗达成协议，为解决这场危机作出努力。

此行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行前同伊朗进行的所有沟通和谈判都表明，他们眼前的任务异乎寻常地艰难。瓦尔德海姆一行先由纽约飞抵巴黎，在机场旅馆里过了一夜，他们的心情就如同冬天的夜晚，忧郁而迷茫。法国总统德斯坦通过电话预祝他们一路顺风。临近午夜时分，瓦尔德海姆同纽约和维也纳的家人通了话，互祝新年快乐。女儿丽泽洛特说父亲的声音听起来十分忧虑，第二天，他们就这样忧心忡忡地踏上了前往德黑兰的行程。

1980年元旦的那一天，瓦尔德海姆一行的飞机降落在德黑兰附近的梅拉巴德机场。伊朗外长高特布扎德前来迎接，他的表情看起来十分不安，这让瓦尔德海姆感到，自己的到来似乎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最为引人注意的是，

外长将衣领敞开着，没有系领带，这种装束在当时的伊朗相当时髦，是支持革命的标志。

在进城的路上，高特布扎德告诉瓦尔德海姆，德黑兰的局势很不稳定，这实在不是一个访问的好时机，“我们在公开场合必须避免给人造成您是为了释放人质前来谈判的印象。我请求您跟别人说，您这次带来的是一个考察团，而不是为了什么人质。我们将向您展示巴列维政权的残暴，伊朗秘密警察的滔天罪行，以及伊朗人民所遭受的苦难。鉴于形势的高度紧张和人民的极度敏感，再加上美国大使馆里好战的伊朗学生，我们必须格外小心。”这番话一方面说明，外长本人的地位很不稳定，自身难保，另一方面也预示着，等待着瓦尔德海姆的将是一次危险的行程。

德黑兰的大街上随处可见激奋的人群，不时还会传来枪声。瓦尔德海姆下榻的希尔顿酒店戒备森严，他 1978 年来访时与巴列维握手的照片赫然报上，伊朗人把他当成了美国人的一只延长了的手臂，当成了巴列维的帮凶，学生们甚至断然拒绝他与人质见面。

在与伊朗外长会谈的过程中，瓦尔德海姆转达了由美国人起草的四点建议，内容包括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以及伊朗应在此之前或者至少与此同时释放人质。瓦尔德海姆强调说，伊朗如果想通过向美国法庭起诉来要回前国王财产，则美国不会对此制造任何障碍，然而，美国绝对不会同意将巴列维交还伊朗。

这些建议遭到了伊朗外长的拒绝，“美国人作事不能总像个被宠坏的孩子”，他坚持联合国大会必须就引渡巴列维和归还财产问题通过决议，只有当美国同意了这些要求时，人质的获释才会成为可能。瓦尔德海姆与高特布扎德之间的谈判困难重重。

伊朗政府为瓦尔德海姆安排了两次活动：到伊朗革命烈士公墓敬献花圈和参观以前的军官俱乐部。

行前，高特布扎德急匆匆地来到酒店，说他得到可靠消息，特务正在策划一次谋杀瓦尔德海姆的行动。他建议瓦尔德海姆放弃参观计划，因为人最好不要跟命运对着干，但瓦尔德海姆坚持按原定日程行事。他试图通过向伊朗人民作出同情表示，赢得他们的好感，冲破目前这种被孤立起来的状况，从而减轻谈判中的压力。抛开这一目的不谈，他这次来到德黑兰，也不想成日呆在旅馆里。

一切都照原计划进行。当瓦尔德海姆乘坐的直升飞机靠近公墓时，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等待着他的到来。飞机降落后，他们坐上了汽车，驶向几百米之外的目的地。但是，还没走多远，人们就一窝蜂似地冲过来围住了汽车。有人爬上车顶用拳头狠砸，还有人透过窗玻璃用变形的脸对着他们怒目而视。这真是一幕令人难以想像的混乱场面。瓦尔德海姆企图下车，安抚一下人群的情绪，但身边的保镖又把他压回了汽车后座。看起来是没有希望逃脱这场灾难了。多亏伊朗司机技术高超，驾车突破重围，在公墓和飞机场之间疯狂地奔驰，才让他回到了直升飞机上。愤怒的人群在后面追逐，试图阻止飞机起飞，但在人群到达之前，飞机刚好上了天。好玄哪，差一点就身陷其中，再也回不了纽约和维也纳了。

逃离机场后，瓦尔德海姆立即返回伊朗外交部，他不想给伊朗人造成这种印象，认为自己迫于来自街头的压力而把谈判任务放到一边。见到高特布扎德时，他原以为，自己会听到外长为伊朗政府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而致

歉的声音，但听到的却是这样的揶揄：“怎么样，您的这次经历一定相当有意思吧！”

伊朗革命委员会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在国际调查委员会组成之前决不释放人质。但在高特布扎德帮助下，瓦尔德海姆还是与人质中的三位美国外交官见了面。

下一步行动计划是参观德黑兰的前军人俱乐部。瓦尔德海姆进入一间快要挤破了的大厅，来到一个临时搭就的看台前。他看到，看台上有许多缺胳膊少腿或是眼盲的残疾人，有大人也有孩子。这些人拄着拐杖，坐着轮椅依次登上看台，向人们展示他们残缺的肢体，诉说他们在生理及精神上的痛苦。一个男人带着他5岁大的小儿子来到瓦尔德海姆面前，告诉他说，是秘密警察砍掉了孩子的双臂，以便从他哥哥口中榨出他们需要的口供。这样的场面真是触目惊心，但瓦尔德海姆后来却从高特布扎德那里听说，这孩子其实是一次交通事故的牺牲品。

就在从军人俱乐部回来的那天晚上，高特布扎德终于为瓦尔德海姆安排了一次同伊朗革命委员会成员的会面。有人用车载着他与随行人员穿过夜幕中的德黑兰市区，来到一个黑漆漆的大院门口。一队荷枪实弹的壮汉来到他们面前，簇拥着他们穿过了大门。里面的建筑物一片漆黑，看上去像是一座废弃不用的堡垒。他们被移交给一队革命政府的士兵，袖珍电筒照亮了前面的道路，有人甚至用电光直射他们的脸。对于一个受成员国正式邀请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来说，这无论如何是一桩令人难堪的事情。

经过重重审查，眼前终于灯光大亮，瓦尔德海姆认了出来，这原来是他两年前在完全不同的待遇下曾经来过的参议院大楼。伊朗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就在他的面前。瓦尔德海姆等人被指令坐在下首的一张小桌子前，像是法庭上的被告。

会谈并没有带来什么令瓦尔德海姆高兴的结果。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们依然坚持认为，是美国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伊朗在国际法上的权益，在任何情况下，将巴列维交还伊朗都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声称，在组成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之前，再讨论释放人质问题无异于浪费时间。瓦尔德海姆想拜会阿叶特特拉·霍梅尼的要求也遭到了拒绝。

鉴于伊朗政府无可挽回的态度，瓦尔德海姆一行于第二天失望地离开了德黑兰。当然，他本来也没有奢望乘坐满载人质的飞机凯旋而归。在德黑兰短短的三天时间里，他们经历了一系列不愉快甚至胆战心惊的事情。但与此同时，他也有机会通过第一手材料了解伊朗革命委员会的意见，洞察伊朗国家大权的真正所在。瓦尔德海姆虽未能将美国政府的四点计划付诸实施，但却了解到，伊朗政府首脑对于释放人质的前提要求是组成国际调查委员会。他在德黑兰收集的情况实际上成了导致人质问题最终解决的出发点。

德黑兰之行无疑是瓦尔德海姆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最不同寻常也最印象深刻的一次经历。他也不由得发出感叹，秘书长的职权是多么的有限！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和道德责任，但却不拥有行政权限，他可依赖的只有外交技巧和信念的力量。看来，只有在受到各成员国政府的尊重和重视时，秘书长的努力、联合国的宪章和国际法的准则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解救人质——尽心尽责解决危机

回到纽约之后，瓦尔德海姆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之中。美国政府在听取了瓦尔德海姆对德黑兰情况的介绍之后认识到，缓解危机的唯一出路在于组

建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而这便成了瓦尔德海姆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

两天后，瓦尔德海姆飞赴华盛顿，与卡特及其他政府官员共商计策。在会谈过程中，他发现，尽管自己的描述已足以惊心动魄，但美国领导层还是低估了德黑兰的紧张局势。卡特此时还在坚持这样的立场，绝不引渡在巴拿马身患重病的巴列维，而且，假如巴拿马政府欲向伊朗交还巴列维，他反而会邀请这位前国王到美国来。卡特还决定，要提请安理会对伊朗进行制裁。

安理会准备在 1980 年 1 月 11 日开会讨论对伊朗的制裁问题。就在这天早上，伊朗政府驻联合国代表带来了德黑兰改变态度的消息：霍梅尼同意，人质可以在美国交还巴列维及其财产之前得到释放，前提是尽快将国际调查委员会派往德黑兰。会议终于还是于 1 月 13 日召开了。此次对伊朗进行制裁的议案虽然得到了大多数成员国的支持，但却遭到了苏联的否决。

对伊朗的制裁没能成功，伊朗人对美国的态度却更加强硬了。美国人至此已不再坚持，在组成调查委员会之前至少是与此同时释放人质，他们同意，调查委员会以考察团而不是以法庭的身份前往德黑兰。此外，美国人还委托了一名法国律师和一名阿根廷商人前去调停，这两人均与霍梅尼有着密切的私人交往，但他们的努力也未能取得任何结果。这一作法令瓦尔德海姆十分不快，他不禁产生了一种被人替代的感觉。后来，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表示，“我们永远感激瓦尔德海姆所给与我们的支持”，但这种狡兔三窟的作法仍令他久久不能释怀。

瓦尔德海姆还是以大局为重，一如既往地尽职尽责。2 月 20 日，他按原计划宣布组成国际调查委员会，并公布了委员会此行的使命：“委员会将以考察团的身份前往伊朗，听取伊朗人的抱怨，尽快解决美伊之间的这场危机。委员会应在一周之内结束考察，但在人质被释放或至少从学生手中移交给政府之前，委员会报告不得发表。”接着，他宣布了委员会的五人名单，五个成员分别来自委内瑞拉、阿尔及利亚、叙利亚、斯里兰卡和法国。同一天，五人代表团飞赴日内瓦，三天后启程前往德黑兰。

代表团还在途中的时候，瓦尔德海姆从德黑兰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霍梅尼把对人质命运的决定权交给了尚未举行成立大会的伊朗议会。这对联合国和瓦尔德海姆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挫折。

调查委员会到达德黑兰后，与伊朗政府进行了第一次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霍梅尼并不认为释放人质与引渡巴列维之间存在任何直接联系，议会方面至少要拖到 4 月份才会考虑释放人质的问题。由此，委员会的成员感觉自己像是一个被人操纵的木偶，无法发挥真正的作用。伊朗学生又突然要求委员会对人质进行不折不扣的审讯，这当然遭到了他们的拒绝。3 月 10 日，伊朗电台又以霍梅尼的名义要求委员会发表公开声明，揭示巴列维的罪行和美国长期干涉伊朗内政的历史，并表示，只有当这一声明被伊朗人民接受时，委员会才会被允许去探访人质。伊朗外长高特布扎德希望瓦尔德海姆能够说服委员会，接受霍梅尼的条件，但瓦尔德海姆表示这绝对不可能。费力而又徒劳的释放人质的努力终于接近了尾声，委员会于 3 月 12 日返回了纽约。

瓦尔德海姆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与伊朗政府重建联系。当 5 月 8 日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下葬时，他与伊朗外长在贝尔格莱德会面，两人达成一致，再派已经失败的调查委员会中的一名成员重返德黑兰。于是，叙利亚人阿蒂伯·达乌迪又回德黑兰呆了三个星期，但他的一切努力也都没有结果。

1980 年 5 月 24 日，国际法院最后判定伊朗违背了国际法原则，要求伊

朗立即释放并遣返美国人质。此后，安理会就此问题一再进行审议，并决定，如果伊朗不遵守安理会的要求，将对其实行经济制裁。但伊朗拒不执行并公开反对国际法院的命令。联合国和瓦尔德海姆在此问题上终于无计可施了。

为了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以和平的方式使人质得以释放，卡特策划了一次特别营救行动，但这次行动由于沙暴天气的影响而失败了。命运没有赋予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

身患癌症的巴列维 1980 年 7 月 27 日病逝于开罗。随后，9 月 22 日伊拉克向伊朗发动进攻，两伊战争的漫长悲剧上演了。伊朗总理穆罕默德·阿里·拉贾伊来到纽约，在联合国谴责了伊拉克对伊朗的侵略，但却没能引起任何同情，他不由得抱怨联合国不主持正义。瓦尔德海姆向他解释说，只要伊朗把持着人质不肯放手，它就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同情。拉贾伊回到德黑兰，并带回了明确的信息：人质事件先得有个完结，然后，伊朗反对伊拉克入侵的呼声才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共鸣。人质事件由此终于出现了转机。

拉贾伊向霍梅尼力陈解决人质问题的紧迫性，终于说服他与美国进行谈判。他们选择阿尔及利亚作为中间人。在没有联合国介入的情况下，美伊两国作出了复杂的安排，以调整双方的经济要求。双方的诸多权利义务均在国际法院主持下予以讨论。

1981 年 1 月 20 日，就在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就职宣誓的那一天，人质终于获得了释放。因为伊朗人一直坚持，绝不在卡特任职期间让人质回到美国，这是他们对于一个自身政治命运与人质命运结合得如此紧密的总统所采取的最后一次报复行为。

人质已经与家人团聚了，瓦尔德海姆却遭到了攻击。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评论员皮埃尔·萨林格称，瓦尔德海姆在与伊朗革命委员会会谈时，根本没有谈及美国的建议，没有把美国的想法准确告诉伊朗当权者。他还指责瓦尔德海姆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乱了方寸，没能按计划完成自己的使命。前总统卡特和前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当即反驳了这种看法，并公开赞扬了瓦尔德海姆在德黑兰期间表现出来的非凡勇气和外交技巧。

在整个个人质事件中，瓦尔德海姆通过亲赴德黑兰、与伊朗政治家们保持密切联系以及组建国际调查委员会，为人质的最终释放和美伊两国关系的缓和作出了贡献。

两伊战争——调解无效而忧心忡忡

1980 年 9 月爆发的伊朗和伊拉克战争虽然成了导致美国在德黑兰人质事件终结的催化剂，但是没有人想到，这场新的战争引发了多少流血事件，在战略上和经济上造成了多少世界性的损失和影响。

与大多数地区冲突一样，这次海湾战争也经过了很长时间的酝酿。伊拉克和伊朗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下游地区边界划分问题上的局部冲突由来已久。两伊在南部以阿拉伯河为界，河两岸丰富的石油资源令两国间的争吵欲罢不能。同时，两伊之间长期以来还存在着民族矛盾和教派分歧。

1974 年，伊拉克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指责了伊朗的“军事挑衅行为”。伊朗方面则声称，是伊拉克人侵犯了自己的边界。这是瓦尔德海姆任期内的首次海湾对抗，联合国的干预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瓦尔德海姆指派墨西哥人路易斯·魏克曼—穆纳斯为安理会特别代表，在他的斡旋和阿尔及利亚人的调停下，两伊答应停火撤军，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与伊朗国王巴列维还于 1975 年签署了新的边界条约。双方达成协

定，以阿拉伯河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同时，伊朗须将其境内约 300 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伊拉克。但伊朗方面并未履行这一协定。

在巴列维统治时期，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逃离伊朗后，自 1965 年起在伊拉克居住，但由于受到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逼迫，他后来只得逃到巴黎。1979 年伊斯兰革命成功，霍梅尼带着对萨达姆的仇恨回到德黑兰上台执政，决定在伊拉克发动又一场伊斯兰革命。两伊的关系迅速恶化了。

1980 年 9 月 17 日，伊拉克宣布废除 1975 年的边界条约，收回对阿拉伯河的主权。9 月 22 日，经过几周的零星冲突和强大的宣传攻势之后，伊拉克向伊朗领土发动了大举进攻，两伊战争爆发了。到 1982 年初，伊拉克占领了两万平方公里的伊朗土地。但伊朗随后发起反攻，收复了失地。此后不久双方陷入相持的僵局。霍梅尼巩固了自己在德黑兰的政权，但却无法颠覆萨达姆政权并使战火深入到伊拉克境内。同样，萨达姆虽在地面上取得了一定收益，但也无法使霍梅尼下台。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又持续了六年之久。

战争还给联合国带来了一个国际问题：有 86 艘挂有 22 个不同国家国旗的船只被困在阿拉伯河中，周围是一幅狂轰滥炸的混乱景象。瓦尔德海姆呼吁交战两国应尊重这些船只的安全权益，在它们驶离之前局部停止开火。但接下来却产生了这些船只该挂什么旗帜的问题。伊朗主张这些船悬挂联合国旗，而伊拉克则坚持让它们挂自己的国旗。

瓦尔德海姆认为，安理会费尽周折进行公开谈判并不能解决问题，当务之急是需要有一个持中立立场、有较高政治级别的中间人进行尽可能私下展开的耐心调解，他将这一使命交给了瑞典人帕尔梅。帕尔梅受命之后全力投入工作，在两伊的首都共主持了五轮谈判。最后终于就此问题达成一致，让船只使用国际红十字会的旗帜。

然而就整个冲突所进行的外交和军事谈判却进行得十分艰难。瓦尔德海姆等人试图达成一项为双方共同接受的协议，建立一个缓冲地带，但这一计划很快便告破产，因为交战双方谁也不肯退一小步来解决问题。帕尔梅在 1981 年三次前往两伊，就撤军问题同双方展开讨论，但未能取得任何结果。

1982 年 2 月，帕尔梅又作了一次巴格达和德黑兰之行，以就细节问题再作商讨，但他的努力又失败了。他得出结论，只要两伊不愿就推进和平谈判作出明显表示，则进一步调解毫无意义。安理会呼吁伊斯兰大会组织和不结盟国家介入并进行干预，但却没能达到预期效果。1982 年 7 月 12 日，安理会通过 514 号决议，随后联合国大会也通过决议，要求两伊停火撤军。伊拉克表现出了合作的态度，但决议遭到了伊朗的拒绝。对战争进展深感失望的萨达姆通知瓦尔德海姆，假如伊朗方面作出相同表示，他将立即结束这种敌对状况。来自伊朗的答复是，只要伊拉克的进攻还在继续，伊朗将不考虑安理会的任何建议。

在两伊战争如火如荼之际，两个超级大国也正忙得不亦乐乎。苏联被阿富汗和波兰问题绊住了脚，美国因忙于人质问题和卡特、里根的权力移交而无暇旁顾。此外，东西方关系的日益紧张也使得两个超级大国在通过对话解决海湾冲突的问题上出现犹豫。两国不愿直接介入冲突，而是隔岸观火，乐得清闲。

由于交战双方立场的无法调和以及两个超级大国的无所作为，联合国和瓦尔德海姆在两伊冲突中的一切努力均告无效。瓦尔德海姆意识到，这场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宗教狂热情绪对全世界的威胁在一天天增长，他忧心忡忡地

说：“如果无法通过调解的方式结束战争，那么有朝一日，整个世界都将成为这种令人恐惧的圣战的人质。”

阿富汗事件——任期内最后的特别困扰

在任期的最后两年，特别困扰瓦尔德海姆的是阿富汗问题。

自 60 年代以来，阿富汗政局一直动荡不安。1973 年，查希尔王朝前首相达乌德发动政变，成立了阿富汗共和国。1978 年，亲苏联的人民民主党军官再次发动政变，推翻达乌德政府，成立了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从此开始了苏联对阿富汗的控制。由于人民民主党内部出现分裂与对抗，阿富汗局势更加动荡，国内反政府武装异常活跃。苏联试图巩固喀布尔人民民主党政权的所有努力都未能奏效。

1979 年 12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随着阿富汗内部权力之争达到高潮，苏联出动空军和陆军大举入侵阿富汗。在苏联的人民民主党领导人卡尔迈勒回到阿富汗，被扶上总统的位子。从此，苏联对阿富汗实行全面军事占领。

苏联的侵略行动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与密切关注，也在联合国一些小成员国中引起了恐慌，他们担心，有朝一日也会有超级大国进占自己的国土。1980 年 1 月 7 日，联合国安理会试图呼吁所有外国势力退出阿富汗，以便使阿富汗人民建立自己拥戴的政府，但这一议案在苏联的否决下没有通过。1 月 10 日至 14 日，联合国大会召开了第六次紧急特别会议，以 104 票赞同、18 票反对、18 票弃权通过了一项与安理会议案内容相同的议案。议案要求，所有国家都应尊重阿富汗的不结盟国家性质，不得介入其内部事务，而应立即采取人道主义救助措施，使难民尽快回归故土。

联大委托瓦尔德海姆向所有成员国通报议案执行情况，但却没有指出达到议案规定目标的方法。这一议案的提出和通过招致了苏联和阿富汗现政权的不满，要想说服他们与联合国秘书长进行合作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瓦尔德海姆曾考虑，以联合国或联合国与国际红十字会的共同名义派代表团前往喀布尔，但这也不会有什么直接结果，因为决定权在莫斯科而不在喀布尔。他确信，在目前的对立无法调和的情况下，过早地言及和平是没有意义的。在 1980 年 11 月 20 日的一项新决议中，联合国大会授权他指派一名特别代表，在莫斯科和喀布尔之间斡旋。这一代表的人选应与莫斯科和喀布尔没有任何牵连。但任命特别代表一事遭到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坚决反对。瓦尔德海姆决定将这一特别代表改成联合国秘书长私人代表的身份，这一办法得到了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方面的认可。瓦尔德海姆很快选定了副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

1981 年 4 月，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到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和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同两国最高级官员进行了磋商，以便在联合国大会议案的基础上使谈判开始进行。各方就谈判一事达成了谅解，但未能就谈判方式形成共识。1981 年 5 月，瓦尔德海姆与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一同前往莫斯科，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探讨一下阿富汗的紧张局势。随着国际社会的压力增大、阿富汗国内反侵略战争的发展以及苏联国内经济的日益不堪重负，苏联终于决定同意边打边谈，授意喀布尔政权出面谈判。在与葛罗米柯的会谈过程中，瓦尔德海姆争得了苏联方面的同意，在秘书长私人代表的参与下，开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谈判。

1982 年瓦尔德海姆卸任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在日内瓦开始了谈判，由于巴基斯坦不承认喀布尔政权的合法性，谈判通过秘书长私人代表为双方传

话来进行，即所谓“间接谈判”。瓦尔德海姆认为，阿富汗事件是联合国政治进程中的转折点，从此以后，苏联同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之间的联系削弱了。

此外，在越南入侵柬埔寨的问题上，瓦尔德海姆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积极的斡旋活动。他曾亲临河内和曼谷，之后又派出特别代表，为柬埔寨问题通往最终解决之路作出了贡献。

坦然引退——告别“硬装的体面”

托马斯·杰菲逊在做了八年的美国总统之后，曾经用“硬装的体面”这样的话来描述总统这一职位。在联合国秘书长职位上呆了十年的瓦尔德海姆对此深有同感。因为这两个职务在有些方面极为相像：两者的工作都受到法律和政策的限制，而这种限制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失败。瓦尔德海姆认为，联合国秘书长所拥有的权限其实还不及一个小国的政府首脑，他没有绝对的权力，又没有足够的物质来源，但仍须在可能的范围之内为解除国际紧张局势、维持世界和平作出努力。

当1981年来临的时候，需要瓦尔德海姆作出重大决定的时刻也不可避免地到来了。是急流勇退，还是争取再度连任，从而创下秘书长历史上任期最长的记录呢？

回顾十年来的秘书长工作，浮现在瓦尔德海姆脑海中的是一连串的挫折和失望。但无论如何，他毕竟成功地维持住了地球上每个国家对联合国这一国际组织的信任。63岁的瓦尔德海姆，身体依然强健，个人的学识和阅历都处在人生的顶峰，且拥有大多数成员国的支持。于是，在秋季的联合国大会上，他宣布了自己竞选第三任的决定。但他的竞选连任遭到了中国代表团的反对。虽然在几轮投票中他的成绩都不错，但由于中国的态度无可挽回，他便于12月初决定放弃竞选。他在联合国秘书处的同事、他对之评价甚高的秘鲁人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后来居上，以其职业外交家的优秀资历和为所有代表团接受的拉丁美洲出身，当选为联合国第五任秘书长，接替了辛苦十年的瓦尔德海姆。

此次虽未达成心愿，但瓦尔德海姆并无遗憾之感。在每一轮投票中他的支持率均高于其他任何一位候选人，他把这看作是联合国对他十年来工作的一种肯定和补偿，因而内心十分平静和满足。在该年度联合国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所有代表都从座位上站起来，以热烈的掌声向瓦尔德海姆告别。这一动人的场景令他久久难忘。

在任期间的瓦尔德海姆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工作者，每天用来办公、开会和社交的时间长达12~14小时，他曾说：“我自从当上了联合国秘书长，便不能享受愉快的家庭生活了，我从大清早便来到办公室办公，一直要忙到深夜才能回家。”不过他又说：“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如果我能够使一些被俘虏和被监禁的人士获得自由和解放，如果我能够解决一项边境冲突，如果我能够促使世界各国在解决争端时能坐下来举行谈判，而不贸然发动一场新的战争的话，那我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十年来，瓦尔德海姆的身体和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如今这一切均已成为过去，他渴望和夫人过一段宁静松弛的日子。他应邀去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作了主讲国际关系的客座教授，此外，他还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柴普尔—希尔大学任教。这种教学实践使他与年轻人建立了密切联系，同时也使他有时间整理在联合国十年间积累的丰富个人资料。他

的自传《在世界政治的玻璃宫殿中》的草稿已经完成了。重归维也纳——“小世界”里的“巨人”

1984年，在纽约度过了17年难忘的岁月之后，瓦尔德海姆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祖国奥地利。

阔别已久的维也纳此时已由一个处在世界政治边缘的大都市变成了一个国际事务中心。这是一个可使瓦尔德海姆继续发挥他的国际外交经验的理想之地。1982年，有人向瓦尔德海姆建议，成立一个由各国前国家及政府首脑组成的国际委员会。这就是媒体所称的“指点世界政治的智者委员会”。

1983年11月，这个“国际行动委员会”在维也纳成立了，成员尽揽世界各国的前政坛巨星，瓦尔德海姆被推举为主席，他担任这个职位一直到1985年11月。委员会的目的在于：为那一时代的三大主题即和平、安全与裁军提供具体建议，重振世界经济，并特别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负债问题。委员会的行动方式是：派出由前政坛名人组成的小型代表团前往世界热点地区，向当地的高层领导人提供委员会共同拟定的建议。

对于这样一个委员会来说，维也纳无疑是一个理想的驻地。因为它所在的国家奥地利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其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均足以跨越东西方意识领域的界线。“奥地利是一个可供巨人施展抱负的小世界”，瓦尔德海姆就是一位从奥地利这个小世界走向联合国政治舞台的外交巨人。

历史问题——埋藏已久的萧墙之祸

1985年11月，奥地利人民党第二次将瓦尔德海姆推举为总统候选人。正当他躊躇满志，准备向政治生涯中继联合国秘书长之后的第二个高峰进发时，万万没有想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历史问题在国内外掀起了轩然大波。

1986年3月，奥地利发行量很大的《侧面》周刊中有一篇报道称，瓦尔德海姆在维也纳大学读书时曾加入了纳粹学生联合会，入伍后又参加了纳粹冲锋队骑兵旅。3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引用世界犹太人大会的材料，认为瓦尔德海姆曾参加过纳粹党卫军褐衫队，他所在的纳粹军队1942年在南斯拉夫进行过围剿和屠杀，把众多的希腊犹太人投入了集中营。这些报道当即遭到了瓦尔德海姆的否认，他表示自己根本就没有参加过1942年的巴尔干战役，因为他早在1941年春就因伤退役了。后来事件的发展表明，他如此作出否认实在不是一项明智之举。

《纽约时报》就此反驳说，他当时并非来退役，而是在纳粹E集团军司令劳尔的领导下在巴尔干作战，参加了南斯拉夫的柯萨拉山大屠杀。存在联邦德国军事档案馆的E集团军的行动日志表明，瓦尔德海姆于1943~1944年间曾经为军方起草情报简报。世界犹太人大会在美国档案馆发现，一份在波斯尼亚执行扫荡任务的文件上也有瓦尔德海姆的签名，并由此证明，他在当时并不是普通翻译官，而是执行秘密警察任务的情报官。南斯拉夫的一家报纸还刊出一份1947年的政府文件，称贝尔格莱德战犯委员会曾以“谋杀、虐杀、射击人质和纵火烧毁平民区”的罪名要求引渡瓦尔德海姆。此外，世界犹太人大会还编辑了一本名为《瓦尔德海姆纳粹史》的小册子。美国借助陆军部档案称，瓦尔德海姆由于参与了大屠杀，曾被美国陆军列入被通缉的纳粹德国军官名单。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表示，如果瓦尔德海姆当选奥地利总统，将不允许他进入美国。情况对瓦尔德海姆十分不利。不料，美国这一表示明显染上了

干涉奥地利内政的嫌疑，反而刺激了奥地利人的逆反心理。他们认为，二战时候所有的奥地利青年都被纳粹征召入伍，到处作战，因而没有必要单单指责瓦尔德海姆一人。1986年6月，瓦尔德海姆最终以53.9%的得票率战胜了社会党候选人、前卫生部长库尔特·施泰雷尔，当选为由人民直接选出的奥地利第二共和国第八任联邦总统，任期6年。

然而，他的历史问题并没有因为这一胜利而被人们遗忘。国内外对此问题的争论仍沸沸扬扬。他生平处境最为困难的时期随即来临了。美国司法部于1987年4月27日宣布将他列入“监视名单”，不允许他以私人身份入境。瓦尔德海姆本人、奥地利政府和人民对此感到震惊和不可理解。在美国影响下，西欧各国领导人与他断绝了往来，不邀请他前往访问，也不到奥地利来访问。整个西方世界对他十分冷淡，瓦尔德海姆成了不受欢迎的“孤独老人”。

上任前两年的时间里，他只出访过梵蒂冈、巴基斯坦和约旦。爱尔兰总统1986年初访问奥地利时曾邀请奥总统回访，在瓦尔德海姆上台后却撤销了邀请，西班牙首相1987年也婉辞了奥地利的访问邀请。只有联邦德国总理科尔作出惊人之举，于1987年8月来到奥地利总统夏季官邸，拜会了瓦尔德海姆，从而成了自美国宣布禁止其入境以来第一位与之会晤的西方领导人。

为了摆脱这种尴尬局面，瓦尔德海姆主动建议奥地利政府对自己的历史进行调查，并表示，如果历史学家们能证明他与杀害犹太人有关，他将引咎辞职。于是，受奥地利政府委托，1987年9月，瑞士、联邦德国、英国、比利时、希腊、以色列的六位著名历史学家就瓦尔德海姆的历史问题组成了国际历史学家调查委员会。

1988年1月29日，联邦德国《明镜周刊》公布了一份1942年7月22日的电报复印件，这是花巨资从南斯拉夫历史学家普伦察那里购来的。电报内容是，中尉瓦尔德海姆要求，把4224名南斯拉夫人驱逐出他们自己的国家。

《明镜》称，这些人中有许多后来死在了纳粹集中营中。调查委员会对这一报道极为重视，经过认真调查，又经南斯拉夫专家委员会查证，他们证实，这份电报纯属伪造。可见，国际社会对瓦尔德海姆的指责并非绝对证据确凿，混水摸鱼者也大有人在。

2月8日，委员会向奥地利政府提交了关于瓦尔德海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历史问题的长达202页的调查报告，终于使这个争论了两年的问题有了初步结论。结论认为，经过5个多月的调查，没有发现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驻巴尔干地区希特勒某兵团司令部中尉、情报联络官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直接参与战犯罪行的证据，没有查到瓦尔德海姆参加纳粹党的证据，因此，不能将他定为战犯和纳粹分子。

调查结果证实了瓦尔德海姆的清白，他对此感到十分欣慰。但关于他历史问题的争论仍未结束，国内各派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斗争。这一事件也给奥地利的国际形象带来了不利影响，瓦尔德海姆作为总统的声誉也严重下降。舆论认为，瓦尔德海姆已经信誉扫地，不能继续对外代表奥地利的国家形象了。维也纳街头不断出现要求他下台的示威游行，公众对他的支持率大幅度下降。瓦尔德海姆日益陷入了困境。

“ 要没有我的妻子和儿女，我真不知该如何打发这艰难的日日夜夜 ”，70岁的瓦尔德海姆心力交瘁、痛苦不堪。但他一直坚持认为，自己是无辜的，虽然自己参加过希特勒军队，但从未杀过人，也从未下令杀过人，自己决不是纳粹战犯。他终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只是从未谈起过1942~1945年间在巴

尔干地区任德军中尉军官的历史。

奥地利总统虽然没有实权，但宪法规定，政府无权解除总统的职务，而总统却有权解散政府。在宪法保护下，瓦尔德海姆抵制住了国内外要求他下台的呼声，坚决拒绝辞职。

瓦尔德海姆在任期间，就修改奥地利《国家条约》中某些约束奥地利主权的条款作了一些工作。他还一再重申，奥地利在始终不渝地坚持其永久中立政策的同时，将继续努力争取加入欧共体，把这作为奥地利外交政策的一项特别任务。此外，他还表示，奥地利将为进一步缓和南北矛盾作出努力，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但是，由于他任职期间一直受到自身历史问题的困扰，被这一问题耗去了大部分精力，所以，在处理国事、行使职权之时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挥手从兹去——47年风雨任凭说

1991年6月，瓦尔德海姆表示自己将不会参加下届总统选举。1992年7月8日，任期已满的瓦尔德海姆将总统职权正式移交给新当选的托马斯·克雷斯蒂尔，从此告别了政治舞台，告别了他47年来集辉煌和屈辱于一身的政治生涯。

73岁的瓦尔德海姆心潮起伏，他在告别演说中说道：“回顾过去，在巨大的压力和种种伤人的攻击下，我未能随时找出适当的言辞，来描述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感受，描述我这一代的命运以及祖国的命运，描述那个时期罪恶的深重，我对此实在感到十分遗憾。”客观来看，瓦尔德海姆期满离任也意味着奥地利从此结束了被国际社会孤立的状况。

离任后的瓦尔德海姆担任了奥地利的联合国协会主席，还曾应中国联合国协会的邀请，于1994年4月来中国访问。

瓦尔德海姆夫妇生有一子二女。在繁忙的外交工作之余，他喜欢听古典音乐，还爱好游泳等户外活动。他于政务之外还多有著述，主要著作有《在世界政治的玻璃宫殿中》、《奥地利的道路》、《奥地利的榜样》、《和平的挑战》等等。

（王剑南）

力尽职责、政绩卓著的第五任秘书长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

秘鲁人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曾任两届联合国秘书长，他遵循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间的友好关系、解决国际冲突与纠纷、捍卫民族自决作了不懈的努力，政绩卓著，受到国际社会的赞扬和好评，成为联合国杰出的秘书长之一。

职业外交家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 1920 年 1 月 19 日出生于秘鲁首都利马。系西班牙贵族后裔，父亲曾是一名富商。在罗马天主教中学读书时喜欢西班牙美洲文学艺术，后进入利马天主教大学法律系。上大学时，因家庭经济状况每况愈下，从 1940 年起受雇于秘鲁外交部，以补贴上大学的生活费用。1943 年获得国际法学士学位，翌年正式进入秘鲁外交部工作，不久被派往秘鲁驻法国大使馆任职。1946 年作为秘鲁代表团正式成员首次参加联合国大会。后曾在驻英国、玻利维亚及巴西大使馆工作数年，因成绩显著而被提升为驻巴西使馆负责旅游事务的参赞。1961~1962 年任外交部法律和人事司司长。1962~1964 年先后任总务司、礼宾司和政治司司长，期间还任外交学院及空军学院的外交法和国际关系法教授。1964~1966 年调任驻瑞士大使。1966~1969 年还兼任秘鲁与东欧国家经济关系委员会主席。1968 年 10 月 3 日左翼军人胡安·贝拉斯科将军发动政变，推翻了人民行动党的民选总统贝朗德·特里，实行军事专政，并于翌年同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兼驻波兰大使。1971 年调任秘鲁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73~1974 年秘鲁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他于 1974 年 7 月任安理会主席，1975 年率领秘鲁代表团出席第三十届联合国大会。

1974 年 7 月塞浦路斯亲希腊的一个右翼军人集团策动政变，推翻了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三世政权。土耳其以“保证国”保护土族的权利为由也出兵塞岛，并占领塞全国 37% 的领土，土族居民迁居北部，形成希土两族南北分裂的局面。1975 年 2 月土族宣布成立“塞浦路斯土族邦”，整个塞岛的局势更趋复杂化。为缓和紧张局势，当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瓦尔德海姆于 1975 年 9 月 18 日任命德奎利亚尔为其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尽管未获特权去解决塞浦路斯根深蒂固的种族矛盾，但德奎利亚尔凭借其为人诚实，不耍手段，不投机取巧，说话有礼貌又具耐心，做事勇敢慎重以及广博的学识和解决国际纷争的丰富经验，通过耐心细致地做希、土两族领导人的工作，终于说服了双方接受调停，并使双方于 1976 年举行了会谈来解决分歧，防止了军事冲突的升级，缓和了紧张局势，这是他外交生涯上取得的一大成功。

1977 年 12 月德奎利亚尔完成在塞浦路斯的使命，转任秘鲁驻委内瑞拉大使，但仍保留特别代表的身份。1979 年 2 月 27 日出任联合国负责特别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1981 年 4 月作为瓦尔德海姆的特别私人代表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解决因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而引起的两国纠纷，同年 5 月 31 日卸任副秘书长职务，8 月又再次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赴阿富汗执行和平使命，回国后于年底退休。

当选秘书长

正当德奎利亚尔告老还乡之时，联合国内部围绕瓦尔德海姆的继任人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各大国主要是安理会美国、中国、苏联、英国、法国 5 个常任理事国扮演了这场斗争的主角，结果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

界国家取得最后的胜利而告终。

众所周知，奥地利的瓦尔德海姆自 1971 年 1 月起至 1981 年底已担任了整整 10 年（两届）联合国秘书长，但他仍想继续连任，并在某些国家的支持下成为下届秘书长候选人；另一候选人是由非洲统一组织提名、获得不结盟国家支持的坦桑尼亚外交部长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联合国宪章规定，秘书长作为该机构的首席行政长官，需经安理会推荐，由联合国大会任命。安理会由 5 个常任理事国及 10 个经选举产生的非常任理事国组成。根据安理会的决定，如属程序性问题，只需 9 票多数即可通过，如属像选举秘书长这样实质性的问题，则 9 票中必须包括 5 个常任理事国的全部赞成票，也就是说，安理会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都拥有否决权。下届秘书长于 1982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上任，1981 年 12 月底以前选出。自 1981 年 10 月 27 日起，安理会就举行非公开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推举下届秘书长，投票进行了十几次，有好几次两人的票数都超过 9 票，但由于常任理事国美国投票反对萨利姆，而另一常任理事国中国则对瓦尔德海姆投了反对票，这样秘书长候选人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选举陷入僵局。据报道，美国否决萨利姆是由于美国确认萨利姆在南部非洲和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较激进，不合美国战略的需要；中国郑重宣布，她对瓦尔德海姆本人很尊敬，不支持他当选，并非对他本人不感兴趣，而是因为联合国成立以来的四任秘书长中三人（挪威人赖伊、瑞典人哈马舍尔德、奥地利人瓦尔德海姆）都来自欧洲，而当时联合国 157 个会员国中四分之三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它们强烈要求在联合国享有平等的权利，所以新一届秘书长应由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来担任。中国的原则立场，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支持，尤其符合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心愿，也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威望。

鉴于秘书长人选长时间得不到解决，联合国各成员国普遍感到焦虑和不安，要求由第三世界人士出任下届秘书长的呼声进一步高涨，直到乌干达驻联大代表奥·奥顿努担任安理会 12 月份主席后，经他巧妙的斡旋以及其他国家的努力，终于打破了选举僵局。12 月初，瓦尔德海姆写信致奥顿努主席，表示在今后表决秘书长入选时不要再列入他的名字，以便安理会能更顺利地工作，数天后萨利姆正式通知安理会主席，为了使第三世界国家其他人真正有可能当选，他愿放弃竞选秘书长的愿望。瓦尔德海姆和萨利姆二人退出竞选后，菲律宾、伊朗、秘鲁、阿根廷、巴拿马、厄瓜多尔、哥伦比亚、毛里求斯和圭亚那等 9 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士参加秘书长竞选。12 月 11 日安理会再次举行秘密投票，但选举程序同以往略有不同，在正式选举前先进行了秘密预测投票，每个代表团只许有两人参加，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全部退出会场，安理会 15 个理事国先在列有 9 名候选人名单的白色选票上标明赞同哪个候选人，然后 5 个常任理事国在蓝色选票上标明不赞成哪些候选人。预选后，巴拿马和毛里求斯的候选人退出竞选，安理会理事国遂对其余 7 名候选人进行正式投票，结果德奎利亚尔以 10 票赞成、1 票反对、4 票弃权而被安理会推荐，经联大选举于 1982 年 1 月 1 日正式就任联合国第五任、第八届秘书长，任期五年。1987 年继任，1991 年底任期届满归里。

政绩卓著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当选是第三世界在联合国内突破超级大国控制、争取平等权利的一次重大胜利。他当选后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的使命将是寻求和平，为和平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世界问题作出贡献。在我被选为联

联合国秘书长时，在某种意义上，我将不得不忘掉我是出生于何地区的人，如果可以的话，甚至应该忘掉我的国籍，这是因为我要担任作为一个整体的联合国的代表之职务，联合国所有成员的代表之职务。但是我不能不优先注意影响到第三世界的一切问题。这不仅是因为第三世界在联合国大会中占绝大部分，还因为第三世界的繁荣将决定着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繁荣。”

“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我将捍卫第三世界利益，也捍卫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利益。”他主张在国际关系方面实行“多种意识形态”的原则，维护各国间的和平，在保卫各国主权方面，认为除了保卫土地和海洋主权外，还应加上保卫自然资源主权，为求使中、小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能获得独立发展。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就任联合国秘书长时，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局势相当紧张，世界各地“热点”蜂起。美国和苏联在日内瓦关于欧洲限制核武器谈判陷入僵局，它们开始争相部署新型导弹，东西方集团出现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对峙；苏军入侵阿富汗后使阿国内战争进一步升级；1982年阿根廷收复被英国占领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英称福克兰群岛），爆发了阿、英马岛战争；1983年美国武装入侵格林纳达；以色列举兵黎巴嫩；还有已持续几年的两伊战争以及柬埔寨、尼加拉瓜境内如火如荼的区域性战争等等。世界局势不断恶化，导致联合国内各种力量的严重对立，安理会想通过一项决议难上加难，致使秘书长与安理会之间的协调举步维艰。加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故意拖延交纳会费，向联合国施压，使联合国债台高筑，更加深了联合国的财政危机，许多成员国开始对联合国是否有能力实现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全球人民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宗旨表示怀疑，纷纷对它提出尖锐批评。德奎利亚尔面对急骤“变冷”的国际局势及联合国自身窘境，巧妙地采取了各方都能接受的“温和外交”的工作方法，以其过人的聪明才智和信心，在纷争的各种势力之间纵横捭阖进行斡旋调停，来摆脱困局。他总是让人家感到他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从众多国家的要求和希望中找到它们利益的汇合点，显露了其高超的领导艺术。10年中，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各“热点”地区和国家，为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积极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赶出自己的家园，从而引发了已达数十年之久的巴以领土争端。巴勒斯坦人在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下，同以色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而以色列人为保住掠得的领土，依仗美国的支持，自1948~1973年同阿拉伯国家发生了4次大规模的战争。当时，苏联为加强其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也竭力插手中东事务，使中东局势更趋复杂化。联合国为解决阿以冲突，实现中东和平，曾作出了各种尝试和努力，并曾通过许多决议，重申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要求以色列撤出其占领的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但收效甚微，冲突各方面的分歧仍然很大，立场严重对立。

德奎利亚尔就任秘书长之时，正值要求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呼声不断高涨，他借此大好时机积极斡旋，出访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些国家，派遣秘书长特使访问中东，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以缓和紧张局势，进而推进和平进程。1982年，即德奎利亚尔就任秘书长的头一年，联合国特别大会通过决议，敦促以色列执行安理会和联大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翌年8月底到9月初，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了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德奎利亚尔亲自

主持大会开幕式，尽管美国和以色列抵制，但仍有一百多个国家派代表，或以观察员身份与会，会议开得比较成功，一致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的日内瓦宣言》及《巴勒斯坦权利的纲领》，确立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各项原则，并举行一次在联合国主持下的有阿以冲突各方参加的中东国际和平会议。会后，以色列和美国强烈反对日内瓦会议的各项主张，拒绝和谈，但这次会议仍对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具有积极意义。美国和以色列的顽固态度，越来越遭到世界各国和舆论的谴责，美国为顾全其全球战略利益，对巴勒斯坦的态度开始转变；以色列的强硬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尽管仍坚持反对与巴解对话，拒不撤出所占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但表示同意召开中东国际和平会议的主张；当时苏联的外交政策也发生重大转变，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力图缓和美、苏关系。1988年美、苏在莫斯科举行首脑会晤，双方就中东问题达成了某些谅解，表示还要加强政治磋商，以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同年底联合国再次在日内瓦举行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并通过五项决议，会上阿拉法特发表了讲话，提出了关于承认以色列生存权的新主张，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注入了强劲的活力，美国也及时作出反应，宣布将恢复中断13年之久的美、巴和谈。此后，德奎利亚尔在联合国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讲话，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作出努力，促使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回到谈判桌上，还说他曾同安理会和联大全体会员一起多次要求以色列遵守日内瓦公约的有关条款并履行其义务，保障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利，并重申了召开关于中东问题国际会议的一贯主张。1990年8月初，伊拉克入侵和吞并科威特后，中东形势急剧恶化，美、巴对话中断，中东和平进程再次受阻。对此，德奎利亚尔在当年联合国大会工作报告中指出，中东形势再度恶化令人失望，但强调联合国仍将坚持不懈地努力，为全面、公正实现中东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海湾战争结束后，世界格局的变化朝着更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美、以在中东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因此，1991年10月30日在西班牙举行的马德里中东和平会议，表面上是美、苏两家主持，实际上是美国一手操办的。巴、以代表团及有关阿拉伯国家与会，另外，联合国秘书长的代表、欧共体及海湾合作委员会等组织机构的代表应邀作为观察员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召开以前，德奎利亚尔就曾指出，联合国仅派观察员是不充分和不公平的，后来他在向第四十六届联大提出的一份报告中说，“尽管马德里和平会议是在联合国范围之外进行的，但它得到了有关各方的支持，并以安理会242号和338号决议为基础”。他“希望马德里会议所产生的势头能保持下去，中东各国人民长期以来被剥夺的持久和平能成为现实”。当前中东和平仍处于艰巨、曲折而又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以土地换和平的目标远未达到，但德奎利亚尔在两届任期的10年间为实现中东和平倾注的心血是举世公认的。

（二）致力于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1960年塞浦路斯获得独立，宣布成立塞浦路斯共和国，并由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组成联合政府，但希、土两族自1963年第一次发生流血冲突后，整个塞岛动荡不安，从1964年起联合国即向该地区派驻了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着手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德奎利亚尔早在任秘鲁驻联合国大使时，就曾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去塞浦路斯执行和平使命。1982年当选秘书长后，更积极投入了这项工作，1984年6月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分别同希、土两族的代表会晤，以促使双方举行新一轮谈判，1985年同塞浦路斯外交部

长在阿曼就塞浦路斯形势及有关问题进行讨论与磋商。1988年5月，德奎利亚尔致信塞浦路斯希、土两族领导人，倡议双方无条件恢复中断近三年之久的两族直接谈判。同年9月，双方就结束两族分裂状况，恢复国家统一举行了直接谈判，但未达成最终协议。同年底，德奎利亚尔在纽约又先后会见希、土两族领导人，继续做工作，同时还通过其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同有关各方协商，以打破僵局，重新举行谈判。但1990年整整一年希、土两族的谈判依然无进展，1991年6月德奎利亚尔又提出召开一次高级别国际会议的主张，安理会也发表声明，支持召开一次由秘书长担任主席，有希、土两族和希腊、土耳其两国参加的高级别国际会议，并呼吁各方同联合国进行充分的合作。同年12月19日，德奎利亚尔向安理会提出其在塞浦路斯斡旋使命的报告，说斡旋取得了进展，并根据联合国方面历次对塞浦路斯问题作出的决议和希、土两族的实际情况以及希、土两族领导人的立场和态度，认为将来有可能在塞岛建立一个两族、两区的联邦。报告提出，这个联邦国家由政治上平等的两族组成，双方平均分享主权，但不可分割；联邦国家必须完全体现联合国安理会716号决议所重申的基本原则，即保障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12月23日，安理会一致认可秘书长的斡旋使命报告，同时敦促希、土两族领导人与秘书长通力合作，弥合双方的分歧，以促成塞浦路斯问题的圆满解决。

（三）对解决柬埔寨问题作出贡献

1978年12月越南入侵柬埔寨，翌年1月6日金边陷落，波尔布特领导的民主柬埔寨政府被迫转移，随后由越南扶持的韩桑林政权统治金边，于是柬埔寨人民掀起了抗越救国战争，主要是游击战争。由于越南拒不执行联合国第三十四、三十五和三十六届大会多数通过的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决议，继续对柬埔寨进行武装侵略和军事占领，1982年7月9日，柬埔寨三方实行联合，正式建立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这使柬埔寨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正义事业在全世界赢得了更加广泛的同情和支持。1982年2月17日，德奎利亚尔派其高级副手，处理东南亚人道主义问题的特别代表拉菲丁·艾哈迈德出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等东盟五国以及越南和老挝，据联合国发言人说，艾哈迈德赴东南亚执行和平使命，是新任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为促使东南亚地区实现和平而采取的第一个主动行动。1985年1月底至2月初，德奎利亚尔先后访问了曼谷、万象、河内、吉隆坡、雅加达，并在新加坡作了短暂停留。1月30日，他在河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的东南亚之行旨在评估有关各方在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帮助各方寻求共同点，使其能坐到谈判桌上来政治协商和谈判，还说他同越南领导人的会谈，对解决柬埔寨问题是有益的，各方都希望和平。对于柬、泰边境的问题，联合国考虑在两国边境部署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德奎利亚尔此次穿梭外交活动，对最终解决柬埔寨问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86年3月，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在北京召开内阁会议，提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八项建议，其主要内容是越南撤军，实现停火，组成以西哈努克亲王为主席的四方联合政府，实现民族和解，确立柬埔寨为中立和不结盟国家，柬、越签订和平互不侵犯条约，永远和睦相处。1987年12月，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领导人与金边政权的代表在巴黎举行首次会晤，签署了一项政治解决柬埔寨冲突为主要内容的联合声明。1988年7月，首次关于柬埔寨问题的非正式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茂物举行，柬四方、越南及东盟国家的代表

参加了会议。这是越南自 1978 年入侵柬埔寨以来首次同柬抵抗力量的代表坐到一起，它标志着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谈判的开端。同年第四十三届联大通过了 64 个国家联合提出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决议案，再次要求越南撤军。1989 年 7 月 30 日，柬埔寨问题巴黎国际会议召开，为期一个月，柬埔寨四方代表西哈努克亲王、宋双、乔森潘和洪森、德奎利亚尔以及中美苏英法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代表出席会议，东盟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印尼和文莱 6 国的代表以及越南、老挝、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不结盟运动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大会就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越南撤军以及撤军后柬未来和平进程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尽管未达成具体协议，但却为在柬埔寨实现和平扫除了一些障碍，对此，德奎利亚尔作了客观的评价，他说，会议成功地制定了全面解决办法的各项要素，但是由于若干实质性政治问题而无法达成整个一揽子办法，不过巴黎会议所建立的后续行动机制为继续外交进程即再度召开会议提供了希望。他还表示要继续努力斡旋。1990 年 8 月 28 日，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达成一项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框架文件，其主要内容是促进柬埔寨四方实现民族和解，充分发挥联合国在柬埔寨过渡时期的作用，9 月 10 日，柬四方宣布接受安理会的框架文件精神，并决定成立由柬四方组成的全国最高委员会，为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前进了一大步。11 月 23~26 日，秘书长代表同巴黎会议两主席和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巴黎再次举行工作会议，达成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协议草案，并敦促柬四方确保全国最高委员会充分发挥作用，以使和平会议能够重新召开。1991 年 4 月 22 日，德奎利亚尔同巴黎会议两主席联合发表声明，呼吁柬埔寨交战各方从 5 月 1 日起实行停火，同时派出的联合国 4 人军事代表团抵达柬埔寨战场视察，使停火基本上得到了遵守。同年 10 月 23 日，柬埔寨问题巴黎国际会议第二阶段会议隆重开幕，德奎利亚尔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上次与会国的外交部长以及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全体成员。与会的 18 国外交部长代表各自政府在柬埔寨和平协定上签字。柬全国最高委员会 12 名成员也分别签了字。柬埔寨和平协定包括《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关于柬埔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及不可侵犯、中立和国家统一的协定》、《柬埔寨恢复与重建宣言》和《最后文件》。这些文件规定柬全国最高委员会在整个过渡时期是柬唯一合法机构。协定还要求安理会成立一个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力机构，负责执行协定所载明的权力，该机构直接对联合国秘书长负责。和平协定的签订，标志着历时 13 年之久的柬埔寨问题经过长期、曲折和复杂的过程最终获得解决。德奎利亚尔也在讲话中说，经过多年的战乱，柬埔寨人民终于得到了和平，还说实施柬埔寨问题和平协定，是“联合国历史上最复杂的任务，也是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解决冲突的一个范例”。

（四）推动阿富汗问题的解决

1979 年 12 月 27 日，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扶植更亲苏的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上台执政，阿富汗人民在全国掀起了抗击苏军的英勇斗争。国际社会纷纷谴责苏联的侵略行径，但联合国和安理会有关要求苏联撤军的决议屡遭苏联的否决而得不到执行。德奎利亚尔任秘书长后，继续为解决阿富汗问题进行调停和斡旋，1983 年 3 月出访新德里，就阿富汗问题同当时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举行磋商，同时在新德里先后会见了伊朗总理侯赛因·穆萨维，两人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会谈，还会晤了阿富汗总理苏丹·阿里·基什特曼，拜访了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将军。在结束新德里的一系列高级

会晤后，又访问了莫斯科，继续执行其和平使命。阿富汗局势的发展不断朝着有利于阿人民的方向变化，1986年5月4日，穆罕默德·纳吉布拉取代卡尔迈勒任阿富汗人民党总书记，后又任总统。1988年6月，阿富汗抵抗运动七个政党联合，成立了临时政府，同喀布尔政权相对峙。1988年4月14日，德奎利亚尔在日内瓦主持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阿富汗、巴基斯坦、苏联和美国四国外长在四项协议上签字。当时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军事上又不断失利，只得履行日内瓦协议，并于1989年2月15日完成了从阿富汗撤军。3月，卡尔迈勒政府向抵抗运动各派别提出实行停火、地方自治，并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国际会议以及实现“民族和解”等建议，但遭到阿富汗圣战者临时政府的拒绝，他们坚持要推翻喀布尔政权。1990年2月14日，卡尔迈勒政府又提出实现民族和解等九点建议。这时德奎利亚尔也发表声明，说苏军撤出后应建立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阿富汗联合政府，这是阿富汗冲突各方消除分歧、在阿实现全面和平的正确方向，他还呼吁国际社会帮助阿富汗人民结束旷日持久的冲突，说苏联撤军已整整一年，但阿富汗人民面临的悲剧并未结束，日内瓦协议中撤军以外的条款没有得到全部实施，其中最突出的一条就是仍未建立起联合政府。另外，还呼吁冲突各方把民族利益置于一切之上，尽早使阿人民摆脱目前的苦难，让数百万难民早日返回家园。1991年5月21日，德奎利亚尔又发表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声明，提出切实停止敌对行动，举行自由选举，建立广泛联合政府等五点建议，对此，喀布尔政权表示欢迎，圣战者组织中的温和派表示有保留接受。随后，阿富汗问题有关各方就执行联合国和平计划展开了一系列活动，1991年7月29日，阿富汗抵抗运动组织、巴基斯坦和伊朗举行三方会谈，哈里斯派和萨亚夫等派未参加会谈。同年8月27日，第二轮会谈在德黑兰举行，与会各方赞成就政治解决阿问题采取一致行动，并表示原则支持联合国五点计划，同意把它作为政治解决阿问题的基础，同时决定开始与苏联对话，但仍坚持不同纳吉布拉政权举行谈判。1990年底，喀布尔政权的代表与抵抗运动温和派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翌年又同伊斯兰民族阵线领导人、查希尔前国王的代表和临时政府总统穆贾迪迪进行了接触，1991年9月13日，美国和苏联达成协议，从1992年1月1日起，双方停止向阿交战各方提供武器。同月，德奎利亚尔访问德黑兰，会见了基地设在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圣战者组织游击队领导人，同他们讨论了他提出的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五点和平计划，德奎利亚尔还通过他们呼吁圣战者组织各个派别不要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以便他能为推动阿富汗问题的解决提供一次机会。11月，阿富汗圣战者组织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同俄罗斯有关领导人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两年后在伊斯兰会议组织和联合国协助下在阿富汗举行选举。由于阿富汗问题错综复杂，并已旷日持久，且冲突各方政治立场相左，积怨很深，外部势力仍在左右局势，致使内战仍在进行。尽管如此，德奎利亚尔为推动阿富汗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五）为结束两伊战争立下功劳

1980年9月伊拉克和伊朗两国间爆发的战争，到1988年8月才实现停火，战争历时达8年之久，德奎利亚尔在两伊战争中、后期的6年多时间中，四处奔走，积极斡旋，数次出访海湾国家，执行和平使命。两国实现停火后，亲自主持两伊间的直接谈判，充分发挥联合国及安理会的作用，努力使两伊战争的一系列决议得以贯彻执行，为结束两伊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两伊战

争爆发后，安理会数次作出决议，要求停火，要伊拉克撤出所占领的伊朗领土。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战争的态势朝着有利于伊朗的方面发展，伊朗态度进一步强硬，加强了对伊拉克军队的攻势，陆地战争越来越升级，进而发展到“油轮战”、化学武器战。1984年3月，德奎利亚尔向伊朗派出实地调查团，了解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同月提出了解决两伊冲突的八点建议，主要内容包括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停止袭击居民区、商船和港口，停止威胁民航飞机和使用化学武器，交换战俘和继续同秘书长磋商。为实现上述目标，他又访问了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和阿曼等海湾4国，寻求解决两伊战争的办法。同年4月，访问伊拉克和伊朗，亲自出面进行斡旋，虽未取得具体成果，但双方袭击对方城市的行为有所减缓。联合国安理会对于使用化学武器的行径予以强烈谴责，呼吁有关国家严格遵守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1984年6月，德奎利亚尔致函伊拉克和伊朗，呼吁两国政府作出庄严承诺，不以任何理由使用化学武器。1985年德奎利亚尔再次访问海湾国家，就海湾的最新事态发展同沙特阿拉伯等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并就其解决两伊战争的一揽子计划进行讨论。1985年4月9日，伊拉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表示愿在秘书长主持下，或者在联合国安理会范围内，举行直接或间接谈判，以便找到两伊冲突的全面、公正和体面的解决办法，但遭到伊朗当局的拒绝。

1986年2月，伊朗调兵10万余人向伊拉克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战况对伊拉克不利，为扭转对已不利的局面，伊拉克利用空中优势，加紧在海湾水域发动“油轮战”，同时对伊朗重要石油设施实行空中打击，加剧了海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加之美国和苏联在该地区的勾心斗角，特别是美国同伊朗自1980年断绝外交关系后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两伊战争随时有国际化的危险。1987年7月20日，安理会一致通过了598号决议，要求交战双方立即停火，停止陆地、海上和空中的一切军事行动；由秘书长派遣联合国观察员组，监督停火和撤军；要求两伊双方在执行决议各条款的过程中充分同秘书长合作，以求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基础上全面、公正和体面地解决冲突。德奎利亚尔对该决议作了高度评价，说它为了解决交战双方的合理要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7年8月，德奎利亚尔在联合国总部同伊朗副外长举行会晤，就具体贯彻执行598号决议试探伊朗的立场，而伊拉克在决议通过后的第三天就由外长出面，在纽约会见秘书长，表示伊拉克政府愿与秘书长合作，全面执行598号决议，同年9月，德奎利亚尔访问两伊，讨论了598号决议的每个方面，但其4天的和平使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进入1988年后，伊拉克又逐渐在战场上占上风，收复了被伊朗占领的地方，当时伊朗内外处境都不妙，遂于同年7月18日宣布正式接受598号决议，并放弃先前的诸如要求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下台等先决条件。8月8日，德奎利亚尔在安理会宣布8月20日为两伊开始停火的时间，要求双方停止陆、海、空一切军事行动。规定8月25日举行日内瓦和平谈判，还宣布他将亲自主持两伊直接谈判。两伊双方也宣布从8月20日起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实现全线停火。随后，德奎利亚尔又指派一高级官员为其监督执行598号决议的私人代表。1988年8月至1989年4月，在德奎利亚尔直接主持下，两伊已举行了五轮直接谈判，但在撤军、释放和遣返战俘方面取得的进展不大。1990年海湾危机爆发后，大大推动了两伊问题的解决。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占领科威特后，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应，西方国家向海湾地区调兵遣将，伊拉克为对

付西方的武装进攻，避免腹背受敌，主动向伊朗媾和，宣布撤军，释放战俘，接受 1975 年关于划分两伊水界的阿尔及尔协议，不久两国宣布复交。1991 年 12 月 12 日，德奎利亚尔向安理会提出报告，确定伊拉克是两伊战争的发动者，认为 598 号协议的各项条款基本得到执行，两伊实现了和平。

（六）对解决海湾危机作出努力

1990 年 8 月 2 日，伊拉克出兵占领科威特。当天美国作出强烈反应，宣称要采取必要行动保护它在海湾地区的切身利益，安理会立即作出伊拉克马上从科威特撤军、伊科两国谈判解决争端的 660 号决议。但伊拉克拒不接受 660 号决议，反而于 8 月 8 日宣布科威特已“全面永久”并入伊拉克，后安理会又通过强化对伊制裁等一系列决议，与此同时，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组建多国部队数十万进驻海湾地区，海湾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德奎利亚尔曾力主和平解决海湾危机，他说政治解决海湾危机是可行的，并于同年 8 月 21 日在约旦与伊拉克外交部长阿齐兹举行了两轮会谈，以寻找和平解决的突破口，还要求伊拉克释放在科威特的数万名外国人。鉴于伊拉克的强硬态度，安理会于同年 11 月 29 日又通过了授权使用一切手段解决海湾危机的 687 号决议，限 45 天之内完全执行安理会决议，即 1991 年 1 月 15 日是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的最后期限。对此，德奎利亚尔评称，这是对伊拉克的“严重警告”，但还允许进行至少 48 天的真诚努力来和平解决这一危机。他还说，联合国要的不是投降，而是在尊重所有各方合法利益并有利于更广泛的和平与法制的情况下，寻求解决危机的最体面的途径。他对美国 and 伊拉克直接会谈表示欢迎，希望双边接触能导致公正、和平解决海湾危机。1991 年 1 月 11 日 德奎利亚尔在巴黎会见法国总统和外长后说，他将作为国际社会的发言人前往巴格达，为和平解决海湾危机作出最后努力。次日下午德奎利亚尔抵巴格达，同阿齐兹举行会谈无果。因此，他拟议中的向伊拉克提出的五点和平建议，因没有伊拉克保证撤军作为前提也就没有提出来。尽管如此，德奎利亚尔仍未放弃和平解决危机的一线希望，虽然规定的撤军限期快要临近。同月 15 日晚间，德奎利亚尔向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发出最后呼吁，强烈要求他立即从科威特撤出全部军队，以避免爆发海湾战争。他说：“当 1 月 15 日这一最后期限逼近，全世界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徘徊之际，我最诚恳地呼吁萨达姆总统扭转事态发展方向，避免灾难，在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走向正义与和谐的新时代。”联合国秘书长的最后呼吁是在安理会未能就法国和平倡议和英苏建议达成一致后发出的。他向萨达姆保证，一旦伊拉克遵照联合国决议从科威特全部撤军，部署在海湾地区的多国部队将不袭击伊拉克。

他还说，他还将敦促安理会重新考虑对伊拉克的制裁决议和在海湾地区的外国军队撤离该地区的问题。他还表示，他将努力促成全面解决中东和平问题。他说：“各国政府已经保证，在目前危机解决以后将竭尽全力地广泛解决阿以冲突，包括巴勒斯坦问题。”

687 号决议规定一个为期 48 天的“善意的暂停”，并没有迎来达成政治解决的过渡，而成为走向战争的临界状态。秘书长的一连串外交活动，各国领导人和许多国际知名人士的劝告和呼吁，均未使伊拉克改弦更张，纠正错误。1991 年 1 月 17 日巴格达时间凌晨 2 时 40 分，即在安理会规定的最后期限过了大约 19 小时后，以美国为首的 29 个国家组成的多国部队向伊拉克发起进攻，首先从空中向伊拉克发动大规模空战，代号为“沙漠风暴行动”的

海湾战争正式爆发。德奎利亚尔当即对此表示遗憾，他说：“作为联合国这样一个和平组织的秘书长，我对这次战争只能表示悲痛。”但他也认为，安理会没有鲁莽从事，已给予伊拉克充分时间去执行安理会决议，是在所有的劝告都遭拒绝后，才付诸武力去恢复科威特主权的，今后任何公正的评价都不能忽视这一事实。2月24日多国部队开始发动地面进攻，只经过4天的激战，伊拉克就遭到彻底失败。同月28日，伊拉克被迫宣布无条件地全面接受安理会自1990年8月2日以来通过的所有12项决议，持续43天的海湾战争宣告结束。4月3日，安理会通过了由美国提出的关于在海湾地区正式停火的决议草案，即安理会687号决议，它具体、详尽地规定了恢复海湾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条件。后伊拉克外长致函秘书长和安理会主席，表示伊拉克接受687号决议，同时称决议是“不公正的”，是“邪恶的报复性措施”，是对伊主权和权利的“史无前例的攻击”，但又说伊拉克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一决议。4月11日，海湾实现正式停火。根据687号决议，4月9日安理会通过689号决议，决定组建联合国伊、科观察团，以对伊、科两国接壤的非军事区实行监督，观察团只在自卫时使用武力。4月18日，德奎利亚尔根据687号决议向安理会提交一份报告，建议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实施销毁伊拉克的生物、化学武器和其他武器的计划。687号决议要求伊拉克必须无条件地同意在国际监督下销毁其所有化学、生物武器和射程超过150公里的弹道导弹，并要求秘书长提出具体实施计划。特委会由20~25个国家组成，分为五个小组，分别负责销毁武器的各项有关事项。同年5月，德奎利亚尔根据687号决议成立了划分伊、科边界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秘书长任命的3名独立的专家和伊、科各派一名代表组成，以标定伊、科两国1963年边界条约商定的边界。该委员会规定将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有关边界划分的决定将是不可更改的。1992年4月17日，伊、科边界正式确定。

德奎利亚尔在推动贯彻执行安理会的各项决议时，注意关心伊拉克人民的疾苦，维护伊拉克的独立和主权，他反对实施旨在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制裁措施，他说：“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我不能同意旨在推翻联合国一个成员国的政府的措施”，“如果实行制裁的目的是为了推翻伊拉克政权，那么我就不同意，我不能同意”；“萨达姆·侯赛因下不下台是伊拉克人民的事，不由联合国或其他国家决定”。他在谈到难民问题时说，外国军队在伊拉克北部建立难民收容中心需要得到伊拉克政府的批准，他希望和伊拉克官员接触，看看他们对外国军队在其领土上存在的反应，他认为外国军事人员在伊拉克领土上的存在会引起法律方面的问题，但从人道主义观点看还行得通。他呼吁国际社会向在海湾战争中遭受损失的伊拉克、科威特、约旦、土耳其和伊朗等国提供援助，表示联合国将尽快承担救援伊拉克难民的工作。1991年4月26日他在安理会一次非正式会议上说，美英法三国已于4月20日开始在伊拉克北部建立难民营，收容因伊拉克内乱而流离失所的库尔德族难民。鉴于伊拉克政府反对它们在伊境内建立库尔德人难民营，联合国承担救援伊拉克难民的工作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他还说，作为救援工作的一部分，联合国的两支工作队将于4月29日分别从巴格达和土耳其出发，向难民聚集地区运送救济物品，并协商接管美英法建立的难民营。据秘书长透露，伊拉克难民人数已超过160多万，其中逃亡伊朗的有100多万，在伊、土边境地区和土耳其境内的达41万多人，伊拉克境内还有20万人。对此，德奎利亚尔说，伊拉克的人道主义救援非常需要，而且规模较大，所以他在1991

年9月9日公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安理会批准伊拉克出口16亿美元的石油不能满足该国人道主义的需要,而且其中只有9.33亿美元能用于人道主义援助目的,需要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同年9月,德奎利亚尔向第四十六届联大作工作报告,指出在当今经济相互依赖的情况下,实施全面经济制裁会影响与被制裁国有经济关系的第三国,因此,应对其给予适当帮助,而对于被制裁国家人民所遭遇的苦难亦不能忽视。整个海湾危机期间,安理会通过了针对伊拉克的24个决议,对恢复海湾地区和平及处理海湾战争的善后问题起了积极作用,德奎利亚尔对联合国的作用也给予很高评价,他本人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联合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先后在伊拉克南、北部以种种借口建立所谓的“禁飞区”和“安全区”等,这样严重损害伊拉克主权的霸权行径及分裂、支解伊拉克的企图显得束手无策,无可奈何,有损联合国的形象。世界舆论认为,联合国绝不能成为某些大国用来谋取新霸权的挡箭牌和护身符。

(七) 为纳米比亚独立作出贡献

纳米比亚共和国位于非洲西南部,原称西南非洲,1968年改为现名。历史上曾遭荷兰、西班牙、英国和德国等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和占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南非以参加协约国对德国作战为名,于1915年7月出兵占领西南非洲,1920年12月17日国际联盟“委托”南非托管,1949年4月南非议会通过《西南非洲事务修正法》,吞并西南非洲。1950年7月联合国国际法院宣布此项修正法为非法,此后联合国大会多次通过决议要求南非结束其非法占领。1978年9月29日,安理会通过435号决议,要求南非结束在纳米比亚的非法统治,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自由公正选举。安理会授权成立一个为期最多一年的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援助团,协助秘书长特别代表工作。为推动435号决议的贯彻执行,联大会议要求所有会员国断绝同南非的一切关系。建议安理会对南非实施全面性强制性制裁。联合国的行动有力地支持了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但南非当局以各种理由为借口拒不执行安理会435号决议,如它把纳米比亚问题同安哥拉问题联系起来,声称古巴不从安哥拉撤军,南非就不撤出纳米比亚。1981年9月,德奎利亚尔主持召开联合国紧急特别会议,审议纳米比亚问题,要求南非无条件执行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计划,强调435号决议是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基础,呼吁进一步强化对南非的制裁措施。1983年4月,联合国在巴黎召开“支援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国际会议”,并通过了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巴黎宣言。1985年2月德奎利亚尔在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呼吁国际社会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正义斗争,他在总结战后取得非殖民化的历史成就时,特别强调纳米比亚的独立问题,重申安理会435号决议是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的可靠保证。同年8月,他访问南部非洲国家,在比勒陀利亚同南非当局就南部非洲问题特别是纳米比亚问题举行会谈,由于南非坚持要以古巴从安哥拉撤军作为先决条件,纳米比亚的独立问题未能取得进展。

南非当局长期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不得人心,内外交困,尤其在国际上处境十分孤立,进入8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苏两国关系趋于缓和,出现了有利于推动政治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新局面,迫使南非当局放弃占领政策,以实际行动执行安理会435号决议。1988年安哥拉、古巴、南非和美国先后在伦敦、开罗和纽约举行正式会谈,达成了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14点原

则协议。同年9月，德奎利亚尔再次访问南非，同南非总统博塔举行会谈，强调联合国在执行435号决议的过程中将采取“最公正的态度”，确保纳米比亚的各派都享有“平等的地位”。同年12月22日，安哥拉、古巴和南非三国在纽约签署关于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三方协议，同意自1989年4月1日起实施435号决议。1989年2月安理会批准了德奎利亚尔关于建立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建议。1989年4月1日敌对双方正式停火，纳米比亚恢复了和平。7月18~21日，德奎利亚尔访问纳米比亚，并作实地视察，对纳米比亚独立进程表示满意，他在同月24日开幕的第二十五届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上说，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军队已按联合国和平计划的要求予以削减，并在联合国临时援助团的监督下撤回兵营，纳米比亚全境的选民登记中心已开始工作，大选将如期举行。还说联合国正在审议选举法草案，以确保纳米比亚举行首次自由公正的选举，让纳米比亚人民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11月7~11日，纳米比亚如期大选，萨姆·努乔马领导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获胜。1990年2月9日，制宪议会通过独立后的纳米比亚宪法，16日制宪议会一致选举努乔马为总统。3月21日，德奎利亚尔亲自参加纳米比亚的独立庆典，主持独立升旗及努乔马就任总统的仪式，并发表讲话，说纳米比亚独立标志着国际法准则的胜利，并为解决其他国际问题树立了榜样。同年4月23日，纳米比亚正式加入联合国，成为第160个会员国。

随着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安哥拉的内战日趋平息下来，1991年古巴完全撤军以后，南非支持安哥拉反对派的活动不断减少，安哥拉长期对立的两大派，即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领导的、处于掌权地位的人民革命运动和萨文比领导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于1991年5月31日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签署了和平协议。与此同时，南非的政治改革进程也已起步，长期处于“热点”的南部非洲开始走向和平与稳定。

（八）推动在西撒哈拉实现停火

西撒哈拉是欧洲老殖民主义者西班牙遗留下来的问题。非洲国家统一组织、联合国以及德奎利亚尔的前任曾为解决西撒哈拉问题做了巨大的努力。德奎利亚尔任职后对此继续做了不少工作，在其第二个任期尚剩数月时，终于在他的推动下在西撒哈拉实现了停火，从而结束了长达16年之久的武装冲突，为最终决定西撒哈拉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西撒哈拉位于非洲西北部。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进入该地区。15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入侵。1886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联合国一直要求西班牙给予西撒哈拉人民自决权。1973年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波利萨里奥阵线，简称西撒人阵）成立，决定通过武装斗争取得西撒独立。1976年西班牙被迫放弃西撒哈拉后，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两国分割了西撒哈拉，同年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在阿尔及利亚的支持下，宣布成立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从此，西撒人民展开了反对摩、毛占领者的武装斗争。1979年8月5日毛里塔尼亚同西撒人阵签订和平协定，放弃对西撒的领土要求，退出西撒战争，摩洛哥随即占领了毛里塔尼亚退出的地区。这之后，非洲国家统一组织首脑会议数次做出决议，呼吁在西撒停火，举行公民投票，摩洛哥因之退出了非统组织。

联合国大会多次通过决议，重申西撒哈拉人民拥有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1984年12月联合国决定，由德奎利亚尔出面同西撒问题有关各方磋商，以便为在西撒哈拉举行公民投票做准备。1985年7月18日，德

奎利亚尔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会见出席第二十一届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的西撒人阵领导人阿卜杜勒·阿齐兹，掌握了西撒哈拉最新事态的发展情况。次日，飞抵拉巴特对摩洛哥进行为期3天的工作访问，同哈桑二世国王举行了长时间会谈，后向联大提交了一份有关西撒问题的报告。1986年4~5月在德奎利亚尔主持下，摩洛哥和西撒人阵在纽约举行了两轮间接谈判，1987年7月双方又在日内瓦举行第三轮间接谈判。同年11月，联合国技术小组向德奎利亚尔提交了一份关于西撒问题的实地考察报告。1988年8月11日，德奎利亚尔在纽约分别会见摩洛哥外交大臣菲拉利和西撒人阵执委会委员穆西塔法，向他们递交了秘书长新的和平计划，9月安理会授权德奎利亚尔任命一名特别代表负责处理与西撒有关的问题。1989年初，摩洛哥与西撒人阵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举行首次直接对话，同月德奎利亚尔任命的特别代表访问西撒地区，与争端双方就诸如举行公民投票的具体安排等实质性问题进行讨论。6月德奎利亚尔先后访问了阿尔及利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和塞内加尔等非洲五国，同被访国领导人就实施西撒和平计划进行更为广泛的接触和磋商。同月30日他又宣布经冲突各方同意决定设立一技术小组，以加速实施和平计划。1990年2~3月又派西撒事务特别代表先后出访有关国家，继续调停和斡旋。3月底，德奎利亚尔亲赴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作为期4天的穿梭访问，并在阿、西边境会晤了西撒人阵领导人，说同各方领导人的会见是有益的，西撒和平进程已取得了进展。6月19日德奎利亚尔发表了西撒局势的报告，提出了西撒和平计划的执行计划。计划要求在停火生效后6个月在西撒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西撒的前途，并向西撒派遣一支联合国和平部队，监督将在那里举行的公民投票。拟议中的联合国和平部队称之为“联合国西撒哈拉公民投票观察团”。执行计划还规定在停火3个月，摩洛哥将减少其驻西撒的部队，在公民投票之前和投票期间，西撒人阵游击队和留驻西撒的摩洛哥部队将集中到指定地点，并由联合国和平部队对他们实行监督，同月安理会审议了该计划。1991年4月安理会通过690号决议，批准秘书长关于在西撒举行公民投票的修正案，规定自5月17日起16周内宣布在西撒停火，停火后11周内，双方交换战俘，确定参加公民投票人员名单，摩洛哥在西撒驻军减至65000人，从停火后第17周起准备公民投票，3周后举行公民投票。同年6月27日摩洛哥与西撒人阵接受在9月6日停火，9月5日联合国西撒公民投票观察团进驻西撒哈拉，次日交战双方宣布正式停火，长达16年之久的西撒战争宣告结束。因双方在如何确定参加公民投票的选民问题上出现分歧，公民投票未能在1992年1月如期举行。

（九）为中美洲和平发挥积极作用

中美洲问题的核心是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两国的内战，外国强权势力的卷入，使中美洲局势长期动荡不安，危及整个中美洲乃至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安全。80年代后半期，美、苏关系趋向缓和，为政治解决中美洲问题带来新的机遇。

长期以来美国支配着拉美，视其为自己的“后院”。1959年初古巴革命的胜利，使拉美的政治格局发生新的变化，而古巴支持的尼加拉瓜圣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于1979年取得政权，更加鼓舞了中美洲其他诸如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国内的反政府游击战争，日益威胁美国在拉美的霸主地位。为抵御苏联的渗透和影响，美国不惜从经济和军事上大力支持萨、洪、危等国的亲美政权，加强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援助，抑制苏、古的渗透，从而使中美

洲地区的“低烈度”代理人战争愈演愈烈。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巴拿马为本国和地区的安全，于1983年1月成立孔塔多拉集团，以调解尼加拉瓜内战，德奎利亚尔随即表示支持该集团为中美洲和平所作的积极努力，同年11月将中美洲局势开始列入联大议程，他说要为政治解决中美洲冲突作新的努力。1985年5、6月出访古巴、多米尼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及孔塔多拉集团有关国家，就中美洲形势同被访国家领导人进行磋商，了解有关各方对中美洲问题的立场。1986年11月他就四十一届联大审议中美洲局势问题向联大提出报告，指出中美洲问题除了和平协商的方式外，别无其他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还对中美洲某些国家正在遭到的日益严重的外来压力表示遗憾。1987年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危地马拉等中美洲五国签署关于美洲稳定与和平的协议，推动了尼加拉瓜冲突双方的和谈与对话，并签署了萨波阿停火协议。1988年3月德奎利亚尔发表讲话，对该协议表示满意，并敦促双方认真执行协议的各项条款，同年4月1日萨波阿协议生效，尼加拉瓜实现了停火，1989年2月，德奎利亚尔发声明，支持中美洲五国总统在萨签署的有关撤除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在洪都拉斯境内的基地、重新安置游击队员、尼加拉瓜政府释放政治犯的协议，同年9月，他又宣布成立联合国考察尼加拉瓜选举观察团的决定，为尼加拉瓜在1990年2月25日举行自由、公正的大选发挥了重大作用。

尼加拉瓜的停火并成功地举行了大选，实现了全国和解，大大缓和了中美洲的紧张局势，推动了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两国内部敌对各方的和谈，加快了中美洲和平进程。萨尔瓦多内战是中美洲危机的又一个“热点”。该国70年代以来出现游击队活动，但遭到政府镇压。1979年后内战迅速升级，反政府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越战越勇，萨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984年和1987年萨政府和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曾举行过3次对话，但未取得结果。1989年新政府上台，萨国内形势出现新的转机，克里斯蒂亚尼总统调整了对游击队的方针，更强调以政治方式解决内战，1990年1月29日克里斯蒂亚尼总统邀请德奎利亚尔出面充当萨政府和游击队恢复和谈的调解人。同年5月在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和秘书长私人代表阿尔瓦罗·德索托的主持下，政府和游击队代表在加拉加斯正式恢复第五轮和谈，双方就争取国内和平的日程达成政治协议。同年8月，德奎利亚尔出访哥伦比亚等国，讨论中美洲局势，推动萨尔瓦多的和谈进程。1991年4月，萨政府和游击队在墨西哥城继续和谈，双方在修改宪法、武装部队、司法体制、选举制度和人权问题上达成《墨西哥协议》。8月德奎利亚尔亲自主持和参加萨尔瓦多交战双方的新一轮谈判，在游击队参与国内政治生活、组建新的国民警察等问题上取得新的进展。12月德奎利亚尔邀请萨总统和游击队代表在纽约再次进行和谈，同月31日，在德奎利亚尔主持下，萨政府和游击队就最终停止武装冲突、游击队解除武装转为合法政党、政府军裁减一半和修改宪法等达成协议并签署了《纽约纪要》。1992年1月16日，德奎利亚尔的继任人加利亲自参加萨政府和游击队代表在墨西哥城正式签署《和平协定》的仪式，在联合国严格控制下，萨政府军与游击队从2月1日起开始正式停火，历时12年之久的萨内战宣告结束，萨尔瓦多实现了和平。至此，中美洲问题基本上获得解决，危地马拉内战虽已延续30余年，但对整个中美洲局势影响不大，且近几年危国内和平进程步伐加快，1996年12月29日，危政府和游击队组织危地马拉全国革命联盟正式签署最终和平协定，中美洲完全

实现和平。

对解决其他问题的立场和主张

德奎利亚尔是继吴丹之后第二位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联合国秘书长，在涉及到世界各国的安全和发展，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时，总是表明其鲜明的第三世界观点和立场，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第三世界国家声张正义。

（一）关于其继任人人选问题

1991年9月他在谈及联合国新任秘书长时明确表示，希望有一位非洲人来接替他，他说，联合国是一个“平等和民主的组织，不是君主国”。指出他的前任中有两位斯堪的纳维亚人，一位缅甸人和一位奥地利人，秘书长一职从未由非洲人或东欧人担任过，因此，希望看到一位非洲人接替他。

（二）支持建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他说，二战后独立的新兴国家中，绝大部分国家的发展状况不尽人意，尤其在80年代，许多国家，特别是非洲和拉美国家以及部分亚洲国家，经历了深刻而持久的经济危机，使多数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因素，一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关税壁垒。他呼吁停止关税保护主义的做法，实行开放性的贸易制度。他说，发展中国家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增长是70年代突出的成绩之一，为保持这种增长的势头，发展中国家要不断革新产品，实行技术革命，提高产品的种类和质量，增强其国际竞争力，同时要求发达国家在提供资金和转让技术方面予以大力支持。第二个因素是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使其对初级产品的需求锐减，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入下降。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持续失衡又引起了汇率、利率以及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加深了发展中国家的困难。另外美国的巨额贸易和财政赤字吸走了大量国际剩余资金，并导致资金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他指出90年代应设法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保证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每年至少增长2.5%，呼吁发达国家对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予以特别的关注。要求加强南北对话与合作，指出没有南北合作，世界持久的稳定与和平就没有保障，只要南方国家始终处于困境之中，北方国家就不可能安稳地享有繁荣。他说，发展的巨大差距将地球分为两半，而这些差距本身就滋生着紧张关系的萌芽，缩小发展差距应该成为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成为国际社会每个成员的义务。他指出，整个80年代最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人均生产总值下降，外贸总额仅占世界贸易的1%，他呼吁发达国家通过足够而有效的财政援助和贸易措施，来支持最不发达国家为发展民族经济作出努力。他还赞扬“77国集团”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作用，说它在推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和经济合作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并要求它继续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挥强有力的对话者的作用。1989年在国际发展会议上要求大国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严重的债务负担，他说，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比30年代的萧条时期还要严重。目前，拉美国家的人均收入低于80年代初期，第三世界国家有8亿人在忍饥挨饿。他指出，债务国和债权国需要共同采取行动，制定出长期和有利于发展的解决债务问题的措施。特别是西方7国集团应优先考虑减少第三世界的债务，同时保证继续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援助，呼吁富国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7%作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从而使现在的援助翻一番。同

年 11 月德奎利亚尔对解决债务问题提出了三点意见：第一，加速并简化削减债务计划谈判进程，贯彻现有债务战略时需要加快速度和更加灵活；第二，现有削减债务工作需要国际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的资金；第三，对低收入国家，如非洲国家，应进一步减免它们的债务和降低贷款利率。他还呼吁发展中国家加紧海洋开发，他在 1991 年 12 月 12 日递交给联大讨论的一份有关海洋资源开发的报告中指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一种有效利用海洋资源的意识，没有认识到海洋资源开发对其社会经济发展潜在的重要性，这是有效利用这些资源的首要障碍，他希望有海洋开发传统的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努力，并吸收采用新的开发方式以提高生产力。

（三）主张加强反毒斗争

1990 年 2 月 20 日德奎利亚尔在禁毒特别联大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打击毒品走私活动。他说，此次特别联大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难得机会，以便把共同商定的扫毒战略转变为一项明确的全球性行动纲领，这样一项行动纲领必须建立在全球合作基础之上，任何国家都不应无动于衷，置身度外。他指出，毒品生产在许多情况下是“经济贫困和缺乏可行替代办法的表现，在许多国家里债务的阴影严重危及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他要求国际社会在开发经济方面协调努力，因为“如果不针对毒品问题的所有方面展开协调的、全面的进攻，就不可能找到一个永久性地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他还要求有关国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毒品消费。毒品生产已成为一项举足轻重的全球性工业，其销售额已超过石油贸易额，仅次于军火贸易。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每年的消费额在 500 亿到 1000 亿美元之间。他呼吁全世界各机构和组织加强努力，防止滥用麻醉药品，并且帮助那些毒品受害者戒毒。他说，滥用麻醉药品和毒品走私的急剧增加，要求采取反对毒品的紧急行动，在减少毒品需求和防止滥用毒品的斗争中，社会各界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每个家庭和每个学校以及那些从事医疗保健和新闻等事业的人员的参与则更加重要。

（四）积极主张核裁军

德奎利亚尔 1987 年向第四十二届联大提出的报告中，把防止核战争列为世界性挑战之首，他指出当今世界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是制止爆发核战争，这关系到全人类的安全和幸福。现已部署的数量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是“没有道理的”，即使美国和苏联达成销毁其所有中程核导弹的协议，余下的核武器也“足以摧毁地球许多次”。他呼吁加速多边削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谈判的进程，说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在核裁军和避免战争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两个主要核大国如果达成一项协议是十分重要的，它将有助于推动正在进行的其他裁军谈判。他认为尽早缔结一项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获取、转让和使用化学武器，以及销毁这些武器的多国公约是“非常重要的”。他赞扬欧安会 34 国首脑在巴黎达成的欧洲常规裁军条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说这项条约不仅是政治变革的反映，它实际上是为欧洲和北美的安全建立了一个必要的新框架，它将大大阻止大规模的进攻行动，并将建立一套严密的核查和数据交换措施，以便增加透明度和促进相互信任。他坚信欧洲常规裁军条约将为达成其他的裁军协议铺平道路。只要欧安会成员国认真考虑采取单方面的各种诸如改变研究与发展计划、削减军工生产、限制常规武器的转让等措施，就能维护欧安会进程，最终建立欧洲持久的和平。

（五）积极支持朝鲜北南对话，促进和平统一

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后，朝鲜南北对立局面仍然严峻，美国继续在韩国驻军以及对朝鲜事务的干涉，更阻止了朝鲜的和平统一进程。1986年2月德奎利亚尔复信朝鲜外交部长，欢迎朝鲜政府再次作出的关于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继续进行北南对话的保证，指出北南的分裂状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继续加强对话与和平协商，对于实现朝鲜半岛持久的和平与安全以及朝鲜民族的统一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1988年联大重新讨论朝鲜问题，对推动双方的接触和对话起了积极作用。1991年北南双方都加入了联合国，但南北双方仍不时出现摩擦和冲突，朝鲜长期分裂的局面仍将持续一个时期。

（六）对中国态度

1971年5月，当时任秘鲁驻联合国代表的德奎利亚尔就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没有代表，这是整个国际大家庭所不安的。同年10月宣布秘鲁支持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提案，说两个中国的政策“在政治上是无益的”。他热烈祝贺中、英两国政府1984年达成的关于香港问题协议，说两国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应大力提倡，只要有善意和决心，任何双边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他赞扬中国与联合国的合作，说联合国与中国的合作一直是令人满意的，联合国今后将继续保持和加强同中国的友好合作，认为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国家，一定能够在推动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对话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他赞扬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取得的伟大成就，说中国在进行重大结构变动和加强对世界经济的参与方面取得了成功，并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1992年7月他在出席由万国宝通银行举办的“世界领袖巡回演说”活动时说，作为一个外交家和律师，他认为1989年的“六·四”事件必须得到足够的证据，才可以指责中国政府违反人权，说他当时身为联合国秘书长，亦曾尝试寻找证据，但却没有获得足够证据证明中国违反了人权。他提醒说，一般人往往会过分着重政治上的人权观念，例如美国的选举制度，但却往往忽略了一些最基本的人权观念，如生存、温饱及医药救济等权利。事实上，上述几项基本人权在中国已经得到保证，希望美国不要把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同人权混为一谈。

（七）强调加强联合国维持和平的作用

联合国自1945年成立以来，在解决国际纠纷、缓和世界紧张局势、解决地区问题及国与国之间的问题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德奎利亚尔1984年在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中说，战后发展表明，人类社会的互相依存和加强多边合作不可缺少，随着联合国作用的增强，它已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解决各种普遍关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中心。联合国解决影响国际和平与人类进步一系列问题的能力，是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与之相比拟的。不论是否愿意接受，今天的世界已是各国相互依存的世界，联合国在这个世界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1985年1月他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发表讲演时说，联合国成立以来，一直面临着一个充满紧张局势、军备竞赛、民族利益纠纷、各国经济力量悬殊以及贫穷、干旱和饥饿的世界。面对这种情况，联合国进行了艰苦的工作，成功地建立了已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律秩序。到目前为止，联合国已缔结了350项多边条约，其中有许多是“十分重要的”条约，以前缔结多边条约的国家很少超过10个，而今天一项联合国公约至少会有50个国家参加缔结，有些重大公约的缔结国甚至超过100个。他指出，鉴于当前

世界上不断发生暴力和冲突，国际关系中存在着混乱，核军备竞赛和常规武器竞赛依然十分激烈，支持联合国和增强联合国履行其使命的能力是各国义不容辞的事情。1991年他又指出冷战引起的两极化局面的消失，并不足以为世界各国人民带来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当前的国际形势是希望与危险并存，一些地区还存在纷争的根源，有的地区已出现冲突，因此要加强联合国维持和平的作用和能力，努力消除国际关系中导致暴力对抗或不稳定的危险因素。他呼吁各会员国尤其是各大国要加强同联合国的合作，支持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工作，使之起到更有效地维持和平的作用。

兴趣广泛知识渊博

德奎利亚尔的任期曾被称为是秘书长工作“最富有成效的10年”。由于他不懈的努力和卓著的工作成就，曾被提名为1988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同年他被拉美记者协会授予“银舟奖”以表彰他为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作出的杰出贡献。1989年1月10日他在斯德哥尔摩被授予1988年奥洛夫·帕尔梅奖。授奖仪式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隆重举行。奥洛夫·帕尔梅纪念基金会主席、瑞典外交大臣斯滕·安德松在致辞中指出，1988年不仅是和平事业取得进展的一年，也是联合国在维持和实现和平方面的实际作用有所突破的一年，授予德奎利亚尔帕尔梅奖是为了表彰“在他的全力领导下，联合国给世界又带来了和平的希望”。瑞典首相英瓦尔·卡尔松也在仪式上讲话赞扬德奎利亚尔为推进和平进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联合的历史上发挥了非常特殊的重要作用”。帕尔梅纪念基金会是帕尔梅的家属和瑞典社会民主党为了纪念这位前首相而设立的，用以表彰为促进和平和国际了解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此次帕尔梅奖金额为10万瑞典克朗（约2万美元）。德奎利亚尔在授奖仪式上表示，他将用这笔奖金设立帕尔梅信托基金，为研究和平事业的学生提供奖学金。1990年2月，奥纳西斯基基金会授予他“奥纳西斯—雅典娜”1990年人和人类奖，表彰他在解决国际冲突和振兴联合国机构中所作出的努力。1991年11月25日，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在王宫授予他西班牙最高公民奖，国王称他在任职期间完成了“地球上最棘手的工作”。同年12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他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勋章。

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德奎利亚尔，每天的生活节奏是相当紧张的。每当他感到疲劳时，总是喜欢听巴赫和舒伯特的乐曲，有时，他也会读一读法国和拉丁美洲的文学作品。他爱好艺术、建筑和古典音乐，同时也喜爱烹调。闲暇时，他会亲自下厨做几道好菜与家人或朋友共享。此外，他对于罗马教堂和古墓遗址也颇有研究。他还是一位集邮爱好者，说集邮是他“天然嗜好”。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不但是一位众所周知的职业外交家，还是一位造诣颇深的学者。1962~1964年，德奎利亚尔曾在从事外交工作的同时，兼任秘鲁外交学院外交法教授、空军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曾是秘鲁国际法协会会员、国际法研究泛美协会成员以及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成员，并著有《外交法》和《对国家和政府的承认》等书。他还擅长写诗，他创作的许多诗在世人中广为流传。他还被世界上许多大学授予博士荣誉称号。卸任秘书长后曾受聘于两家瑞士外国银行。1995年曾由争取秘鲁联盟推选为总统候选人。他的妻子马尔塞拉·坦普莱曾从事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如在慈善救济、儿童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周瑞芳）

矢志改革、壮志未酬的第六任秘书长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

1991年底，埃及人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当选为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成为第一位来自非洲的联合国秘书长。自任职后，加利致力于加强联合国的实力，努力增强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为联合国在冷战结束后如何更有效地展开工作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有效尝试；对维护世界和平孜孜不倦，起了有益作用；任内为联合国所做的工作受到代表们的普遍赞扬。但是，由于性格倔强的加利一再坚持维护联合国“最低限度的独立性”，并因此在处理索马里、波黑等问题上与美国屡屡产生分歧，最终招致了美国的不满。美国以加利“对联合国改革不力”为由，对其第二任期行使了否决权，使加利成为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位没有获得连任的秘书长。1996年12月31日，加利结束了他的5年任期，壮志难酬，踏着纽约冬日的萧萧风雨告别“玻璃宫”，返回非洲。

出身宦宦之家

1991年12月3日，由16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正式任命埃及人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为联合国的第六任秘书长，任期是从1992年1月1日至1996年12月31日。加利的当选受到世界注目，特别是遥遥万里之外的他的祖国——埃及，千百万埃及人通过电视观看了加利出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宣誓仪式，他们呼喊加利的名字，为自己的大陆——非洲感到骄傲，为自己的祖国——埃及感到骄傲，更为这位“天生英才”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感到骄傲。

加利出身于埃及最富有而且政治上最活跃的家族之一，历史上，加利家族曾为国家输送了好几位部长级以上的高官要人。他的祖父布特罗斯·帕沙·加利曾任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福阿德王朝的首相，1910年遇刺身亡；父亲也曾担任过财政大臣。在政治气氛如此浓厚的家庭成长起来的加利从小就对仕途、对外交界很向往，立志要像自己的祖辈父辈那样，有朝一日也能出人头地，光耀门楣。小加利虽然没见过自己的祖父，但却对这位曾任首相要职的祖辈钦慕不已。为了纪念他，加利在其名布特罗斯和姓加利中间又加上祖父名布特罗斯，成为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加利家族属于信奉基督教的科普特人，科普特基督教是埃及最主要的基督教派，但在埃及这个穆斯林占人口总数90%的国度里，科普特教实在难以引人注目。

加利生于1922年11月14日，这一年正是埃及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年份，这一天恰巧也正是印度著名的开国元勋尼赫鲁的诞辰日。是否上天在暗示这个小生命将来会加官进爵，前途远大？家里人对小加利也是格外垂青，为他创造了一切优良的生活和学习条件，加利就是在这样温暖、舒适的环境中无忧无虑地生活着，但他并不像一般富家子弟放荡不羁，贪图享乐。加利自小就养成了勤奋好学的品德，在法加拉区上学读书时，他不仅功课门门优秀，而且对世界各种文化也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博览群书，不但丰富了知识，也开阔了视野。除了读书，年轻的加利爱好十分广泛，尤其对体育活动极感兴趣，几乎尝试过所有的体育项目，包括骑马、击剑、狩猎等颇具危险度的活动，他甚至还学过驾驶当时仍处于新生阶段的飞机，获得了屈指可数的飞行执照。丰富多彩，悠然自得的童年时光使得加利从小就乐观、自信、雄心勃勃。

加利所受的高等教育主要是在法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方面。1946年，

刚满 24 岁的加利从开罗大学毕业，即赴向往已久的法国巴黎求学，1949 年获巴黎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三年的留法生活使加利获益匪浅，他不仅对国际法有了深入的了解，更重要的是经过专门训练，他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法语。加利还对法国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这个美丽、浪漫的国度不仅有迷人的塞纳河、辉煌的卢浮宫、壮观的凯旋门，还有大文豪雨果、巴尔扎克以及音乐巨匠德彪西、比才，如此浓厚的文化氛围深深地吸引了从小就喜爱文学、艺术的加利。因此，尽管他英语讲得不错，但有时故意流露出法国腔，而且还时不时地顺口用一些法语特有的表达形式。他的一些朋友干脆管他叫“皮埃尔”（法国人常用的名字）。也许加利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段法国经历竟在 45 年后对他竞选联合国秘书长一职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因为他曾经在法国留学，精通法语，且对法国友好，在竞选秘书长时才得到密特朗总统的大力支持。

加利归国后，由于他的身世背景和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等因素，他并没有如愿走入政界，而是在学术界开始了自己的学者生涯。他首先担任了开罗大学国际法和政治学教授。1954 年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1965 年 5 月，加利任海牙国际法研究中心副主席兼海牙国际法教授协会主席。1967 年加利受委托创办了开罗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任政治系主任，后任院长。除在开罗大学执教外，加利还兼任欧、美一些大学的非专职教授，并曾在金字塔出版社任职，负责《金字塔报》的经济副刊和该社所属的《国际事务》杂志的撰稿工作，他还出任了《金字塔报》政治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这一研究机构被称为是埃及的“思想库”，对埃及政府在内政外交政策方面起着重要的咨询作用。据说，埃及前总统萨达特就是看中了他在这个位置上所显示出的才气和能力，才调他去搞对外工作的，当然这是后话。作为师长，加利博士的教学风格深受学生们的喜爱，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却又谦恭随和，特别是他擅于将理论同实践相结合，例如，他教授政治系学生有关国际法、联合国宪章等课程时，他往往引导学生将这些法律同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紧密结合起来进行讨论、研究，从而加深了学生的理解能力。作为学者，加利也以自己的勤奋与博学赢得了同行们的称赞。他是位多产的学者，学术上硕果累累，著作颇丰，现已有 100 多本著作出版问世，在国内外发表过的学术论文也有上百篇。值得一提的，是奠定了他在国际法学的学术地位的有关也门和阿拉伯联盟的两篇最著名的论文和旨在“尽量打破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至今仍是‘欧洲中心论’的一统天下”的《非洲边界争端》一书，加利以此书为中心的非洲系列专著文章使他最终成为“埃及非洲政策的化身”。此外，《国家与国际组织平等原则》、《世界变化中的外交政策》、《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统一组织》等也都是极有影响的专著。就任联合国秘书长后，尽管公务繁忙，加利仍是笔耕不辍，他常常拂晓起床进行写作。他说：“我步入中年以后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和写作”。现在加利正着手把法国文学翻译成阿拉伯文，他说这是自己在法国留学时就有的心愿。而且加利还表示，在五年秘书长任期期满后，他打算写一本权威性的详细描述自《戴维营协议》以来开始的中东和平进程的著作。

加利曾结婚两次，尤其是他与第二任夫人玛丽雅·莱拉的婚姻令他津津乐道。1956 年加利应朋友邀请出席在亚历山大市举办的一次舞会。刚从美国回来的加利风度翩翩，博学多才，很快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这当然也吸引了玛丽雅·莱拉女士的视线。莱拉女士是出生于埃及上流社会的犹太人的

后裔，她举止优雅、热情开朗，在埃及上流社会很有知名度。当她出现在加利面前时，加利也被她的美貌与热情所吸引，两人一见钟情。从此这对令人羡慕的郎才女貌的搭配开始了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人生旅程。人们常说“一个伟大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个更伟大的女人”，如果说身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加利是这个伟大的男人的话，那么这个更伟大的女人就非莱拉莫属。加利从政以后主管外交工作，常常往返奔波于各国之间，两人是聚少离多，莱拉却毫无怨言，总是从生活上和事业上关心、支持自己的丈夫。难怪加利每次回忆自己的婚姻生活时都充满深情地说：“我结婚多年，虽然膝下无一子半女，无福享受天伦之乐，但妻子温柔贤淑，知书达理使我依然像年轻人一样充满朝气，快乐无忧。”

临危受命

50年代初，是埃及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变革时期，1952年埃及爆发了7月革命，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王朝，1953年6月废除君主制宣布成立共和国。刚从法国留学回来，风华正茂的加利本想大显身手，一展鸿鹄之志，无奈这时候的埃及没有给加利提供从政的土壤。当时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在对外政策上奉行激进的主张，不仅联苏反帝反美而且宣扬阿拉伯民族主义，企图消灭以色列。对以色列采取“三不”政策（不承认以色列，不与以色列直接谈判，不与以色列缔结和约）。而加利由于与西方有一定联系，且属科普特基督教徒以及妻子是犹太族等原因，则与纳赛尔的主张，格格不入。因而，在这一时期可说是天时，地利，人和这三种成功因素加利无一具备。

加利在政治上实现其童年的梦想是在萨达特就任埃及总统之后。萨达特这位与纳赛尔同年出生的新总统是一个思想开朗、重实际、讲实效的政治家。他上台后，在对外政策上作出了影响深远的决策。首先，他抛弃了纳赛尔时代的联苏反美政策，主张利用美国的影响来解决阿以问题。其次，改变对以色列的“三不”政策，主张在以色列放弃侵略政策前提下，与以实现和解。为了消除1967年“六天战争”的惨败罩在埃及人民心中的巨大阴影，改变阿以之间的实力对比，取得改变阿以关系的主动地位，萨达特总统于1973年发动了对以色列的赎罪日战争（又称斋月战争）并取得很大成功。这次战争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也使萨达特成为埃及乃至阿拉伯世界人民心目中的英雄。此时他又不失时机地呼吁以色列从1967年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撤走并公正地对待巴勒斯坦人的要求，还许诺愿意给以色列和平与安全的边界。萨达特这一倡导揭开了埃及以及阿以关系的新一页，即通过谈判解决阿以冲突被列入日程。正是萨达特对外政策的这一改变给加利提供了从政的良机。此外，萨达特为稳定国内政局，缓和人数较少的科普特基督教徒与人数众多的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开始任命科普特人为政府的高级官员，这也为加利从政提供了机会。于是，1973年斋月战争后，加利便走向埃及政坛。从1973~1977年，加利以其才华出众在首都外交界崭露头角。1977年加利55岁时被任命为埃及内阁中的不管部长。虽然他此时已到知天命之年，但是加利并不以此为终点，相反，他以此作为自己生活的新起点，信心百倍地投身于国际政治舞台。加利虽走上了政治舞台，但名气不大，真正使加利扬名全球的是他陪同萨达特总统的耶路撒冷之行。为继续推动埃以关系的改善，1977年11月，萨达特拟议出访以色列。这项计划一公诸于世就遭到了阿拉伯家以及埃及国内大部分人的强烈反对，有人攻击他是“阿拉伯世界的叛

徒”，称他的出访将是“一场真正的民族灾难”，甚至扬言要推翻他。萨达特总统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特别是在以色列之行的前两天，他任命的两位外交部长都因在此问题上与其意见相左，而先后提出辞呈。为克服政府危机并完成耶路撒冷之行，就在出访前2小时，萨达特总统果断任命内阁中的不管部长布特罗斯·加利任外交事务国务部长，并任代理外长。加利在接到这项任命后表示：“我要听从我接到的所有指示，我要执行这些指示。”于是，陪同萨达特总统访问耶路撒冷的官方代表团中，就有了外交国务部长兼代理外长布·加利。此次历史性的出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萨达特总统在以色列议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说，以色列接受了埃及提出的巴勒斯坦人必须参加中东危机的解决这一原则立场。埃以关系自此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友好程度。加利作为代表团重要成员之一，第一次出现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就受到瞩目。他于危难之时，能挺身而出，顶住内外压力，决意陪同萨达特总统访问耶路撒冷，此举不仅需要极大的勇气，而且也需要有深邃远见的政治眼光。

在耶路撒冷之行的几个月后，又一项重要使命落在了加利身上。1978年夏，卡特总统邀请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到华盛顿附近的戴维营举行一次旨在解决中东问题的最高级会谈。加利作为萨达特总统的主要陪同人员参加了这次里程碑式的戴维营会议。《戴维营协议》和在此之后签署的《埃以和平条约》，使两国结束了长达30年的敌对状态，为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打下了基础。加利是这些协议的主要制定者和参与者之一。他认为，一劳永逸地解决阿以冲突必须要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巴勒斯坦人必须参加谈判，他们的参加是“极其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其二，苏联必须参加“持久地”解决阿以冲突的一切工作。1991年10月马德里中东和会的召开似乎证实了加利的远见卓识。

《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和平条约》的签订，被看作是埃及与以色列的单独媾和，在阿拉伯世界内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阿拉伯国家指责萨达特放弃了他们反对以色列的王牌，即不承认以色列，破坏了他们的统一战线，危及了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他们纷纷断绝了与埃及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阿拉伯联盟及所属组织停止了埃及的成员国资格，阿拉伯联盟总部也由开罗迁至突尼斯。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加利作为埃及对外政策的主要策划人之一，及时扭转工作重心，在进一步促进全面解决中东和平问题的同时，注意缓和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以早日使埃及摆脱孤立处境。

首先，谨慎发展与以色列的关系。加利认为，埃以关系正常化仅仅是中东建立安全与和平的手段之一，它只能随着中东其他问题的逐步解决而得到发展，并告诫以色列：单独媾和只是他们的梦想。1982年，以色列大规模入侵黎巴嫩后，一贯主张承认以色列，与以进行和谈的加利一改以往的温和态度，公开谴责以色列的行径违背了《戴维营协议》的精神，宣布停止与以色列的谈判，并强烈敦促美国对以色列的行为进行干涉。

其次，加利坚持不懈地在各种场合作了大量的解释和说服工作，并力求与阿拉伯国家立场一致，加利多次强调，埃及属于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埃及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是兄弟关系，他们的利益是共同的，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共同的，埃及同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分歧并不在目的上，而是在如何实现那些目的的方法问题上。它们有共同的目标，即以以色列撤出其占领的土地，承认巴勒斯坦权利，以及全面和平地解决中东冲突。加利还指出，

埃及同以色列的和约并不凌驾与埃及对其他阿拉伯国家所承担的义务之上，埃及所承担的阿拉伯的义务先于其他任何义务，

埃及恪守阿拉伯共同防御协定，先于其他任何协定。

第三，把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列为和谈的重要内容。加利明确表示，埃以关系正常化与巴勒斯坦自治问题是不可分割的，这是埃及参加与以谈判的原则性立场。他主张在西岸和加沙地带两个地区实行包括领土和居民两个方面的“全面自治”，选举产生的自治机构应拥有行政、立法和司法大权。在谈判中，加利坚定这一原则立场，一再敦促以色列军队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撤出，主张建立独立、和平和中立的巴勒斯坦国家。

加利以其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的外交手法，帮助埃及在 80 年代末摆脱了孤立处境，并重新确立了它在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

加利不仅对中东阿拉伯问题十分了解，作为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专家，他深谙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和第三世界以及非洲事务。在许多问题上，加利的立场、观点不乏真知灼见。由于某些不结盟国家已经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国在非洲推行强权和霸权政策的工具，加利主张加强和更新非洲的不结盟，反对把非洲大陆变成两个超级大国新的冷战场所。对于不结盟在国际中的地位，加利认为，不结盟运动应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一种平衡力量，应在两个集团之间保持某种程度的等距离”。加利主张南南团结和合作。1990 年 4 月加利在《埃及新闻报》上发表文章说：

“事实发展表明，南北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东西方缓和很可能以牺牲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为代价。”他认为第三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殖民主义留下的后遗症和贫穷与生产水平低下之间的恶性循环。他强调指出，第三世界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源，只要加强团结、合作，建立一个共同市场，就能发挥自己的优势，消除殖民主义的后遗症，创造和平稳定的环境，从而推动南北对话。他特别主张非洲各国开展合作，解决自己严重的经济问题。同时，他认为应在非洲统一组织范围内用和平手段解决非洲分歧。借助加利制订的埃及非洲政策，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 1989 年成功地当选为非洲统一组织的主席，并在不结盟运动和伊斯兰组织中享有威望，使埃及这个非洲大国在非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加利本人不仅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渊博的知识，而且也是解决国际争端和棘手难题的能手。1990 年，加利秘密地访问南非，利用自己的影响，为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的获释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加利曾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以探寻结束两伊战争的途径，他还成功地帮助调解了安哥拉、莫桑比克、毛里塔尼亚以及其他一些邻近撒哈拉沙漠的国家间的争端。10 多年来，加利经常出访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进行不倦的穿梭外交和调解工作，由于他的杰出表现，人们称赞他为“不知疲倦的调解人”。

尽管加利一直没有担任埃及外长，但他始终是埃及外交政策的制订者和领导者。1991 年 5 月，加利被任命为负责对外关系的副总理。

入主“玻璃宫”

自联合国成立到 1991 年加利当选以前，共产生了五位秘书长，唯独没有非洲人。早在 1981 年，坦桑尼亚外长萨利姆代表非洲竞选秘书长，但由于美国的强烈反对，连续使用否决权，萨利姆最终被秘鲁前外长德奎利亚尔代替。随着德奎利亚尔 10 年任期的即将结束，新任秘书长的选举再次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非洲国家也表达了希望下一任秘书长由一位非洲国家的代表来担任

的强烈愿望，并且得到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表示支持非洲的提名，即将卸任的德奎利亚尔秘书长也指出，联合国秘书长一职，从未由非洲人或东欧人担任过，他希望看到一位非洲人当选。

1991年的秘书长选举被看作是联合国46年历史上最不同寻常的一次，因为这次将产生的是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位秘书长，这位秘书长将要管理一个刚刚摆脱超级大国对抗而长期处于困难状态的世界组织。为此，安理会各成员国纷纷开始筹划运作，积极酝酿候选人。早在1990年9月，美国福特基金会就发表了一份关于改革联合国体制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对秘书长候选人资格挑选方式方法以及今后秘书长的任期和任务提出了整套改革方案，实际上就是为遴选下任秘书长定调。1991年1月，从联合国秘书处和安理会分别传出根据这一报告拟定的两个非正式文件，对秘书长候选人提出几个条件：具有政治和经济领域担任高级职位的经验；具有领导和组织众多国家职员的管理能力；能流利使用联合国两种以上的工作语言，通常指英语和法语；具有作为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文件还强调，在寻找候选人时，不应受地区概念的束缚。美国和英国还多次强调：秘书长的人选“毋需按地区巡回”，希望避免开创按照地理位置轮流担任秘书长的先例。这显然是针对非洲国家希望下届秘书长由非洲人担任的要求而提出的。

西方国家和舆论界为了对未来的选举施加影响，大肆宣扬它们的观点。他们首先提出了所谓“各国领袖有被选举权”的主张，宣称，为了使联合国在建立“世界新秩序”中更好地发挥作用，秘书长应由担任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著名政治人物来担任。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柯克帕特里克甚至主张，随着冷战的结束应该打破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人不能担任秘书长这一职务的惯例。这样，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甚至苏联前外长谢瓦尔德纳泽都被认为是比较能应付联合国的新问题和新的挑战的人选，而出现在联合国秘书长非正式候选人名单里。面对这种情况，非洲国家加强了协调行动。1991年6月，非洲统一组织各国首脑在尼日利亚会晤，就推举秘书长候选人进行多次磋商，最终提出六位正式候选人。其中包括埃及副总理兼外长布特罗斯·加利，津巴布韦财政部长贝纳德·切泽罗，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前联合国负责行政事务的副秘书长、塞拉利昂的詹姆斯·乔纳，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加纳人肯尼思·达乔以及加蓬的弗良索瓦·奥沃诺—恩圭马。非统组织还决定成立一个由坦桑尼亚、扎伊尔、埃及等7国元首组成的委员会，向联合国安理会和世界各国进行游说。正是由于非洲国家声势浩大的竞选活动，西方国家才意识到下届秘书长非非洲莫属，否则它们与整个非洲国家的关系将受到严重的损害。

在非洲众多候选人当中，埃及的加利和津巴布韦财政部长贝纳德·切泽罗被认为是热门人选。加利的优势有三点：一方面，加利熟练掌握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中的三种，英语、法语和阿拉伯语。尤其是他早年曾留学法国，法语受过专门的训练，讲得标准、流利，深受强烈要求未来的秘书长必须会说法语的法国青睐。另一方面，加利的“中间人”形象也是别人无法取代的。加利是代表非洲竞选，但他又不是非洲黑人，虽然出身于阿拉伯世界中的埃及，但他却信奉基督教，他的妻子又是出身于亚历山大的犹太人，他具有阿拉伯世界、非洲与欧洲之间，甚至是与犹太人之间的“中间人”的理想形象，这一特殊性可以使世界各方面接受他，从而增加了非洲在本次竞选中的竞争

力。还有就是加利的学识及政治生涯更使人无法挑剔。而切泽罗虽然是非洲甚孚众望的经济学家，但不足之处是缺少国际外交工作的经验。最终人们把眼光落在了加利这位 69 岁的老资格外交家身上。

为了寻求支持，非洲、埃及以及加利本人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尼日利亚驻联合国代表易卜拉欣·甘巴里曾以非统组织主席的身份向西方国家的代表转述了非洲对联合国秘书长遴选问题的立场：非洲有条件最好的候选人，如果安理会提出的候选人条件不及非洲人，这可能不是出自于对才能、公正和平等的考虑，而是由于别的因素；我们将在今年联合国大会上反对任何非非洲人担任这个职务。作为有重要影响的地区大国，埃及也在为加利的竞选呐喊助威。埃及明确地提醒华盛顿：埃及是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重要盟友。穆巴拉克总统至少两次拨通白宫的电话，同布什总统就加利出任秘书长一事进行磋商，同时，他还曾亲笔书信给梅杰首相，并派遣穆萨外长前往华盛顿会晤美国国务卿贝克。加利更是全力以赴，他打破了不露面争取这个职务、不要身先士卒去竞争的联合国准则，亲自出马，先后访问了一些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征求意见和表示自己竞选的意向。为了回击一些西方国家说他年龄较大、体弱多病，恐怕不能应付繁重的工作的流言蜚语，1991 年 9 月加利亲自到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美国国家海军医疗中心进行体检，结果证明身体健康。加利的足迹遍及非洲、中国、英国和美国。此外，他还频频会晤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并举行记者招待会，宣扬自己志在必得的决心和政治主张。

苍天不负苦心人，在 11 月 21 日举行的 15 个安理会成员国对秘书长人选进行的正式投票中，加利获 11 个赞成票，4 个弃权票，无 1 票反对，以超过所要求的 9 票赞成票的优势被推荐为下届联合国秘书长。事后人们分析，加利之所以能顺利当选，得益于三个有利因素：一是华盛顿的消极态度。许多外交官曾预计华盛顿会利用在海湾战争后扩大的影响来挑选一位它喜欢的候选人。美国也曾表示它希望有一名可以连任两届，行政能力很强的年轻候选人。虽然布什总统不反对 69 岁的加利，但他曾倾向于挑选像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这样的人。可马尔罗尼不为非洲人所接受。为此，在选举埃及的加利为联合国秘书长的过程中，美国在很大程度上退居次要地位，这与以前的几次选举中美国和苏联都拼命影响联合国，影响秘书长的选举形成了鲜明对照。二是法国的外交手腕。竭力推举加利当选的法国坚持说，不能把联合国看成是一个由西方主宰的俱乐部，秘书长应该关心发展中国家的事务。法国在联合国的这一思想占了上风，成功地使加利获得了必要的选票，否则就可能挑选一名较受华盛顿欢迎的折衷候选人。这是一个欧洲国家在安理会运用各种策略的结果。三是非洲人立场坚定，坚持要选一位非洲人担任秘书长。

当加利被推举为第六任联合国秘书长后，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都作出了积极良好的反应。美国总统布什给加利打电话，表示祝贺，并承诺将支持加利为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所进行的工作。苏联对外关系部发言人表示苏联将给予加利“一切可能的支持”。法国外长迪马称安理会的决定实现了“法国的愿望”。德国外长根舍称赞安理会作了“一流的”选择。日本外务省发言人说，加利是担任秘书长的“最合适的政治家”。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拉美国家和中国政府都对加利的当选表示祝贺。即将离任的德奎利亚尔秘书长也认为这一结果是“明智的选择”，反映了阿拉伯世界、非洲社会和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中的重要作用。西方舆论也认为，这位熟悉南北关系和第三世界、非洲及阿拉伯问题的政治家的当选，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以解决冲突

和分歧。

正在德国进行访问的加利得知此消息后，十分高兴地表示，“终于轮到非洲人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了”，“这不仅是我们国家的光荣，也是非洲、阿拉伯人民和第三世界的光荣。”加利十分自信地告诉记者，他“天生”就是适合担任秘书长这一职务的。他表示：“联合国在国际关系方面将发挥新的作用，包括在用和平手段解决武装冲突、保护人权以及增进国际间的合作等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

联合国大会批准加利为联合国秘书长后，他立即宣誓要使联合国的利益高于其他利益，并且将不接受任何政府下达的指示。他保证：“我们将为振兴联合国而共同努力，为和平与安全而共同战斗，我们将共同帮助我们的世界机构面对 21 世纪的挑战。”“联合国不仅要维持世界和平，而且还要塑造和重建和平。”

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对加利来说既是机会更是挑战。他将面临众多的难题，其中包括南北关系、民族矛盾和地区冲突、环境、毒品、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等问题，而如何发挥联合国在实现中东和平和解决南斯拉夫内战问题上的作用，更是摆在加利面前的两大迫切的任务。此外，对拥有 1.4 万人，欠债 20 亿的联合国本身进行多方面的改革，以适应纷繁复杂、变换莫测的新形势，也是一桩棘手的事情。

1992 年的新年钟声刚刚敲过，加利就迈着稳健的步伐步入了位于美国纽约东河畔的玻璃宫，成为这座大厦的新任“大管家”。

走马上任的第一天，身穿深灰色西服，戴着浅蓝色领带的加利来到联合国的小教堂，默默地作了一番祈祷。上班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摆好姿势，让等候在那里的摄影记者拍照。在耀眼的闪光灯照射下，戴着黑边眼镜的新任秘书长表情显得格外严肃。有位记者请加利作出微笑，他却回答说：“那么，你就得讲个笑话。”幽默风趣的回答引起周围的人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刚刚走马上任，加利还来不及立刻对处理联合国的种种问题作出轻重缓急的安排，但他坚信“果断行动是使事情成功的最好办法”。上任第一天，雷厉风行的加利，马上召集联合国各位副秘书长及其有关人员开会。简单寒暄之后，加利立即进入主题。他恳切呼吁大家精诚合作，以营造一种“有利于我们的组织的新势头”。随即，他签署了任后的第一项任命书，宣布由德索托继续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派往中美洲的代表，调停萨尔瓦多政府和游击队的冲突，促使双方尽快达成协议。

从上任的这一天起，加利就像一架上足发条的机器，迅速运转，采取了一联串的“果断行动”。在他的提议或主持下，1 月 16 日，萨尔瓦多政府和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在墨西哥城正式签署和平条约，以结束长达 12 年的内战；1 月 23 日，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所有国家立即执行禁运，禁止向索马里运送武器和军事装备；1 月 31 日，安理会 15 个理事国在联合国历史上首次举行首脑会议；2 月 21 日，安理会通过 743 号决议，批准向南斯拉夫地区派遣联合国保护部队，执行维和行动；2 月 28 日，安理会通过 745 号决议，决定建立联合国柬埔寨过渡时期权力机构；3 月 2 日，联大接纳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等 9 国为会员国，使联合国会员国总数达到 175 个……

就这样，出任联合国秘书长不过才几个月，加利便博得了“活动力强，难以对付的外交官”的声誉。对此，媒界评论说，加利迅速采取的行动使他

同比较谨慎的前任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相比形成了对照。

改组联合国机构

加利采取上述颇富成效的行动后，并没有停滞不前。很快，他便燃起履新不久后的“第一把火”，开始实施一项令世人瞩目的果敢行动，着手改组联合国。

早在入主玻璃宫以前，加利就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他即将接管的联合国正饱受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以及经费短缺之苦。联合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要想正常、高效运作，消肿化淤势在必行，必须对内部机构进行适当调整。因此，上任伊始，加利在接受比利时电视采访时即明确表示，“我将利用我被委任为秘书长的机会，着手改组联合国一些组织”。他指出，联合国“有必要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调整”，以适应一个“不断变革的世界的需要”和符合“新的国际行动的要求”。

在新形势下，联合国改革已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美国联合国协会主席在国会作证时曾总结说：“联合国正处在两种可能的边缘：要么取得大跃进，要么痛失良机。”大多数联合国问题观察家一致认为，除非联合国彻底改革，否则，就不可能在冷战后的时代取得大跃进。联合国徘徊在新旧格局交替的十字路口，国际社会要求改革联合国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关于联合国应该如何进行改革，却是众说纷云，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远在加利就任联合国秘书长之前，为了使联合国更充分地发挥其“中心行动机构”的作用，无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联合国的每一个成员国几乎都已从各自的愿望出发，纷纷向联合国提出了一系列的构想和建议。“一份长长的菜单”早已摆在了这位新“管家”面前：

——开发或扩大冲突的预测性和控制作用，防止危害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冲突发生；

——充分发挥国际讲坛和管理机构的作用，特别是在裁军与军控方面的管理作用；

——重视并强化联合国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作用；——更有效地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促进人权的改善和保护环境的作用；

——完善联合国立法与执法职能。

围绕上述五大作用，人们还提出了其他各式各样的具体建议和方案。这显然是一张需要加利苦心孤诣才能“烹调”出、“烹调”好的“菜单”。

1992年1月31日，安理会举行了自联合国成立47年以来的第一次首脑会议，15个理事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聚集一堂，共同讨论当前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问题。最后与会各国领导人决定，授权会议主席代表15个理事国宣读一项声明，以表达共同愿望。声明说，“秘书长不妨借鉴近期联合国维持和平任务所获得的经验，建议如何提高秘书处的规划与作业的效率。秘书长还可以考虑如何扩大动用他的斡旋作用以及宪章赋予他的其他职能。”

这次安理会首脑会议对加利秘书长的改革工作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支持，它不仅使改革有了坚实基础，也为改革带来了强大的推动力。在安理会的大力支持下，加利对来自各方的大量建议汇总并进行了深入分析，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拟订出一系列的改革计划。2月7日，上任刚刚6个星期的加利，宣布被他称之为全面展开精简联合国机构的“第一阶段”改革开始正式启动。

2月29日，第一阶段改组方案正式生效。这是联合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

的总部机构改组。与刚刚成立时的 1500 名工作人员相比，到加利上任时，联合国已成为拥有近 15000 名工作人员的庞大官僚机构（这还不包括临时工作人员及维和部队人员），人员增加了近 10 倍。机构不断扩大，人员不断增加，造成机构重叠，人事关系复杂，办事效率低下。加利上任之初，在视察联合国驻日内瓦的办事机构时曾说：“那里有数千名工作人员，但明半数人无事可做。”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改革联合国的组织机构一直是玻璃宫内外的热门话题。但是，要想对它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并非轻而易举的事。对加利的改革举措，事前就有人放出风来说，难以驾驭的联合国官僚是决不会轻易让步的。但我行我素的加利无视这些人的“劝告”，他给自己规定了 60 天的期限，裁减合并双管齐下，率先精简秘书处上层班子，终止了 28 个副秘书长直接向他报告的冗杂低效的混乱制度。依据改组方案，他裁撤了 14 个秘书长助理以上的联合国高级官员的职位，将副秘书长的人数从 28 个裁减到 10 个。他还采纳了联合国高级管理专家的建议，制订裁员和人员自然缩减计划，一次性裁减了 1000 余人。在此基础上，加利进一步表示，今后仍将大量裁减世界范围内的秘书处工作人员，特别是要将高层职位减少 25%。

几经考虑和磋商，加利决定改革秘书处的结构，把 12 个主要部门和办公室加以合并，同时组建一些新的办事机关并任命一批新的联合国高级官员，将决策过程集中在 7 个主要部门，其中包括新设立的 4 个部门，即政治事务部、维护和平行动部、经济和社会发展部及人道主义事务部。其余的 3 个部为法律事务厅、新闻部、行政和管理事务部。加利任命 8 位副秘书长来管辖这 7 个部门。从改组的方案看，加利的目的显然是要精兵简政，提高联合国各机构的办事效率。

当年 9 月，加利在第四十七届联大作关于联合国改革工作的报告中说，第一阶段改革，“结果是，减少了不必要的官僚层次并取消了某些无关紧要的活动”。他表示，今后仍将尽一切努力，以简化行政程序，使之更具透明度，更易于实行，“以期一方面去除仍然存在的任何叠床架屋和多余累赘的现象，另一方面加强那些任务和责任不断扩大的部、厅、处。”

经过第一阶段旨在“精简决策机构，并打通指挥渠道”的改革方案后，雄心勃勃的加利随即又推出了涉及大会和经社系统的第二阶段改革措施。到加利接任时，联合国的经济和社会系统已多达 190 多个机构，这些机构所消耗的经费占联合国开支总额的三分之二。加利出任秘书长后，于当年 2 月便开始着手对经社系统的秘书处支持机构进行改组，取消了原来的几个经社秘书处单位。在此基础上，在第二阶段改革中加利又做出了新的决定，于同年 12 月把由副秘书长冀朝铸（中国）领导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部门一分为二，并任命 3 位副秘书长来分管这新设的 3 个部：冀朝铸主管发展、支助和管理事务部，让·克劳德·米勒荣（法国）主管经济社会信息及政策分析部，尼切·德赛（印度）主管政策协调和持续发展部。加利这么做，反映出他希望把联合国的精力更好地集中于发展中国家的愿望。

对联合国组织机构和经社系统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后，加利又将其锐意革新的目光投向了联合国的大会系统。联合国会议之多，文件之多，手续之多，在世界各组织机构中大概要名列前茅，就连联合国的很多官员也对此大为头痛。曾有媒介形容联合国就如同一家大型造纸厂，操作人员是公务员，他们用文山会海来衡量其产量，各种研究报告塞满了他们的文件架。但效果呢？

正像加利批评的那样：“联合国大会所要求的文件都是经常性的，同上一年度报告相比，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增加什么有用的情报。”为了提高效率，减少浪费，加利决定精简联合国大会的有关工作。1993年8月17日，第四十七届联大通过233号决议，决定改变大会的委员会结构，将特别政治委员会和非殖民化委员会合并成新的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第四委员会），负责以前指定给这两个委员会处理的所有议程项目。决议还决定自第四十八届大会开始，它将由6个委员会组成，并将第一委员会称为裁军和国际安全委员会。

同年9月，加利在第四十八届联大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尽管“大会在世界事务中正日益发挥实际的作用”，“但大会的工作可以进一步精减”。他指出，许多决议特别是那些影响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决议，都不谈政策问题，而带有工作方案决定的性质。他建议，“决议形式应限于大会针对政策事项采取行动并提出建议供会员国和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时采用”，“然后可以采用一种更简单的形式，用于经济和社会领域工作方案的决定”，以提高效率。此外，他还建议，“还可以使大会议程有一种优先次序”，“议程也需要略加合理化”。

除了进行上述调整外，加利还酝酿提出改革安理会的方案。据1992年2月8日的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加利履新不久便计划建议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关于安理会是否应进行改组，是近年来联合国成员国长期争执不休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联合国中身兼数职的乌于达官员奥拉拉·奥通努说：“安理会目前的组成已经过时。它反映了60年代，甚至40年代世界的政治，而不是今天世界的政治。”安理会“没有理由永远不变”。其他一些国家也认为，作为反映成员国的民主意见的场所，联合国现在继续实行的战胜国体制的常任理事国制度没有“反映世界的现状”，理应进行改革。

但是，关于如何改革安理会，意见很难一致。有人主张把欧共体和日本纳入常任理事国行列，取代原来的英国、法国席位；另有一些人主张增加常任理事国数目，以一个地区国民生产总值最高或人口最多为标准，增加亚洲国家的日本和印度、非洲的南非和尼日利亚，南美的巴西等；还有人主张设立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和没有否决权的常任席位，给德国、日本等有否决权常任席位，给巴西、印度等无否决权常任席位。也有人提出加强联合国大会的作用，取消否决权制度等。

可以说，改革的方案五花八门，出发点也各有不同，但至少有两点需要各方协商和讨论，即安理会的规模问题和关于当选新的常任理事国的条件问题。

现在积极要求增加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国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上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日本和德国，正积极利用各种渠道为争得常任理事席位而多方奔走努力，想以此为契机从经济大国一跃而成政治大国；二是一些地区大国，它们对安理会的某些运行机制不满，希望通过增加常任理事国席位来改变安理会现状，并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安理会的声音。

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对改革安理会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希望联合国安理会的规模扩大，将常任理事国增至10个，拟议增加的新成员包括德国、日本、印度、巴西和尼日利亚。特别是对日、德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加利一直持积极态度。为了解决联合国的财政困难和赢得日、德对维

和行动的慷慨解囊，加利多次访问这两个国家，希望它们积极协助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并发挥大国作用。他曾说过：“新的联合国需要有多个大国开展负责的活动。”

但这一计划因涉及很多方面，一时也很难推行。因为“安理会改革”的焦点不仅仅是日、德加入常任理事国行列的问题，增加新席位势必会打破各方力量旧有的平衡。英国首相梅杰就曾明确表示，没有理由改变安理会的结构。

正是哪里有改革，哪里就会出现反对的声音。正当加利大刀阔斧地清除联合国旧机制中的种种弊端时，批评意见也随之而来，指责、不满与怨恨一时间在联合国大楼内外闹得沸沸扬扬。一些人对他所拟订的长期管理计划持怀疑态度，指责加利未能使联合国的雇员们了解他的意图。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对加利的改革计划颇为不满，它们批评加利不该把绝大多数副秘书长的席位都给了大国和发达国家，并认为联合国不应在改革中一味追求精减，而忽视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它们担心，联合国会因此失去广泛的代表性。一些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乘机利用改革中所暴露出的问题大作文章。

联合国毕竟不是世界政府。它的作用大小取决于世界各国，特别是重要国家对它的支持程度。事实上，在联合国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的问题上，的确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联合国的弊端不应归咎于加利，改革的效果也不可能立竿见影。就像加利自己感叹的那样：“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改组联合国，而且是成员国的‘政治意愿’。联合国能否有效地发挥作用，主要问题在于，成员国对如何利用联合国解决国际问题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对联合国首席行政长官来说，联合国这个庞大机构毕竟太大、太复杂了。

但是，不论多么艰难，加利仍决心使他的联合国改革之火继续升温，并最终使联合国成为一个更精简、更统一的组织，使之能有效地执行联合国的各项任务，“在政治方面能更顺应民心，在知识方面更有创造力，在财政方面基础更为稳固，在管理方面更有效率，更能代表社会的所有阶层”。

加利深知，当今世界对联合国的要求是空前的。世界越感觉到联合国的存在，对它的要求就越多，期望就越大。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希望自己的改革措施能为联合国开拓出新的发展契机，以迎接 21 世纪的挑战。他表示：“联合国面临纷至沓来的要求，决不能变成盛名之累，发生不孚众望的危机。”因此，在采取每一步骤时，他都必须小心再小心，以期争取赢得各方的基本满意。

正是本着务实，本着为联合国在下世纪的发展寻求新的起点，1995 年 8 月，加利又推出了题为《我们正在整顿联合国》的六点计划。他强调说：“在目前各国预算削减，全世界人民正在勒紧裤带的时候，联合国必须精简机构、突出重点并提高效率。随着全世界接受冷战结束所带来的变化，联合国也必须适应新的任务和新的需要。联合国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对联合国成员国以及联合国为之服务的全世界人民的挑战。在情况改变的条件下，各国政府和舆论必须决定它们希望联合国成为什么样子，希望联合国做什么，并决定愿意做出什么贡献来使联合国有效工作。”

加利认为，“联合国自 1945 年成立以来，未曾遇到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1992 年到 1995 年这段期间，很可能决定本组织对下一代甚至今后几代的行动路线和贡献。”他强调说，“我们时代的特征是历史的加速发展，如果联合国要走在它的前头，就必须加快改革的步伐”。

联合国改革的序幕已在一片争执声中拉开，并在各种批评与指责中艰难进行。改革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还要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加利，这位踌躇满志的老政治家，决心在他的任期内完成联合国的革新工作。

提出《和平纲领》

在一次联合国大会开会前举行的午餐会上，加利曾说过这样一番话。他说，既然冷战已不再提供一个国际关系框架，联合国将面临一场“世界革命”。他指出，“今天的冲突不同了，今天的冲突更可能是国家内部的冲突，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他还说，这是一个极其捉摸不定的时代，“我们已进入第一个真正全球性的时代。我们中谁都没有找到全部答案”，“缔造未来的重任落在我们肩上。联合国是完成这项使命的场所。没有联合国就完成不了这项使命。”

加利常说，从战后到北约和华约组织等主要冷战体制的建立花费了 10 年的时间，现在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情况一样，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新时代的新制度和新结构要确立下来也要一段时间。意外的灾难、势力集团之间的竞争、内战的危机等多种因素对世界构成威胁。他认为，世界不是新秩序存在问题而是新秩序根本就没有确立，“我们还处在过渡期”，这种过渡期可以说是有着多种可能性的时期。因此，他强调说，“这就需要联合国的存在，联合国要做的事情也就更多了”。他曾充满深情地概略勾划出他对联合国未来的设计蓝图，企盼联合国能在维持和平、建设和平、增进经济和社会合作、维护人权和民主等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强调联合国维持和平的作用时，他更加强调“建设和平”、“缔造和平”的重要性，因而主张加强联合国机制，完善集体安全制度，建立监测和预防危机发生和升级的机制。

基于上述思想，1992 年 6 月 17 日，加利应联合国安理会的要求，提出了题为《和平纲领》的特别报告。6 月 23 日，加利正式发表他所拟就的《和平纲领》，并作为联合国文件分发。这份《和平纲领》长达 53 页，分为 10 个部分。他在报告中提出了一个使联合国能够在追求和维持国际和平方面担负起更广泛的任务的多方面计划。报告中还提出了一整套保障和平的建议，包括提高联合国查明冲突、使冲突获得短期和长期的解决以及促进以前敌对各方之间的和平等举措，推出了有关维和行动的四个领域，即：

预防性外交。加利认为，这是最理想、最有效的外交运作方式，它旨在采取行动，防止发生争端，防止现有争端升级为冲突，并在发生冲突时限制冲突的扩大。

建立和平。加利称这是“介乎谋求防止冲突与维护和平这两种任务之间的一项责任，是设法使敌对双方以和平方法达成协议”，建立和平也是采取行动，主要是通过宪章第六章所设想的那些和平手段，使敌对双方达成协议。

维持和平。加利自豪地说：“维持和平可以确实称为联合国的发明”。他认为，随着日益增加的需要，近年来维和行动的性性质迅速演变，越来越多的维和人员被派往实地帮助执行调解者商定的解决办法。维持和平是实地部署联合国人员，这种部署按以往做法都要取得有关各方的同意。维持和平是一种手段，它可以使防止冲突和建立和平两个方面成为可能。后来，他在向第四十八届联大作年度报告时，对此又作了一些补充。他提出，“这里应当加上执行和平的概念。这个概念所涉及的维持和平行动不必一定得到所有有关当事方同意。执行和平是宪章第七章所设想的”。

在冲突后缔造和平。加利指出，“预防性外交是避免危机；在冲突后缔造和平是要防止危机再起”。在冲突后缔造和平是他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它是指应采取行动，以避免再度爆发冲突。

此外，加利还在《和平纲领》中就同区域组织合作、人员安全和经费措施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建议。

《和平纲领》一经推出，很快引起了各方的广泛重视，并受到了欢迎。6月30日，加利的这一报告被安理会称为“对正在进行中的改革和加强联合国进程的第一个全面的反映”，因为它载有一套复杂的、令人感兴趣的建议。安理会表示，它将“充分优先地深入”审查这些建议。安理会从当年10月至翌年5月，每月都开会审查《和平纲领》中的具体建议。在这一过程中，安理会主席发表了10次声明或信件。1993年9月，联大再次通过表示欢迎这一纲领的决议。

1995年1月3日，加利又发表了《和平纲领》补编，作为秘书长在联合国50周年提出的立场性文件。这是自1992年6月提出该纲领后，首次对纲领的实施所作的总结。在第四十九届联大的年度工作报告中，加利形象地说，“联合国天天都在行动中考验《和平纲领》。”的确，自从安理会首脑会议以来，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活动，“在数量上和性质上，都有很大的改变”，“有的成功，有的失败”，“联合国已引起宣传媒介的强烈兴趣，它们时常赞扬，更时常批评”。加利认为，应“好好吸取冷战后时代最初这几年联合国的成功和失败的教训”。在《和平纲领》补编中，加利对《和平纲领》发表以来所进行的维和行动实践，从“质的变化”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概括和总结，找出了经验教训，并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

尽管还存在一些异议甚至是反对意见，但从总的来讲，加利所写的《和平纲领》及其补编，为联合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加强维和行动提出了新的方针、新的举措，特别是其中有些是从实际运作中得出的比较有益的结论，是很好的维和行动指南。但是，要切实执行《和平纲领》及其补编并非易事，因此，加利向各会员国呼吁：“时代要求重新思考和一起努力创造克服危机的新方法。”

在柬埔寨的维和行动

加利入主联合国后，处理得最成功的维和行动是柬埔寨维和行动。这次行动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前任德奎利亚尔及国际社会在前期所作的努力，但加利也功不可没。

柬埔寨问题是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在地区争夺过程中造成的一个“热点”。1978年12月，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出动10万大军入侵柬埔寨，翌年1月7日越军占领金边，第二天韩桑林政权成立。不久，柬埔寨国内即出现了三支抵抗组织：乔森潘领导的爱国民主、民族团结大阵线，宋双领导的高棉人民解放全国阵线及西哈努克领导的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此后，由于外来干涉不断，柬埔寨问题长期不能解决，内战不停。

自1979年起联合国一直在审议柬埔寨局势，但直至1989年在国际社会大力敦促和柬埔寨抵抗组织的斗争下，越南军队才撤出柬埔寨，这为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提供了条件。1990年8月，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经过多次讨论，制订了《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框架文件》，敦促柬四方实现民族和解。

柬埔寨四方接受了框架文件，并于9月9日成立全国最高委员会。

1991年10月，包括柬埔寨四方参加的全国最高委员会全体成员、联合国秘书长（当时是德奎利亚尔）和澳大利亚等18国代表在巴黎召开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会议签署了《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等四项文件。协定的签订给柬埔寨实现全面和平带来了曙光。

加利正是在这个时候上任的。对他来讲，虽然柬埔寨问题的解决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但要完成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历史使命，并不轻松。巴黎协定规定：联合国权力机构在柬埔寨过渡时期控制柬的外交、国防、财政、公安和宣传部门，组织并主持大选，核查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的情况，监督四方停火和停止接受外援，监督各方裁减70%的军队。

为了进一步落实巴黎协定，1992年2月，加利建议向柬埔寨派出2.6万人的维持和平部队，组成联合国驻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进驻柬埔寨，具体负责解除各派武装、进行选民登记、保证选举公正、成立合法的民选政府等事宜。2月底，安理会一致通过加利的建议。1992年3月15日，联柬权力机构正式建立。

为确保联柬权力机构顺利完成其使命，同年4月加利开始了他十多天的亚洲之行，先后访问了中国、柬埔寨、泰国和印度。

1992年4月14日，加利开始他就任联合国秘书长之后对中国的首次访问。在中国他受到热烈的欢迎，会见了江泽民、李鹏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他的要求下，中国破例向国外派遣军事人员直接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4月16日，中国政府表示，中国将向柬埔寨派遣47名军事观察员和由400人组成的军事工程大队，参加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力机构的工作。在离开北京之前，加利对中国给予联合国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对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等方面“明确而有力的支持”感到满意。

在访问中国之后，4月18日他又访问了柬埔寨，受到了联合国驻柬权力机构负责人明石康、柬埔寨全国委员会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及其成员拉那烈、宋双、乔森潘等人的欢迎，但柬三位最高层领导人洪森、谢辛和韩桑林没有参加迎接活动。在柬埔寨，加利表示，联合国将尽一切努力确保12个月后柬埔寨按期举行大选，产生新政府，确保顺利遣返滞留在泰国的柬埔寨难民。

加利的亚洲之行对柬埔寨问题的解决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同年6月，加利把注意力放在裁减各派军队上。他指出巴黎协定的执行已到达一个关键阶段，解除武装、复员、遣返等必须按时进行，以确保选举按期举行。按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的计划，从1992年6月13日起柬埔寨和平进程进入第二阶段，到9月底之前完成裁减各派军队的任务，把总计20万人的军队安排到临时营地，并遣散其中的70%。

但民柬方面由于担心联合国驻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偏袒金边政府，通知联合国说，它不能准许联柬权力机构部队在其控制地区内进行部署。这一做法打乱了柬埔寨和平进程第二阶段计划。截止1993年9月26日，联合国只裁减了5万柬士兵，即只完成30%的裁减任务。

加利对民柬的做法很不满意，但他坚持认为，“耐心外交”是使和平进程回到轨道上来的最好方法。1992年9月，加利先后同西哈努克亲王和民柬领导人举行会谈，希望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

11月他在交给安理会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尽管红色高棉（民柬）拒绝遵循和平进程，但他仍反对对红色高棉控制的地区实行经济制裁，主张用悄悄的外交手段来促使红色高棉遵守巴黎协定。为此民柬曾发表公报，称加利是

杰出、明智和富有国际经验的外交家，暗示民柬可能重新研究解除武装问题。但安理会并没有采纳加利的意见。1992 年安理会通过了对民柬控制区实行贸易制裁的决定。

尽管在裁减各方军队方面进展不利，加利仍希望柬埔寨大选能按期举行。1992 年 10 月，联柬权力机构按计划开始选民登记工作，至 1993 年 1 月 31 日，大约有 470 万选民登记参加选举，加利对此表示满意。3 月 8 日，安理会同意柬埔寨于 5 月举行大选，并向可能抵制大选的民柬发出强烈信号，表示如果联合国认为选举自由、公正，即使民柬不参加选举活动，它也将承认选举结果。

1993 年 4 月，柬埔寨大选前夕，加利再次访问亚洲。他首次到柬埔寨视察大选准备情况，随后又访问了在柬埔寨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泰国和越南，取得了两国对大选的支持。

5 月 23 日~28 日，柬埔寨如期举行了 20 多年来的第一次多党选举。尽管民柬方面由于其提出的条件未得到满足，抵制此次大选，但柬埔寨仍在大选后组成了临时民族政府。加利称此次选举是“联合国外交的成功”，但他同时也指出，选举后仍存在既困难又富有挑战性的任务。联合国承认了此次大选的结果。

大选以后，柬埔寨成立了君主立宪国家，9 月 24 日西哈努克登基。同天，明石康宣布联柬机构的任务完成。不久，联柬机构撤离柬埔寨，联合国在柬埔寨维和行动正式结束。

在柬执行任务期间，联柬机构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有：与联合国难民署共同完成了约 37 万柬难民的遣返工作；清除了 7000 多颗地雷，并销毁 4000 颗未爆军事装置；顺利组织了柬埔寨大选。虽然联柬机构在监督停火、撤军、军队复员等问题上没有达到原定目标，但总的来说，联合国在柬埔寨取得了较为圆满的结果。

联柬行动之所以取得成功，与加利强调冲突各方与联合国机构合作、联合国机构与冲突各方耐心谈判、坚定执行五大国框架文件和巴黎协定有关，加利较好地处理了他称之为微妙而困难的使命。

联合国在柬埔寨的维和行动是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比较成功的一次。尽管由于民柬没有参加大选，柬埔寨局势仍不稳定，但此次维和行动对稳定柬埔寨大局起了重要的作用。联合国在柬埔寨的维和行动得到了国际舆论的较高评价。

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

90 年代初，索马里不仅兵燹连年，而且天灾频仍。作为来自非洲的联合国最高行政长官，加利 1992 年任职后，非常关注索马里问题的解决。

1991 年索马里反政府武装推翻执政 21 年的西亚德·巴雷政权后，发生内证，以临时总统迈赫迪和以联合大会主席、议长艾迪德为首的两派兵戎相见。曾遭多年内战之苦的索马里人民再次饱尝战争的苦难。而当时在索马里肆虐多年的干旱使索马里人民雪上加霜。据估计，当时索马里全国 60% 的人处于饥饿状态，其中 25% 的人因饥饿直接面临死亡的威胁，近百万人逃往邻国。

为寻求解决索马里问题的途径，加利一方面呼吁索马里冲突各方停火，另一方面要求国际社会在加强对索马里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对索马里全面彻底实行武器禁运。他尤其重视非统组织、阿拉伯联盟及伊斯兰会议组织的

作用，同他们一起商讨解决方法。

在加利等人的努力下，索马里对立派别在联合国主持下于 1992 年 2 月 14 日和 3 月 3 日两次签署停火协议。但停火协议并没有得到索马里对立各派的尊重，索马里安全状况仍然很差。国际社会向索马里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经常受到干扰。

为此，加利提议联合国向索马里派遣维和部队。在他的敦促下，4 月 24 日安理会通过 751 号决议，决定建立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简称“联索行动”)，同时安理会还决定向索马里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90 天。

联合国 90 天行动计划开始后，加利希望该计划不仅向 150 万危在旦夕的索马里人提供食品和其他救济物资，而且向 350 万缺少食品、种子、水和基本保健服务的人提供帮助，援助物资的分配撇开政治和地域考虑，根据需要分发。

为把粮食尽快送往受灾地区，联合国进行了两个月的粮食空运。世界粮食署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也积极向摩加迪沙港口运送食品，其中国际红十字会 1992 年预算开支 2.55 亿美元的 1/3 用于救助索马里难民。

随着国际社会加大对索马里援助力度，索马里武装派别和匪徒也加紧了援助物资的抢劫。他们不仅以不干涉内政为借口，阻挠维和部队进入，而且用武力威胁向联合国救济组织强征“保护费”、场地“使用费”，一再拦路抢劫和倒卖联合国的救济物资，把倒卖物资的收入用于购买军火，继续打内战。有人估计，国际社会送到索马里的 70~80% 的救援物资落入武装团伙和不法奸商之手，从而增加了军阀、匪徒的经济实力，联合国人道主义救助线，成了他们的物品供给线。

虽然联合国为索马里准备好了大批援助物资，但实际送到贫困者手中的“往往微乎其微”。索马里 75% 的人仍受饥荒威胁，每天约有 1000 多人濒临死亡。

由于联合国人员屡遭袭击，继 90 天计划之后的联合国 100 天援助计划的进展也很不顺利。

为解决索武装团伙持枪抢劫联合国救济物资，解决人道主义援助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加利在向安理会的报告中曾提出以“粮食换武器”方案，希望通过解除武装来改善索马里安全状况。然而，正如一些人所说的，对索马里男人而言，有三样东西是生命里最重要的——骆驼、老婆和枪。由于索马里人游牧民族的特性，要他们交出枪械非常困难，而派系众多的索马里各武装派别更不甘心轻易放下武器。鉴于武器不仅被视为“个人安全的手段”，而且也是“生存的手段”，加利“粮食换武器”的美好愿望也就成了泡影。

粮食换武器计划的失败，并没有使加利失去信心。他从中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在索马里工作有危险，但索马里大批人口所面临的饥荒要求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对此作出全面的“反应”。他抱怨安理会把过多力量耗费在巴尔干“富人的战争”上，而没有把足够的力量花在索马里上，抱怨安理会只关心波黑白人的窘迫处境，却忽视索马里黑人走投无路的绝境，指责安理会某些国家充满“欧洲中心主义”。

加利的这种“咄咄逼人”的做法既使西方国家感到意外，又使他们感到不快。西方传媒也对加利“改变秘书长传统的作用——安理会恭顺的奴仆”的做法颇多微词。

为了加强联合国在索马里的力量，加利建议从行政、安全、人道援助和

政治谈判四个方面采取行动。他呼吁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使用武力，包括考虑部署美国军队，以确保联合国的人道主义援助。他在发给安理会的一份秘密文件中说，索马里军阀持续不断的敲诈勒索和骚扰，使联合国别无他法，只有使用军事手段向奄奄一息和手无寸铁的索马里平民运送食品。

在加利的要求下，1992年12月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以美国为首的联合特遣队（多国部队）进驻索马里，该决议还要求成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尽快为人道主义救助活动创造一个安全环境。此次行动被称作“恢复希望”行动。

“恢复希望”行动对联合国来说是一个先例，这是联合国有史以来，首次在没有受到当事方邀请的情况下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包括意、法、埃及等国派兵参加了这次名为“恢复希望”的行动。

一些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对此行动表示出相当复杂的心情。他们同情索马里人民的不幸遭遇，希望此次行动能使索马里人民脱离战争与饥荒。同时，他们又对此次行动感到担忧。他们的担忧主要有两点，一是此次行动的理由似乎超出有关“威胁和平、破坏和平和侵略行为”的规定，它有可能被超级大国用作干涉别国内政的例子。二是“恢复希望”授权某些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方式，有可能对联合国集体作用带来不利影响。

1992年12月9日，18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摩加迪沙附近海域登陆，“恢复希望”行动正式拉开序幕。一个多月后，多国部队基本完成在索马里全境的军事部署。多国部队搜缴了当地各派游击队的大量武器，对各派间不时发生的武装冲突及时进行干预。在各国部队强大的军事压力下，索马里首都及其周围地区局势渐趋稳定。与此同时，国际救援车队迅速赶赴拜多阿、基斯马尤等重灾区，向大批灾民散发食品和救援物资。国际红十字会还在索马里全境设立了上千个救济中心，索马里每天因饥饿和疾病死亡的人数迅速减少。

1993年1月3日，加利在上述背景下来到非洲。在短暂访问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后，他于次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主持召开了索马里14个政治派别参加的关于索马里和平预备会议。此后，索马里全国和解会议也于3月15日召开，索马里各派同意实行停火，并等待解除武装。在各方努力下，索马里内部武装冲突的频率和强度明显下降，索马里国内饥饿状况也得以缓解，第一期联索行动取得了一定成绩。

为扩大战果，3月26日安理会又通过814号决议，决定在索马里部署联索行动二期任务。决议主要内容包括向索马里派遣28000名维持和平部队以替代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联合特遣队）。决议同时授权维和部队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在执行任务时采取任何必要行动维持和平，包括解除交战各派的武装。

联索二期行动是联合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维和行动之一，据估算，此次维和行动一年大约要花费15亿美元，相当于联合国每年28亿美元维和预算的一半。此外，此次维持和平行动得到的广泛授权也是以前联合国维和部队所不拥有的。

随着维和行动进一步深入，索马里的一些武装派别越来越不满意对其活动的限制，索马里的枪手与联合国维和部队间的交火事件时有发生。索马里最大军事派别领导人艾迪德对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尤为不满，6月5日终于发生了艾迪德武装分子打死24名维和士兵事件。

事件的发生激怒了国际社会。加利也感到非常愤怒，他谴责艾迪德武装派别的残暴罪行，敦促安理会“对罪犯采取坚决的行动”，希望安理会授权维和部队逮捕、起诉、审讯和惩处这起袭击事件的策划者。6月6日，安理会通过了惩处肇事者的决议。

美国在捉拿艾迪德问题上表现得非常积极，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频繁动武，加剧了维和部队和艾迪德派的冲突。由于维和部队把矛头直接对准艾迪德，冲淡了联索行动的主要使命，把人道救援行动变成了一场小型战争，维持和平变成了强制实现和平。其结果是，艾迪德没逮着，而索马里群众和维和部队的伤亡加重，索马里重新陷入混乱。国际社会，尤其是非洲国家对索马里局势表示忧虑，要求维和部队调整其在索马里的做法。

面对越来越大的困难，美国开始改变态度。9月份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致信加利，要求降低搜捕艾迪德的调子，把精力集中在实现索马里民族和解和重建国家上，并谈到了减少和撤回美军的可能性。对此，加利回信说，联合国将采取一些主动政治行动，“转移新闻界对搜捕艾迪德的注意力”。同时，他强调指出，“艾迪德的问题加深了我近一年来所持的看法，这就是，除非我们解除各部族和各派的武装，否则，我们要在索马里恢复和平与繁荣的行动就不会成功。”他认为，美国减少或撤回军队，“不仅会使索马里人民重新陷入内战，而且还会产生各种可怕的后果”。

然而，正当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致函加利，希望实现政治解决时，美军却抱着侥幸心理，再一次发动了对艾迪德的袭击，企图抓住艾迪德，在全世界面前显示美国的“力量”。美国的行动受到艾迪德等派别的强烈抵抗，联合国死伤人数增加。10月4日，两名美国人的尸体被索马里人在摩加迪沙示众，刺激了美国人，也是对联合国“强制实现和平”维和行动方式的一次挑战。这一事件使联合国维和部队内部出现的分歧趋于激烈，法、意等国认为美国在索马里的所作所为“偏离了原定目标”，超过了人道主义使命，明确表明他们反对美国的这种做法。

面对种种压力，美国政策出现了180度大转弯。美国不仅停止追捕艾迪德，而且为使艾迪德出席1993年11月在埃塞俄比亚召开的索马里政治会议，用飞机送艾迪德到埃塞俄比亚参加会谈。

艾迪德对美国新政策表示欢迎，指责加利执迷不悟。他以胜利者的姿态结束东躲西藏的生活后，声称“除了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以外，世界各国领导人现在都承认了我们的权利”，认为联合国应该像美国那样，承认其错误，承担起真正援助索马里人的新任务。

美国在作出改变其对艾迪德政策的同时，还宣布在1994年3月31日之前将美军全部撤出索马里，美国的这个决定使以美国军队为主的联合国维和行动陷入困境。

为此，加利再次访问非洲。除会见了当时的非统主席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外，他还分别会见了非统、阿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他希望由一支规模较小、主要由非洲人组成的维和部队来继续这项使命。这些组织拒绝了他的要求，表示他们没有人力和财力来接受这样大的人道主义任务。

在种种努力失败后，加利不得不作撤出索马里的准备。1994年5月、9月、10月和11月，安理会四次延长联索行动的任务期限后，联合国最后一批维和部队于1995年3月从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撤出，历时2年多的联索行动以失败告终。

对此次联索行动，加利承认，联合国维和部队从索马里撤出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一次失败。他在一份向安理会提供的报告中称，索马里民族和解进展甚微，联索行动对索马里和平进程和安全影响有限。但如果未来的索马里政府提出要求，联合国维和部队还会重返这个国家。

在波黑的维和行动

波黑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历史上最大的维和行动，也是加利就任秘书长后着手处理的最棘手问题之一。

前南斯拉夫解体后，波黑穆斯林、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三大民族在波黑未来政体等问题上意见分歧，穆斯林希望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克罗地亚人希望向毗邻的克罗地亚共和国靠拢，塞族人则希望与塞尔维亚共和国实行某种形式的联合。三方各不相让，并为争夺地盘发生战争。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波黑 20 多万人丧生，200 余万人流离失所，波黑冲突逐渐演变为前南斯拉夫问题的焦点。

作为解决前南斯拉夫问题的一部分，安理会曾于 1992 年 2 月 21 日向前南斯拉夫派遣联合国保护部队（以下简称维和部队），并将联保部队的总部设在萨拉热窝，联合国波黑行动也由此拉开序幕。但联保部队并没能阻止波黑形势的恶化。4 月 7 日欧共体和美国，出于反共与削弱塞族实力的需要，违反国际惯例，过早承认波黑共和国独立，促使“波黑塞尔维亚共和国”同日也宣布独立。波黑局势迅速恶化，战争爆发。

在波黑问题上，加利主张采取审慎态度。他在 4 月 24 日和 5 月 12 日的报告中指出，鉴于波黑各派之间极端猜忌，互相指责，暴力循环升级，在萨拉热窝设立的联保部队总部“未能防止那里爆发的激烈冲突”，因此他赞同联合国在人道主义援助受阻时，“考虑进行武装保护”，但是他坚持认为，联合国派一支“干涉部队”（波黑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等人的建议）去强迫停止波黑战斗的建议，“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主意”。

加利在波黑问题上的谨慎遭到了许多人非议，一些人指责他在此问题上漠不关心。对此，加利坚持认为，作为秘书长他的任务是“维护联合国机构”，而不是博取众人的好感。他表示，联合国不是“一个有着 5000 万人口的国家”，联合国“没有军队，没有各层机构，没有土地，没有警察”，他“不能冒险让年轻士兵去萨拉热窝白白送命”。他希望借助地区性组织（欧共体或北约）的力量解决波黑危机，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则按照其现有能力发挥“有限的救援作用”。

1992 年 7 月他在这个问题上同英国发生了争执。事情的起源是这样的，7 月 17 日波黑冲突三方在欧共体调停下达成一项停火协议，协议要求联合国监视各派武装的重型武器。按照惯例，安理会成员国在提出某项方案或提议时，尤其是涉及安全问题，事先应与秘书长磋商，以示尊重秘书长的工作。然而，英国代表在提出上述提议时，却避开了秘书长。对此，加利极为不满。他认为，联合国监督波黑境内重型武器的条件尚不具备，安理会在事先未与他磋商的情况下，不应擅自接受欧洲强加给联合国的“荒唐”计划。

他在此后接受德国《时代周刊》的一次采访时再次表示，联合国资金困难，缺少军事人员和设备，联合国重型武器监督工作需要花费联合国三个月时间才能完成，而欧洲人能在三四天时间里建立一支符合要求的后勤部队。他希望“欧洲各国应该为自己中央地带爆发的灾难出力”，欧共体和西欧联盟应为联合国服务，而不是联合国为他们服务，更不应在他们无能为力时转

而向联合国推卸责任。

他曾致信欧安会、北约以及包括西欧联盟在内的其他机构，请求它们分担监督波黑共和国使用的重型武器的任务。但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积极响应。

8月26日，由英国倡导的南斯拉夫国际和平会议在伦敦开幕，会议由加利和英国首相梅杰主持。会上，加利主张以政治手段解决前南斯拉夫问题，再次表示希望欧洲国家为波黑冲突多作贡献，强调“欧洲的地区性组织和机构、北约、联合国安理会之间的紧急协作”，以制止波黑的“不幸、蹂躏和恐怖”。

为继续寻找解决波黑问题的途径，1992年12月26日，加利奔赴日内瓦，同负责解决波黑冲突的国际会议两主席万斯和欧文以及南斯拉夫联邦、克罗地亚和波黑领导人举行会谈。12月31日，他抵达萨拉热窝，同波黑高级官员及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举行会谈。在加利及国际社会努力下，1993年1月和8月前南问题委员会分别提出欧文-万斯计划和欧文-斯托尔滕贝格计划。但两个计划或遭塞族反对，或遭穆族反对，联合国在波黑的行动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在寻求政治解决波黑冲突的同时，加利也为解决内战带给波黑人民的苦难作了很多努力。他曾多次呼吁为前南斯拉夫境内受害者提供4.34亿美元的援助，以缓解波黑“当代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他与联合国一起，在波黑人道主义援助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包括向波黑增派部队、在波黑上空采取禁飞行动、设立六个波黑安全区（萨拉热窝、图兹拉、热帕、斯雷布雷尼察、比哈奇和戈拉日代）等。

然而，加利的种种努力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结果。波黑内战丝毫没有结束的迹象，交战各方为寻求军事上的优势，冲突更加激烈。

冲突的加剧给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增加了很多困难，空中运输不时间断，公路运输也因车队遭到袭击而处于停滞状态，许多“无法形容的野蛮行径”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1993年6月4日安理会通过836号决议，再次扩大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权限，批准维和部队使用武力保卫安全区，并允许北约使用空中力量支持维和部队。

决议通过后，在如何实施决议，尤其在如何使用空中力量问题上，各方意见差别很大。西方国家认为塞族应对波黑局势的恶化负主要责任，主张广泛使用空中力量打击塞族。加利对此提出了疑议，认为“空袭将给正在进行的维持和平行动、人道主义援助”和当时在日内瓦进行的有关波黑和平的谈判带来影响，主张在空袭问题上谨慎行事，希望北约在实施空袭之前先听取其特别代表的建议，表示他本人“应当实际上接管”波斯尼亚地区作战总司令的权力。同时，加利提出了增兵计划，他认为要切实保卫波黑安全区的和平，安理会应增加维和部队的人数，在波黑六个安全区派驻34000万名维和部队士兵。但他的这个意见并没有被安理会采纳。在空袭问题上，加利意见也没有得到北约的尊重。

在波黑维和行动中，加利常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对安理会多次改变和扩大对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授权不满，同时抱怨安理会在给联合国增加大量的任务的时候，并不提供足够的部队或经费来完成这些任务。

1994年11月，波黑塞族进攻联合国安全区比哈奇后，波黑形势更趋恶化，并危及联合国在波黑的维和行动。由于维和部队无力保卫联合国宣布的

“安全区”，国际上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指责增多。波黑交战双方对维和部队的不满也与日俱增，塞族指责维和部队袒护穆族，穆族也认为维和部队的存在对其不利，维和部队在波黑的处境越来越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加利在 11 月的一份声明中谈到了联合国维和部队从波黑撤出的可能性，但他反对联合国维和部队以武力保卫波黑境内安全区的要求。他在 12 月致安理会的一份书面报告中指出，“联合国保护部队是以少量地面部队以及可能使用的空中力量作为对进攻安全区行动的一种威慑力量，这没能阻止塞族对比哈奇安全区的进攻。尽管如此，我认为联合国保护部队不应得到授权，强制实施安全区制度”。为完成这一使命使用武力“会妨碍联合国保护部队执行在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的总的使命，使联合国保护部队变成一支战斗部队，而且进一步破坏波黑的稳定”。

1995 年 5 月 25 日北约空袭帕莱附近的军事目标后，26 日波黑塞族武装将大约 370 名维和士兵扣为人质，同时炮击维和部队的军事观察所，并宣布拒绝与联合国维和部队合作。

人质事件给联合国维和部队以沉重打击，维和部队被迫放弃了保护萨拉热窝的使命，撤出了 10 个塞族重武器集结地。此后，维和部队不仅遭受塞族武装的攻击，而且也受到波黑穆斯林的攻击，维和部队在波黑的维和行动更加举步维艰。

维和士兵被扣作人质事件的发生，促使加利更进一步考虑联合国维和部队从波黑撤出的可能性。加利在 6 月给安理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主张相应减少驻波黑维和部队并改变其任务，使它们“只包括那些我们认为维持和平行动能够切实可行地执行的任务”。建议安理会派遣多国部队取代联合国保护部队，并由派遣军队的国家来指挥这支部队。1995 年 9 月，加利再次建议由一支大规模多国部队迅速代替 3 万多人的联合国驻波黑维和部队。

加利的这种想法并没有马上被英、美等国所接受。当时北约国家中间“没有任何人支持”派遣一支多国部队的建议，美国也表示反对。但在实际做法上，美欧却更经常地撇开联合国单独采取行动，并逐渐掌握波黑问题主导权。北约通过“双控钥匙”（即北约的空中支援和空袭行动需事先得到北约和联合国的同时授权方可执行）等方案，迫使加利将一直由他自己控制的空中打击方面的权力授予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司令贝尔纳·让维耶将军。而经常与美、欧在维和问题上意见不一致的秘书长特使明石康，也在西方的压力之下，被迫调回联合国总部。

随着美欧越来越多替代联合国直接出面处理波黑问题，他们对待波黑的立场也越来越趋于强硬。1995 年 7 月 21 日波黑问题伦敦国际会议通过“大规模轰炸波黑塞族的主张”后，北约更频繁轰炸塞族目标。8 月 4 日，克罗地亚共和国在美国支持下，发动“风暴行动”，攻占“克拉伊纳塞尔维亚共和国”大部分地区。8 月 30 日起，北约以塞族炮击萨拉热窝平民为由，对其军事目标发动持续半个月之久的空中打击。这两次严重打击使塞族彻底丧失了战场上取胜的可能性。

波黑塞族在西方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被迫接受苛刻的条件，同意接受和平。11 月 21 日，波黑有关各方（南联盟、克罗地亚、波黑）终于签署波黑全面和平协议（代顿协议）。而此前不久，北约在基本掌握波黑问题主导权后，终于在 1995 年 10 月批准向波黑派遣部队。

协议的签订给波黑和平带来了希望。多国部队取代联合国维和部队也很

快被提上议事日程。协议签署后，加利表示联合国将尽其所能，在安理会授权范围内，帮助该地区结束苦难，恢复正常生活。

随着 1995 年 12 月 14 日波黑全面和平协议在巴黎正式签署，北约向波黑派遣多国维和部队的工作基本就绪。12 月 25 日，在波黑执行维和任务的 2.5 万名联合国维和部队终于摘下了蓝色贝雷帽，把持续了近 4 年的维和任务移交给以北约部队为主、由北约将军指挥的 6 万名多国部队。

有人认为，波黑维和行动是继索马里维和行动后联合国在没有最终完成使命的情况下宣告结束的一次行动，是联合国受到的又一次挫折。

1996 年 2 月加利在德国《时代周刊》评论这次维和行动时认为，安理会“派遣蓝盔部队去巴尔干的授权，一开始就是矛盾的”，这是联合国波黑维和行动的根本障碍。尽管国际上对此次维和行动指责很多，他坚持认为联合国在巴尔干“不辱使命”，它在巴尔干和平进程中起了“出色的作用”。

重视环境与发展

身为全世界的头号“大总管”，加利不仅要投身“热点问题”，积极调解各种矛盾，预防冲突的发生，同时他还必须以相当的精力和极大的智慧去关注其他全球性问题，努力推动人类的文明与发展。1992 年 3 月 19 日，在就任秘书长后首次举行的记者报告会上，加利曾说：“在和平与发展问题上，联合国并无更重视前者的倾向，而是认为两者同等重要，因为没有发展就不会有真正的持久的和平”，就没有民主和人权。他一再强调指出：“今天人类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发展的问题，不顾环境保护是自挖墙角。”他还多次批评国际传媒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维持和平行动上，因而忽略了联合国在其他方面的活动。

1992 年 6 月 3 日至 14 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178 个国家的代表团以及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共计 1.5 万人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是联合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级别最高、人数空前、影响深远的一次国际会议，是人类环境与发展史上的一次盛会。

此次环境与发展会议又被称为“地球首脑会议”。在会议的发言中，加利热情洋溢地说：“这次会议证明，我们已经明白了我们的地球及地球的生命是多么的脆弱。地球在同时遭受落后与过度发展带来的痛苦，毫无疑问，越是富裕的国家应承担的责任就越大。”加利对此次会议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里约会议“提醒了全世界，发展进程不能危害到子孙后代”。

在会议召开期间，通过了《21 世纪行动议程》。该计划是第一个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具体联系起来国际行动计划。这一计划旨在改变人类活动以便将环境的损害减少到最小程度，并确保发展得以持续进行。加利断言，《21 世纪行动议程》将是“未来许多年联合国系统内国际合作和协调活动的中心”。他还认为，这项议程在具体阐明持续发展和全球发展这一概念方面迈出了头几步。

环发会议还通过了另一重要的国际文件，即《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该宣言提出了一整套帮助指导经济和环境行为的 27 项原则，并规定了“建立一种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目标。《里约宣言》在最初曾被定名为《地球宪章》，但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还存在不少分歧，故最终被通称为《里约宣言》。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希望“里约精神”能为联合国将来承担规模更大的任务提供动力。

由于创纪录的出席率和所达成的各项具体协议，人们对这次会议普遍感

到满意。对于会议的结果，加利却认为，这次会议是朝向“拯救地球”目标迈出了一大步，但是，“它只不过是漫长路途中的一瞬间，一个有益的一瞬间”。的确，要想实现环发会议的目标还需要国际社会作出进一步的努力，但这需要时间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更何况现今的联合国正处于资金日益枯竭的危险边缘。

当年10月，加利向联大提交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报告》在谈及发展问题时指出，“迄今为止，国际社会仍然没有形成一个新的、为各国普遍接受的发展概念。发展不仅仅是经济政策和资源问题，它同样涉及政治、社会、教育和环境等诸多因素”，并表示“联合国目前正在努力把注意力放在发展方面”。正因如此，继围绕维和行动的“和平课题”之后，加利又提出了“把社会的发展与稳定视为维和基础”的“发展课题”。

1994年5月，加利发表了题为《发展纲领》的报告，并称这是国际社会“为了重新寻求发展的理想而做出的第一项努力”。这是一份全面阐述发展问题的长篇纲领性文件，它论述了为什么需要发展和发展的范畴，并首次提出了“发展文化”的概念，认为应从多方面、多角度来界定这种发展文化。加利在《发展纲领》中指出，“发展是一项基本人权。发展是和平的最稳固基础。持续的经济发展是整个发展问题的火车头。没有它，就不可能对付环境恶化和贫困、失业等社会问题。发展已成为全球性的事业，发展需要国际合作，发展是当今时代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任务，它将决定人类的共同前途。”他还提出，在新的发展合作格局中，联合国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联合国大会应集中努力于制定必要的规范、标准和行为准则来维持全球相互依存关系。

《发展纲领》发表后，在联合国内外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成为第四十九届联大审议和辩论的主题。辩论中，人们已超越了和平问题本身，看到了影响和平与安全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即“发展问题”。正是以此为基础，自第四十九届联大会议起，联合国改变了它原有路线，决定把工作中心从维和行动改为“发展经济”，同时设立工作小组委员会，负责协商具体的发展战略。虽然《发展纲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但它“提供了一个思考如何追求发展的全面重要框架，作为替人类持久进步奠定基础的方法”。

在发展问题上，加利重视影响发展的诸多因素。他强调人口问题的重要性，主张妇女参与发展问题，重视区域组织在发展中的作用，积极关注南北问题，呼吁联合国应缩小南北贫富的差距，缓解南方国家的外债负担。

寻求非洲的发展途径是加利就任联合国秘书长后的又一项重要工作。自上任之日起，加利就意识到，在今后几年他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来自贫穷国家人民的压力。他呼吁国际力量来解决第三世界的问题，特别是应优先考虑被他称作同席卷非洲的极端贫困作斗争的问题。

非洲大陆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在世界上48个被正式确定为最不发达国家中，有33个是非洲国家。身为来自非洲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对非洲的发展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说：“几年来，尽管非洲存在着困难，但它已在为和平、发展、民主和人权进行着勇敢的斗争，我比以往更加相信非洲人民的能力、聪明才智及坚韧不拔的精神。他们的努力应该得到更广泛的支持。”他指出，“从需要国际社会支援的角度讲”，非洲大陆“是我们最紧迫的重点”，联合国应该帮助非洲建立有效的社会机构，并且支持它们改善公共教育和职业培训状况的努力。但

他同时强调，要求国际社会所作的并不是慷慨施予，而是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他们应该认识到国际努力的重要性，意识到世界各国利益的相互依赖性，认识到如果非洲能最终得到他们应得的一切，那么非洲将是世界和平繁荣的一个因素。“现在刻不容缓的是，联合国及整个国际社会都应与非洲、与其领导人、与他的人民站在一起。非洲首先需要的是恢复和平。预防外交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该为非洲大陆服务。但还应该使那些遭受战后蹂躏的国家恢复正常生活。”他还强调，在全球经济日趋区域化的今天，非洲国家要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有效的竞争，就必须加强地区一体化。因此，非洲国家需要加强地区性的合作与协调。

在向国际社会发出大声呼吁的同时，加利还积极行动起来，利用各种场合、机会和方式为非洲寻找发展的途径。1992年12月，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非洲发展高层人士专门小组首次会议。1993年10月，出席在东京召开的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他一次次地向国际社会呼吁，希望有关方面能采取“具体行动”帮助非洲人民寻求一条持久发展的道路。1996年3月15日，加利又在日内瓦宣布一项援助非洲的联合国特别倡议，建议提供250亿美元的援助以加快非洲的发展。这项由联合国系统首次提出的帮助整个非洲地区发展的行动计划，旨在持续、广泛地动员和协调联合国各组织、国际社会和国际金融机构等筹集更多的资金以用于加快非洲大陆的发展。这项需要10年实施的行动计划，其主要资金将用于改善非洲大陆的教育和卫生状况。

处理与大国关系遇到困难

联合国前任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曾感叹说：“联合国秘书长是世界上最难干的职务。”作为一个人员众多、利益大相径庭的国际组织的秘书长来说，似乎也只能在相互冲突的集团利益中间，努力寻求一种艰难的平衡。或许正是由于有这种难言的苦衷，以往历任联合国秘书长都喜欢把自己定位成“一位彬彬有礼的处理国际事务的神秘人物”。他们对一些大国往往必恭必敬，几乎是唯五大安理会强国马首是瞻。不过，到了加利上任，这位外交官和学者却不信这老一套，他准备一改陈规，按照自己的方式走自己的路。

在宣誓就职时，加利立誓要使联合国的利益高于其他利益。当时，他曾用阿拉伯语向全世界郑重宣布：“我，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在这里庄严宣誓，我将以我的全部忠心、谨慎和良心来行使委任给我的联合国秘书长职能，我将履行这些职责，并使我的行为完全符合联合国的利益。从履行我的职能的角度来讲，我决不寻求或者接受任何政府或者这个机构外部的其他当局的指示。”

加利想向安理会、联合国以至全世界表明，他决不会允许当一位唯唯诺诺、讨好奉承的公务员。以他之见，秘书长办公室是独立的，它应该维护联合国的纯洁性、防止那些动辄逃避责任的人损害联合国的声誉。

加利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一上任就敢于大胆摸老虎屁股，批评欧洲不应把钱都花在南斯拉夫的和平任务上，也应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孤苦想一下解决办法。这话在那些被加利称之为“欧洲中心论”者的国家驻联合国大使听来，很是逆耳。于是就有人放出风说。“这样下去，恐怕到最后对谁都不好”。这话听似不重不轻，但下面随之而来的，很可能就会是暂缓对联合国的拨款。

加利对此倒也相当冷静，他坦言说，未来10年间，世界上出现的问题，如饥饿、难民、干旱等，大多会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所以我觉得有必要

向欧洲施加点压力，让他们干点事。”加利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他心里的想法。

后来，加利又说了一句更不容于欧洲国家的话，称欧共体及西欧联盟“都是为联合国服务，而不是联合国为他们服务”。此语一出，西欧一阵哗然，口诛笔伐，不在话下。

其实，一些大国和加利之间的冲突还不完全是因为这几句话，更主要的是对他推行强化维和的一些作法不满。另外，加利行事的风格也不大对它们的胃口。它们批评加利做事没有章法，常常无视各国大使的存在，遇事不跟他们这些驻联合国大使商量，而是径自去找他们的外交部长或元首。这种跨越式的外交手段，颇令那些本来驻在纽约的外交大员，自感身价贬值，难免会有冷言讥讽之事发生。他们抱怨说，加利斥责他们无视他的意见，可是他自己却常常缺席会议，并且还经常在代表发言时打断代表的话。一些大使对加利冷若冰霜的态度颇有微词，有些人甚至私下里称他为“法老”，还有一些人则说他更像“司芬克斯”（狮身人面像）。

美国自从参加索马里的维和行动受挫后，就开始冷淡了同加利的关系。加利曾多次强烈批评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是不负责任的作法，再加上其他原因，加利更是难讨美国的“欢心”。美国报纸一再宣传加利权欲熏心，指责他想当世界总统。

不能同美国一起工作，而没有美国又无法工作，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加利在处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和调解行动时，遇到的两难处境。他在一次访谈中承认，没有美国的领导和实力，联合国就缺乏力量；而一旦有了美国的领导和实力，联合国就失去独立性。他还说，如果美国不参加活动，联合国就无法采取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但是，在它参加后，它就坚持要全面操纵，仅仅把联合国当做一块遮羞布，例如在伊拉克和索马里。

除了与大国关系不甚和睦外，甚至连曾把加利看作希望之星的第三世界也对他感到失望。它们批评他在联合国忽视了它们的利益，印巴媒体则批评他唯美国马首是瞻，把安理会变成了美国的工具。一些阿拉伯国家报纸甚至抨击他背弃了伊斯兰事业，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叛徒。

其实，尽管加利一再强调要保持“独立性”，但客观上他还要兼顾到各方利益，有时还不得不做出适当妥协甚至让步。事实上，很多时候他经常是处在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不得不对一些问题左闪右避，在夹缝中维持艰难的平衡。以联合国高层人士安排一事为例。上任后，他曾对秘书处上层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调整。经过这些调整，各大政治集团的利益安排似已取得了某种平衡。美国籍的副秘书长依旧分管秘书处的财务和行政，英国籍的副秘书长仍然主管维和与政治，中国籍和印度籍的副秘书长主管经济、技术和发展，国力日衰的俄国和法国的副秘书长级人物则被外放日内瓦，去主持一些相对次要的事务。加利这种安排可谓用心良苦。

但是，尽管他一再小心行事，也难得皆大欢喜。随着时间的推移，批评他的文字也越来越多，有的还相当尖刻。针对种种批评，加利说：“如果我被那么多的指责所左右，那我就无法继续我现在的工作。我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我的良知行事。我确信我正在竭尽心智从事我应该做的事情。”

为联合国财政危机所困扰

联合国成立以来，在世界和平和推动全球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是，正当它想进一步发挥作用的时候，腰包里的钱却越来越空。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十七条的规定，联合国组织的经费“应由各会员国依

照大会分配限额担负之”。各国应缴纳的会费数额，主要是按其国民收入总额与其他国家相比计算的。对于人均收入低的发展中国家，则按一种特别宽减办法调低国民收入。此外，还规定有最高和最低摊派限额。

联合国的经常费用有两项：一是正常预算，用以支付联合国主要机关和辅助机关的行政开支和活动费用等；二是维持和平行动经费。除此之外，联合国还有许多其他活动，所需经费全靠会员国自愿捐款，即所谓预算外资金。这笔资金数额很大，近年来还不断增加，对联合国也相当有影响，但至今联合国对这笔资金尚无法管理，它是由捐助国决定用途，并直接交秘书长代管，最后由秘书长向捐助国报告使用情况。联合国成立至今，会员国数量已翻了三番以上，活动内容、数量、范围与相应机构都在大量增多，联合国的正常预算也随之大增。

多年来，联合国一直被严重的财政危机所困扰着。联合国不断增加的庞大预算，导致了会员国普遍拖欠或迟缴会费，最终的结果就是联合国的经费危机越来越严重。到1985年底，只有69个会员国付清了当年的会费，18个会员国拒付联合国正常预算摊款2.4亿多美元。而10年之后的今天，拖欠现象有增无减。截止1996年10月2日，联合国各会员国欠联合国的会费已高达25亿美元，其中包括18亿美元的维和经费和7亿美元的经济经费。

导致联合国财政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一些会员国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在规定时间内拒付和拖欠会费。这些拒付和拖欠情况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类：一些国家为表示他们政治上反对某些活动；一些国家以本国法令为根据，以此要挟联合国和其他会员国；一些国家因经济困难或自然灾害难以按期交清会费。前两种是导致财政危机不断加剧的主要原因。因此，实际上，联合国的财政问题远不是一项单纯收支的技术性事务，它还是一个充满矛盾与斗争的政治

问题。联合国要有更大生命力，就必须有效地解决财政危机。

也正因如此，如何解决资金问题可以说是加利上任后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资金可能使联合国在它应该成功的时候偏偏走向失败。”加利决心改变这种“寅吃卯粮的日子”。1992年5月，他向联大提交了一份有关联合国财政问题的报告。他指出，联合国的财政状况很“不稳定”，未缴纳的会费数额达到“极高的水平”。加利在报告中分析认为，由于资金短缺，又没有任何储备金，维持和平行动所需的经费又在大量增加，加上若干会员国不履行其财政义务，特别是主要资助国拖延付款，造成联合国出现财政危机。

为了缓和财政困难，加利提出并实施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财政改革计划。比如，一个高级事务小组正在研究发行公债的构想即拖欠联合国会费的国家政府可以以联合国为对象发行公债，联合国将其投入流通。为防止今后继续出现会员国拖欠的现象，加利提出“预算一经通过之后，特别是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之后，各个会员国就应当按时全额缴付其摊款，使会员国审议通过的所有联合国活动都能筹到经费”，会员国“不这样做，就违背宪章规定的义务”。

就在联合国的一些项目因资金不能到位，不得不最终束之高阁的同时，联合国机构内部的浪费现象却十分惊人。由于联合国没有有效的审计制度，因此很难知道每笔资金的使用是否得当。这就使得联合国的某些工作人员得以乘机挪用公款、中饱私囊，出现了所谓联合国官员“白天奢谈救济，夜晚

花天酒地”的现象。为杜绝这一情况的发生，同时也为了进一步开源节流，加利除批准建立相应的监查机构外，还决定从1996年2月5日起，联合国停止向与会代表发放铅笔和笔记本，预计此举一年可节省经费20万美元；同时，每次会后不再分发文件，而是要求各国外交官开会时携带事先送到他们代表团的文件副本，此举一年约可节约经费25万美元。此外，他甚至还提出了一些“五花八门”颇为“大胆”的建议，诸如向所有联合国会员国的公民征收“环境税”；对国际外汇交易进行征税；对国际航空旅行征税；对使用矿物燃料或由此引起的污染征税；对国际金融交易收费；从世界各国军事开支中抽取一部分资金作为联合国专用款；甚至建议按惯例只向各国政府贷款的世界银行借现金给联合国，以及建议西方七国集团通过发行联合国债券为联合国筹资等等。

尽管加利的财政改革有前一段机构改革工作的基础，但还是遇到了与前一阶段相似的麻烦和问题，阻力大，收效甚微。

在拖欠会费的国家中，首当其冲的是美国。1985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规定除非联合国在所有预算问题上实行加权表决，否则要从1996年开始将其每年分摊的会费从原来占联合国预算25%削减到20%。此后，它又以各种理由拒付或拖欠会费。美国应分担联合国经常预算的25%和维持和平费用的31%，它是提供经费最多的国家又是欠款最多的国家，至今已总共拖欠11亿多美元。

为解决这一难题，加利煞费苦心，努力寻找可行方案。1996年2月，他提出一项建议，把美国的联合国会费从25%降到15%或20%。这种方案令相当一些联合国的会员国大感吃惊。其实，加利此举实出无奈，无非是希望联合国尽快结束对任何一个会员国的依赖。他说：“把会员国对联合国固定预算的分摊的最高限额限制在20%或15%，这能更好地体现出这个组织是所有国家的工具。”

事实上，行政和财政领域的改革与联合国其他领域改革一样，都是联合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一场长期、复杂的较量。无论是行政改革或是财政改革，其进程和结局将会直接影响到联合国的兴衰强弱。加利曾向联合国财政委员承诺，将尽其所能“避免财政上破产”。但是，他也明白，“只有会员国能采取必要的审慎措施”，否则财政危机仍将使联合国处于无偿付能力的边缘。现在，广大会员国都很关注联合国的财政问题，正努力排除干扰，积极推动它向健康方向发展。但最终结果如何，还有赖于所有国家的精诚合作和共同努力。

坚持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

加利是中国人民熟识的老朋友，对中国怀有友好感情，曾四次访华。他一直非常尊重中国的大国地位和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所起的独特作用。他说，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又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联合国做出了重要贡献，联合国需要中国的支持和帮助”。他还强调，目前联合国面临越来越多的新问题，“我们必须倾听中国的意见”，探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谈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评价时，加利说，我们有兴趣看到中国经济在下个世纪实现更大的增长，这样中国就可以给联合国提供更大的支持和帮助，这是符合联合国利益的，也是符合整个国际大家庭的利益的。

加利在台湾问题上的鲜明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对于台湾当局企图推翻联大决议，“重返”联合国的问题，他表示，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的2758

号决议“现在仍然有效；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就是联合国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

1994年6月初，曾有台湾媒体报道说，几个中美洲国家已向联合国提交了关于让台湾“重返联合国”的提案，“秘书长已接受了这一提案，并同意将其列入将于当年9月中旬开幕的四十九届联大的临时议程”。加利很快获悉了这一报道。第二天，他就指示其发言人正式向外界宣布：秘书长从未接到过这种要求，他没有、也不会同意把这样的议案列入联大临时议程。他再次重申，“联合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仍然坚持2758号决议。对我们来说，只有一个中国。我们拒绝发生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接触。”

荣幸主持联合国成立50周年庆典

身为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的加利，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忙碌的人。每天，从日出到日落，事必躬亲的他，在1.4万名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尽心竭力地履行着他作为联合国行政首长的职责。对这位平易近人、处事严谨、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的国际活动家来说，一天似乎不仅仅只有24小时。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加利曾感叹说：“在到纽约后的二年零七个月中，我没有去过一次电影院，没有去过一次剧场，没有听过一次音乐会。只是在访问莫斯科时应邀到大剧院去看过芭蕾舞，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华盛顿出席过类似的晚会。”他承认，“作为秘书长，你必须接受，只有工作，别无其他”。加利入主联合国后，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他作为名符其实的外交避雷针为全球局势的缓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95年，年过七旬的加利又迎来了他任期内的一个重大事件，在反法西斯战争烽火中建立起来的联合国走完了半个世纪的曲折道路，即将度过它的第五十个生日。在加利的主持下，联合国把“我联合国人民——联合起来创造更美好的世界”作为50周年纪念的主题。他提出，要把纪念活动谱写成联合国历史上“新的一章”，表示不仅要庆祝成就，更要反省问题，不能用歌功颂德来掩饰缺点，应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联合国。10月24日，加利在联合国日发表献词。他说：

今天，联合国人民庆祝人类历史上这个唯一真正全球性组织成立50周年。

在岁月的长河中，50年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历史上没有其他的组织聚集过这么多的政治实体。没有其他的组织经历过这么多的风浪而屹立不动。没有其他的组织像联合国这样为前途奠定如此坚实的基础。

联合国提出的维持和平概念，对自古以来寻求和平解决的努力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在联合国听到了最穷的人们骄傲而清楚的呼声。在这里，艰巨的发展问题受到最积极的注视。在联合国，世界上新兴的国家取得了应有的地位，成为会员国。在这里，主权和国家地位结合起来，成为逐渐出现的国际社会的基石。

联合国人民正处于世界局势的转折点。在这个周年纪念日，我们纪念——并且切切实实地评价——联合国50周年的历程。在这个纪念日，我们也有责任仔细考虑这个世界组织在未来的50年应走的道路。

和平是个迫切的问题。但是，发展的事业却是持久成功的必要条件。它需我们看得比和平更远，在经济、环境、社会正义和民主化等方面认清形势并采取行动。

让我们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以我们的各种成就为基

础而再接再厉，因为过去有过许多成就：有些成就出现在太复杂或太平凡的情况下，而未引起广泛注意；有些成就出现于缓慢而辛勤地争取进展的过程中，但这种进展必须经过很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有些成就出现于促进和平、发展和民主的重大行动中，但这些行动却没有得到应得的承认。

我们取得的进展越来越大。联合国起着全球共同努力的协调中心的作用。它是为了替所有人民服务而成立的世界组织。它是一部机器，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为实现人类最崇高理想所必要的有效工具。

50周年的纪念活动，无疑为世界各国重新认识、评价和加强联合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半个世纪的历史表明，联合国远非十全十美，它有成绩，也有问题，走过了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

像联合国的发展一样，加利在这几年的任期内，可以说是有成绩，也有不足。但客观他讲，就像他自己总结的那样，联合国“几乎在每一个领域都有了重大的成就”。继1955~1956年和1960~1961年两次联合国接纳会员国高峰外，1991~1993年又出了第三次新的高峰。到1994年底，联合国会员国数量已达185个，可说是真正实现了这一国际组织的“普遍性”。在维和方面，冷战结束后，维和行动规模剧增，数量空前。另外，在他的主持或参与下，联合国近年来召开了多次国际性的重要会议，其内容几乎包融了环境、发展、人口、妇女等全球各个领域的共性问题。这其中最有影响的会议包括：1992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简称“地球高峰会议”），通过了《环境与发展宣言》和《二十一世纪议程》；1993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大会”，选出了第一位人权高级专员；1994年9月在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有关行动纲领；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指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199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北京宣言》；1996年6月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大会”，通过《伊斯坦布尔宣言》和《人居议程》；1996年11月在罗马召开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指出全世界还有8亿多人口得不到足够的食物这一严峻问题。

1996年12月31日，加利结束了他的任期。在就任联合国秘书长的这几年间，加利一直在积极奔走，极力主张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巨大作用，致力于加强联合国的实力。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理想与现实之间常有差距，他的苦心经营难免会遇到重重阻力。这正是“有心全球试身手，无奈事艰志难酬”。

谋求连任未获成功

加利于1992年走马上任的时候，联合国正面临着冷战结束后如何工作如何发挥作用的难题，加利在这方面的贡献和有益的探索，是毋庸抹杀的。尽管人们对在极其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联合国在维持和平等方面的得失还存在不同看法，但一致认为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在新的形势下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取得显著成效。也许正因为加利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他曾多次表达了竞选连任的意愿。这虽与他当初许下不竞选连任的诺言相左，却也顺理成章，因为加利之前的五位秘书长除赖伊外，都是两任期满后卸任的。正如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所有联合国秘书长都干满了两个任期，我作为第一个非洲国家的秘书长，难道不该获得第二个任期吗？”

然而美国获悉加利谋求连任的意图后，立即作出了强烈反应。

1996年6月2日，美国政府宣布，希望加利不要争取连任，否则在必要时刻，美国将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不惜对他的任命案行使否决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总统认为目前联合国面临许多挑战，它需要新的领导人”，“我们认为还有其他人更适合担负起推动联合国改革的使命”。美国政府作此宣布之时，加利正在德国访问，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针锋相对地正式宣布：他将角逐连任。

美国为何极力反对加利连任呢？从表面上看是美国政府与加利个人之间的矛盾激化的结果，实际上这并非根本原因，正如美国人自己所说的，“这并非针对加利本人”。美国一直利用联合国作为其实现独霸全球战略的工具，随着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加剧，美国对联合国的操纵和控制力明显下降，双方的矛盾和龃龉不断增多。美国现在感到已经不太容易像当初那样利用联合国为所欲为，联合国在不少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已不能完全满足其要求和利益需要，因而在交纳经费等问题上采取能拖就拖，能赖就赖的手段，与联合国讨价还价。加利刚好在这个非常时期任秘书长，于是美国同联合国的不少矛盾、争执都集中到了他头上。尽管加利出任联合国秘书长以来已经对美国作出了很多让步，以迎合美国的需要，迁就美国的立场，包括在索马里、海地和波黑维和行动中迁就美国不少无理要求，大幅度削减联合国援助发展中国家的项目等，美国依旧对加利不满，经常大加非议，甚至公开指责。当然，加利同美国确实有较深的矛盾，他们的不和也许要追溯到1991年加利竞选联合国秘书长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曾拟提名加拿大卸任总理马尔罗尼接任此职，但是，在遭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极力反对后，马尔罗尼退出角逐。最后，在法国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全力支持下，安理会通过了对加利的任命。因此，可以说加利从一开始就与美国有芥蒂。加利任职后，采取了一系列独立的措施。间接阻碍了美国在联合国的政策目标，美国因此对加利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的做法深感不满，具体来看主要有：

一、美国认为联合国未能顺应冷战后世界局势缓和的新形势，大刀阔斧地进行机构改革和人员削减，致使目前机构臃肿庞大，经费赤字连年增加，人浮于事的情况更加严重。美国认为，加利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对联合国的现状特别是经费拮据和效率低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国会中的强硬派不只一次地表示，只要联合国机构不动大手术，他们就同意美国继续拖欠联合国的会费。美国认为加利虽然是位资深外交家，但在领导才能、协调能力以及刚毅果断方面显得不够。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委员、印第安那州民主党议员李·汉密尔顿等人多次强调，即将跨入新世纪的联合国“需要新的动力、新的领导人和新的方向”。

二、美国在维和行动上与加利有严重分歧，联合国维和部队在索马里、卢旺达和波黑的维和行动受挫后，加利要求美国等国出兵，接管维和使命。克林顿政府原以为美国向世界展示其大国威力的时机来临，便不顾国内的反对意见而出兵。但事与愿违，美军在各冲突地区的表现令人失望，在索马里更是弄得狼狈不堪，丢尽颜面。于是克林顿便迁怒于联合国，迁怒于加利，认为美国之所以成为洋相百出，世人耻笑的丑角，都是因为联合国的无能和加利的捣乱。

三、在有关伊拉克石油出口解禁、“石油换食品”问题上，以及美国出台的制裁古巴及其贸易伙伴的赫尔姆斯—伯顿法案的问题上，加利的态度、立场和言论都使美国大丢面子。

四、美国政府公开要拉加利下马的另外的一个原因与 1996 年美国大选形势有关。白宫发言人麦柯里一语道破玄机，他说：“加利已不获美国国会信任。”美国国会中的多数派共和党人认为，加利是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巨大障碍，共和党在竞选中指责克林顿政府是随加利的指挥棒东倒西歪的玩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多尔说：“（如果我当选）何时向海外派遣美国军队的事将由我说了算，而不是加利说了算。”面对共和党人的攻势，克林顿自然不甘示弱，也以加利为活靶，为大选获胜赢得一些资本。除此之外，美国还抓住加利当初曾许诺不竞选连任这一点，批评加利言而无信。

加利则驳斥美国说他阻挠联合国改革的指责，他在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时说：“我在四年里完成的改革比过去四十五年进行的改革还多。”的确，加利在其上任时就十分清楚他所面临的联合国两大难题：人浮于事的臃肿机构和捉襟见肘的财政经费。他上任之初在视察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机构时曾深有感触地说：“那里的数千名工作人员中半数人无事可做。”如前所述，在这两方面加利已做出了不小的成绩，对此，许多联合国官员也表示肯定，由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推荐担任联合国负责行政事务的副秘书长约瑟夫·康纳认为，联合国改革的成功已经很明显了，加利既是改革的“鼓吹者”，也是“身体力行者”。另外一名美国人，克林顿举荐的联合国提高效能委员会主任帕米拉·约翰逊认为许多节省开支和精简机构的建议已经实施，但对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组织的改造需要时间，而且一些改革需要会员国采取行动。针对美国指责他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处置不当”，加利列举了他的一些成就，其中包括使萨尔瓦多和莫桑比克实现了和平，以及主持召开了关于贫困和环境等问题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他认为，过去五年的失败，包括联合国在波斯尼亚维和使命的失败，说到底都是成员国的责任。对于美国指责他违反当初不竞选连任的许诺，加利称：“相反，我相信我的离开将会给这个机构造成更多的问题，因为在这个特定的时期需要一种连续性。我们已经开始一系列改革，重要的是，如果不能全部完成这些改革（这是一个有连续性的过程），那至少也应该完成其中的一部分。”

反对加利连任的批评者也不仅仅是美国一家。在联合国内部，就有许多雇员抱怨说，加利任人唯亲，把自己禁锢在一个由顾问组成的小集团中。联合国前助理秘书长、荷兰发展合作大臣认为，加利“没有远见”，保持着“灾难性的”人事政策。世界人权观察组织也指责他“放弃领导”，声称他对侵犯人权的现象保持沉默。马来西亚也要求加利退下来，其总理马哈蒂尔说，他领导的政府对联合国未能对波斯尼亚穆斯林大力支持感到愤怒。马来西亚虽不是安理会成员，但它驻联合国的特使拉扎利·伊斯梅尔担任着本届联大主席。

尽管受到了不少反对，尤其是美国用行使否决权相威胁，加利依然没有退让，坚持竞选连任。鉴于加利的强硬立场，美国曾提出了一个让加利“体面的自愿退休”的折衷方案，即加利于 1997 年 1 月任期后再任一年，但不得谋求连任。但加利并不买美国的帐，他说：“我认为在过去的四年半的时间里，我的工作干得很好。我希望把我已经开始的工作继续下去直至完成，而这在一年时间内是办不到的。”加利之所以敢和美国唱对台戏，关键在于他获得了许多联合国会员的支持，因为联合国秘书长的任命或连任都是由 15 个成员国组成的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投票来决定的。常任理事国中除英国态度暧昧外，中国、俄国和法国已明确表示支持加利竞选连任。 1997

年7月，法国总统希拉克在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传统的做法是，这个职位由各大洲轮流出人担任，每位秘书长服务两个任期。”他认为，加利谋求第二任期是合法的，说“剥夺这一权利是毫无道理的”。希拉克赞扬了加利在联合国改革和减少开支方面所做的工作，并含蓄地指责美国给他的工作制造更多的困难。在1996年的东盟首脑会议上，二十一国领导人表示，支持加利连任下届联合国秘书长，同时要求美国改变对此所持的反对立场。由于非洲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至关重要，因此美国和加利都很注意得到非洲的支持。美国助理国务卿乔治·穆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先后访问非洲，游说多位英语国家元首，劝说他们不要支持加利连任。为瓦解分化支持加利的非洲阵营，美国许诺将“优先考虑非洲候选人”。加利则于去年7月6日出席了非洲统一组织国家首脑会议，希望获得非洲的明确支持。尽管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非洲统一组织还是发表了一项宣言，“建议让加利连任联合国秘书长”。

由于加利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许多人认为存在加利获取连任的可能性，至于美国的反对，不少人将之归于克林顿的一种竞选策略，并乐观地预计只要克林顿获胜，加利连任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11月美国大选揭晓，克林顿蝉联总统，但他反对加利连任的立场没有丝毫改变，许多外交官预测加利的连任提案将难在安理会上通过。果不其然，在11月19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加利获得连任提名进行表决时，美国在其余十四个安理会成员，尤其是中、俄、法、英四个常任理事国投票赞成的情况下，投了唯一的一张反对票。这样一来，加利连任的可能性已经变得微乎其微。美国也感到了压力，正式同意下届秘书长入选由非洲人士担任，但同时扬言：“不能永远等候，如果非洲国家不推出候选人，我们不排除其他地区人选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一直支持加利连任秘书长的非洲开始出现分裂。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萨利姆说：“必须考虑找出一位可以信任的非洲人。”而前一天，埃塞俄比亚已经正式要求非统组织考虑其他非洲人的候选的资格。非洲国家之所以改变了态度，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既然美国不会改变态度，那么重要的是第二任期应由另一位非洲人来完成，以免再次出现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法国虽然仍然表示支持加利连任，但其立场已经有所松动，它只是扬言要对不是出自“完全讲法语的国家”的候选人行使否决权，加利的祖国埃及除了口头支持外，也未能给加利更多有力的支持。为打破僵局，加利于12月4日宣布“暂时终止候选人资格”，“以便提出其他的非洲候选人”，这一顾全大局的举动为非洲保住秘书长职位铺平了道路。非统组织正式向安理会提出了秘书长候选人名单：联合国副秘书长、加纳人安南，科特迪瓦外长埃西、毛里塔尼亚前外长阿卜杜拉和尼日尔前总理加比德。

12月13日，经过七轮的投票，安理会十五国一致推选联合国副秘书长安南为联合国新任首脑。加利在获悉安南当选的消息后，很快向他表示祝贺，认为由非洲人继续担任秘书长也是他几个月来追求的目标。12月17日加利在联大作告别演说，回顾了他五年来的工作，再次批评某些会员国拖欠经费导致了联合国的财政危机，阻碍了改革。加利对他的继任者也提出了希望：必须维护自己的独立性。同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向加利致敬的决议，各国代表对加利在任期内为联合国所做的工作表示赞扬，安南认为历史将会给加利以好评。有意思的是加利的对头——美国新任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称赞加利是“著名政治家”。加利对此应该感到自豪：他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由

于美国的执意阻挠，加利未能实现连任的愿望，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此他将隐归故里、无所作为，据加利的发言人透露，秘书长卸职后他还愿受邀请，如充当联合国顾问的角色。可以预见，作为一名资深外交家，加利将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韩冰心陈坤徐伟忠汪淼）

长于管理、志在未来的跨世纪秘书长

科菲·安南

1996年底加纳共和国迎来了它历史上一个光辉的时刻。当加纳国内举国欢庆罗林斯再次问鼎总统宝座时，世界上更多的人却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位加纳公民，他就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秘书长科菲·安南。安南是1996年12月17日被任命为接替埃及人加利的联合国第七位秘书长，任期为1997年1月1日至2001年12月31日。安南的当选创下了三个纪录：一、安南是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首任联合国秘书长，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第一位“真正”代表非洲的秘书长；二、安南还是唯一一位在联合国内部几乎未间断地工作了34年的秘书长；三、安南将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位跨世纪秘书长。

难忘的求学经历

在非洲西部，几内亚湾北岸，有一个地形狭长的国家，它西邻科特迪瓦，北接布基纳法索，东毗多哥，南濒大西洋，这就是以盛产黄金而闻名于世，被人美誉为“黄金海岸”的加纳共和国。

1938年的早春时节，在这个共和国中部城市库马西的一个芳族部落酋长家庭里，大家都在翘首祈盼着一个婴儿的出世，这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要是个男孩多好。随着一阵婴儿洪亮的啼哭声，天遂人愿，一个健康、结实的小男孩降生了。这一天正好是周末，老酋长就给自己的第一个儿子起名叫科菲，这在芳族语言中是“星期五”的意思。不知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安排，这个叫科菲的小男孩日后当选世界最高行政首脑也是在星期五。

严父的言传身教、慈母的细心呵护、兄弟姐妹的互助互爱以及殷实、富有的家庭为安南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学习条件。安南在成长过程中受父亲的影响最大。老安南是一个正直、讲原则的人，他不仅是加纳阿桑蒂区首府库马西芳族部落的酋长，也是阿桑蒂皇家法庭的大法官，还是英国在非洲的最大公司——联合非洲有限公司的管理者，具有丰富的行政管理和政治外交经验。耳濡目染，科菲从父亲身上学到了许多管理方面的技能。安南似乎天生就是当领导的材料，他不仅品学兼优，而且在小伙伴中有很强的号召力。任何时候他都是出谋划策的人。12岁时因不满校方提供的劣质食品，他带领同学们举行了罢课活动，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

五六十年代，加纳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那是一个民权抗议活动非常活跃、就众多问题展开激烈辩论的时代。正在库马西理工大学读书的安南也积极投身于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当时他任加纳学生联合会副主席，是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一个雄辩家。在塞拉利昂举行的一次非洲学生领导人会议上，安南作为加纳学生代表发言，他指出，在目前非洲争取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时期，应提防极左思想倾向会损害国家的经济，应适度地与西方国家合作，与西方的对立有极大的冒险性。安南因此被美国福特基金会物色人才的人慧眼相中，得到福特基金会外国学生领导计划的奖学金，赴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麦卡莱斯特学院攻读经济学。这是他第一次远渡重洋，离开非洲大陆，到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地方去。多年后，在回忆起这段初到美国的经历时，安南不无感慨他说：“在圣保罗，我经历了许多人生的第一次，第一次远离非洲，第一次体会到季节如此明显的变化，第一次见识到寒冬，第一次裹上厚重的冬衣，但我坚决不戴耳套，因为那种样子真是很滑稽，直到有一天，我出去买食品时差一点把耳朵冻掉了。于是，我去买了

我所见到的最大的一副耳罩。这使我懂得了：当你初到某个环境时，绝不要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比当地人还懂得多。你必须四处听、四处看，否则会犯一些很严重的错误。这个教训让我一生受用不尽。”在调入联合国工作后，安南仍勤学不辍，又先后取得了日内瓦国际高教学院经济系研究生文凭和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硕士学位。

资深的联合国官员

安南原本为自己设计了丰富多彩的人生：45岁以前经商，然后在加纳政坛上一试身手，60岁后落叶归根，在家乡务农，从事可可种植业，直至在家中安静地逝去。这本是一个完美无憾的生活计划，但这一切却被他接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职位所打乱。

1962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安南来到风光秀丽、景色迷人的瑞士首都日内瓦，在联合国的下属机构——世界卫生组织中担任一名行政官和预算官，这份工作对于年仅24岁的安南来说未免有些枯燥、刻板，也与他从商心愿相去甚远，但当时能为联合国工作是每一个非洲青年梦寐以求的，安南也为此而感到骄傲。两年以后，他渐渐习惯了这份公务员的工作。在随后的30多年中，除了1974~1976年间回国任加纳旅游发展公司总经理外，安南先后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总部以及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等部门工作过，足迹遍布非洲、欧洲、美洲，积累了丰富的的工作经验，尤其对处理联合国错综复杂的事务极为熟练精通。由于安南稳健扎实的工作作风，出色的办事能力，良好的人际关系，1993年3月他被任命为联合国负责维持和平事务的副秘书长，总管全球的维和行动。

安南担任负责维和行动的联合国副秘书长，是仅次于加利秘书长的第二把手，位高权重，掌管着38亿美元的预算经费和7万之众的维和部队，监督着从索马里的派系战争到卢旺达的难民危机，以及波黑地区的多国部队等18项维持和平行动。世人对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褒贬不一，但对安南的表现却众口一辞：能力出众、踏实干练。安南也不失时机地向人们显示他丰富的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早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安南就初露锋芒。当时他协助谈判，成功地令伊拉克释放劫持的西方人质，并解决了50万名被困于科威特和伊拉克的亚洲人问题。这引起了美国国务院和新闻界的注意。其后，安南常被挑选执行敏感的特别任务。

为安南赢得调解人美名的是他在波斯尼亚的使命。1995年11月代顿协议签署之后，科菲·安南作为加利秘书长的特使被派往前南斯拉夫执行联合国和北约之间的交接任务。对已经被人们认为是有希望成为加利秘书长接班人的安南来说，这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波斯尼亚这个被人称作泥潭的地方使许多才能卓著、经验丰富的外交家马失前蹄、无功而返，加利派驻这个地区的前任特使明石康曾在柬埔寨维和行动中大出风头，但却在巴尔干地区使自己的好名声大打折扣。安南如果能够较圆满地完成任务，无疑为自己竞争联合国首脑职位增添了一份厚重的法码——具有处理棘手问题的丰富经验。因为在此之前，有些人对于长期从事行政事务工作而没有任何从政经历的安南要担任联合国秘书长这个复杂、艰巨的职务还指指点点，顾虑颇多。结果证明，安南不辱使命。他再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他卓越的外交才华。他十分巧妙地

周旋于美国、俄罗斯、法国和英国之间，体面地完成了各种任务，既没有损害联合国的利益，也没有伤害与这几个大国的关系，他还以自己坦率、

真诚的工作态度赢得了人们的一致尊重，包括赢得冲突各方的尊重。就连反对维持和平行动、言词犀利的波斯尼亚驻联合国大使沙契尔贝伊也特别称赞安南说：“人们信任他，因为他正直。”人们也许可以从曾与安南在前南斯拉夫地区共事的英国记者和作家威廉·肖克罗斯的回忆中对安南的工作作风略见一斑：“他从不以错误论点掩饰自己，他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从来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1995年11月一个下雨的晚上，我和安南一同前往萨拉热窝塞族区。市长米洛拉德·卡蒂奇对安南解释说，代顿协议对萨拉热窝的塞族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应该重新进行谈判。安南彬彬有礼但又毫不含糊地回答：‘我和你坦率地说，代顿协议是妥协的产物，但是，由于它是各国国家元首签署的，因而是不可更改的。不要试图去改变协议，更确切地说，要努力去实施它。让世界听到你们的声音，知道你们希望和平时生活。’”

安南在外交场合举止儒雅，衣着时髦，但绝不张扬，他喜欢穿灰色西装，使自己的灰色头发和山羊胡子倍显突出。与个性倔强、直率的加利相比，安南总是给人以平静、温和的感觉。在联合国，安南受到同事的普遍尊敬，人缘极好。人们形容他“有才干而不低调，为人沉着而不失幽默感”。

安南一家在纽约罗斯福岛上的一座普通住宅里过着平静无忧的生活，妻子娜内·拉格尔格伦是瑞典艺术家兼律师。他们都是再婚，有3个子女。据说他们是在联合国总部大楼的走廊上一见钟情的。娜内是瑞典外交官拉乌尔·瓦伦堡的外甥女，瓦伦堡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从纳粹手中解救了在匈牙利的数以万计的犹太人。

安南通晓英语、法语和几种非洲语言。爱好网球、壁球，他还是曼彻斯特联队的忠实球迷。

非洲团结的胜利

联合国是国际政治斗争的舞台，历来的联合国秘书长选举都是这种斗争的一个侧面。冷战时期，选举联合国秘书长的斗争焦点主要集中在前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东西方两个集团之间。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国际政治关系正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这次联合国秘书长选举是在世界加快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各国利益尤其是大国之间利益相碰撞又需要妥协的情况下进行的，选举过程主要反映出美国与法国、美国与非洲及国际社会的对抗。

1996年6月以来，联合国在选举下一任秘书长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交锋。现任秘书长加利已经74高龄，在中国社会中，这已是年逾古稀，安享天年的岁数了，也许是因为壮志未酬，不愿心存遗憾地就此踏上归途，他不顾自己的体弱多病以及亲友的善意劝说，再一次在世人面前表达了自己不可动摇的信心和决心：我，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将竞选连任联合国秘书长。和五年前一样，接着他就踏上了艰难而曲折的竞选道路。他四处奔走，访问了许多国家，寻求对他竞选连任的支持。他首先在非洲的土地上吹响了进攻的号角，并赢得了非洲国家的普遍支持。7月，非统组织首脑会议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举行，加利作为特邀贵宾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加利争取连任联合国秘书长。曾鼎力支持加利竞选秘书长一职的法国也从一开始就态度明确，坚决支持加利连任。另外，加利任职期间的功绩为他获得了不少分数，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下任秘书长人选问题上也有意于他，同时他领导下的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方面也建树颇多。从种种迹象表明，加利的连任前景一片光明。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96年6月19日加利正式宣布竞选连任秘书长

后，立即遭到美国的反对。加利 1992 年走马上任之时，正值冷战时期刚刚结束，世界处在新旧格局转换之中。美国利用冷战后对它有利的国际形势，以唯一超级大国自居，公开声称要“领导世界”。把联合国作为实现其霸权野心的工具，是美国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而加利在任期间的所作所为则没能使美国满意，所以美国想找一个比加利更顺从的人当秘书长就不足为怪了。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阻挠加利连任。为了动摇非洲支持加利竞争连任的立场，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出访马里、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南非和安哥拉等五个非洲国家，并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会见了正在那里开会的东非国家领导人。他软硬兼施的游说活动取得了一些成效，他所访问和接触的几个非洲国家，除南非外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支持加利连任的立场：埃塞俄比亚保持沉默；马里说最重要的是联合国秘书长这个职务继续由非洲人担任；坦桑尼亚和安哥拉拒绝公开表态；乌干达和肯尼亚表示，它们关注的是这个位子属于非洲。

尽管如此，非洲国家还是采取了统一步伐。在 11 月 19 日举行的安理会首轮正式投票中，所有非洲国家代表的选票都投给了加利，在所有 15 票中，只有一个刺目的否决票，这无疑是美国的手笔。同时美国还声称，如果非洲国家不能推出统一的候选人，将考虑其他大洲的候选人。为了顾全大局，确保非洲人继续担任这一联合国最高行政职务，加利宣布不再谋求连任，非洲国家相继推出四名候选人，联合国主管维护和平事务的副秘书长科菲·安南，科特迪瓦外长阿马拉·埃西，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哈密德·贾比德和毛里塔尼亚前外长阿卜杜拉。安理会从 12 月 10 日起连续 3 天对这四名候选人进行了 7 次非正式投票，安南得票数始终领先，但常任理事国法国投了反对票。显然，美国在加利连任问题上一意孤行的做法激怒了法国。在这次秘书长人选问题上，本来法国是志在必得：加利连任。但美国却与它唱起了对台戏，不仅否决了加利连任的可能性，还推出一名出自英语非洲地区的候选人安南。法国怎能泰然处之，于是对安南行使了否决权。

在加利之后，法国属意的人物是来自法语非洲国家科特迪瓦的埃西，埃西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他曾任联合国大会主席，比较注意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他曾说过，他会支持保留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有益于穷国的机构，并务必使成员国如美国尽快还债。埃西这一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形象颇受好感，这与始终生活在美国，不熟悉非洲也不为非洲所熟悉的安南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加纳的安南和科特迪瓦的埃西成为下任秘书长的真正热门人选。至于哪一个能获得最后胜利，大家都不敢妄下断言，因为这要看美国和法国角力的结果。不少人都指出，安南与埃西的角逐，是一场关乎语言的争拗——美国要求下任秘书长必须说得一口流利英语，而法国则希望继任者熟操法语。可是明眼人一看便知，纠纷的核心，显然并非美法两国希望当选者能与自己“同声同气”那样简单。法国和美国分别与非洲法语系国家和英语系国家有密切关系，分别对这两类国家有极大影响力，近年来在非洲法语国家阿尔及利亚、卢旺达、布隆迪和扎伊尔所发生的内战、饥荒、惨无人道的屠杀、病毒和难民潮等一系列事件，法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已大不如从前，为重振外交，扩大影响，法国希望有位亲法人士担任秘书长，而美国则希望英语系的安南当选，这样可透过加纳影响未来秘书长的举动，有助于自己以“改革联合国”之名，删除很多援助或有益于第三世界的联合国机构。鉴于这层利害关系，因此就出现了刚才提到的七轮投票中法美展开否

决权大战的场面，双方僵持不下。为打破僵局，非洲国家加强了协调行动，除安南以外的三名候选人宣布退出竞选，本来持反对态度的埃及、博茨瓦纳和几内亚比绍也转而支持安南，投票结果显示为 14：1，法国陷入了势单力孤的境地，为了避免给人以与非洲国家为敌的印象，它被迫让步，最终投了赞成票。安南以十五票获得一致通过，被安理会推荐为下一任秘书长候选人。这确保了非洲人继续担任这个联合国最高行政职务。非洲国家的团结一致、美国的鼎力相助、法国的无奈妥协，使安南顺利当选新一任联合国秘书长。

安南当选联合国秘书长是众望所归，因为无论是人品涵养，还是行政经验，他似乎都无可挑剔。在联合国大会 17 日通过任命加纳的科菲·安南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决议后，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声明，对安理会的决定表示欢迎，称赞安南是“一位公正、精干、熟练、活力充沛的行政人员”，法国总统希拉克说，法国必会毫无保留的支持安南。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表示，安理会提名安南出任联合国秘书长是“恰当的”。英国外交大臣里夫金德热情洋溢地说：“他有丰富的经验。他的经验和优秀的个人品质使他完全有能力领导联合国去处理目前所面临的许多迫切的任务。”俄罗斯副外长西多罗夫说安南的选择确保了“这个组织能够以建设性的步伐继续动作。其他国家也纷纷对安南当选表示欢迎及祝贺。加利在临别赠言中说：“我很高兴是非洲人保有了这个位子，但我想强调，没有任何事情比联合国的名誉更宝贵。它建立在五个支柱之上：公正、平等、效率、成绩和独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也向安南本人发去贺电，热烈祝贺安南的当选。他表示相信安南在履行联合国成员国赋予的重要职责中，“将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加强国际合作作出积极贡献。”

1996 年 12 月 17 日，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会议大厅里将举行新任秘书长安南的就职典礼，同时欢送加利秘书长的卸任。两位风格迥异的秘书长同时出现在会议大厅里，安南身着他偏爱的深灰色西装，打着蓝底圆点领带，更显儒雅气质，而加利仍是那么与众不同，他身着深蓝色的西装，系着鲜红色的领带，虽然五年心力憔悴的秘书长生涯使他本就单薄的身材更显瘦弱，鬓边也多了几许华发，但他翩翩的学者风度与倔强的表情却丝毫未变。当新一任联大主席马来西亚的拉萨利宣布加纳的科菲·安南将出任联合国历史上第七任秘书长时，全场起立，以雷鸣般的掌声向安南表示祝贺。安南在誓词中说：“作为一个非洲的儿子，作为一个职业的国际公务员，我向你们保证，我将尽力而为，不辜负你们对我的信任。”这时人们注意到，坐在后排的加利也对安南报之以掌声，脸上现出了欣慰的笑容。安南宣誓后发表讲话，他说：联合国正处于一个变化的时代。在冷战之后，各国必须在他们准备支持一个怎么样的联合国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我们并不缺乏冷战后联合国的新蓝图。我们需要的是共识和承诺。在冷战结束、超强间的对峙不再左右联合国后，各会员国应重新界定彼此的关系；对联合国的目标和对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理解与措施；而经济的持续发展更是冷战时期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我一个人干不了什么事，但我希望能与 185 个成员国很好地合作，如果我们团结起来，可以为全人类的和平、尊严和正义作出贡献。我有信心领导联合国迈向 21 世纪，迎接兴利除弊的革新挑战。安南掷地有声的话语既是对自己的鼓励，也是对所有会员国的希望。

安南出任联合国新秘书长是有不少有利条件的。首先，他得到联合国安

理会绝大多数成员国的赞成，特别是他得到美国的支持。熟悉联合国事务的人士都清楚，只要美国不故意找茬，联合国秘书长的日子就会好过得多。其次，多数成员国希望加强联合国，盼望联合国在新秘书长的领导下尽快进行必要的改革，摆脱财政危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广泛的作用。另外，前任秘书长加利的改革为安南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尤其是在精简联合国机构与削减预算方面。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安南本人具有改革的决心与经验，他本来就是一位资深、精干的联合国高级官员，在联合国系统工作长达 30 多年，在联合国的许多部门担任过重要职务，其作为国际组织高级官员的领导能力在实践中得到证实并受到各方好评，加上其政治立场较温和、为人又随和。易于被联合国内各方所接受，所有这些为安南履新奠定了基础。

任重而道远

安南将从 1997 年 1 月 1 日起担任这个年薪为 20.58 万美元的要职。五年的任期间，要恢复世人对联合国的信心，解决联合国的财务困境、提高联合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范围的影响力，可谓是任重道远。安南上任伊始，即着重强调了联合国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承诺建立一个精简、有效率的联合国，主张各国协力合作，循序渐进改革联合国。

1 月 2 日是安南上任的第一个工作日，上午 10 时他乘专车来到联合国总部，开始他新的工作。安南在秘书处大楼前受到联合国仪仗队简短而隆重的迎接。许多联合国工作人员聚集在大楼的门厅里，自发地欢迎他们十分熟悉的老同事、老上级正式就任联合国秘书长这一新职务。安南向欢迎的人群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这是我就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第一个工作日，就好像上学的第一天，每个人都对你抱有很大的希望，而你开始的时候不免有点紧张。”安南说：“各会员国已经表明，它们希望联合国有所变化。我想，如果我们携起手来，我们就能取得很多的成就，包括联合国必要的改革。在我们迈向 21 世纪的时刻，如果我们希望联合国适应新的形势，我们就应在一起创造这种变化。”发表讲话后，安南乘电梯来到 38 楼的秘书长办公室。这位新秘书长先与他的助手们一起照像，然后在宽大的办公桌前坐下来，戴上眼镜说：“好，现在就开始工作。”他随即拿起桌上的报告，批阅起第一份文件。

安南上任后，首先着手建立一个精干、协调的领导班子，以便有效地管理联合国。为了在人事安排方面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安南写信给原先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副秘书长和秘书长助理等二十三位联合国高级官员，要求他们全体辞职。但这些高级官员不包括负责维持和平使命的人员，以保证维和任务的连续性；也不包括由联合国大会批准或需要同其他机构协商后才能决定的副秘书长等人员，这主要是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和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这两个机构的主管都是美国人。这种与众不同的做法在联合国历史上尚属首次。过去新秘书长上任后，一般是悄悄地个别调整人事。这个举动似乎让人们觉察到这位外表温文尔雅的秘书长坚定的决心和魄力。最初，这种大幅度的人事变动使联合国内的官员和工作人员感到不安，使国际社会感到有些意外，但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联合国官员说，安南要求高级官员辞职不等于将他们辞退，预料安南将会重新启用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时选用一些主要助手，放到重要岗位上。

果不其然，安南在他任命的一个由八名副秘书长和十名秘书长助理组成的联合国新的领导班子中，有许多就是联合国的老人。新任命的副秘书长是

金永康、尼廷·德赛、明石康、贝尔纳·米耶、基兰·普伦德加斯特、约瑟夫·康纳、汉斯·克里尔和伊科巴尔·里扎，他们分别来自中国、印度、日本、法国、英国、美国、瑞典和巴基斯坦。八名副秘书长的具体分工是，金永康、尼廷·德赛负责经济和社会发展事务；明石康、贝尔纳·米耶和基兰·普伦德加斯特负责人道主义、安全和政治事务；约瑟夫·康纳和汉斯·克里尔负责法律和行政事务；伊科巴尔·里扎主管秘书长行政办公室。新任命的秘书长助理是安杰拉·金、赫德·阿纳比、阿尔瓦罗·德索托、曼菲尔德·埃赛尔、皮埃尔·郝伯瓦斯、丹尼斯·哈利迪、萨米尔·桑巴、班依·塞文、克劳德·埃米和吉利恩·索伦森，他们分别来自牙买加、突尼斯、秘鲁、德国、毛里求斯、爱尔兰、黎巴嫩、塞浦路斯、海地和美国，舆论认为，新领导班子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保持工作的连续性。新班子的大部分成员曾在前任秘书长加利的领导班子里工作过；二是注重加强对美国的工作。让美国人约瑟夫·康纳负责与联合国改革密切相关的预算和行政事务，让另一美国人吉利恩·索伦森负责联合国的对外关系；三是来自西方国家的人士继续掌管政治、法律和维和等重要部门。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安南任用了一批曾公开进行游说活动，反对他接替布特罗斯·加利的高级官员。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加拿大前商人莫里斯·斯特朗。斯特朗曾公开为布特罗斯·加利连任进行竞选活动，他预言，当时的美国首席代表奥尔布赖特使加利下台的努力将会失败。安南任命他为新设立的“改革实施协调员”，直接向自己汇报工作，而不是向负责联合国行政和管理事务的副秘书长（美国人）约瑟夫·康纳报告。这项任命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担心：斯特朗可能篡夺或重叠康纳目前行使的一些职能。新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对安南任命斯特朗一事的第一反应就是“为什么是斯特朗”？对这件事，安南解释说：“更迭是一个进程，不是一个事件。康纳继续从事使联合国发挥更有效作用的工作，而斯特朗的工作则是与联合国各成员国进行接触，制订出反映它们在改革方面的看法的计划。”

势在必行的联合国改革

作为当代世界上最具普遍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尽管道路是曲曲折折、坎坷不平的，但它的生命力、影响力与重要性却与日俱增。当今的联合国已经成为处理世界事务的核心机构，它对于国际社会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是功不可没。但当世界即将迈入21世纪时，当国际社会纷纷呼吁提高联合国的地位，强化联合国的作用时，当人们期待着联合国在处理重大国际争端和全球性问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时，联合国却没有了足够的信心与实力去回应这些期待与呼吁。它所面临的是一系列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陈旧、不合时宜的组织原则和运营体制，逐渐陷入困境并遭受多方批评的维和行动，捉襟见肘、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以及严重的、人浮于事的官僚主义作风。这些问题严重束缚与影响了联合国进一步发挥作用和发展壮大，联合国要想确定自己在风云多变的世界中的强有力的地位，理应适应时代的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

联合国改革是大势所趋，这是由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冷战后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是主要的外因。众所周知，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带有深刻的历史烙印，联合国现有的组织原则与运营机制仍是二战后组织框架的延续，难以反映国际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现实。正如加利秘书长所说：“今天全球化正加速进行，同时分崩离析的力量也在增长。这两种现象及它

们所带来的新机遇和新问题，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一个切实有效的联合国。”联合国已从成立之初的 51 个成员国发展到现在的 185 个，发展中国家数目大大增加，它们要求联合国实行改革，以更好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联合国机构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如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资源不能有效合理配置及财政危机，则是其需要改革的内因。联合国需要通过自身内部机制的改革，更好地服务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联合国必须改革，这既是联合国自身生存发展所不可避免的，更是国际形势发展之必然。

国际社会对于联合国改革已经酝酿多年，各类改革方案、主张、建议纷纷出台。目前，联合国的改革焦点主要集中在三大方面：安理会的扩大和常任理事国的增添原则；成员国的会费分摊比例调整；确定联合国在新形势下的经费使用主要方向。在这三个问题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尖锐矛盾和根本分歧。广大发展中国家主张从全球整体利益出发，坚持联合国的任何改革必须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希望即将进入新世纪的联合国能更加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大国则千方百计试图把联合国演变为“国际富人俱乐部”，并使之成为其谋取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和推行其价值观念的工具。

但不管怎么说，联合国的改革已不可逆转，这一点已经成为大多数成员国的共识。由于安南是在要求联合国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形势下，被推上这个世界组织的最高行政长官职位的，所以在任职的五年间，不管联合国的改革有多艰难，不管最后采取何种改革方案，他都必须克服重重障碍，逆流而上，将改革的进程向前推进，不能再议而下决，安南在 1 月 2 日正式上任之际着重强调了改革的重要性，并呼吁所有成员国给予必要的支持。他指出，只有成员国一起努力，联合国才能迈开改革的步伐并“取得很大的成就”。

目前在联合国的各项工作中，联大各改革工作组的活动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它们的工作既取得一些进展，又面临诸多困难。联合国有五个改革工作组：和平纲领工作组、发展纲领工作组、安理会改革工作组、财政状况工作组及加强联合国系统工作组。前两个工作组旨在重新界定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以及在发展领域方面的作用和目标。后三个工作组主要着眼于联合国内部机制的改革与调整。两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联合国大会一直强调一揽子改革方案，不能只进行局部改革。1996 年 10 月，在联合国成立 50 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对联合国及其理想作出庄严承诺，是推动联合国改革的一次重大努力。从目前的情况看，联合国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各工作组分别向联大提出了进度报告，有的已就某些问题达成共识。然而，由于各成员国对改革抱有不同的目的，必然有一些利益冲突。所以，在如何改革的问题上还存在着许多分歧，有些分歧是尖锐的。

维和改革举步维艰

长期以来，维持和平行动一直是联合国的主要使命。尤其是近年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规模与数量创历史纪录。1990~1994 年间，联合国授权的维和行动次数超过过去 44 年的总和，1993 年联合国维和行动经费开支高达 36 亿美元，为 1986 年的 16 倍。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在缓解地区冲突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同时，随着维和行动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频繁使用强制性手段，并越来越多地涉及别国内部事务，甚至直接卷入冲突，使维和

行动一再陷入困境。究其原因有三点：

一、冷战结束后，冲突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国内不同种族、民族、宗教和派别之间，冲突的性质发生变化，联合国正开始介入在原本意义上属于“国内管辖”的内部冲突。这实际上已有超越《联合国宪章》中的既定原则倾向，即不干涉别国内政。

二、联合国与其成员国和有关地区组织间对维和行动指挥权的分配与协调有争议，在海湾与波黑等地区的维和行动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强迫联合国授权其使用武力，并与联合国安理会争夺维和行动主导权，致使维和行动陷入混乱。

三、维和部队要在同一冲突地区实施从调停、人道主义救援到使用武力等多项任务是十分艰难的。

由此看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联合国维和行动已受到很大冲击，一些宪章中所规定的维和行动原则及运作规则受到现实的挑战，必须及时制定新的和平纲领，对维和行动原则与准则进行重新规范。在讨论和平纲领问题上，美国与少数大国力图利用维和之机，采取制裁等手段，干涉他国内政，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它们主张维和行动应进一步扩大到对有关国家内政干预，并提出采用军事手段的同时，将经济制裁作为维和行动的手段之一。此项提议已遭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第五十届联大发言时提出了中国政府在维和行动原则上的立场，认为联合国维和行动应确立和遵循以下指导原则：

——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特别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

——坚持以斡旋、调解、谈判等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不应该动辄采取强制性行动。即使是人道主义行动，也不应诉诸军事手段。

——反对实行双重标准，不能把个别或少数国家的政策主张强加给联合国安理会。不能允许少数国家假联合国之名，行军事干涉之实。

——采取维和行动，要遵循事先征得当事国的同意，严守中立，除自卫外不得使用武力等被历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一系列原则。

——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条件不成熟时不应该建立维和行动，更不应该使之成为冲突一方，偏离维和的根本方向。具有丰富维和经验的安南将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改革投入更多的精力。他表示，在新形势下，维和行动仍将是联合国的主要使命。安南主张“安理会以武力强行实施秩序”，认为冷战后应“适度扩大联合国的维持和平作用”。

安南是联合国预防性外交的积极推行者。他认为，要解决维和行动经费不足的最好办法是进行更有效的“预防性外交”，在潜在冲突爆发成暴力行动之前就制止它们。安南进一步阐述了“预防性外交”：尊重各国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预防性外交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加强平等的磋商和对话，增进相互信任，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和分歧，是预防性外交的基本内容；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减少贫困，是预防性外交获得成功的根本保证。为了推进预防性外交，安南建议：（1）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应和各国政府配合协调，以增强对危机的反应能力和处理能力；（2）联合国应建立一支能迅速部署的区域性多国维持和平部队来实现维和行动，这样就有可能避免像1994年卢旺达集团大屠杀惨剧的发生，就可以更有效地达到维持和平的目的；（3）建

立一个预警系统，以评估对和平的可能威胁，并由安理会查明可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经济和社会形势。

鉴于现在愿意参加维和行动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少了，安南认为联合国的主要任务是说服各国政府应当有更广的安全概念，不能局限于各国的国家利益。他对密特朗的一句话推崇备至：“如果我们任凭幻想欺骗自己，即我们能够为某些人提供一个可居住的世界，结果将是为所有的人提供一个无法居住的世界。”安南表示“我们应该找寻一些方法、途径来鼓励会员国对地区危机做出积极的反应，因为其中的一些潜在的而又是现实的危机有可能破坏整个地区的稳定”。

发展问题日趋重要

联合国自成立以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国际政治中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上，而冷战结束后，经济因素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因素。经济安全已成为各国发展战略的重点，并将直接影响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尽管早在 70 年代，联合国就已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但事实上，南北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壁垒与经贸控制也在不断加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成为联合国的历史使命。这也是新一任秘书长在五年时间中必须努力解决的一大难题。

在讨论发展纲领问题时，一些西方国家无视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透过联合国进行发展援助的要求，它们不愿承诺外援义务，并向发展中国家提出一些与经济无关的要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求联合国预算实现零增长，好像改革就是节支，他们提出逐步废除经社理事会和贸发会，由一个所谓的“经济安全理事会”取而代之。但另一方面，它们却在保护人权、扩大民主等领域内极力主张充实机构，增加资金，以利推销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与发达国家不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主张：（1）联合国应加强其在经济与发展方面机构的职能，经社理事会与贸发会议的职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更不能取消或合并；（2）在联合国系统内，发展问题必须与政治问题脱钩，发展与人权问题应是平行的，应当就事论事；（3）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金额应摆脱逐年递减的势头，努力达到联合国规定的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0.7% 的目标。

在就职演说中，安南曾大声疾呼：“让我们确保那些最有能力提供帮助的成员国在经济问题上能听到联合国的声音。”因为他一上任就面临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降到历史的最低点这一现实。据经合组织统计，1995 年，发达国家政府提供的发展援助总额为 588.9 亿美元，只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0.27%，为 1950 年来最低水平。在发达国家政府发展援助不断减少的同时，其私营经济部门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却再次打破历史纪录，1995 年达 920 亿美元。所以，安南在继续呼吁发达国家增加政府开发援助，加强联合国的经济与发展部门的同时，已开始探求由私营企业与联合国建立伙伴关系，援助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的可能性。在达沃斯全球经济论坛上，安南呼吁，联合国和私营部门共同努力，“以使全世界的 60% 的人口进入市场”。安南提出的由成员国政府—私营企业—联合国—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四位一体发展援助模式是一种新的尝试，旨在摆脱对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单一依赖，符合国际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极有可能被广大成员国所接受。

安理会改革尚难进行

安理会在联合国诸多机构中地位重要，所以它的改革一直是各国关注的

集点。1992年联大通过由日本、印度等36国提出的关于《安理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的问题》决议案后，大多数国家主张根据联合国成员已扩大到185国及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加强的现实，进一步扩大安理会成员国数量，使其更具代表性和权威性。1993年联合国成立安理会改革小组，专门征求各国的建议，汇集方案，提交大会审议。结果，185个成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形成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提出的只吸收德、日为常任理事国的“快捷法”，它们坚持把对联合国出钱多少作为增加新常任理事国的标准，坚称目前只有日、德两个经济大国最符合条件，要先行一步，并声称如果不让它们进来，就反对扩大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安理会；二是北欧国家提出的“2+3”方案，即常任理事国扩大不仅包括德、日，而且从亚、非、拉三大洲各产生一名；三是不结盟国家提出的在常任理事国扩大问题处于僵持的情况下，首先将非常任理事国扩大6至10个。由于“快捷法”的实质是要保持西方在安理会中的优势，它实际上排斥了增加发展中国家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可能。同时也有违《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三条关于选举安理会成员国时，也宜充分斟酌地域上之公允分配的原则，理所当然地遭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对。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强调新成员的地区平均分配原则，反对以对联合国出钱多少作为接纳新成员的唯一标准，不赞成日、德先行，而置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地区平均分配要求于不顾。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关于安理会的改革，安南认为目前的安理会组成反映的是1945年的政治经济现实，赞成扩充安理会，但表示除日本和德国以外，亚洲、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有权利要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至于多少国家、哪些国家和入会的时间，则均要由各会员来共同决定。安理会改革是联合国中最重要的方面，分歧也最大。由于各方意见相距甚远，而且涉及联合国宪章的重大修改，在一定时期内，安理会的改革尚难取得较大进展。

财政改革是基础

安南上任后，把进行财政改革放在了优先考虑的位置。财政改革的原因在于财政危机，联合国的财政危机早已告急，各种开支捉襟见肘，联合国拖欠的债务及维持和平活动的经费，时常超过20亿美元，但每年财政预算仅为13亿美元，由于经费严重不足，大大影响了联合国的运转和办事效率，尤其是维和行动屡遭挫折与此不无关系。如果财政危机不能得到解决，整个联合国机构的运转势必陷入困境，各种改革更是纸上谈兵。而联合国财政危机本质上是“支付危机”，即由于某些成员国不交或拖欠会费造成的。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一些国家，特别是弱小发展中国家因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无力缴纳应承担的会费。二是个别大国出于政治目的拒绝缴纳会费，要挟联合国。特别是美国，它是联合国最大的捐助国，应承担联合国25%的经费和大部分的和平维持费，但同时它也是拖欠费用最多的国家，在联合国各成员国拖欠的总计为23亿美元的会费当中，美国就占了一半以上，达13亿之多。因此，联合国财政改革的关键是解决这种政治性的“支付危机”。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却提出了“责任支付原则”改革方案，即谁在联合国承担的责任大，谁就应分摊更多会费；谁分摊会费多，谁就拥有在联合国事务中更大的发言权。显然，这个原则实际上削弱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地位。因此，联合国的财政危机问题远比单纯的经济数字复杂得多。

联合国会费分摊比例调整是财政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会费分摊比例问题上，美国和日本等西方经济大国以联合国会费分摊不合理为由，企图改变联大有关决议和多年来的传统做法，要将现行的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支付能力确定会费比例的做法改为变相的平均摊派，并提出限定最高比例不得超过总额的 20%。例如，把美国目前占联合国会费总收入的 25% 降为 20%，而把更多的费用转移到经济增长很快的东南亚。不难看出，这些主张实质上是要把联合国沉重的财务包袱甩给发展中国家，大大减少它们自己的分摊比例。如果这一目的不能达到，就要求在联合国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目前发展中国家正在积极抵制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图谋。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批评美国不履行联合国的法律义务，并指出会费分摊比例是根据联大决议，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支付能力而确定的，是行之有效的做法，反对大国在改革的幌子下向其他国家转嫁财政负担，并希望美国支付更多的款项，以便更恰当地反映它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在此问题上，各方争论不休，短时间内谁也不会做出让步。

为解决目前的财政危机，挽救联合国濒临破产的境地，最紧迫的办法在于敦促美国尽快缴清拖欠的巨额会费。美国政府和国会都曾表示，只要“阻碍联合国改革”的加利不再连任，美国将会解决欠款问题。安南当选后，已经不止一次公开表示要将解决会费拖欠问题作为其上任后的“首要任务之一”，他把自己出访的第一站定在了华盛顿，以求改善联合国与美国的关系，并明确敦促美国缴款。美国政府发言人也作出了“希望付清”的承诺，但美国的诺言何时能够兑现尚是未知数。美国并非没有能力付款，刚刚赢得连任的克林顿政府也应该有办法说服国会同意付款，现在的关键是美国要把缴付会费作为诱饵和要挟的手段，乘机对安南和联合国提出种种苛刻的要求，这就增添了解决联合国财政危机的复杂性。一些人士估计，美国有可能在近期内缴纳部分欠款，作为对安南领导下的联合国作出的一种积极姿态，但不会痛痛快快地尽快全部付清所欠会费。安南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表示，联合国离不开美国，正如美国离不开联合国一样，双方应开展积极的合作，希望美国在五年内支付拖欠会费。

行政改革先行一步

加强联合国系统是联合国改革的重要一环，其目的是更好地发挥联合国系统的作用和效能，它包括两个重点，即加强联合国大会的作用和提高秘书处的能力。对此，各国已有一些共识。如普遍认为，联大是联合国的最高政治机关，应加强联大主席的作用，包括建立联大主席与安理会和经社理事会主席的协商制度。同时确保大会对秘书处的监督机制。一些国家呼吁改变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让联大发挥更大的影响，改变目前“沦为其他机构的橡皮图章”的状况。安南在谈到秘书长本身的工作时说，秘书长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既有行政管理职能，又有政治和外交职能。秘书长可以做很多事，但我们不能比各会员国所要求的做得更多。我们可以提出独立的看法和建议。如各国都积极认真地参与，事情就好办了。他还表示，他不想改变秘书长按区域轮换担任和每个地区任期两届的惯例。在提高秘书处工作能力问题上，各国对加强责任制和秘书处人员管理方面意见一致，但在秘书长的作用和甄选问题上有不少分歧。一些国家建议，在甄选秘书长时应加强联大的作用，使甄选工作更加透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甄选秘书长过程中不能使用否决权；可考虑成立由大会和安理会共同组成的推荐人选委员会，并对秘书

长的任期等进行改革。从本次秘书长选举中，美国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导致选举工作陷于僵局的情况看，这些建议是有道理的。

行政改革是联合国系统改革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是最“轻而易举”的。安南以此为突破口，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目前，安南正在采取“双轨制”办法推进联合国的行政改革。一方面是当前改革方案，即他着手在自己直接掌管的联合国秘书处系统内进行“职权允许范围内”的积极改革，包括十个方面：一是减少预算，将联合国 1998 年至 1999 年预算缩减 1.23 亿美元；二是裁减人员 1000 名；三是削减 1/3 的行政开支（目前行政开支占日常预算的 38%），节省下来的钱用于发展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项目；四是改善联合国在国家一级的一体化水平，加强联合国在一些国家所设办事处及机构的领导人和协调员的作用，使各国政府真正是与一体化的联合国打交道；五是巩固联合国经济和社会部，将目前分散在联合国三个部门的经济和社会部门合并成一个部；六是加强联合国的技术支持，将目前分散在各部门的向大会和各种会议提供技术支持的部门合并，组建联合国大会事务及会议事务厅；七是成立通讯及传媒厅取代目前的联合国新闻部，以便为各国政府、新闻媒体及民间团体提供更及时的信息服务；八是精简行政、财政、人事、采购及其他服务部门，以便联合国的管理进入新水平；九是制定联合国行为准则；十是把联合国秘书处的文件、文书减少 25%，并对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文件页数分别作了限定，最迟于 1998 年底实现此目标。为确保改革方案步步落实，安南已经建立了“内阁式”的联合国行政领导班子，组成由秘书处各部门以及联合国各大基金会和各计划署最高级官员组成的“政策协调小组”，协调联合国的各项工作，缩小行政管理机构，着手撤并工作部门，他还特地任命了一位曾反对他当选但力主联合国改革并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加拿大人当他的“改革行政协调员”。另一方面是联合国长期行动方案。安南将同成员国政府的代表广泛接触，商讨有关整个联合国组织全面机构和结构改革的方案。他还宣布，他将在 1997 年 7 月底之前正式拿出有关联合国改革的“一揽子方案”，然后提交秋季的联合国大会审议。对于联合国的改革特别是敏感复杂的人员和机构精简工作，安南不仅亲自抓，而且先从他自己的办公室做起。他果断地取消了设置已久的三名联合国秘书长政治顾问职位，自己直接向下属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和进行决策。

上述举措表明，安南的改革决心坚定，倾向明显。而且，人们普遍注意到安南的改革步骤谨慎稳健，不冒进，更不急进。针对某些成员国对联合国改革提出的显然出于私利的改革要求和片面、急于求成的改革设想，安南多次明确强调：联合国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等特点。急躁冒进和畏难情绪都是不可取的。改革不能一厢情愿，而应充分听取广大成员国的意见和要求，并在他们的肯定和支持下进行。他为联合国改革确定的原则和目标是：力争把联合国改变成一个“更精干、更有效、更有力的国际组织”，使之真正能适应冷战后世界的各种新挑战，能够不负 185 个成员国的期望。他公开反对有人把联合国的改革简单归结为大砍预算和大裁人员的说法，认为联合国在改革进程中有必要在职员培训和设备技术更新等方面增加必要的投资，并力主联合国在促进国际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更加积极具体的作用，而不能将联合国的作用局限于国际维和以及解决地区冲突等应急方面。

对于安南的改革举措，目前大多数成员国表示理解和赞赏，但也有极少

数国家表示出不满和不耐烦，认为安南的改革步伐过小，速度过慢。美国国内的一些极端势力甚至对安南的改革加以指责和要挟，公开提出如果安南不能满足美国对联合国提出的改革要求，美国就不会缴付拖欠联合国的 10 多亿美元会费。这种蛮横挂钩的说法正遭到国际舆论的广泛谴责。就连《纽约时报》在最近的文章中也对这种“挂钩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安南的改革需要时间，华盛顿只有与安南正在着手进行的联合国改革保持一定距离才是明智的。

谨慎处理与美国的关系

身为新任职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迫在眉睫的外交挑战，并不是在喀布残破不堪的内战废墟，也不在非洲中部的湿热雨林区，安南的最大挑战来自华盛顿国会山庄的议事殿堂。安南必须赢得美国国会领袖的一致信任。

美国在联合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不正常现象，美国既是联合国最大的债权国，也是最大的债务国。这个现象的背景是发人深思的。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和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及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格局的消失，给世界局势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世界形势趋向缓和、趋向多极化，经济因素在各国自身的国家战略和国际关系中的作用都大大上升，谋求和平、稳定、发展与合作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形势的主流。但冷战思维、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在全球权力结构中，美国算得上是独一无二的超强，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上缴联合国会费比例最高的国家，联合国能苦苦支撑到现在，与美国的强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但这位财大气粗的强人常常为了谋取私利，在国际事务中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特别是在联合国，它常常颐指气使，炮制这个议案那个声明，挟联

联合国以令全世界，在美国一些国会议员眼中，联合国应该是他们忠实的、说一不二的仆人，出钱养活你，你就应该识好歹，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有二心或办事不利，那就要你尝尝断顿儿的滋味。美国国会拒绝偿付积欠联合国已久的 13 亿美元债务，就是因为国会议员普遍认为，联合国非但绩效不彰，甚至还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深怀敌意，不热衷支持。加利就是美国强权政治的牺牲品。这位埃及贵族世胄出身的秘书长，未能全然领会美国政治的精髓，更不懂得在美国朝野、媒体、国会或其他领域中厚植人脉、广结善缘，最终在美国政府和国会丧尽人心。相形之下，新任秘书长安南在这方面优势明显，安南年青时曾两次在美国留学，受美国影响很深，对美国印象很好。他在美国政界、外交界有许多朋友，据说，他与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奥尔布赖特就是私底下的好朋友。所以，人们预测，安南也许将在受美国影响颇大的联合国中有所作为，起码能够促使美国尽快缴纳所欠会费。

安南是在美国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当选新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美国对他的当选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和要求。在他被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后，美国总统克林顿当晚就同他通了电话，邀请他尽快到华盛顿会晤。与此同时，美国国会的实力派人物、参议院外委会主席赫尔姆斯也请他到华盛顿商议。显然，这一切表示善意的行动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拉拢这位新任秘书长，使他在行事中能够领会和接受华盛顿的授意。但安南毕竟是来自非洲大陆的第一位黑人秘书长，在 1996 年的竞选中如果没有非洲国家的全力支持，他同样不会成功。因此，面对广大的成员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安南深知作为联合国秘书长不能过分迁就美国等西方大国的要求，更不能按照华盛顿的霸权旨意办

事，而必须尽可能保持公正。他曾屡次明确表示：“我向来是独立自主的人，不会依附于任何人。我将谋求同所有国家进行合作，我是整个世界的秘书长。”一边是一手扶持自己的超级大国，一边是与自己利益相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安南天平上的法码究竟孰重孰轻，他在处理中不得不慎而又慎。

安南能否重蹈加利秘书长的覆辙，因独立超然勇于任事得罪大国，而被拉下马来，抑或只是受大国左右的工具傀儡，则首先要看他能否加速完成联合国的改革，解决联合国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安南面临严峻考验。

（陈坤）

